中国军事通史 第九卷

隋代军事史

目　录

第九卷　隋代军事史

书末附图：

绪 论

《隋代军事史》是《中国军事通史》的一个分卷，它叙述隋朝自建立迄灭亡的军事发展的历史。全书共 6 章、24 节，其内容主要包括该时期的战争、军制、国防、武器装备、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等。本书写作的指导思想是，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隋朝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军事问题的内在联系入手，通过对该时期诸多军事问题的系统而全面的阐述，着重探讨和揭示有隋一代军事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从而给广大军内外读者学习祖国军事历史、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有益启迪。

隋代（581～618 年）是继我国南北朝之后所建立的一个统一而短暂的封建王朝，历文帝、炀帝等，共存在 38 年。开皇元年（581 年），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建立隋朝以后，由于他能顺应历史潮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采取一系列有益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改革措施，不仅巩固了政权，增强了国力，顺利地实现了统一南北之大业，而且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仅在 20 多年间，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辛勤和创造性的劳动，便把隋朝建设成为当时世界上比较繁荣富强的封建国家。大业元年（605 年），杨广称帝执政后，由于他“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①，推行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的违背国情民意的政策，在其执政后仅仅 14 个年头，竟把繁荣富强的隋王朝搞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而最终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强大力量和统治阶级内部反对势力的交错打击下走向灭亡。通观隋代历

①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评语。

史，其经济文化之繁荣、国家实力之强大、社会矛盾之激烈、存世时间之短暂，乃是其突出特点；而隋代之军事，恰是在此种特定条件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

军事是从属于政治，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军事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是以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为根本前提，而且将直接随着政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因此，隋代军事既反映了隋代的经济，也反映了隋代的政治。隋朝存世时间虽然短暂，但其上承北朝遗绪，下开李唐盛业，在中国中世纪历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而此种地位和影响，不但突出地表现在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科技的发展方面，而且也集中地体现在其军事的发展方面。隋代军事发展的基本轨迹、特点，其历史地位和影响，颇多发人深思之处。这里，仅就隋代军事的四个问题，概括而简明地申论于卷首。

一、规模浩大、类型多样的隋代战争，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古代军事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这是隋代军事的显著特点之一。

隋代在其存在的38年中，各类战争或军事冲突频繁不断①。在诸多战争中，给隋代社会乃至后世历史发展以重大影响的，则主要有文帝时期的南下灭陈之战、炀帝时期三攻高丽之战和隋末农民起义战争。上述之三种战争，由于其阶级属性和目的之不同，战争实践所带给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同。隋灭陈之战，是体现以隋文帝为首的隋朝统治阶级意志的，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社会进步需要的统一战争。因而它的胜利，不仅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分裂割据的局面，为隋代社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唐代盛世的形成和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较长期统一稳定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隋灭陈之战，又是继西晋初年的晋灭吴战争之后，我国古代又一次大规模江上作战的成功战例。

① 据胡如雷先生统计，仅大业七年至大业十四年（611～618年）的7年中，前后爆发的农民起义多达126起，地主官僚起兵约有60起。

如将这两次江上作战情况加以比较，则不难看出，隋灭陈之战无论在主观指导上，或是在客观效应上，均较晋灭吴之战更具鲜明特色。从战争准备的时间看，隋灭陈是在经过 8 年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发动的，比晋灭吴的战争准备时间（如从司马昭提出灭吴战略设想后算起，到攻吴作战之发动，其准备时间前后历时长达 17 年），缩短了一半；从出动的兵力数量来看，隋灭陈出动了水陆军 51 万余人，约为晋灭吴之战晋军兵力（20 余万）的 2.5 倍；从作战持续的时间看，隋灭陈之战不足 1 个月即告胜利，约为晋灭吴作战时间（5 个月）的 1/5；从战后的客观效应来看，隋灭陈后出现了隋唐近 320 年的统一发展局面，几乎是晋灭吴后出现的短暂统一时间（晋灭吴后全国统一时间约 37 年，又出现了十六国到南北朝近 3 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的 9 倍。从上述两战诸多方面的比较，不仅清楚地说明，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晚于西晋约 3 个世纪的隋朝，具有比西晋更加强大的综合国力，而这恰是隋灭陈战争得以顺利实施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充分地证明，隋朝统治者具有比西晋统治者谋胜一筹的战争指导，而这又是隋灭陈战争得以迅速取胜的主观条件。隋灭陈之战以其战果辉煌的战争实践所创造的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的大规模江上战役作战的成功战例，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古代水上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令人瞩目的新鲜经验。

大业八年至十年（612～614 年）隋军接连三次对高丽的大规模战争，是体现以隋炀帝为首的隋朝统治阶级意志的、规模浩大的对外征伐的战争。尽管这场战争不无巩固国防、开拓发展之目的性，然而由于隋炀帝杨广统治后期加紧推行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政策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故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遭到国内人民普遍而强烈的反对。这既是导发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原因，又是造成进攻高丽之战连续失败的基本因素。可见，炀帝发动的三攻高丽之战，非但未能按原计划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倒成为炀

帝及其隋王朝“丧身灭国”① 的发端。

隋末农民起义战争，是体现隋代社会以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意志的人民革命战争。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战争（诸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新莽末年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等）相比较，隋末农民起义战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主要是其斗争规模的空前性、波及范围的广泛性、抗暴夺权目标的明确性、作战指挥的艺术性，以及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错综交织的复杂性，等等。这些为以往农民起义战争所罕见的显著特点，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古代农民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库，提供了经验教训，增添了奇光异彩。持续长达 7 年之久的隋末农民起义战争，虽因最后遭到失败而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目标，但它在加速新旧王朝更迭的时代变革中，所发挥出来的无可替代的革命暴力作用及其伟大历史功绩，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马克思曾经深刻而形象地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② 用马克思这一关于革命暴力历史作用的科学论断，来认识和评价隋末农民起义战争在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所做出的伟大历史贡献，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二、以府兵制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制度改革，不仅为隋末兵役制度和武装力量的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唐代前期兵制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了经验。这是隋代军事的显著特点之二。

府兵制作为一种军事制度，是由西魏丞相宇文泰于大统八年（542 年）创建并行于整个北周统治时期的。当时，宇文氏为了达到控制军队以维护其鲜卑部族统治之目的，下令把府兵军将及其所属士卒统统改易鲜卑姓氏，故西魏、北周的府兵带有鲜卑部族私兵的浓重色彩。从这一点上讲，该时期的府兵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国家军队。但自杨坚担任北周大丞相总揽朝政以后，特别是在其取代北周称帝建隋以后，他从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和巩固

①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史臣评语。

② 《资本论》第 1 卷 819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王朝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同时，对以府兵制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制度，也进行了全新性的大胆改革与改造。从其改革府兵制的诸多举措来看，隋代在以府兵制为主体的国家武装力量建设上，较好地发挥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其主要历史贡献，概言之有三：

第一，废除府兵的鲜卑赐姓，恢复府兵中的汉族本姓，从而消除了府兵的鲜卑私兵之印记，使府兵真正成为由封建中央掌握的国家军队。

第二，大力整顿地方武装，将乡兵部曲纳入府兵系统，扩大了封建中央掌握兵员的范围，增强了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

第三，将府兵编入民籍，实行兵民合治的新型府兵制度。这是隋文帝杨坚在府兵制改革上所推出的最具重大意义和影响的举措。隋对府兵制的这一带根本性的改革，是与当时整个封建政治、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的，它是建立在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政治目的、以推行均田制为经济基础的一种寓兵于农、兵民合治的新型府兵制度。这种新型府兵制度，具有两个主要的鲜明特点：一是集军籍与民籍二重性于府兵一身，这是北周府兵所没有的新特点。在平时正常情况下，府兵直属于所在州县地方政府管辖，同一般民户一样从事生产和生活，具有"民籍"性质；但在应征服役期间，则在军府统管和组织下，进行军事训练，遂行宿卫或作战任务，具有"军籍"性质。二是建有一套较为严密的卫府组织体制，在封建皇帝的旨意下对全国府兵实施自上而下的组织指挥。旧史虽称隋朝的卫府体制是沿用西魏、北周"十二大将军的遗制"，但它决不是简单的因袭旧制，而是从隋朝的客观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经过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封建中央军事指挥体系，并且经历了由文帝时期的十二卫府制到炀帝时期的十六卫府制的发展变化，从而使隋朝的卫府制度更加日臻完善和趋于系统化、严密化。并为继隋而兴的唐代前期所实行之府兵制，提供了基本经验和具体模式。唐朝自武德初至开元末（618～741年）的120余年间，其所行兵役制度和武装力量体制，实际乃是对隋代创建的

新型府兵制的继承和发展。

三、以修筑长城、开凿运河、建置仓储、发展军事装备等为重点项目的国防建设，不仅为隋朝国力的增强奠定了雄厚基础，而且为后世国防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这是隋代军事的显著特点之三。

综观隋代历史，可以看出，隋代从巩固政权、开拓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大力加强经济、政治、军事建设的同时，也狠抓了国防战备建设，其中影响较大的工程项目，主要有以下四项：

一是修筑长城。隋朝建立后，为了北防突厥和西御吐谷浑，从开皇元年至大业六年（581～610年），曾前后7次于北部及西北部边境地区修筑长城或缘边增筑城垒。从总体上看，隋代的长城和筑垒，虽是在前代北魏及周、齐已筑长城基础上的“补苴阙失”①，然而，恰恰是经过隋代的多次施工，才使“长城全部，东迄榆关（今山海关），西终甘肃，始告完备，且统一矣”②。这不但增强了隋朝抗击突厥、吐谷浑袭扰的防御能力，而且对我国古代北部边防以长城为主体的筑城防御体系的建设，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二是开凿运河。从开皇四年至大业六年（584～610年），隋朝曾6次调发数百万人开凿了广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等5条大型运河，总长近5000里。这不但沟通了东西南北之战略交通，把隋朝两大政治中心，即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同黄河南北、江淮南北广大地区更紧密联系起来，利于国家有效的统治与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唐以后国家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继续发挥着重要历史作用。

三是建置仓储。置仓储谷，这是我国各封建王朝大都实行的以维系本朝财政机制正常运转的重要制度③，也是备战备荒、加强国防的重要措施。但是，像隋代仓储规模之巨大，制度之明确，藏量之丰实，这在隋以前是不多见的。隋朝所建之仓储分为官仓和

---

①② 寿鹏飞：《历代长城考》（见《得天庐存稿之二》，1941年印行）。

③ 参见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前言》，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

义仓两种。全国所设官仓计有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卫州黎阳仓，洛州河阳仓，陕州常平仓、太原仓，华州广通仓、永丰仓等。其中，以洛口仓为最大，回洛仓次之，两仓共储粮谷 2424 万石，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开皇三年（583年）五月，隋文帝采纳民部尚书长孙平建议，开始设置义仓，并将其作为一种"定式"（即固定制度）推广到各州县。从《隋书·食货志》记载来看，此种义仓有如下之特点：其一、它是由"诸州百姓及军人"通过"劝课"方式而自愿出粟所设；其二、所出粟谷品种"随其所得"之谷物，没有固定的要求；其三、仓窖置于捐谷者之所在村社，委托社司负责管理；其四、所积仓谷用于灾年"赈给""当社有饥馑者"。由此可见，隋代之义仓乃是一种民间生产生活自救性质的仓储制度。隋以前历代民间虽然也有捐谷自救的活动，但是，将义仓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定制度而行于后世，首创之功当推隋代。①

官仓和义仓在隋代的普遍建置，不仅有利于当朝备战备荒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为后继者唐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贞观二年（628 年），唐太宗在与黄门侍郎王珪的一次谈话中，曾明确指出：隋代"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② 在隋亡 20 年后的贞观十一年（637 年），侍御史马周在其给唐太宗的奏疏中，再次指出：隋代所留下的积蓄"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③。这充分说明，李唐盛业的开创，是建立在隋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极为丰厚的物质财富基础之上的。

四是发展军事装备。从现存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情况看，隋代的许多兵器，较之前代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没有多大发展变化，但在水上作战的主要装备舰船的制造和应用上，却有突出的发展。隋代舰船业是在隋初实施灭陈战争准备的过程中，迅速发

① 参见《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义仓》。

② 《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第三十四》。

③ 《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

展起来的。与前代相较，隋代舰船业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制造规模之大、舰船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隋朝在杨坚、杨广父子统治的短短30余年中，为适应作战、出巡、漕运等需要，前后在江淮流域等地区，制造了大批舰船，其总数文献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某些零星记载材料，仍可窥见其一斑。例如，开皇八年（588年）底，灭陈之战发起后，杨素所率船队，仅“黄龙”一种战船就有“数千艘”；大业元年（605年），杨广一巡江都，一次就制造各种舰船达“数万艘”。可见，隋代舰船发展规模之大。二是舰船类型之多、作战性能之好，也是前所罕见的。根据文献记载粗略统计，有隋一代制造的不同种类和型号的舰船多达20多种，而直接用于作战的即有“五牙”、“黄龙”、“青龙”、“平乘”、“舴艋”、“艨艟”、“艚艘”、“八棹”、“艇舸”等9种不同类型的战船；其中，以“五牙”为最大，可载800士卒，舰体前后左右装置6根能“发之以拍敌船”的“拍竿”，从杨素军对陈作战中使用的情况看，该舰作战性能良好，具有较强的攻击力。

隋代在军事装备和军事设施的发展上，值得提出的还有隋炀帝统治时期，由工部尚书宇文恺发明的“观风行殿”和少府监何稠发明的“六合板城”，前者是野战条件下的大型御用军帐，后者是野战条件下的大型防御性活动城垒。此两种装备、设施，曾用于炀帝北巡突厥和东征高丽的作战实践中，并且均发挥出令对方惊惧万状的震慑作用。可以说，隋代“观风行殿”和“六合板城”的首创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军事装备发展史上，做出了别具特色的贡献。

四、以战争与治军的实际需要为着眼点而开展军事学术活动，不但推动隋代军事思想朝着实用性方向发展，而且深刻影响唐以后军事思想的发展趋向。这是隋代军事的显著特点之四。

隋代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史载该时期的兵学著作却有133部之多①。其中，既有隋以前的著名兵书抄本，也有隋代兵家

① 见《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

撰述的军事专著。但可惜的是，由于隋唐以后战乱频仍，文献典籍（包括兵学著作）严重毁于兵燹，故迄今尚未发现一部流传下来的隋代兵书。尽管因为隋代兵书阙遗而给人们研究该时代军事思想全貌造成很大难度，但是，透过隋代众多兵家和名将丰富多彩的战争与军事实践活动，不仅可以窥见有隋一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精华，而且还可以看出该时期军事思想逐渐朝着实用性方向发展的鲜明特点。这对后世军事思想的深化发展无疑有重要影响。通观隋代军事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能够集中体现上述鲜明特点的隋代军事思想精华，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依据客观实际而决策的战争指导思想。这不但集中地表现在封建统治者的战争实践中，也鲜明地体现在农民起义领袖的战争实践中。

杨坚称帝建立隋朝伊始，即确立了灭亡陈朝以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但是，统一战争先自何处开始，杨坚依据当时南北形势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在战略全局的指导上，经历了一个“先南后北”到“先北后南”的决策变化过程。这既体现了杨坚顺应历史发展推进全国统一的思想，又反映出他善于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决策的战争指导艺术。其后，通过开皇三年（583 年）隋军北上反击突厥和开皇八年（588 年）末至次年初隋军南下灭亡陈朝两次重大战役作战的完全胜利，充分证明了杨坚依据客观实际而最终制定的“先北后南”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和实用性。

在隋末农民起义战争中，李密为瓦岗军所制定的以灭隋夺权为根本目标的“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总战略决策，也是依据当时隋朝“主昏于上，人怨于下”的国内形势的客观实际而提出的正确战略决策。恰是在这一正确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才使瓦岗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推翻炀帝暴政的三大农民军的中坚力量。

第二，顺应国情发展变化需要的战略转变思想。这主要体现在隋文帝杨坚在南北统一以后指导国家和平建设上。

灭陈战争胜利结束后，面对统一后的国内新形势，杨坚不仅能适时提出由以往“干戈方用”的战争状态，向当今“率土大

同”的和平时期实施战略性转变，而且在大力开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仍然强调和平时期的军事建设，诸如完善府兵制度、加强军队职能、实行兵符制度、强化武器管理等。在文帝统治期间，隋朝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几年间，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比较繁荣富强的封建国家，这固然是广大人民群众辛勤和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但也与隋文帝于灭陈战争结束后，顺应国内新形势而果断、及时地实施战略转变分不开。

第三，服从于国防建设和战争实践需要的治军思想。这在隋代封建统治者和农民起义领袖的军事活动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世家的杨坚，自15岁（公元555年）担任西魏车骑大将军始，到40岁（公元580年）执掌北周朝政而“都督内外诸军事”止，担任重要军职已有长达26年的历史。恰是这种长期军旅生活和战争实践，使杨坚懂得建设一支强大军队对于赢得战争胜利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特殊意义。因此，在杨坚执政的二十几年中，他一向比较重视军队建设。从其一生军事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能够集中体现其治军思想特色的举措，主要有两点：一是倡导和坚持“既文且武”的选将标准。他多次颁诏，明令各地铨选具备“文武才用”者担任军政要职。正是在其大力倡导和实践下，才使有隋一代名将辈出。二是倡导和坚持军事训练。他不但把“阅戎具”、“教战法”作为法定制度令各地严格执行，而且亲临部队“口授兵书，手画行阵”。正是在杨坚亲自组织指挥和严格训练下，才把隋军培养成为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

隋末农民起义军从灭隋夺权的斗争实际需要出发，对义军队伍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视的。瓦岗军在以翟让为领袖的初期，该义军仅是一支活动地区狭小、人数不多且无明确政治目标的小股义军；但自李密参加义军队伍后，特别在其为众公推为瓦岗军领袖之后，该义军则迅速发展壮大成威震全国的三大主力军的中坚力量。此种壮观局面的形成，除了灭隋深得民心之外，注重义军队伍的扩建和训练，也是其不断发展壮大、多打胜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从斗争实际需要出发而采取军政并举的策略思想。这在隋代军事家们的战争实践中，有鲜明而成功的体现。

隋文帝杨坚在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之后，为了既能阻止突厥南犯而消除边患，又不影响灭陈准备的顺利进行，于是采纳长孙晟的建议，根据突厥内部矛盾重重的实际，对突厥实施以政治瓦解为先导、以军事打击为后继的军政并举的斗争策略，既降服了突厥而消除了边患，又使隋朝没有付出多大代价，从而为巩固国内政权、顺利进行灭陈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瓦岗军领袖李密在组织指挥义军对隋军作战的实践中，也是运用军政并举的斗争策略比较成功的军事家。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李密指挥瓦岗军于大海寺伏歼隋军主力张须陁部以后，为了尽快占领荥阳郡城，一方面以大军兵临城下形成包围之势，一方面致书该郡太守、郇王杨庆（杨坚从祖弟河间王杨弘之子），规劝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指出：“为王计者，莫若举城从义，开门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长守富贵，足为美谈，乃至子孙，必有余庆。”① 杨庆得书后，迫于“城中粮尽，兵势日蹙”②而开城投降，瓦岗军未战而克荥阳城。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李密指挥瓦岗军攻占隋朝第二大储粮基地回洛仓以后，义军已经逼近洛阳城。在此形势下，李密为了实现“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灭隋夺权这一根本战略目标，一面令部队大修营堑，从军事上做好进攻东京洛阳的准备，一面令记室祖君彦起草讨隋檄文向诸郡县大量散发，以此向隋王朝展开政治攻势。在这篇长达近3000字的讨隋檄文中，义军以大量事实揭露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指出他是一个“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③ 的祸国殃民的暴君和历史罪人。号召广大人民奋起推翻其统治，规劝隋代官吏认清形势，识机知变，反戈一击，投身义军。这篇事

---

①② 《隋书》卷四十三《杨弘传附杨庆传》。

③ （唐）韩昱《壶关录》（载于《说郛》卷三十五）；又见《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实确凿、措词犀利的讨隋檄文，既鼓舞了人民斗志，又给统治阶级以极大的心理震慑和瓦解：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得悉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慌忙派人南下奏报隋炀帝，请求其急速北返以挽救洛阳危局；而困于江都的隋炀帝得报后，则心惊色变，一筹莫展；太原留守李渊及其次子李世民得悉后，即于晋阳起兵，揭起反隋大旗，从而加速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和以炀帝为首的封建统治的崩溃进程。此种局势的出现，固然主要是隋末农民起义战争深入发展的结果，但也是与瓦岗军领袖李密正确运用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配合的斗争策略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隋代虽然是个仅仅存在38年的短命王朝，但该时期于军事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在中国军事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隋代依据当时客观实际而在许多重大军事问题上的颇具时代特色的建树，不仅对唐以后军事发展有过影响，而且有些问题对今天仍不失其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给隋代军事历史以实事求是的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军事文化遗产，乃是发展我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事业之所需。

第一章　隋朝建立及其统一战争准备

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以后，着力从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增强了国力，巩固了政权，为尔后实现南北统一，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第一节　南北朝末期形势发展的特点

自西晋末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豪强割据、南北分裂的局面，长达近 300 年之久。到了南北朝末期，由于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间的长期斗争，阶级、民族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由北及南的统一趋势逐渐形成。

一、士族门阀势力的急剧衰落

自东汉以降，士族豪强势力的恶性膨胀所形成的门阀制度的腐朽统治，乃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分裂动荡的重要根源。但到南北朝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影响，封建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即士族门阀势力的急剧衰落、庶族地主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这是南北朝末期形势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南朝出身庶族地主的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以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大力推行抑制士族豪强、整顿吏治的政策，为庶族地主广泛参政、寒人“典掌机要”①，

---

①《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第十一》。

开辟了道路。南朝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降将侯景[1]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到处烧杀劫掠，不仅使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且严重地打击了梁朝的士族门阀势力，致使随东晋南渡的中原百家名门望族势力"覆灭略尽"[2]。北朝由于少数民族统治者掌权，士族门阀势力始终不如南朝势盛。北魏孝文帝统治期间，在中原汉族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虽曾于太和十九年（495年）下诏"制定姓族"[3]以推行门阀序列制度，但在实际贯彻中，却根据中书侍郎韩显宗关于用人"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建议，提出了"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4]的政策。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西魏文帝元宝炬于大统十年（544年），根据丞相宇文泰建议，采取了"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5]的措施。到了北周时期，特别是周武帝宇文邕统治时期（561～578年），朝廷在选拔官吏上，一直比较注重"贤才"，诚如史书所载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6]。总之，北朝统治者这种用人不唯"门第"而重"贤才"的政策，无疑是对魏晋以来所推行的旨在维护封建贵族门阀特权的等级制度的一种否定，它对抑制士族门阀势力的膨胀，促进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

① 侯景，北魏怀朔镇人。先属尔朱荣，后归高欢。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侯景为东魏镇守河南的大将。梁武帝中大同二年（547年）投降南朝梁，受封为河南王。次年，勾结梁宗室萧正德举兵叛乱，直至梁天正二年（552年）始为梁将陈霸先所平定。

② 《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

③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④ 《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

⑤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⑥ 《隋书》卷五十六《卢恺传》。

二、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

南北朝末期形势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北方各族人民的大融合。自晋愍帝建兴四年（316 年）西晋灭亡后，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乘机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开始了史称“十六国”纷扰混战的历史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虽都先后崩溃，但入居中原地区的各族人民，并未因此而迁回原来居住的地方，而是仍然留居中原。他们不仅与汉族杂居一起，接受汉民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并且同汉族人民一道对北方各族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斗争。这样，久而久之，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特别是鲜卑族拓跋部进入中原以后，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东晋太元十一年（386 年），鲜卑族首领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流域）建立北魏政权；太元二十一年（396 年），拓跋珪率兵击灭后燕，进占今山西、河北地区，两年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称帝。宋元嘉十六年（439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珪之孙）灭亡北凉，统一了中国北方。自此形成了与黄河以南的刘宋王朝相对峙的南北朝历史时期。当北魏进兵中原之初，鲜卑族的人口本不多，其社会发展尚处于比较落后的奴隶制阶段。拓跋氏为了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权，他们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强迫汉族人民来供其奴役。在汉族封建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北魏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由以游牧为主的奴隶社会向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转化。随着北魏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大融合也在同步加速进行。到了北周统治时期，与汉族杂居的各少数民族，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文化语言方面，或者在风俗习惯方面，均与汉族几乎一样了。也就是说，经过十六国、南北朝近 300 年的曲折发展时期，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已经同作为统一国家中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几乎融为一体了。南北朝末期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便成为隋朝

其后统一全国的重要历史条件。

三、由北及南统一趋势的形成

南北朝末期，随着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深入发展，一个由北及南的统一趋势已经形成。这一点不仅成为该历史时期最为显著的特点，而且恰为取代北周政权的隋王朝得以完成南北统一大业，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首先，北朝生产的较大发展，奠定了由北方统一南方的经济基础。西晋灭亡以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一带，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已呈现“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①的荒凉凄惨景象。但到北魏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北方以后，由于结束了长期战乱和采取了发展生产的措施，为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创造了安定环境和有利条件。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北魏孝文帝元宏下诏颁行均田法，“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②。北魏创立均田制度以后，北齐、北周都相继施行。北朝推行均田制，虽是统治阶级欲将农民置于封建国家控制之下以增加封建剥削收入的一种办法，但由于农民原有的小块耕地和新占的荒地，从法律上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护，其中一部分无地或少地农民还可以按照均田令向国家请授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一方面农民的产权得到保护，一方面，使荒芜土地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因战乱造成的土地大片荒废、浮游人口众多的严重社会问题，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自北魏颁行均田制度以来，经过各族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中国北方社会经济在得到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又获得了较南方速度更快的发展，改变了北魏入主中原

---

① 《晋书》卷一〇九《慕容皝载记》。

② 《魏书》卷七《高祖纪上》。

之初那种“兵革并起，民废农业”① 的战乱衰落局面。东魏武定五年（547 年），曾在北魏末年担任秘书监的杨衒之记述自北魏以来的社会发展情况时，指出：“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②。这里虽然不免粉饰与夸张之词，但也多少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比较繁荣的景象。从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一书所载种类繁多的农具、农作物，以及精耕细作和多种多样的施肥方法等等，可以看出当时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较大发展。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北朝的手工业生产也得到较大发展。如在丝织业生产技术上，已“大优于江东”③，可以织造出质地优良的“黼黻、锦绣、罗绮”④。在冶铸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北齐人綦毋怀文创造了打制“宿铁刀”的技术，“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⑤ 北朝打制“宿铁刀”新技术的发明，不仅对推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促进兵器制造和改善武器装备，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北朝自北魏推行均田制度以后，社会经济获得较快较大发展，从而为北方统一南方，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其次，北朝中央集权的加强，为北方统一南方奠定了政治基础。北魏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北方以后，为巩固其统治，在政治上大力推行封建化的革新措施，依照汉族封建政治体制设司置官，并吸收大批汉族地主名士参加政权工作，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⑥。故自南北朝以来，南、北方的政权机构和职官设置情

---

① 《魏书》卷一〇九《食货志》。

② 《洛阳伽蓝记》卷四《开善寺》。

③④ 《颜氏家训》卷一《治家第五》。

⑤ 《北齐书》卷四十九《綦毋怀文传》。

⑥ 《通典》卷十九《职官一》。

况，“虽小有吏易，而大抵不异”①。即中央各部门长官和地方长官均由封建中央任命，而地方属官则由地方长官自行辟置。如州刺史、郡府官，不仅有权自辟僚属，而且多掌军权。因此，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指出：“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则州与府各置僚属，州官理民，府官理戎”②。但是，到了南北朝末期，北朝因袭南朝的地方长官自辟僚属这一传统政治制度，却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北齐“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③；北周州刺史下属掌管军务的“府官则命于朝廷”④。北齐、北周开始将地方属官的任免权部分地收归朝廷的这一重大变化，集中地反映了北朝后期封建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与此同时，北朝在官吏选拔制度方面，也有明显变化。南朝的选官制度，从总体上看，是因袭自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践证明，此种选官制度的最大弊端，是选官首计“门第”而不重“贤才”，实行的结果便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⑤ 的局面，这就为士族门阀势力操纵政权提供了保证和方便。刘裕代晋建宋以后，虽曾大力推行抑制士族豪强、整顿吏治的政策，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他却无法改变其后继者因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所造成的由士族门阀势力操纵政权的局面。北魏虽然也沿用了“九品中正制”，但自魏孝文帝元宏执政以后，选官逐渐注重“贤才”。特别是到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了变革性的变化。宇文泰执掌西魏朝政以后，大力革易时政，推行“强国富民之道”⑥，根据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的建议，颁布《六条诏书》⑦，在选官问题上实行“不限资荫，唯在得人”⑧的任人唯贤的路线，一扫“魏、齐之失”而“罢

---

①② 《通典》卷三十二《职官十四·总论州佐》。

③④ 《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历代制中》。

⑤ 《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⑥⑧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⑦ 《六条诏书》是：一“先治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具体内容详见《周书·苏绰传》。

门资之制”①。史载宇文泰对颁行的《六条诏书》极为重视，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诵之”，并规定牧守令长不通晓此六条者“不得居官”②。由于选官制度的改革，封建中央掌握选举的权力逐渐上升，士族门阀势力把持选举的局面开始扭转。

北朝后期官吏的任免和选拔权限移归中央，标志着封建中央集权力量的不断加强，这一政治制度的新变化，恰是以均田制为主体的新的经济制度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这不仅大大有利于北朝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也是形成北方统一南方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北朝府兵制度的创立，为北方统一南方奠定了军事基础。南北朝初期的兵制，大体上都是世执兵役的世兵制，兵士称为军户、府户或营户。但在军队统率权的实际掌握上，南朝与北朝却有明显不同。自刘宋以来的南朝各代均承晋制不变，即地方行政长官掌握军政大权。由于皇帝不能亲统军队，而窃居高位的士族官僚腐败无能，于是军权旁落，地方长官经常拥兵自重，与封建中央分庭抗礼。北朝则与此不同，北魏皇帝是刚由部落联盟军事酋长演化而来，不仅直接控制军权，而且每遇大的征战，都是亲自统军，指挥作战。这说明北朝军事指挥大权，是集中于封建中央的。这对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无疑是有利的。到了西魏时期，丞相宇文泰于大统年间（535～551 年）创立府兵制度以后，北朝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军事制度。府兵创立后，西魏封建中央设 8 个柱国大将军，其中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仅有虚名，不领兵权；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是最高军事统帅；其余 6 个柱国大将军，即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 6 人实际分领府兵。每个柱国督两个大将军，共 12 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将军，共 24 个开府，是为 24 军。每个开府下辖

---

① 《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历代制中》。

②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两个仪同，共48个仪同。① "六柱国共有众不满五万"②。西魏府兵制，从根本上讲，是由鲜卑族部落世兵制演变而来。但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速完成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新经济制度的深入推行，到了北周时期，府兵制度有了新变化。周武帝宇文邕（宇文泰第四子）为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削减相府军权，下令"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③，把府兵变成名副其实的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禁卫军；一方面为了扩大兵源，充实军事力量，从均田户上广募汉族百姓来充当府兵。自此，府兵制开始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府兵的兵源由鲜卑族人扩大到汉族农民，"是后夏人（汉人）半为兵矣"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南北朝末期，由于士族门阀势力的急剧衰落，各民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北朝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一个由北及南的统一趋势逐渐形成。继北周而起的隋王朝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南北统一的事业，正是在上述客观条件下进行的。

第二节 隋朝的建立

自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始，北魏王朝分裂为东、西魏。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武定八年（549年），丞相高欢之子高洋废掉孝静帝元善见，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西魏恭帝四年（557年），丞相宇文泰之第三子宇文觉废掉恭帝元廓，自称天王，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自此，北朝由东、西魏对峙而变为齐、周相抗。直至北周灭亡北齐以后，北朝复归统一。

---

①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6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② 《玉海》卷一三八《兵制三》引《邺侯家传》。

③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④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一、北周统治的腐败与杨隋集团的形成

北周保定元年（561年），宇文邕即帝位（为武帝）后，由于大力推行“修富民之政，务强兵之术”①，使北周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得到迅速发展，其国力已经超过北齐。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出兵灭亡北齐。这不仅结束了周、齐对峙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而且为隋朝后来实现南北统一，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到了北周后期，封建统治日趋腐败。宣政元年（578年）六月，武帝宇文邕病死，其长子宇文赟即位，是为宣帝。年仅20岁的周宣帝却是一个“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② 的昏庸暴君。在其统治期间，他随意加重劳役，大兴土木。为了修建规模壮丽远逾汉、魏的洛阳宫，他下令征发山东诸州兵丁，改一月劳役为45日，常役人数多达4万人。他生活奢侈腐化到了极点，从其登上皇位到他死亡的两年时间里，共立了5个皇后，嫔妃则不计其数；他整日深居宫中，寻欢作乐，不理朝政，过着“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③的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和诛戮谏已过者，他制定了极其残酷的《刑经圣制》，规定“鞭杖皆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④上自公卿重臣，内及皇后嫔妃，几乎无不被其鞭杖。他即帝伊始，就将“智勇冠世，攻战如神”⑤ 的齐王宇文宪（周武帝之弟）杀死，其后又将武帝重臣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等人杀死，而把迎合他为非作歹的奸佞留在身边，参掌机要。致使北周处于“内外恐惧，人不自安”⑥ 的混乱动荡局面。这就给了以杨坚为首的杨隋集

---

①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史臣评语。

② 《周书》卷七《宣帝纪》史臣评语。

③④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⑤ 《周书》卷十二《宇文宪传》。

⑥ 《周书》卷七《宣帝纪》。

团夺取政权的极好机会。

杨坚是周宣帝嫡妻天元大皇后杨丽华之父。杨坚祖籍弘农郡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东北），其五世祖杨元寿于北魏初期迁居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并任武川镇司马。所以，杨坚祖上和宇文泰祖上不仅同居于武川镇，而且同为该镇军人。其父杨忠乃独孤信的部将，西魏时担任将帅。宇文泰创立府兵制时，置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杨忠担任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时，杨忠官至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因佐周有功，赐姓普六茹氏，封隋国公。因此，杨氏不仅是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而且是强有力的军事将帅之一。杨忠死后，杨坚袭父爵为隋国公。周武帝灭齐后，杨坚任定州（治今河北定县）总管。宣帝时，因杨坚是皇后之父，被调任为大司马、右司武，从此掌握军权。坚妻独孤氏乃鲜卑大贵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之女，独孤信的另一女儿是周明帝宇文毓（周武帝之长兄）的皇后，故杨坚和周明帝是联襟；又因其女儿是宣帝之皇后，因此杨坚又是北周的国丈。由此可见，杨坚不仅是关陇军事集团的实力派，而且是当朝皇亲国戚，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北周末年，由于宣帝政治腐败，阶级矛盾不断加深，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裂。此时，身居北周军政要职的杨坚，乘机结交和笼络一批显要官僚于自己周围，于是，一个以杨坚为首的，以汉族官僚和鲜卑汉化贵族如刘昉、郑译、高颎、韦孝宽、元谐、元胄、宇文忻等人为骨干的杨隋政治集团便形成了。

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五月，荒淫暴虐的周宣帝病死了，其子宇文阐虽已即帝位（为静帝）年余，但他此时却是一个年仅 8 岁的孩子。杨隋集团乘机矫诏拥戴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①；又以静帝名义拜杨坚“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而听焉”②。于是，北周军政大权完全落入杨坚及其杨隋集团之手。

①②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二、杨坚平定“三方之乱”

杨坚入总朝政以后，为了巩固既得的军政大权，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鉴于周宣帝失政，为了收揽人心，实行“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① 的政策，致使“天下悦之”②。这无疑是为进一步夺取帝位创造了条件。二是为防止周室外藩势力发动兵变，于大象二年六月，将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等人召回长安先后杀害。杨坚此项措施虽意在固位，但因举措过急，杀戮太多，却激起北周一些握有重兵的地方军阀势力的起兵反叛。首先发难的是相州（治今河北磁县南）总管尉迟迥（宇文泰外甥），他和担任青州（治今山东益都）总管的弟弟尉迟勤等人联兵叛乱，关东诸州纷纷响应，其部众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他们北联突厥，南结陈朝，与杨隋集团相抗衡。接着，郧州（治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周静帝之岳父）、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北周十二大将军之一的王雄之子），相继起兵反叛杨坚。一时三方并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③。

杨坚面对十分紧迫的严重形势，迅速采取军政并举的战略决策，来应付这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继续推行“惠政”：废除《刑经圣制》，删略旧律，放宽刑罚，重新启用周武帝制定的《刑书要制》；下令准许传播佛、道两教，允许僧侣修行念佛，以此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争取人民和下级官吏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力量，调兵遣将，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依次向叛乱者发动进攻：

在东战场方向 尉迟迥是三方叛乱的带头羊，又是实力最大的一支，他地广人众，号称“聚徒百万”④。消灭尉迟迥无疑是平

---

①②③④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定三方之乱的关键。因此，杨坚首先发兵进攻尉迟迥。大象二年（580年）六月初十，以名将韦孝宽为行军元帅、高颎为监军，率关中精兵东进。七月三十日，韦孝宽率军进至永桥城（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大虹桥），尉迟迥遣子尉迟惇率兵10万西至武德（今河南沁阳东南），与韦军相持于沁水两岸。此时，正值沁水上涨，高颎令士卒赶造浮桥，以通过大军。尉迟惇沿水布阵20余里，企图“待孝宽军半渡而击之”①，于是挥兵稍却以诱之。韦孝宽乘势“鸣鼓齐进”②，奋勇追击；尉迟惇招架不住，全军溃散不可收拾，惇仅单骑逃回邺城（相州治所）。韦孝宽乘胜挥军东进，迅速抵达邺城城西，列阵准备攻城；尉迟迥集中城里全部兵力13万人布阵于城南迎战。两军交锋之后，韦军初战不利稍却。当时，邺城士民数万人从旁观战，韦孝宽部将宇文忻故意用箭乱射观战者，并乘观战者躲箭逃奔，“转相腾籍，声如雷霆”③之机，挥军向尉迟迥军发起猛烈冲击，“迥军大败”④，退守城内。在此形势下，韦孝宽纵兵包围邺城，奋力强攻，迅速破城；尉迟迥兵败后自杀身死。韦孝宽攻破邺城以后，尉迟迥属下大将檀让尚有部众数万，另一大将席毗罗有部众10万人，仍在河南地区活动。为此杨坚任命于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率军进击，大败之，俘获檀让，执杀席毗罗，于是“河南悉平”⑤。至此，受尉迟迥影响而起兵反叛的关东诸州，皆为韦孝宽、于仲文两支部队所平定。尉迟迥自大象二年六月起兵，至八月彻底失败，历时仅68天。

在南战场方向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杨坚命以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率领荆襄兵进讨司马消难。司马消难得悉，遂以郧州（治今湖北安陆）、随州（治今湖北随县）等九州及鲁山（今湖北武汉市西）、沌阳（今湖北汉阳东）等八镇归降陈朝，并“遣其子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七四《陈纪八》，宣帝太建十二年八月。

③④ 《北史》卷六十《宇文贵传附宇文忻传》。

⑤ 《隋书》卷六十《于仲文传》。

为质以求援"①。陈宣帝陈顼虽曾一度出兵应援，但终究未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八月二十六日，当王谊挥军进抵郧州时，司马消难"惧而奔陈"②。在司马消难举兵叛乱期间，北至商、洛，南抵江、淮，在东西二千余里的地区，巴蛮等少数民族多叛，并共推渠帅兰雒州为主。兰雒州自号河南王，"以附消难，北连尉迥"③。王谊率行军总管李威、冯晖、李远等将分讨之，"旬月皆平"④。

在西战场方向 同年八月初七，杨坚任命柱国梁睿为行军元帅率军进讨益州之王谦。十月初二，梁睿奉命率行军总管于义、张威、达奚长儒、梁升、石孝义等步骑20万人，深入蜀地。时王谦遣将李三王等拒守通谷（今名不详），梁睿挥军击破之，进至龙门（在今四川广元县境）。王谦部将赵俨、秦会拥众10万，"据险为营，周亘三十里"⑤，企图阻挡梁睿军前进。梁睿令将士"衔枚出自间道，四面奋击，力战破之"⑥。之后，梁睿乘胜挥军分道前进，先后突破剑阁、开远（均在今四川剑阁东北）等险关重隘，直逼成都（益州州治，今属四川）。王谦令部将达奚惎、乙弗虔守城，自率精兵5万"背城结阵"⑦，以求一逞。梁睿挥军奋战，王谦失利欲退回城内。但此时守城的达奚惎、乙弗虔以城归降，拒绝王谦入城；王谦无奈，仅率30骑北走新都（今属四川），为新都令王宝所擒。十月二十六日，梁睿于成都将王谦等被俘叛将杀掉。至此，"剑南悉平"⑧。

杨坚平定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三方叛乱，自六月至十月，前后历时4个月。杨坚之所以比较顺利地取得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能从国情、敌情的实际出发，措置裕如地采取了军政并举的正确战略：一方面大力推行改革，废除了周宣帝的"苛酷之政"⑨，赢得了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的下层人士的欢迎，从而为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四《陈纪八》，宣帝太建十二年七月。

②③④ 《隋书》卷四十《王谊传》。

⑤⑥⑦⑧ 《隋书》卷三十七《梁睿传》。

⑨ 《资治通鉴》卷一七四《陈纪八》，宣帝太建十二年五月。

取得平叛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能及时组织强大兵力，根据敌情实际，对三方叛乱者依次实施猛烈进攻，因而在军事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任帅用将得当，也是杨坚取得平叛胜利的一个原因。例如，以“在边多载，屡抗强敌”①，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将韦孝宽为行军元帅，以“习兵事，多计略”②，足智多谋的高颎为监军。又如，担任南战场行军元帅的王谊乃是智勇兼备的“文武奇才”③；西战场行军元帅梁睿则是久居重镇而善于“见机而动”④ 的名将，等等。选任如此出类拔萃的将帅领兵作战，取得平叛的胜利则是必然的。尉迟迥等三方实属腐朽势力的卫道者，政治上不得人心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军事上，他们及其所任用的将领，多系胸“无筹略，举措多失”⑤ 的平庸之辈，因此，其失败则是不可避免的。

三、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

杨坚在调兵遣将迅速平定了企图挽救北周于垂亡的三方武装叛乱以后，紧接着就进一步清除北周宗室势力，先后将毕王宇文贤、汉王宇文赞、秦王宇文贽、曹王宇文允等人杀掉。至此，北周宗室势力几乎全被除掉，年幼无知的周静帝宇文阐，已经完全陷于孤立无靠的境地。在此形势下，杨隋集团认为取代北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紧锣密鼓地积极导演“禅让”取代活动。他们先是于大象二年（580年）十二月十三日，以周静帝之名下诏授杨坚为“相国，总百揆”⑥，晋封为隋王，加九锡，“位在诸侯王上”⑦；

---

① 《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② 《隋书》卷四十《高颎传》。

③ 《北史》卷六十一《王盟传附王谊传》史臣评语。

④ 《隋书》卷三十七《梁睿传》史臣评语。

⑤ 《资治通鉴》卷一七四《陈纪八》，宣帝太建十二年八月。

⑥⑦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继之于大定元年（581 年）二月初六，又以静帝名义诏准杨坚“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①，皆以帝王礼仪。通过以上准备，杨坚乃于十四日在长安城之临光殿称帝，正式取代北周，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隋文帝。杨坚即帝位之后，改国号为隋，建元开皇，仍都长安。自开皇二年（582 年）六月始，杨坚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贺娄子干等人负责于长安东南之龙首山下“创造新都”②大兴城，次年三月竣工，杨坚迁居新都大兴城。

杨坚从大象二年五月总揽北周军政大权始，至次年二月代周称帝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完全夺取了北周的政权。周为隋代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北周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又是杨坚执政以来“大崇惠政”的必然趋势。隋王朝的建立，从此开创了一个即将结束南北长期分裂与战乱，实现国家统一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第三节　隋文帝统一事业的各项准备

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王朝以后，即“潜有吞并江南之志”③。为了实现南北统一的大业，从开皇元年起的数年内，杨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和实现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一、发展社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

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隋文帝杨坚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重大措施：

（一）实行均田

---

①②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③ 《隋书》卷五十二《韩擒虎传》。

均田制，是北魏至唐中叶一种计口受田的土地制度。它创始于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九年（485年），而推行于北齐和北周。杨坚称帝以后，立即颁布新令，继续实行均田制度。新令明确规定："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① 这里所说的"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是指在均田制度下，农民受田是依照北齐的均田办法进行，即一夫受露田80亩，妇人40亩，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这就是说，一夫一妻之农家，可以占有的土地合计应为140亩。从隋初均田新令规定的上述内容来看，农民所受田亩数尽管比各级封建官吏的受田数要少得多，并且实际受田又往往不足数，但是，能把农民的土地问题摆到封建政府的议事日程，且以法令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和在实际生活中予以执行，这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把荒地分给农民耕种，不仅扩大了国家的耕地面积，而且提高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减轻赋役

开皇元年三月，杨坚称帝后不久，采纳度支尚书苏威"奏减赋役，务从轻典"② 的建议，一革西魏以来"制征税法颇重"③ 的弊端，实行了轻徭薄赋的利民政策。下令成丁年龄由原定的18岁提高到21岁，每年服徭役期限由1个月减为20天，调绢由1匹（4丈）减为两丈。开皇四年（584年）六月，关中的雍、同、华、

---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隋书》卷四十一《苏威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三年三月。

岐、宜五州发生严重旱灾，杨坚下令上述地区“无出今年租调”①；开皇六年（586年）八月，关中七州再次大旱，杨坚又下令“免其赋税”②。由于赋税和徭役的减轻，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全国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史载关陇、河西地区的农民“勤于稼穑，多畜牧”③；河南地区的农民“好尚稼穑”④；河北地区的农民“务在农桑”⑤；山东地区的农民“多务农桑”⑥；山西地区的农民“人多重农桑”⑦；川陇交界的羌、氐等族人民“皆务于农事”⑧；广东地区的少数民族“尽力农事”⑨，等等。可见，当时全国各地的农牧业生产已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救灾济民

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杨坚下诏把派使巡察民情、赈恤灾民，作为其治国的一项重要政策。开皇五年（585年）八月，河南诸州发生特大水灾，杨坚急派民部尚书苏威前往组织救济灾民。开皇六年（586年）二月，山南荆（治今湖北江陵）、淅（治今河南淅川南）等七州发生水灾，杨坚派遣前工部尚书长孙毗奔赴该地区“赈恤之”⑩。开皇八年（588年）八月，河北诸州荒年不收，杨坚再次派遣苏威前往“赈恤”饥民。通过救灾济民活动，减轻了农民的疾苦和负担，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四）兴修水利

开皇二年（582年）三月，杨坚下令开渠，引杜阳水（今陕西漆水河，因源于杜阳山而得名）灌溉三畤原（位于今陕西武功西南20里）。开皇四年（584年）六月，鉴于渭水“流浅沙深，即成阻阂”⑪，有碍漕运，杨坚下令开凿广通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

---

①《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

②⑩《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③⑧《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

④⑤⑥⑦《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

⑨《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⑪《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潼关。自此，“转运通利，关内赖之”①，便利了水上交通和农田灌溉，对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积极作用。

由于隋文帝杨坚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使隋初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不仅大大增强了隋王朝的经济实力，也为杨坚其后完成统一大业，创造了物质条件。

二、改革政治制度，加强中央集权

隋朝建立后，杨坚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也积极推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其主要措施是：

（一）强化统治机构和完善职官制度

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伊始，即着手改革封建统治机构，废除了北周时期所设的六官②，确立了“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三省”即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央政府以内史省的监、令，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令、左右仆射共为宰相。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分别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六部”即尚书省下设吏、礼、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开皇三年（583年）四月，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各部设尚书总理部务。此外，中央还设有御史、都水二台和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等机构。

地方行政制度，隋初仍沿袭北周的州、郡、县三级制。开皇三年十一月，杨坚针对地方行政机构“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③的严重情况，采纳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和民部尚书苏威等人建议，“遂罢天下诸郡”④。由于废掉郡级机构和裁汰了一批冗官，不仅精干了地方机构，较好地解决了“民

---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北周的六官，即模仿《周礼》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合称六官或六卿。

③④ 《隋书》卷四十六《杨尚希传》。

少官多，十羊九牧”① 的问题，而且减少了国家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总之，杨坚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旨在强化封建统治机构的改革措施，既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又有利于国家统一。

（二）改革选举和用人制度

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以后，废除了魏晋以来选举和用人之权为士族门阀势力所把持的“九品中正制”，采取“举贤良”② 的选官政策，并先后选拔了高颎、虞庆则、苏威、长孙晟、贺若弼、韩擒虎、杨素等一批有能力的“贤才”担任军政要职。杨坚一改北周为政之失，在用人问题上做到了“不以权任假借外戚”③；其皇后独孤氏的兄弟任职最高者“不过将军、刺史”④而已；对他自己的亲戚，可以“厚加供给，而不许接对朝士”⑤，干预朝政。杨坚崇尚惠政，褒奖贤吏。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刺史梁彦光，因“有惠政，隋主（杨坚）下诏褒美，赐束帛及御伞，以厉天下之吏”⑥；相州刺史樊叔略“有异政，帝（杨坚）以玺书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农”⑦；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县令房恭懿因其“政为三辅之最”⑧，杨坚不但给予奖励和提拔其任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刺史，而且每见恭懿，“必呼至榻前，访以理人之术”⑨。由于杨坚较好地贯彻了“举贤良”的选官用人政策，致“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⑩，各地呈现一派繁荣发展的局面。

（三）修定律例，加强法制

修定律例，加强法制建设，这是杨坚实施政治改革的重要方面。在法制建设上，杨坚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修订周法。杨坚鉴于北周之《刑书要制》“比于齐律，烦而不要”⑪，遂于开皇元

---

① 《隋书》卷四十六《杨尚希传》。

②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③④⑤⑥⑦⑩⑪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三年十月。

⑧⑨ 《隋书》卷七十三《房恭懿传》。

年（581年）九月，命高颎、郑译、杨素等人修订周法，确定刑名为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种，“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①。又明确规定，凡民“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②，上告封建中央。其次是更定新律。开皇三年十二月，杨坚“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③为由，又令民部尚书苏威、礼部尚书牛弘等人更定新律，除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1000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④。这就是对唐代颇有影响的隋代《开皇律》。该刑律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⑤。为了贯彻《开皇律》，隋朝又于大理寺置律博士8人，教习法律，使令管刑法的官吏，都必须熟悉法律，做到每“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⑥。开皇六年（586年），杨坚又敕诸州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之官吏，“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⑦。

隋初在修订旧法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开皇律》，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皇朝统治集团的利益，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以巩固其封建统治。但也应该看到，杨坚能够从实际出发，一惩前代法制之弊，废除许多酷刑峻法，并且明确规定民有冤枉而不得申诉者，可以直接上告封建中央。这些做法，无疑对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推动统一是有利的。

三、抓紧军事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在军事建设方面，杨坚主要采取如下一些重要措施：

（一）改革兵制，完善府兵制度

杨坚建立隋朝以后，在继承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的基础上，

---

①②③④⑤⑥⑦《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实行兵制改革以逐步完善府兵制度。其主要做法有二：一是建立和健全卫府制度。杨坚称帝后，依据“魏、周十二大将军之遗制”①，于中央设置“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监门、左右领军等”② 十二卫府；各卫府设大将军 1 人，为府兵的最高将领，总隶于皇帝。这样，就把军事统率权完全集中于封建中央，大大加强了隋朝封建中央集权制。二是整顿私人武装。北周时期除由封建中央控制的府兵外，各地还有相当数量由豪绅地主私人掌握的乡兵、部曲。杨坚为了把这些私人武装力量收编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军队，采取授予豪绅地主以府兵将校的办法，先后将各地的乡兵、部曲收编而纳入府兵系统，从而扩大了府兵兵员。杨坚在改革兵制与逐步完善府兵制度的基础上，大力提倡习武练军，至南下灭陈战争之前，隋朝已训练出一支规模较大、战斗力颇强的军队，为以后进行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武装力量。

（二）加强北边防务，抵御突厥南袭

南下灭陈，是杨坚实现南北统一大业的根本战略目标。为了巩固隋朝政权和做好攻陈准备，认真对付来自北方突厥的不断南侵威胁，便成为杨坚统一事业的首要战略步骤。为此，杨坚建隋伊始，在征发大批丁壮加修北部和西部长城的同时，又于北部和西北边境重要地段设置镇、戍，派兵防守。开皇元年（581 年）四月，杨坚诏“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③；十二月，再次下令“缘边修保障，峻长城”④，并命上柱国阴寿镇守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京兆尹虞庆则镇守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屯兵数万以备之”⑤。开皇二年（582 年）正月，为加强北部边境防卫力量，于并州设河北道行台，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坐镇并州；十月，命太子杨勇屯兵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防御突厥南侵；十二月，调

---

① 《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②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下》。

③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④⑤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三年十二月。

遣并州的虞庆则率兵进屯弘化（今陕西庆阳西北），以备突厥来犯。开皇三年（583年）十月，以秦王杨俊为秦州（治今甘肃秦安西北）总管，统管陇右诸州军事。开皇四年（584年）四月，杨坚鉴于陇西地区民俗不设村坞而屡被侵掠之害，乃命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总管，于陇西地区“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①。自此，陇西地区“镇戍连接，烽候相望”②，防务大为加强。开皇五年（585年），杨坚委派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3万，于朔方（治今内蒙古白城子）、灵武（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境内修筑一条自绥州（治今陕西绥德）至黄河，东西“绵亘七百里”③ 的长城，以防突厥南侵；次年二月，又令崔仲方发丁壮15万人，“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④

杨坚采取修筑长城、派兵防守的措施，不仅加强了北部边境的防务，而且确保了隋朝政权的巩固和灭陈战争准备的顺利进行。

（三）积极做好灭陈的战争准备

杨坚在不断加强北边防务的同时，积极做好南下灭陈的战争准备工作，其主要措施：一是“密诏”黄州（治今湖北新洲）总管周法尚，“使经略江南，伺候动静”⑤；二是自开皇元年始，先后派遣仪同三司元寿、上柱国杨素等人，于长江上、下游修造战船，训练水军，做好灭陈战争的物质和组织准备；三是加强长江一线兵力，选派得力战将委以灭陈之任；四是先后派遣秦王杨俊坐镇襄州、晋王杨广坐镇寿春，分别统管长江上、下游的隋军战备、作战事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杨坚称帝建隋以后，为了北击突厥、南下灭陈，以完成统一的大业，从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进行了长期的认真准备。隋初统一战争的实施，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得以顺利进行和取得胜利的。

---

①② 《隋书》卷五十三《贺娄子干传》。

③④ 《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

⑤ 《隋书》卷六十五《周法尚传》。

第二章　隋初的统一战争

杨坚在积极做好统一战争准备的前提下，依据“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首先出兵击败突厥，尔后集中兵力南下灭亡陈朝。从此，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旧格局，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新局面。

第一节　隋初的南北形势与统一战争的战略决策

杨坚代周建隋之时，全国境内存在三个主要政权，即中原地区的隋朝、江南地区的陈朝和漠北广大地区的突厥。此外，还有居于今甘肃、青海间而“风俗颇同突厥”① 的吐谷浑。突厥当时尚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其统治集团具有残酷的掠夺性，对中原汉族政权始终是个威胁；陈朝至后主陈叔宝统治时期，已呈政治腐败、国力衰弱之势；而隋王朝经过文帝杨坚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处在封建社会的上升发展时期。此种实力对比情况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使结束南北分裂、实现全国统一的大任，自然落到了隋朝肩上。但是，统一自何处开始，则决定于当时南北形势的特点和各方的实际情况。

一、突厥的不断南犯

突厥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最初起源于今叶尼塞

① 《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

河上游，后迁到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部。曾长期附属于柔然①。西魏废帝元年（552年），它推翻柔然贵族统治，建立突厥政权，其牙庭（即可汗之所在地）介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与今鄂尔浑河上游之间。突厥先后征服许多部落和民族，其疆域最广时，东起辽河，西抵里海（一说至咸海），西南到阿姆河南，南至今内蒙古沙漠以北，北越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区。南北朝时期，突厥社会仍处于奴隶制阶段，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即所谓“控弦数十万”②。它常乘北周与北齐争战不休之机，不断向南扩张和袭扰掠夺，致使“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③。北周与北齐统治阶级的这种软弱性，极大地助长了突厥奴隶主贵族的贪婪性，其首领佗钵可汗曾骄狂地说：“我在南两儿（指北周、北齐）常孝顺，何患贫也！”④可是，杨坚取代北周而建立隋朝以后，一反周、齐的屈从软弱态度，对突厥采取强硬政策，“待之甚薄”⑤，停止向其输送金帛、美女。突厥统治者因此对隋十分怨恨，遂乘隋朝新建，内部尚待巩固之际，接连不断地南下袭扰和掠夺，严重威胁隋王朝的统治。

但是，突厥政权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外危机。首先，突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不可调和。隋开皇元年（581年），突厥佗钵可汗死后，其侄摄图乘大逻便（佗钵另一侄）与庵罗（佗钵子）争权夺利之隙，夺得突厥大可汗之位，号为沙钵略可汗。摄图虽身居突厥最高汗位，但其统治并不稳固。佗钵之子庵罗统治独洛水（今土拉河）流域，号称“第二可汗”；摄图之叔玷厥统治乌孙故地（今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号称“达头可汗”；其弟处罗

---

① 柔然，古族名，北魏时亦称其所建政权为柔然。又称“蠕蠕”、“芮芮”、“茹茹”。4世纪中，游牧于今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后迁居阴山一带。5世纪初，其首领社仑合并附近各部，组成联盟，称为丘豆伐可汗，创立军事编制，规定行军赏罚制度，和北魏有经济、文化联系。5世纪后期，又与南朝建立联系。后因内部分裂，其势渐衰。西魏废帝元年（552年）为突厥所并。

②③④⑤ 《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侯统治奚、霫、契丹、鞑靼分布地区（今兴安岭以西草原地区），号称“突利可汗”；其从兄弟大逻便统治阿尔泰山以东地区，号称“阿波可汗”。这样，突厥实际上是处于五可汗分治的割据状态。其次，突厥与被其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由于突厥统治者“世行暴虐”①，致使被征服的“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并“常伺其便”②而起兵反抗之，严重地动摇着突厥的统治。突厥统治阶级的内外危机，恰为隋王朝北上反击突厥之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陈朝的日趋腐败

陈是南朝时期的最后一个王朝。自陈霸先取代萧梁政权而建立陈朝，传至后主陈叔宝，已历五帝，凡三十余年。陈朝虽是在梁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其国力衰弱均超过东晋、宋、齐、梁任何一朝。首先，其版图“较前弥蹙，西不得蜀、汉，北不得淮、肥，虽曾克复淮南，未几复失，始终以长江为限”③，仅保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至沿海的四百余县④，人口二百万⑤，不及刘宋人口的一半⑥。其次，陈朝也是南朝经济实力较弱的朝代。陈朝是在平定侯景乱梁之后建立起来的政权。侯景大规模武装叛乱，给南朝社会经济以极大破坏，陈朝建立后，社会生产虽然有所恢复，但其经济实力仍不及前代各朝雄厚。特别是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崛然兴起，严重的横征暴敛和巧取豪夺，已使小农经济大量破产，

---

①② 《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③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四·南北朝》。

④ 见《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

⑤ 《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载称：陈“至后主灭亡之时，隋家所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

⑥ 《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载称：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 年）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

广大人民怨声载道，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第三，陈朝政治腐败甚于前代各朝。太建十四年（582 年），后主陈叔宝即帝位以后，“怠于政事”①，每日深居宫中，与佞臣爱妃饮酒作乐，“自夕达旦，以此为常”②，朝政大权完全为宦官奸佞所操纵，致使朝政日非，腐败不堪，“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③。陈叔宝为追求享乐而大造宫室，对劳动人民极尽剥削压榨之能事，“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④，从而造成了“主昏于上，民讟于下”⑤ 的严重政治危机。第四，在军事上，陈朝虽尚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⑥，但在根本不懂军事的都官尚书孔范的控制之下，“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⑦来统御，“由是文武解体”⑧，军队已经丧失战斗力。在军事部署上，陈朝虽然企图凭借长江天堑以阻止隋军南下，但实际上除保有个别江北要点外，巴蜀及长江以北地区均为隋朝占有，长江天险已不足恃。陈朝内部危机的严重形势，决定后来它为隋朝所灭的必然性。

三、隋朝的战略决策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以后，即定下结束南北分立、实现全国统一的战略目标。为此，他曾多次与臣下讨论灭陈和对付突厥袭扰的方略，并从建国伊始，在大力推行经济、政治、军事改革的

---

①②③⑦⑧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至德二年十一月。

④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 《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

⑥ 陈朝究竟拥有多少军队，史无明确记载。隋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薛道衡曾说过："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见《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但这只是一种故意贬低陈朝军力的说法，不足征之为据。《资治通鉴》卷一七七载称：当时仅“建康甲士尚十余万人”。可见，陈朝总兵力不止 10 万之数；如加上沿江上下之兵力，其总兵力数可能在 20 万左右。

基础上，为统一事业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这不仅巩固了隋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为统一战争的实施创造了较为充分的有利条件。但是，隋王朝在统一战争的战略指导上，经历了一个“先南后北”到“先北后南”的发展变化过程。隋建之初，杨坚即打算在巩固内部、充实国力的基础上，先南下灭陈，尔后再北击突厥，统一天下。为此，杨坚不仅根据尚书左仆射高颎的建议，选派名将贺若弼、韩擒虎等人“置于南边，使潜为经略”①，而且于开皇元年（581年）九月派遣高颎为总指挥，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率军大举伐陈。可是，随着南北形势的发展变化，杨坚不能不立即中止隋军南进行动，而重新考虑统一事业的战略谋划问题。当时，居于漠北广大地区的突厥，其统治集团出于扩张和掠夺的需要，接连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地举兵南下袭扰。这不但直接威胁隋朝北部边疆的安全，而且给隋朝的统一事业带来极大不利。因此，首先消除来自北方突厥威胁的这一后顾之忧，便成为隋朝的当务之急和首要战略步骤。而居于江南的陈朝，在昏庸后主陈叔宝的统治下，已经处于经济衰弱、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的困难境地，它对隋朝的存在和发展，几乎构不成什么威胁。因此，先置陈朝而不动，暂且采取和平不战的政策，不但是有利的，也是能够做到的。正是根据当时南北形势发展的这一特点，杨坚一改初衷，而确定了先北击突厥、后南下灭陈的“北战南和”、“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为实现统一事业的总战略指导方针。

第二节　北上反击突厥之战

（参见附图1）

杨坚立国之后，在对突厥的关系上，一反以往北周送礼和亲的作法，而采取了防御和抗击的方针，这就大大激怒了贪婪好战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三年三月。

的突厥贵族统治者。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突厥摄图可汗以为其姻亲"周室复仇"① 作借口，勾结盘踞于和龙（亦作黄龙，今辽宁朝阳）地区的前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举兵犯边，并攻陷了临渝关（今河北抚宁东北）。为了阻止突厥的南下袭扰，杨坚根据突厥内部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以政治分化为先导，以军事打击为后继的军政结合的正确作战指导方针。

一、政 治 分 化

隋开皇元年十二月，曾经出使突厥，因而深知突厥内幕的奉车都尉长孙晟②上书为杨坚制定战略实施计划提供突厥内部情况时指出：摄图虽身居突厥大可汗之位，但其统治并不稳固，其叔玷厥"兵强而位下"③，与摄图之间矛盾尖锐，只要"鼓动其情，必将自战"④；其弟处罗侯虽得民心，却"为摄图所忌"⑤，正心怀疑惧不安；其从兄弟大逻便力量较弱，因畏惧摄图，而采取"唯强是与，未有定心"⑥的左右逢源的态度。长孙晟还认为，摄图叔侄兄弟之间虽"分居四面，内怀猜忌"⑦，但因各统其兵，实力尚强，"难以力征，易可离间"⑧。据此，他建议首先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⑨的斗争策略，从政治上对突厥进行分化瓦解；然后乘其"首尾猜嫌，腹心离阻"⑩之隙，再出兵反击，"必可一举而空其国"⑪。杨坚看了长孙晟的这一上书内容后，十分高兴，立即亲自召见，进一步面商大计。长孙晟再次"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三年十二月。北周宣帝时，突厥摄图可汗娶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千金公主为妻，与周室结为姻亲。

② 长孙晟，北周宣帝时，任司卫上士。大象二年（580年）受命护送千金公主赴突厥和亲，他利用与处罗侯游猎之机，"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见《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 《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

其虚实，皆如指掌”①。杨坚听后深为叹服，完全予以采纳，并立即派遣太仆元晖西出伊吾（今新疆哈密），结好玷厥，令其从西面牵制摄图；又授任长孙晟为车骑将军，携带厚礼东出黄龙（即和龙），联络处罗侯，争取奚、霫、契丹等被突厥征服的部族站到隋王朝一边，使其从东面牵制摄图。杨坚既行反间之计，突厥内部“果相猜贰”②，致使摄图可汗陷入更加孤立状态。这就为隋王朝其后取得北击突厥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杨坚对突厥实施离间战略的过程中，突厥于开皇二年（582年）五月，在高宝宁的勾引下进攻平州（治今河北卢龙）。摄图派遣 40 万人马，突入长城后分道南进。六月，隋军分别于马邑（治善阳，今山西朔州）、可洛峐（今甘肃武威东南）击败突厥军，但其势仍盛。杨坚为阻遏突厥军南进，先后抽调部队进驻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弘化（治合水，今甘肃庆阳北）、乙弗泊（今青海乐都西）、临洮（今甘肃岷县）、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等地加强防守。十二月，摄图亲率主力 10 万人进至周槃（今甘肃庆阳南），击败隋守军后，继续南下，直逼隋都长安。接着，突厥军在击败乙弗泊、临洮等地的隋军后，又分兵自木硖（今宁夏固原西南）、石门（今宁夏海原东南）两道南下、西进，攻掠武威（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天水（治上邽，今甘肃天水）、金城（治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治洛交，今陕西富县）、弘化、延安（治肤施，今陕西延安北）等地。此时，摄图本欲继续南进，但因对摄图怀有二心的玷厥不从，“引兵而去”③；长孙晟又乘机散布“铁勒等反，欲袭其牙”④的假情报传给摄图，摄图信以为真，因怕铁勒袭击其后方，乃被迫中止南进，而“回兵出塞”⑤。长安之危暂得缓解。这正是隋朝成功地运用分化瓦解谋略的结果。

---

①②③④⑤《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

二、武力反击

摄图虽然引军北撤，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再次南下袭扰的企图。因此，以武力反击突厥乃是隋王朝势在必行的军事行动。开皇三年（583年）二月，突厥又大举南下。摄图以大逻便率兵一部沿弱水（在今甘肃酒泉、张掖境内）南进，夺取陇右；摄图自率主力出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进攻河套，企图从东、西两个方向对隋形成夹击之势。尽管突厥军来势汹汹，但是，此时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隋而不利于突厥的根本性变化。突厥因隋实施政治分化，其内部矛盾日趋尖锐，五可汗之间更加离心离德；其境内自然灾害异常严重，“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①；加之连年战争，横征暴敛，已引起国内人民和被征服民族的强烈反抗。隋朝则自建国以来，通过一系列改革，不仅巩固了内部统治，而且增强了国防实力，完全具备了以武力挫败突厥进攻的条件。有鉴于此，杨坚决心乘突厥内部危机四伏的有利时机，调兵遣将对突厥实施武力反击，以期达到“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②的战略目的。同年四月，杨坚命以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塞击之”③，其具体部署是：

上柱国李崇率步骑兵出幽州；

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兵数万④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一带）；

卫王杨爽率步骑兵7万出朔州（今属山西）；

河间王杨弘率众数万出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

上柱国豆卢勣率兵出夏州（治今陕西横山西）；

---

①② 《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长城公至德元年四月。

④ 阴寿所率兵力数，《资治通鉴》卷一七五称其“帅步骑十万”。本书这里从《隋书·阴寿传》说。

秦州总管窦荣定率步骑兵3万出凉州（治今甘肃武威）；

尚书左仆射高颎率部出宁州（治今甘肃宁县）；

内史监虞庆则率部出原州（治今宁夏固原）。

上述各路隋军“俱受爽节度”①。

从隋军以上的反攻部署，可以看出其作战企图是：以杨爽、杨弘、豆卢勣所部为主力，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企图进攻河套地区的摄图军；以窦荣定部在河西牵制大逻便军，以阴寿、李崇所部分别东向进攻高宝宁和反击进攻幽州的部分突厥军，积极配合隋军主力行动；以高颎、虞庆则二部为战略机动部队，随时策应主要进攻方向行动。十分明显，隋军采取的是集中兵力于中央，东、西两翼相配合，以摄图军为主要打击目标的战略部署。

开皇三年夏，隋军开始反击。卫王杨爽督率李充等四将自马邑北进迎击突厥军，于四月十二日，与南犯的摄图部相遇于白道。杨爽采纳李充乘摄图“轻我而无备，以精兵袭之”②的建议，遂与充率精骑5000出其不意，实施突然袭击，大败突厥军，俘获千余人和大批马牛羊。摄图本人身受重伤，“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③，其部众因严重缺粮和疾疫流行，而“死者极众”④。与杨爽率军反击摄图的同时，夏州总管豆卢勣率军出夏州，积极配合杨爽行动；河间王杨弘率众数万北出灵州，与突厥军交战，“大破之，斩数千级”⑤，有力地配合了杨爽的作战行动。

在隋军主攻方向的作战行动展开以后，东西两翼的隋军也先后向突厥军发起了进攻。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兵数万东出卢龙塞，进击勾结突厥且盘踞和龙地区的高宝宁。高见隋军来势迅猛，急忙向突厥求救，时值“突厥方御隋师，不能救”⑥。高宝宁无奈，遂于四月十三日弃城逃往漠北，隋军乘势收复和龙地区。为了彻底

① 《隋书》卷四十四《杨爽传》。

②③⑥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长城公至德元年四月。

④ 《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⑤ 《隋书》卷四十三《杨弘传》。

消除隐患，阴寿乃“设重赏以购宝宁，又遣人离其腹心”①，高宝宁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逃往契丹后被部下赵修罗所杀。自此，“北边遂安”②。五月下旬，秦州总管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兵3万人出凉州北进，至高越原（今甘肃武威西北）与突厥大逻便所部相遇。窦荣定在“其地无水，士卒渴甚，至刺马血而饮，死者十有二三”③的极端困境中，仍然挥军奋勇进击，屡挫突厥锋锐，迫使大逻便“不敢复战，遂请盟，引军而去”④。

六月中旬，上柱国、幽州总管李崇率步骑兵3000，迎战企图袭掠幽州的突厥军，转战十余日，因伤亡过众，遂退保砂城（今地名不详）。后在突厥军的重围之下，虽伤亡殆尽，李崇本人也为敌所杀，但却以其顽强抗击而给突厥军以很大杀伤和消耗，使突厥欲占幽州的企图最终未能得逞。七月，杨坚命豫州刺史周摇为幽州总管而出镇幽州。八月十六日，杨坚又遣尚书左仆射高颎出宁州、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以击突厥”⑤。至此，隋军对突厥的反击作战即告胜利。

隋军此次大规模出击，给南下侵扰的突厥诸军以沉重打击，使突厥统治集团内部因战败而互相责难，矛盾更趋尖锐，终于演成了自相攻杀的局面。这就为隋王朝进一步降服突厥，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降服突厥

在隋军反击摄图和大逻便的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杨坚为了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又乘突厥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的有利时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长城公至德元年四月。

② 《隋书》卷三十九《阴寿传》。

③ 《隋书》卷三十九《窦荣定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长城公至德元年五月。

⑤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长城公至德元年八月。

机，继续运用政治分化的谋略，进一步瓦解突厥统治集团。大逻便本与摄图矛盾很深，因作战屡遭失败，惧怕摄图加害，而与之更加离心离德。杨坚见有机可乘，乃派在窦荣定军中任偏将的长孙晟北赴大逻便处进行政治劝降，指出摄图不仅会因大逻便屡败而加罪，而且必定会乘机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灭北牙”①，亦即击灭大逻便的计划（大逻便建牙于摄图之北）。长孙晟以利害关系规劝大逻便，指明其只有归顺隋朝，连结玷厥，才是免为摄图所害的“万全之计”②。大逻便权衡利弊，终于归顺了隋朝，并派人随长孙晟入朝称臣。隋王朝在争取了玷厥、处罗侯之后，又争取了大逻便。自此，摄图陷入更加孤立的状态。

摄图在获悉大逻便已经归顺隋朝以后，十分怨恨，遂率兵袭破大逻便牙庭所在地，并“尽获其众而杀其母”③。大逻便在“还无所归”④的情况下，愤然西投玷厥求救，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复得故地，又收散卒数万，与摄图相攻屡胜，“其势益张”⑤。自此，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

开皇四年（584年）二月，突厥苏尼部万余人来降，接着玷厥也率众正式归顺隋朝。此时的摄图已完全陷入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在此形势下，摄图因惧怕契丹袭其后方，被迫于同年秋向隋求和称藩。摄图在给隋文帝的请降书中表示，自今以后要“子子孙孙，乃至万世”⑥，与隋朝友好下去。杨坚则回书予以安抚；同时对玷厥、大逻便等先后归顺的突厥各部，均给予抚绥以安众心。其后，杨坚又采纳“晓习边事”⑦的上大将军贺娄子干的建议，在北部边境特别是陇右、河西地区，增修设施，加强防务。此后十余年间，突厥未再南下袭扰，使隋朝北部边境保持了和平安定局面。

杨坚采取政治分化与武力反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赢得了北

---

①②③④⑤《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附长孙晟传》。

⑥《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⑦《隋书》卷五十三《贺娄子干传》。

上反击突厥的重大胜利，这不仅为尔后南下灭陈战争的实施，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为隋朝统治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三节　南下灭亡陈朝之战

（参见附图 2）

出兵南下灭陈，实现南北统一，这是隋文帝杨坚既定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企图，杨坚在代周建隋之初，就进行了积极准备。在取得北击突厥作战胜利之后，又在经过多年准备的基础上，终于把南下灭陈的战争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完全胜利。

一、灭陈谋议与战前准备

为确保南下灭陈这一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除了要通过充分的战争准备以创造赢得胜利的客观物质条件外，还必须从实战需要出发，拟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实施计划。为此，杨坚自建隋至攻陈前的八年时间里，反反复复地与臣下讨论研究平陈之策。据《隋书》记载，自开皇以来，杨坚先后征询他人意见或臣下主动献计献策者，有尚书左仆射高颎、内史令李德林、上柱国杨素、吴州总管贺若弼、上柱国梁睿、柱国王长述、虢州刺史崔仲方、开府王颁、左武卫将军杜整、光州刺史高劢、晋州刺史皇甫绩等 11 人之多。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灭陈的必要性和胜利的可能性，提出了许多可资借鉴和利用的重要谋策。对于这些，杨坚不但乐于倾听，而且择善而从。正是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完整而周密的灭陈战略实施计划，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破坏陈朝江防能力及其物资储备的实施计划。此一计划主要采自高颎所献之策。据《隋书》载称，开皇二年（582 年）以

后，杨坚“尝问颎取陈之策”①，高颎建议在江南收获季节，调集一部兵力，采取虚张声势之法，摆出进攻的架式，迫使陈朝屯兵守御，以此延误其农时；待陈大军齐集，隋军便解甲收兵。如此反复多次，陈军必定习以为常，麻痹不备；一旦隋军真正出兵进攻之时，陈军因丧失警惕必然不信，在其狐疑不定之际，隋军即可乘机渡江登陆而战。高颎还建议，要“密遣行人（即间谍），因风纵火”②，烧毁和破坏陈朝的物资储备，这样，“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③。高颎的这个建议，是针对陈朝凭恃长江天险，以水军力量阻遏隋军南渡的企图，而提出的采取佯动误敌和派遣间谍之法，首先破坏陈朝的沿江防御能力和后方物资储备，然后乘其战备松懈和国力削弱之隙，而进行突然袭击一举灭陈的长远实施计划。杨坚完全予以采纳实行。

二是南下灭陈的军事部署及其实施步骤。据《隋书》记载，开皇六年（586年），虢州刺史崔仲方上书就攻陈的军事部署及实施步骤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自武昌（今湖北鄂城）以东，在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北）、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滁州（治今安徽滁县）、方州（治今江苏六合）、吴州（治今江苏扬州）、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长江下游沿江要地“更帖精兵，密营渡计”④；自武昌以西，在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信州（治今四川奉节东）、襄州（治今湖北襄樊）、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基州（即乡丰，在今湖北钟祥南）等长江上游沿江地区“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⑤。崔仲方认为，此一计划实施后，如果陈以精兵增援上游，那么，武昌以东“密营渡计”的隋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捣陈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如果下游的陈军坐守不动，那么，上游的隋军则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隋军夺取建康。这样，纵然陈朝“恃九江五湖之险”⑥，也将无法防守自固和免于灭亡之厄。崔仲方的这一建议，是个旨在正确选择战略攻击方向的

---

①②③《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④⑤⑥《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

重要谋划，其要点是：以武昌之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隋军的主要攻击地段，采取“密营渡计”之法，以隐蔽隋军渡江袭取建康的战略企图；武昌之西的长江上游是为隋军的次要攻击地段，采取“多张形势”之法，以吸引陈朝的注意力，从而造成一个主次配合、东西呼应的对隋有利的战场态势，陷陈军于首尾脱节、顾此失彼的被动挨打局面。这样，便可一举而攻灭陈朝。崔仲方的这个建议，无疑是个较为符合实战需要的灭陈战略实施计划。因此，杨坚“览而大悦”①，完全予以采纳。

为确保灭陈战略计划的实施，隋朝根据实战需要，抓紧进行战前的各项准备，其主要措施如下：

（一）大造战船，训练水师

杨坚根据隋与陈有长江之隔和江南水多利于水上作战的地理特点，采纳了柱国王长述“修营战舰，为上流之师”② 的建议，下令在长江上游地区“大作战船”③，训练水军，抓紧战前准备。先后派遣柱国李衍“于襄州道营战船”④；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于永安（今四川奉节）“造大舰”⑤，练水师。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备战工作也在抓紧进行。杨坚先是派遣仪同三司元寿“奉使于淮浦监修船舰”⑥；后又调朔州总管吐万绪为徐州总管，“令修战具”⑦；又令吴州总管贺若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⑧，积极而又隐蔽地为渡江作战做准备。

（二）加强一线兵力，沟通南北交通

杨坚在大力抓好灭陈战前的物质准备的同时，积极选派得力

---

① 《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

② 《隋书》卷五十四《王长述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元年十一月。

④ 《隋书》卷五十四《李衍传》。

⑤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⑥ 《隋书》卷六十三《元寿传》。

⑦ 《隋书》卷六十五《吐万绪传》。

⑧ 《北史》卷六十八《贺若敦传附贺若弼传》。

将帅，加强长江一线的力量。开皇初，杨坚根据尚书左仆射高颎的推荐，选派有军事指挥才能的将领贺若弼为吴州总管坐镇广陵（即吴州治所，位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坐镇庐江（即庐州治所，位今安徽合肥），并双双“委以平陈之事”①。开皇六年（586年）十月，于襄州（治今湖北襄樊）设山南道行台，以秦王杨俊为尚书令，统管长江上游军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又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设淮南道行台，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负责长江下游军事。这样，至灭陈战争发动前，隋朝于长江一线的兵力和战备得到了很大加强。

为了解决南下攻陈作战的物资补给，杨坚于开皇七年（587年）四月，组织大批人力开凿运河山阳渎，北起淮河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南抵长江北岸的江都（今江苏扬州），沟通了南北战略交通，便利了江、淮漕运，从而使关中、中原的物资得以调运东南，保障了对陈进攻作战的物资需要。

（三）多方误敌，困敝陈朝

杨坚依照崔仲方提出的上游“多张形势”、下游“密营渡计”的谋略，一方面，公开命令上游隋军大造战船，摆出一副即将顺流而下的进攻姿态，以此吸引陈朝统治者的注意力。为使陈人确信上游隋军造船是事实，杨坚令造船者“投其柿于江”②，顺江漂下大量造船废木料。陈叔宝果然上当，误认上游隋军即将发动进攻，遂命散骑常侍周罗睺“帅兵屯峡口”③，企图侵占隋属峡州（治今湖北宜昌）以阻遏隋军顺流而下。这样，杨坚以制造上游立即进攻的假象迷惑陈朝，诱使其调兵西上，从而转移了它对下游隋军备战活动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杨坚采纳吴州总管贺若弼以马易船的建议④，令其暗中用老马换取大批陈朝民船而匿之，又

---

① 《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韩擒虎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元年十一月。

③ 《陈书》卷六《后主本纪》。

④ 见《通典》卷一六一《兵十四·因机设权》。

"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内国无船"①，以此掩盖隋军的备战企图。贺若弼还采用佯动惑敌之法，利用部队每次换防之机，"必集广陵，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但当"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②之时，隋军便立即解散，这样，久而久之，陈军遂习以为常，"不复设备"③，完全丧失了对隋军的警惕性，从而使长江下游隋军的备战活动，得以秘密而顺利地进行。与此同时，杨坚还按照高颎的建议，派遣大都督张奫、来护儿等人多次率领间谍潜入陈境后方，破坏其储备，扰乱其人心，收到了致"陈人益敝"④ 的效果。

（四）制造舆论，争取民心

开皇八年（588 年）三月⑤，杨坚颁布伐陈诏令，公开宣称："近日秋始，谋欲吊人。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⑥，并历数陈后主叔宝的 20 条罪状，"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外"⑦。杨坚此举的目的，一方面以神龙导引益船东进的神话表明伐陈是"显行天诛"⑧，借此威慑陈朝；一方面是为了揭露陈叔宝的黑暗统治，争取江南士民对隋军即将南进之举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对于已经捕获到的陈朝间谍，杨坚采取优容感化的政策，一律放归江南，利用他们传播隋军声威，动摇陈朝的民心士气。

杨坚通过以上临战的准备和动员以后，终于把南下灭陈战争的实施，提到了隋王朝的议事日程。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④《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⑤ 据《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载称，杨坚所颁伐陈诏令是在开皇八年三月，但从诏令的"近日秋始"句看，似应在开皇八年秋。

⑥《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⑦《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二年三月。

⑧《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元年十一月。

二、隋军进攻部署及其战略企图

面对隋军即将渡江南进的严重局势，以陈叔宝为首的陈朝统治集团，不但毫无警觉和紧迫感，相反，却在大兴宫室和佛寺，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后主陈叔宝整天“溺于嬖宠，惑于酒色”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②，在政治上完全陷入“上下相蒙，众叛亲离”③的危殆局面。在军事上，陈朝虽有长江天险作屏障，并于沿江要点驻军防守，但由于统治集团缺乏敌情观念和应战准备，名为置防，实系虚设。这就给隋军渡江南进以可乘之隙。

杨坚见灭陈时机已经成熟，乃于开皇八年（588年）十月，开始部署南进事宜，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调集行军总管90、水陆军51.8万人，“皆受晋王节度”④。杨坚根据隋军将要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⑤的正面沿江作战的实际情况，采取集中兵力，重点突破的原则，作了如下部署：

秦王杨俊率水陆军由襄阳（今湖北襄樊）进屯汉口（今属湖北）；

清河公杨素率舟师出永安顺江东下；

荆州刺史刘仁恩率部出江陵（今属湖北）与杨素合兵东下；

晋王杨广率师自寿春出六合（今属江苏）；

庐州总管韩擒虎率部出庐江攻采石（位今安徽马鞍山西南）；

吴州总管贺若弼率师出广陵攻京口（今江苏镇江）；

蕲州刺史王世积率舟师出蕲春（治蕲春，今湖北蕲春东北），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元年十一月。

③ 《陈书》卷六《后主本纪》。

④⑤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自蕲口入江攻九江；

青州总管燕荣率舟师出东海（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沿海南下入太湖攻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

从以上隋军兵分八路的部署情况看，这是一个体现集中兵力实施重点突破的灭陈作战部署。前三路是以秦王杨俊为指挥，在长江上游行动。从隋军进攻部署的全局看，上游是隋军的次要攻击方向，其战略企图是，切断上游陈军入援建康之路，配合下游隋军夺取建康的作战行动。后五路是由晋王杨广直接统率，在长江下游行动。这是实现灭陈的主要攻击方向。因此，杨坚部署了五路强大兵力，其中又以杨广、韩擒虎、贺若弼三路为主力，进攻所向直指陈都建康；燕荣、王世积两路则分别在建康的东、西两翼策应，主要任务是切断建康与外地的联系，以确保隋军主力顺利夺取建康。

为了达成渡江作战的突然性，杨坚在部署进攻之前，已将陈朝使者扣留不放，以保守军事秘密。在完成南下攻陈的部署之后，杨坚于开皇八年十一月初十，亲赴定城（今陕西潼关西）举行“陈师誓众”① 大会；十二月，各路隋军分别集结于长江北岸的各自进攻出发地。至此，隋军一场大规模渡江南下灭陈战争即将开始。

三、隋军渡江南下作战

隋灭陈之战，主要是在长江上、下游两个方向上相继展开的。

（一）分割围歼，断敌入援之路

灭陈战争首先是从长江上游方向上发动的。采取分割围歼，切断陈军入援建康之路，这是上游隋军实施进攻的主要战法。

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隋军“上流节度”杨俊督率30

---

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总管、水陆军10万余人，自襄阳顺汉水而下进至汉口后，立即派遣总管周法尚率舟师3万顺江而下，迅速占领武昌西北五里的樊口要地，切断上游陈军向下游机动、增援之路。接着，杨素自永安“引舟师趣三峡”①。此时，负责“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② 的陈将周罗睺见隋军来势迅猛，急忙收缩兵力自峡口东撤至江夏(治今湖北武汉东南)，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合兵一处，企图阻遏杨俊军顺流继续东进，双方相持呈胶着状态。

杨素率水军沿江东下，迅速进至西陵峡之流滩头（在今湖北宜昌西北），陈将戚欣以数千兵力和百余艘“青龙”战船，扼守狼尾滩以阻遏隋军东进。狼尾滩位于流滩头之东，“其地险峭”③，易守难攻，隋将见此有些畏难。杨素认为“胜负大计，在此一举”④，激励诸将奋勇向前。他鉴于白天行动易被陈军窥察虚实，遂决定利用夜暗袭击陈军。入夜，杨素派遣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率步兵从南岸进攻戚欣别栅，大将军刘仁恩率骑兵从北岸直趋白沙，自率“黄龙”战船数千艘，顺长江“衔枚而下”⑤，水陆齐进，于拂晓时分袭占狼尾滩，戚欣兵败逃走，陈军数千守兵全部被俘。为了进一步瓦解敌军，杨素采取优待俘虏政策，“劳而遣之，秋毫不犯，陈人大悦”⑥。隋军乘胜继续东进，据守岐亭（今湖北宜昌西北之西陵峡口）的陈将吕仲肃以三条粗大铁索链横于江上，企图拦截东进之隋军战船。有鉴于此，杨素乃挥军登陆进攻北岸的陈军营栅，经四十余战，隋军于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击败岐亭之陈守军，吕仲肃兵败“弃栅而遁”⑦，逃往荆门之延洲。杨素命人拆毁江上横索，隋军大队舰船继续顺流东进，连克安蜀（今湖北宜昌西）、荆门（今湖北宜昌东南）等地。防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的陈荆州刺史陈慧纪见势不妙，遂烧毁储备物资，率所部3万人及千余艘楼船，仓皇东撤，企图“入援建康”⑧，但被杨

---

①③④⑤⑥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② 《隋书》卷六十五《周罗睺传》。

⑦⑧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俊军阻于汉口以西不得前进。不久，杨素率军疾速东进，顺利地“下至汉口，与秦孝王会”①。至此，自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除江夏等少数地方尚为陈军据守外，其余沿江各地均在隋军控制之下。

长江上游的隋军采用梯次出击、分割围歼的战法，不仅歼灭了陈军沿江的一批防御兵力，而且牵制了大批企图东撤入援建康的陈军，从而完成了战略上配合下游隋军夺取建康、灭亡陈朝的任务。

（二）分进合击，直趋陈都建康

当上游隋军向陈军发动进攻之时，下游各路隋军已经分别集结于江北各地，待命出击。此时，陈朝沿江镇戍获悉“隋军将至，相继奏闻”②，但却被“共掌机密”③大权的中书舍人施文庆、沈客卿两人隐而不报，致使陈叔宝对于迫在眉睫的紧急军情毫无知晓，且在施、沈两人的左右下，不但拒不采纳护军将军樊毅等人加强京口、采石要地及缘江上下守备力量的建议，反而为了筹备元会即元旦之庆，竟将镇守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的南平王陈嶷、镇守徐州（治今江苏镇江）的永嘉王陈彦召回建康，并“命缘江诸防船舰悉从二王还都”，“由是江中无一斗船”④，使陈朝下游江防处于十分空虚无备的状态。杨坚正是选择陈朝庆祝元会之日，命令下游各路隋军渡江作战的。

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陈叔宝大会群臣，陈朝上下完全沉醉在元会的庆祝之中。隋军乘陈军戒备极度松弛之机，利用大江之上“雾气四塞”⑤的有利天候，分路渡江，出敌不意地给陈军以突然袭击。晋王杨广派行军总管宇文述为前锋率兵3万，自桃叶山（位于今江苏六合西南60里）渡江进攻石头（建康北之要地）；贺若弼率师由广陵渡江进攻京口；韩擒虎率军自横江浦（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长江袭占采石。与此同时，王世积率舟师自

①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二年十二月。

⑤ 《陈书》卷六《后主本纪》。

蕲口入江进攻九江；燕荣率水军自东海傍海南下入太湖攻取吴郡，在东、西两翼上配合进攻建康的隋军主力行动。

当长江下游各路隋军同时发起进攻之后，消息传到建康，陈叔宝如坐针毡，匆忙召集公卿侍臣讨论战守之策，于正月初四，下诏声称要“亲御六师，廓清八表”①，委派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等率军迎战，以中书舍人施文庆为大监军进行督战；又派南豫州刺史樊猛率水军出白下（在建康北）、散骑常侍皋文奏率兵进驻南豫州之姑熟（今安徽当涂南），企图阻击当面隋军进攻。但是，陈叔宝既不懂作战，又不重用有见识的将帅，竟将军事指挥大权“一以委施文庆”②。施文庆妒贤嫉能，唯恐诸将出战有功，屡向陈叔宝进谗言，千方百计地阻挠陈军出战。这就给隋军顺利进击以可乘之隙。

正月初六，贺若弼率军攻克京口，活捉陈南徐州刺史黄恪，俘获陈军六千余人。贺若弼十分注意军纪，对战俘不但不虐杀，反而全部予以释放，并且“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③。因此，贺军所到之处，陈军皆望风而降。贺若弼乘胜率军溯江而上，向建康进逼。

韩擒虎率军袭占采石之后，疾速南下，于正月初七，攻占姑熟，活捉陈军守将樊巡（樊猛之子，代替其父守此），散骑常侍皋文奏败归建康。江南百姓素闻擒虎威名，故“来谒军门，昼夜不绝”④。慑于隋军威势，陈军将领鲁世真、田瑞等率部相继归降。韩擒虎攻占姑熟后，乘势挥军顺流而下，迅速进抵建康西南约20里处的新林浦；不久，行军总管杜彦受晋王杨广派遣，率兵进至新林浦与韩擒虎会师，共有步骑兵2万人。同一天，贺若弼率兵进至钟山（即今南京紫金山，位于城东），屯兵于白土冈之东；宇文述所部已进抵建康北14里的白下城。至此，隋军采用多路渡江、分进合击的战法，已从东（钟山）、北（白下城）、西南（新林

---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④《隋书》卷五十二《韩擒虎传》。

浦）三面，对陈都建康形成了包围态势。

四、建康失陷与陈朝灭亡

建康相继为六朝① 的首都，该地“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② 当时，陈朝屯驻建康附近的部队尚有十余万人，如能很好组织起来，凭据险要进行防御，虽说不能最终挽救陈朝于灭亡，但可给进攻的隋军以一定的消耗和迟滞。然而，根本“不达军士”（胡注云：“士，读曰事”）③ 的陈叔宝竟弃险不守，把全部兵力置于都城内外，致使江防空虚；加之大监军施文庆从中作梗，诸将“凡有启请，率皆不行”④，无法发挥作战能力。这就给隋军顺利进占建康造成了有利条件。当隋军即将攻城，建康危在旦夕之时，昏庸无能的陈叔宝先是一筹莫展，“唯日夜啼泣”⑤，继则竟在毫无计划准备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命令中领军鲁广达率部在白土冈列阵，自此向北，依次为镇东将军任忠部、护军将军樊毅部、都官尚书孔范部，最北为骠骑将军萧摩诃部，企图在自白土冈以北 20 里的正面上布成一字长蛇阵，阻击来自东面攻城的隋军。但是，这一作战部署，既无统一指挥，又缺乏背城一战的决心，致使诸军行动互不协调，“首尾进退不相知”⑥。

正月二十日，贺若弼首先发起攻击。他亲自率兵 8000 人自钟山疾驰而下，冲向陈军一字长蛇阵的南端，遭到陈军鲁广达部抵抗，损失兵力 270 余人。鉴于隋军初战受挫，贺若弼立即采用燃物“纵烟以自隐”⑦之法，使部队得以“窘而复振”⑧。其后，贺若弼根据陈军初战得手必生骄惰的实情，及时调整进攻部署，集中兵力转攻陈军北端阵地的孔范、萧摩诃部。由于隋军攻势迅猛，孔

---

① 六朝，即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江南二·江宁府》。

③④⑤⑥⑦⑧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范“未阵而北”①，仅以身免，其他诸将“阵犹未合”②，已经溃不成军，陈军损兵折将5000人。在此形势下，本“无战意”③的萧摩诃更加陷入“无所用力”④的困难境地，为隋军生俘。镇东将军任忠与护军将军樊毅等人，也都弃阵逃归建康城内。至此，陈军的一字长蛇阵完全土崩瓦解。

当贺若弼向陈军一字长蛇阵发起进攻，并与陈军展开激战之时，韩擒虎乘陈都西南方向戒备空虚之隙，率军自新林浦直趋建康城。此时，陈朝统治集团已完全陷入分崩离析的混乱状态。镇东将军任忠“已帅数骑迎降于石子冈（即今南京雨花台）”⑤；驻守朱雀航（即建康城朱雀门南横跨淮水的桥梁）的领军蔡徵所部，“闻擒虎将至，众惧而溃”⑥。任忠引导韩擒虎军从朱雀门直入建康城。陈叔宝及其文武百官慌作一团，纷纷逃匿。隋军搜寻皇宫，俘获了藏于枯井中的陈叔宝及其皇妃。此时在建康的陈朝宗室王侯百余人，见陈叔宝被俘，也都相继出降。

在韩擒虎率军进入建康之后，贺若弼已挥军击垮陈军一字长蛇阵，并乘胜进至建康城北的乐游苑，陈将鲁广达虽率“余兵苦战不息”⑦，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守城诸军纷纷逃散，贺若弼乘夜烧毁北掖门而直入建康城。

正月二十二日，晋王杨广率部进入建康后，责令陈叔宝以手书先后招降了长江上游的周罗睺、陈慧纪等部，于是“上江皆平”⑧。之后，隋文帝杨坚一方面“诏遣使者巡抚陈州郡”⑨，一方面仍着部队东下吴、会（泛指江、浙地区）扫荡残存的陈朝军事力量。二月初，右卫大将军宇文述奉命率军自建康东进，直趋吴州（治今江苏苏州西南），企图与自东海南下已抵太湖的燕荣所部，合击陈吴州刺史萧瓛和永新侯陈君范。萧瓛见宇文述军来势迅猛，一面派将留守吴州，且于晋陵（今江苏常州）城东立栅“留兵拒

---

① 《南史》卷七十七《孔范传》。

②④ 《陈书》卷三十一《萧摩诃传》。

③⑤⑥⑦⑧⑨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述”[1]；一面自率部众自义兴（今江苏宜兴）入太湖“图掩述后”[2]。宇文述挥军进破其栅后，立即回兵大败萧瓛于太湖；同时，又遣兵别道袭取了吴州。萧瓛率余众退保包山（今太湖中之洞庭山），又为燕荣军所败；萧瓛及其部将数人为群众所擒献，陈君范则南逃至会稽（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宇文述乘胜南下，进至奉公埭（今浙江杭州东南）。陈在会稽的东扬州刺史萧岩见隋军势不可当，遂偕永新侯陈君范等“以会稽请降”[3]。于是，“吴、会悉平”[4]。

是时，岭南地区（指五岭以南地区）尚未归附，数郡共奉高凉郡（治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夫人洗氏为主号圣母，企图“保境拒守”[5]。隋文帝杨坚诏遣柱国韦洸等人南下“安抚岭外”[6]，却为陈豫章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徐璒拒于南康（治赣县，今江西赣州）之外而不得进。有鉴于此，晋王杨广遂遣陈叔宝遗书洗夫人，“谕以国亡，使之归隋”[7]；洗夫人深明大义，遂举郡归附，派其孙冯魂率众迎接韦洸南下。韦洸进入南康击斩徐璒后，南下至广州（今属广东），终于“说谕岭南诸州皆定”[8]。至此，“陈国皆平”[9]，隋文帝杨坚胜利完成了“统一寰宇”[10]的历史任务。

第四节　平定南方之叛乱

隋灭陈后不久，陈朝旧境自长江以南的江、浙至于岭南地区，一些士族豪门势力纷纷起兵叛乱，企图分裂、割据。隋文帝杨坚乘灭陈的余威，适时派兵前往镇压，仅以两月时间就取得了平叛斗争的胜利，从而使南北统一局势趋于完全稳定。

---

①②③④《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传》。

⑤⑥⑦⑧⑨《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二月。

⑩《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

一、陈朝灭亡后的南方形势

隋灭陈后，共得南方之“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①。对于统一后的陈朝故境怎样进行统治和管理，这是摆在隋朝统治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江以南地区，自东晋以来，特别是陈朝统治时期，由于“刑法疏缓”②，士族豪门侵凌寒门、鱼肉乡里之情景已成为普遍现象，致使江南社会秩序异常紊乱。此种情况如不迅速改变，势必危及全国统一局势的稳定，不利于隋朝对江南的统治。为此，自灭陈战争结束以后，杨坚一方面下令对“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余州免其年租赋”③，欲以减免10年租赋的政策来争取江南民心；一方面，在大力推行开皇新律令的基础上，复令刑部尚书苏威制定《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④，企图以此扭转江南政刑紊乱的社会局面。上述这些措施，对于江南那些横行不法的豪强大族势力，无疑是个迎头打击，因而引起陈朝故境“士民嗟怨”⑤，他们制造所谓隋朝欲将江南人口“徙之入关”⑥的谣言，公开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反对隋朝。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便有婺州（治今浙江金华）汪文进、越州（治今浙江绍兴）高智慧、吴州（治今江苏苏州西南）沈玄侩“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⑦；继有乐安（今浙江仙居）蔡道人、蒋山（指江宁，即今江苏南京）李稜、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吴代华、温州（今属浙江）沈孝澈、泉州（今属福建）王国庆、杭州（今属浙江）杨宝英、交州（今越南河内）李春等人，“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⑧。总之，陈之故境，从长江以南的江、浙到岭南的大部地区，都发生了由豪强大族势力煽动而起的武装叛乱，“大者数

---

①⑦⑧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④⑤⑥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二月。

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①。他们攻打州县，执杀隋官，甚至抽肠割肉，一时甚嚣尘上，严重危害隋朝对江南的统治。在此情况下，隋文帝杨坚及时果断地作出了出兵平叛的决定。

二、平定江南的作战

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中旬，杨坚诏以内史令、越国公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平定江南豪强大族发动的武装叛乱。杨素受命后，为了顺利地渡江作战，他先派仪同三司麦铁杖乘夜潜渡长江“觇贼中消息”②。在获悉当面敌情之后，杨素率水军自扬子津（长江渡口，在今江苏扬州东南）渡江进攻京口（今江苏镇江）。当时，叛首沈玄侩的部将朱莫问“以盛兵据京口”③；杨素挥军猛攻，大破之，首战告捷。尔后乘胜南进，击败晋陵（今江苏常州）的顾世兴，生擒其将鲍迁，俘敌三千余人；接着，又平定了据守无锡（今属江苏）的叶略④。此时，据守吴郡的叛首沈玄侩及沈杰等人以兵围攻苏州（今属江苏），隋苏州刺史皇甫绩屡战不利，杨素率兵急救奋战，沈玄侩败走南沙（今上海崇明南）陆孟孙处。杨素挥军乘胜追击，战之于松江（今上海吴淞江），大破叛军，活捉陆孟孙、沈玄侩等人。至此，江苏境内的叛乱基本平定。

杨素在平定了江苏境内的武装叛乱之后，乘战胜之威，挥军南下，向浙江地区进军。时越州叛首高智慧拒守浙江（今富春江）东岸为营，有“船舰千艘，屯据要害，兵甚劲”⑤。杨素欲督军强攻，上开府来护儿根据叛军“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于争锋”⑥的实际情况，建议采取以“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⑦的出奇制胜之策，为杨素所采纳。杨素

---

①③⑤《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②《隋书》卷六十四《麦铁杖传》。

④ 叶略，《北史·杨素传》作“叶皓”；本书从《隋书·杨素传》说。

⑥⑦《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遂命来护儿率领数百艘轻便小船，直登江岸，突袭而破敌营，又因风纵火，顿时烟焰漫天，叛军见状乱作一团。杨素率军随后，乘敌慌乱而纵兵奋击，大败叛军，叛首高智慧自海路逃往温州。隋军乘胜进攻婺州。时叛首汪文进以蔡道人为司空，拒守于乐安，杨素督军进讨，“悉平之”①。其后，杨素一面率主力直趋温州，追击高智慧；一面遣总管史万岁率兵一部“自东阳（治金华，今属浙江）别道而进”②，搜剿叛军。史万岁率军翻山涉水，转战千余里，历经数百余战，攻破叛军溪洞不可胜数。

杨素亲率主力击败温州的沈孝澈后，乘胜进攻天台（即天台山）、临海（今属浙江）地区，追剿溃散漏网之叛军，前后历经百余战，斩获甚众，高智慧又败走福建。此时，隋文帝杨坚“以素久劳于外，诏令驰传入朝”③；杨素奉诏回朝述职后，“以余贼未殄，恐为后患，又自请行。”④杨坚遂下诏准行，并授以元帅，将“军民事务，一以委之”⑤。杨素立即自长安驰至会稽（治会稽，今浙江绍兴），然后沿海道进攻泉州叛首王国庆。

王国庆本南安（今福建泉州西北）豪族出身，在江南叛乱蜂起之际，他杀隋刺史刘弘而“据州为乱”⑥，自以为“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⑦。杨素挥军乘虚突然袭击，王国庆慌惧不支，被迫弃离泉州而逃走，其余党或散入海岛，或潜藏于溪洞。对此，杨素一面分遣诸将，实施“水陆追捕”⑧；一面秘密派人规劝王国庆弃暗投明，“使斩送智慧以自赎”⑨。在隋军强大攻势的威逼和招抚政策的感召下，王国庆被迫执送高智慧，杨素将高斩于泉州。叛军余众，纷纷来降。于是，“江南大定”⑩，隋军取得了平叛作战的胜利。

---

①③④⑤⑥⑦⑧⑩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② 《隋书》卷五十三《史万岁传》。

⑨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三、平定岭南的作战

开皇十年（590年）冬，在江南武装叛乱发生的同时，番禺（今广东佛山）的豪族王仲宣也起兵反叛，“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兵围广州”①，致使隋柱国、广州总管韦洸中流矢而亡。鉴于广州和岭南形势严峻，杨坚一面立即诏以韦洸的副将慕容三藏负责广州道军事，率众坚守，抗击叛军围攻；一面命令正在“巡抚岭南”②的吏部给事郎裴矩前往进剿。裴矩奉命进至南康，集兵数千人，然后率兵疾速南下。叛首王仲宣在围攻广州的同时，另派部将周师举率部北进攻打东衡州（治今广东始兴），并“立九栅，屯大庾岭，共为声援”③，企图阻截南下之隋军。裴矩与大将军鹿愿挥军奋击，大破其营栅，敌将周师举因惧隋军攻势迅猛，遂弃攻东衡州，而退据原长岭（今址不详）；裴矩挥军追击，又大破之，并击斩周师举，尔后乘胜继续南下增援广州。此时，王仲宣率叛军“四面攻围”④广州已月余。就在隋将慕容三藏率众坚守乃至“城中粮少矢尽”⑤的危险之际，前已归顺隋朝的高凉郡女首领冼夫人遣将率兵急救广州，与南下的裴矩所部会师于南海（治南海，今广东广州），从而对正在攻打广州的叛军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在此形势下，慕容三藏“遂自率骁锐，夜出突围”⑥，与援军内外合击，大败王仲宣，叛军溃散，广州围解。其后，裴矩在冼夫人的陪同下，巡抚岭南二十余州；苍梧（治封川，今广东封开东南）首领陈坦、冈州（治新会，今属广东）冯岑翁、梁化（治今广东惠州东北）邓马头、藤州（治镡津，今广西藤县）李光略、罗州（治石城，今广东廉江北）庞靖等纷纷前来谒见，裴矩均依据隋制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②③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④⑤⑥ 《隋书》卷六十五《慕容三藏传》。

署为刺史、县令，使之还统其部落。于是，“岭表遂定”①。战后，隋文帝杨坚因裴矩平叛有功，拜官开府，升迁内史侍郎；册封冼氏为谯国夫人，并准其开府置官，授予冼夫人以“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②的军事指挥权。

隋军平定江南、岭南豪强大族武装叛乱的斗争，是隋朝统一事业的深入和继续。在灭陈战后不久，面对“陈之故境，大抵皆反”③的严重态势，隋文帝杨坚果断、适时地进兵南方，以强大的军事攻势，迅速取得平叛作战的全面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南方豪强大族分裂割据势力，这对稳定南北统一的局势，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五节　隋朝统一战争的意义及其胜利的原因

隋王朝北击突厥和南下灭陈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自东晋以来南北长期分裂、混战的纷乱局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北统一的实现和全国范围的相对安定局面的形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封建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强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自此，中国社会步入了封建统一帝国稳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隋王朝统一战争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在政治上，隋文帝杨坚顺应了社会发展需要统一的历史潮流。

自东晋十六国以来，由于民族的混战和军阀的割据，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对立。到了南北朝末期，随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融合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南北统一的趋势逐渐形成。杨

①② 《隋书》卷八十《谯国夫人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以后，就暗自立下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当时，塞北的突厥奴隶主贵族不断遣兵南下袭扰掠夺，严重威胁刚刚建立的隋朝政权的安全，损害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的利益；江南的陈朝虽因其国势衰微而构不成对隋朝政权的严重威胁，但以陈后主为首的封建贵族的残暴统治，已成为破坏南方生产发展和阻碍南北统一的最大障碍。因此，杨坚进行的北击突厥和南灭陈朝的战争，不仅是巩固隋朝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且在客观上也符合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和南北人民希望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根本愿望。政治上的深得民心和顺应潮流，这无疑是隋朝赖以击败突厥、灭亡陈朝，实现全国统一的首要因素。

其次，在军事上，隋文帝杨坚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这是隋朝统一战争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纵观隋朝统一战争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杨坚在战略指导方面，主要有以下成功之处：

第一，从敌情实际出发，确定战略决策。

隋朝建立之初，杨坚本欲首先南下灭陈。但是，随着南北形势的发展和敌情的变化，隋朝在制定统一事业的战略决策上，经历了一个由“先南后北”到“先北后南”的变化过程。开皇初年，居于漠北的突厥奴隶主统治集团，出于掠夺和扩张的需要，乘隋朝新建，内部尚待整顿、巩固之际，接连不断地大举南下袭扰。这不仅严重威胁隋朝统治的巩固，也给统一事业带来极大不利。因此，首先解除突厥南下袭扰的严重威胁，便成为隋朝的当务之急和实现统一大业的首要战略步骤。据此，杨坚一改初衷，依据变化了的敌情实际，而确定了先北击突厥、后南下灭陈的“北战南和”、“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隋朝统一战争的实践证明，“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战略指导。在首击突厥这一战略打击目标确定之后，杨坚为了实现既定的战略企图，始终注意在一定时期内，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或威胁最大的敌人突厥，而对次要或威胁较小的敌人陈朝，则采取妥善之策，尽量争取其中立或取守势；在对主要敌人作战的同时，又能秘密而

积极地为下一步作战做好准备。这样，既能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又能为连续作战、最终实现南北统一创造条件。这一点恰是隋军在击败突厥之后，得以乘胜而适时地一举灭陈的重要原因。

第二，根据实战需要，做好战争准备。

杨坚建国之后，为实现南北统一，在加强政治、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同时着力于从军事上做好战争准备。为了赢得北击突厥作战的胜利，自开皇元年始，隋朝多次加修长城，设置重镇，调兵遣将，加强北边防御力量。北击突厥之战，正是在经过 3 年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才付诸实施的。而南下灭陈之战，则是在经过长达 8 年周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隋建之初，杨坚即根据统一战争的实际需要，及时选派贺若弼、韩擒虎等名将“置于南边，使潜为经略”① 灭陈事宜。为了实施对陈作战，自开皇以来，杨坚一方面多次反复地与臣下讨论平陈之策，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周密可行的战略实施计划；一方面积极做好对陈作战的物质准备，根据南方地理特点和渡江作战的实际需要，派遣得力将领督造大批各种战船，集中力量加强水军训练，从而为灭陈战争的胜利，创造了较为充分的有利条件。

第三，实行军政并举的方针，把用兵与运谋紧密结合起来。

在“北战南和”、“先北后南”的战略决策确定之后，对于不断南下袭扰的突厥，是立即以武装力量实施战略反击，还是首先运用谋略进行政治攻心，创造有利条件再行战略反击，这是摆在隋王朝面前必须慎重考虑而作出明确决策的重大问题。对此，杨坚从敌情实际出发，果断地采取了以政治分化为先导，以军事打击为后继的战略指导方针，把用兵攻战与运谋攻心紧密结合起来。在对突厥实施大规模武力反击之前，杨坚采纳臣下建议，根据突厥内部四分五裂的实际情况，首先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政治分化策略，扩大和加深突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使各可汗之间互相猜忌，自相残杀，彼此削弱，从而为其后对突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三年三月。

厥实施大规模武力反击的成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在北击突厥之战取得胜利之后，杨坚继续运用政治分化的策略来进一步瓦解突厥内部，以巩固和扩大军事胜利的成果，因而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制服突厥，赢得了北部边境此后持续十余年的和平环境。在对陈斗争问题上，杨坚也是实行军政并举，用兵与运谋结合使用的方针。当南下灭陈的时机尚未成熟和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杨坚对陈采取“和平不战”的外交斗争策略，主动与陈朝互派使臣，并用“书称姓名顿首”的卑词手段来骄纵和麻痹陈朝统治者，为尔后以武力攻陈创造条件。但在经过长期战争准备，灭陈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之时，杨坚则果断、适时地出动优势兵力，对陈实施突然打击，一举而灭亡陈朝。

第四，集中优势兵力，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作战目的。

灭陈战争，隋朝出动五十余万参战部队。从当时隋陈双方的兵力对比情况看，隋军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加上大批各种舰船和充足的后勤物资供应，这无疑是战胜陈军、灭亡陈朝的物质力量。但是，杨坚并不仅仅依恃兵力和物力上的优势拼消耗，而是竭力争取以较小的代价夺取较大的胜利。为达此目的，杨坚在组织实施灭陈战争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以围歼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作战指导原则。隋军面对数千里的“长江天堑”和有相当数量的陈军兵力，从上、下游两个方向上，兵分八路出击，进攻所向皆是陈军屯兵之处。韩擒虎所部本为直接攻取陈都建康的隋军主力之一，但他率军自横江浦渡江后并不立即北进，而是首先南下连续歼灭采石、姑熟的陈朝守军后，才回兵北上进攻建康；贺若弼率军自广陵渡江后，也不马上溯江而上直趋建康，而是在歼灭京口的陈军后，才进军陈都。上游的杨素、杨俊等军，同样也是以歼灭或牵制回救建康的陈军为基本作战目的。为了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诸路隋军既注意行动的突然性，力争速战速决，又注意动作的协同性，作到相互策应。这样做的结果，既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能夺取陈军江防要地，为消除隋军的后顾之忧，迅速实现攻占建康、灭亡陈朝铺平了道路。

突厥的失败和陈朝的灭亡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深刻原因的。突厥当时尚处于落后的奴隶制社会，由于奴隶主贵族对各族人民的横征暴敛和残酷统治，致使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激烈；突厥统治集团内部更是矛盾重重，陷入四分五裂的混战仇杀状态。这不仅给隋朝进行政治分化以可乘之隙，也给隋军实施武力打击、各个击破造成有利条件。陈朝统治集团政治上腐败不堪，不得民心；经济上国力衰弱，困难重重；军事上麻痹松懈，兵无斗志，战前既无认真准备，临战又无可行决策，在隋军强大攻势的突然打击之下，其兵败国亡实属必然之势。

第三章　隋朝的军制、国防与武器装备

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以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在大力革除北周弊政、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同时，对北周的军制——府兵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着重加强国防设施与军事装备的建设。这不但为杨坚实现统一大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而且使隋王朝自建国至杨广即帝初期的二十余年间，便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国富兵强的国家。

第一节　府兵制及其组织编制和作战指挥体制

隋朝的府兵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一种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此种军事制度的推行，不仅有力地维护了隋王朝的统治，而且为其后唐朝前期的兵役制度的建立和武装力量的建设，提供了模式和经验。

一、隋朝府兵制度的重大改革

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在其论述隋代府兵制度时指出："其制虽始于周、齐，而其效则渐见于隋，彰灼于唐。"① 这大体上揭示了府兵制度的创立、形成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府兵作为一种兵役制度，它始于西魏大统八年（542 年）三月丞相宇文泰"初置六军"②

---

① 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五。

② 《北史》卷五《魏本纪第五·文帝元宝炬》。

之时，而行于整个北周统治时期。隋文帝杨坚代周后，虽然沿用了北周的府兵制，但他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照套，而是从新的历史时期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对府兵制度进行了改革和改造。其主要措施是：

（一）废除鲜卑赐姓，恢复汉族本姓

宇文泰创建府兵之后，于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下令把府兵军将及其所属士兵赐以鲜卑姓氏，随从宇文泰起兵于关西的杨坚之父杨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赐姓普六茹氏"① 的。宇文泰采用对府兵赐以鲜卑姓氏的办法，来达到控制军队、维护统治的目的，使其后的北周府兵打上了鲜卑部族私兵的烙印。这种做法虽有利于北周宇文氏政权的统治，但对嬗替后的杨隋封建统治并无好处。因此，杨坚在大象二年（580年）九月受任大丞相，执掌北周朝政大权后，在同年十二月他所发布的代周文告上，不仅明令"诸改姓者，悉宜复旧"，而且指出："神徵革姓，本为历数有归；天命在人，推让终而弗获"②，公然利用"神徵"、"天命"说把恢复汉族本姓之事与夺取皇位联系起来。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杨坚取代北周称帝之后，再次下令"已前赐姓，皆复其旧"③。杨坚废除鲜卑赐姓、恢复汉族本姓的措施，有利于进一步清除府兵鲜卑部族私兵的印记，有利于争取广大汉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有利于维护和巩固隋王朝的封建统治。

（二）大力整顿乡兵，纳入府兵系统

隋初的军队，大体上是承袭北周的武装力量。当时，除了由国家控制的府兵之外，各地尚有相当数量的属于私兵性质的乡兵、部曲。此种私兵性质的武装力量的存在，无疑是有碍于隋朝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因而，采取必要措施，把这些地方势力收编为国家军队，乃是摆在隋朝统治集团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杨坚称帝伊始，即着手整顿乡兵、部曲。据出土的《唐该墓志铭》载

---

①③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② 《北史》卷十《周本纪下》。

称："洎开皇之初，将定江表，首置军府，妙选英杰。君以材雄入幕，豪胜知名，远近所维，特授都督。既而教兵不弃，治兵有典，富贵自取，仍领帅都督。"① 这段铭文记载内容，不仅描述了唐该本人如何以一地之"材雄"而被授予府兵帅都督的情形，而且披露了杨坚自开皇之初即着手整顿乡兵、新设军府、扩充府兵的事实。另据史载，自隋初至平陈战役前后，杨坚对活动于北自彭城（今江苏徐州）、南至广陵（今江苏扬州）的江淮下游地区的乡兵，进行了整顿和收编，其中：将居家于淮阴（今江苏淮安西）且拥有较强乡里势力和豪侠子弟的张奫，"授大都督，领乡兵"②；授庐江（治合肥，今属安徽）人樊子盖"以仪同领乡兵"③；将江都（治江阳，今江苏扬州）人来护儿"除大都督，领本乡兵"④；授彭城丰县（今属江苏）人刘权"以车骑将军领乡兵"⑤；将庐江襄安（今安徽巢湖）人陈稜"拜开府，寻领乡兵"⑥，等等。上述这些被收编而授予府兵下层统领、军将的乡豪，都曾率领各自的已被纳入府兵系统的乡兵，参加了灭陈战争或平定江南叛乱，并且均以战功而获得升迁。隋文帝杨坚通过对握有一定武装力量的地方乡豪授予府兵军将的办法，先后将各地的乡兵、部曲，逐步收编而纳入府兵制的系统，这样做不仅扩大了隋朝封建中央掌握兵员的范围，而且为隋朝灭陈之后确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府兵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编府兵入户贯，实行兵民合一

把府兵编入户贯实行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这是隋文帝杨坚改造北周兵制所采取的最重大的革新措施。灭陈战争

---

①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 488，转引自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 10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7 月版。

② 《隋书》卷六十四《张奫传》。

③ 《隋书》卷六十三《樊子盖传》。

④ 《北史》卷七十六《来护儿传》。

⑤ 《隋书》卷六十三《刘权传》。

⑥ 《隋书》卷六十四《陈稜传》。

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开皇十年（590年）五月初九，杨坚就向全国颁布了关于军人编入户贯的诏令，这是对改革府兵制度一项带根本性的举措。诏令指出："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① 这段文字记载，不仅是考察隋代府兵制度实行改革的根本依据，而且是研究此前府兵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

北周至隋初的府兵，军人平时集中驻在坊府（即在一定地区筑城而居的军营），其家属一般随营居住、随军调动，性属军户而不是民户。此种军户性的府兵制度，军人与其家属虽可筑城而同居，但在南征北战、军队调动频繁的情况下，却无法长居久安，军人虽然有家，竟呈"家无完堵，地罕包桑"的状态。这不仅给军人家庭生活造成困难，而且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因此，改革北周府兵制，把军人编入民户，是隋朝建立后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灭陈战争结束后，在南北统一已经实现，国家转入和平时期以后，杨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终于把这一改革任务提到了隋朝军事建设的日程上来。军人编入民户以后，隋代的府兵与北周府兵的最大不同之处，则在于它是具有军籍和民籍两重性的一种新型府兵制度。但此种兵役制度，仅在设置军府的地区内实行，而军府的设置，又与内卫、边防任务的需要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军府地区，府兵平时直属地方州县管辖，同一般民户一样从事生产和生活，具有"民籍"的性质；但在应征服役期间，则在军府的统管与组织下，进行军事训练，执行宿卫和作战任务，具有"军籍"的性质。②

隋朝府兵制度的这一重大改革，是与当时整个封建政治经济

---

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又见《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但文略异，即"役车"，《北史》作"役军"；"一与民同"，《北史》作"一同编户"。

② 参见《府兵制度考释》第103页。

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它是建立在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为政治目的、以均田制度为经济基础的一种“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新型兵役制度。按照隋朝政治、经济制度的规定，凡在设置军府的地区内，军人可依照均田法令受田和保有自己的产业，在其应征服役期间，军人本身免纳租赋，但服役时所需资粮给养，则由其个人负担。隋初依照北周旧制，规定男子18岁为成丁，开始服兵役，至60岁而免役。不久，杨坚下令将民丁服役（包括服兵役、徭役）年龄提高到21岁（杨广即位后又将成丁年龄提高为22岁），并将每年服徭役时间由原来的1个月减为20天。开皇十年六月，杨坚继颁诏改革府兵制之后，又下令将免役年龄由原来60岁减为50岁。由于缩小了农丁服役的年龄范围，这样既可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可使更多的壮劳力投入农业生产，这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隋朝府兵制度，乃是变兵农分离而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这一新型兵制的实行，不仅使隋朝军队的兵源和军需供给得到较好保障，而且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二、府兵的体制编制

隋代同前代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一样，军权集中在朝廷，军队由皇帝统御。隋朝的府兵制是在继承西魏、北周“十二大将军之遗制”① 的基础上，经过改革而建立起来的卫府制度。皇帝统御全国军队，是通过在中央所设的卫府来组织实施的。隋朝的府兵制，从其体制编制来看，它经历了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即隋文帝时期的府兵是十二卫府制，隋炀帝时期则发展为十六卫府制；与府兵统率机构卫府变化的同时，其下所设的开府也有相应变化。

（一）隋文帝时期的府兵

---

① 《通典》卷二十八《职官十·武官上·将军总叙》。

开皇中，杨坚在中央设置十二卫府分统全国的军队，其中既包括中央禁卫军，也包括分布于各地军府的地方兵。十二卫府的职责区分及其编组情况如下：

左、右卫府，“掌宫掖禁御，督摄仗卫”①。府直各设大将军 1 人，将军 2 人，配有长史、司马、录事，功、仓、兵、骑等曹参军，法曹、铠曹行参军各 1 人，行参军各 3 人。府中各设直阁将军 6 人、直寝 12 人、直斋 15 人、直后 15 人，“并掌宿卫侍从”②之责；奉车都尉 6 人，“掌驭副车”③；武骑常侍 10 人、殿内将军 15 人、员外将军 30 人、殿内司马督 20 人、员外司马督 40 人，“并以参军府朝，出使劳问”④。

左、右武卫府，“领外军宿卫”⑤。府直职官编制如左、右卫府，但府下不设直阁以下职官，另增配行参军各 8 人。

左、右武候府，主要负责皇帝出巡时的车驾护从、道路营禁。府直职官编成亦如左、右卫府。另增配司辰师 4 人、漏刻生 110 人。

左、右领左右府，“掌侍卫左右，供御兵仗”⑥。各设大将军 1 人、将军 2 人，配置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二曹参军事、铠曹行参军各 1 人。下置千牛备身 12 人，“掌执千牛刀”⑦；备身左右 12 人，“掌供御弓箭”⑧；备身 60 人，“掌宿卫侍从”⑨。

左、右监门府，“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⑩。府直不设大将军，但置将军各 1 人，配有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曹参军、铠曹行参军各 1 人，行参军 4 人。其下各设郎将 2 人，校尉、直长各 30 人。

左、右领军府，“各掌十二军籍帐、差科、辞讼之事”⑪。不设将军，仅置长史、司马、掾属、录事，功、仓、户、骑、兵等曹参军，法、铠等曹行参军各 1 人；行参军 16 人。又置明法 4 人，隶于法司，“掌律令轻重”⑫。

除上述十二卫府外，在中央还设有“东宫十率”，即：左、右卫率，左、右宗卫率，左、右虞候率，左、右内率，左、右监门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率。从《隋书·百官志下》记载其职责区分来看，东宫十率是与十二府（除左、右领军府外）相应而设的禁卫机构。

综观十二卫府的组织编成情况，可以明显看出，除左、右监门和左、右领军四府不设大将军外，其余八府均置有大将军。卫府的大将军对上直隶于皇帝，对下则各领若干骠骑、车骑府（史称“开府”），直接掌握府兵。大将军所置开府分布在京城和地方上要冲地带。在京城者，担负“禁卫九重”① 之责，属于中央禁卫军系统；在地方者，担负“镇守四方”②之任，则属于地方军系统。而在禁卫军中又有内卫与外卫之分，左右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监门及其所属在京府兵为内卫军，左右武卫府及其所属在京府兵为外卫军。实行内外禁卫结合、中外军队相维的府兵制度，就更加有利于隋朝封建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强化。③

骠骑府、车骑府的官制及其组织系统，是由北周的开府组织系统演化而来。骠骑府的长官为骠骑将军，而以车骑将军为副。有的以车骑将军开府时，则以车骑将军为开府的军事长官。这在隋文帝时期是没有统一规制的。开皇十七年（597 年）十月，杨坚“颁铜兽符于骠骑、车骑府”④。可见，当时所设开府，尚有与骠骑府相平行而独立存在的车骑府。诸开府置骠骑将军或车骑将军 1 人，府直机关配置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等曹参军、法曹行参军各 1 人，行参军 3 人。骠骑将军或车骑将军为开府的最高军事长官，直隶于中央十二卫府中之大将军指挥，府下又设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直接领兵。府兵的基层单位为军坊、乡团，每一开府领若干军坊、乡团。军坊置坊主 1 人、坊佐 2 人；乡团置团主 1 人、团佐 2 人。

隋初除设置具有实职性的军府之外，文帝杨坚为了奖励军功，因袭北周旧制，还设有一些勋级性军职名号，即有上柱国、柱国、

---

①②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③ 参见《府兵制度考释》第 110 页。

④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铜兽符，当为“铜虎符”，唐人讳改。

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勤劳”。①但到后来，非有卓著战功的军将，一般不再授予此种名号；而到炀帝杨广时期，除保留开府、仪同三司名号外，其它一律取消了。②

文帝时期的府兵，军人仍沿用北周旧制，通称为“侍官”。当时全国究竟设有多少军府以及所设地点，史籍设有明确记载。但从已出土的隋代墓志碑文所披露的内容看，开皇初，军府一般是以数字序列，而不冠以地名。例如，《范安贵墓志铭》载称，范于开皇三年（583 年）入为右领军右二骠骑将军③。但到开皇后期，军府渐有冠以地名的。例如，《刘德墓志铭》称刘于仁寿元年（601 年）被授以上开府仪同三司的勋衔，后又出任为检校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右武卫三骠骑④。这表明，此时的军府已由单纯以数字序列而向以地名命名的阶段变化。

（二）隋炀帝时期的府兵

隋炀帝杨广即位以后，为了巩固政权和实施战争的需要，他在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大力扩充府兵以强化国家机器。大业三年（607 年），杨广将府兵的中央领导体制由原来的十二卫府制，改组、扩充为十六卫府制，即：左、右翊卫（由左、右卫改），左、右骁卫（由左、右备身改），左、右武卫（依旧名），左、右屯卫（由左、右领军改），左、右御卫（新增），左、右候卫（由左、右武候改），是为十二卫；另有左、右备身府（由左、右领左右府改），左、右监门府（依旧名）。以上合为十六卫

---

①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② 见《府兵制度考释》。

③ 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 502，转引自《府兵制度考释》第 113 页。

④ 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 448，转引自《府兵制度考释》第 113 页。

府。[1] 这十六卫府中的前十二卫领有府兵，后四府则不领府兵。[2] 十六卫府制的形成和十二卫分领府兵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炀帝时期府兵的扩大和军制的进一步完备化。

十二卫的组织编成情况是，每卫各设大将军 1 人、将军 2 人，在皇帝的统御下，总领府事及其所属府兵的指挥管理。废止文帝时期卫府所设的直阁将军、直寝、奉车都尉、驸马都尉、直斋、别将、统军、军主、幢主等职官，以减少卫府的领导层次，这更有利于封建中央对府兵的直接控制。

杨广在改组和扩充中央卫府机构的同时，将原各卫府所领的骠骑府、车骑府，一律改为鹰扬府。这是隋朝府兵组织系统的一个重大变革。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仍为开府的军事主官；改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后又改为鹰击郎将），为开府的副职。其下又改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并增置队副。鹰扬府的组织编成及其职责是：每府置鹰扬郎将 1 人、副鹰扬郎将 1 人，统领全部府兵；下置越骑校尉 2 人“掌骑士”[3]，步兵校尉 2 人“领步兵”[4]。

十二卫所领府兵的军人名称，也由原来的“侍官”改为“卫士”，并且各卫府兵又赐以专用名号，如：左、右翊卫所领府兵名为“骁骑”，左、右骁卫所领府兵名为“豹骑”，左、右武卫所领府兵名为“熊渠”，左、右屯卫所领府兵名为“羽林”，左、右御卫所领府兵名为“射声”，左、右候卫所领府兵名为“佽飞”。以上各卫府兵“总号卫士”[5]。十二卫府兵由皇帝赐以专用名号的作法，这既加重了府兵的禁卫军色彩，又便于封建朝廷对府兵的控制。

十六卫府中的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府等四府，因不领府兵，故不设大将军、将军职，其组织编成及职责情况如下：

左、右备身府，各置备身郎将 1 人为正职、直斋 2 人为副职，

---

①③④⑤ 见《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② 参见《府兵制度考释》第 117 页。

“掌侍卫左右”①。各府除置长史、录事、司兵，仓、骑参军等幕佐人员外，还设千牛、司射各16人，分别“掌执千牛刀宿卫”和“掌供御弓箭”②。又设折冲郎将各3人为主官、以果毅郎将各3人为副职，负责掌管招募来的“骁果”；其下又设左、右雄武府，以雄武郎将、武勇郎将为正副长官，直接统领“骁果”兵。

左、右监门府，各置郎将1人、直阁6人，各府幕佐人员编成情况同左、右备身府。又增设左、右门尉员120人，门候员240人，“并分掌门禁守卫”③之责。

杨广对府兵的领导体制的改组，使中央的卫府由原12个增至16个，统领府兵的卫府由原来的8个增至12个。这标志着杨帝时期府兵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其后，杨广为了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增置军府，扫地为兵”④，致使府兵急剧扩充。杨广统治时期，所置鹰扬府数及其总兵力员额，历史文献虽无明确记载，但从出土文物以及杨广用以征战高丽的兵力来看，军府的分布很广，军队的员额甚多。在东北方面，有幽州的先贤府、易州的龙水府、赵州的象城府等；在西北方面，有瓜州的大黄府、朔州的龙泉府等；在东南方面，有扬州的安德府、润州的金山府等；在西南方面，有襄州的邓城府、夔州的东阳府等。从分布地域之广，可以看出军府数量之多。军府的急剧增置，必然带来兵力员额的激增。开皇八年（588年）冬至翌年春，杨坚发动灭陈战争时，调发兵力51万余人；而大业八年（612年），杨广第一次用兵高丽时，即出动了113万余人，作战兵力较灭陈战争时增加了一倍多。可见，杨广统治时期的隋朝常备兵力，至少保持在六七十万之数⑤。杨广除大肆增置军府、扩充府兵外，还于大业九年（613年）正月，下令“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⑥。“骁果”是属募兵制性质的武装力量，

---

①②③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④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 参见《府兵制度考释》第119页。

⑥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是对府兵兵力不足情况的一种补充。所募之“骁果”皆归左、右备身府下设之折冲郎将、果毅郎将以及雄武郎将、武勇郎将直接管理和统领。同年八月，又“制骁果之家蠲免赋役”①。由于杨广穷兵黩武，广置军府“扫地为兵”和“募民为骁果”，不仅使封建王朝的“租赋之入益减”②，给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而且使府兵制度无法正常实行。到炀帝统治后期，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作为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的府兵制度，随着以炀帝为首的隋王朝统治的崩溃而趋于瓦解了。

三、地方卫戍制度

隋文帝杨坚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在大力加强中央禁卫军的同时，还不断调整和加强地方军。开皇三年（583年），杨坚根据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和民部尚书苏威等人的建议，将地方行政区划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为便于封建中央从军事上对地方的控制，杨坚依据北周旧制，实行州设总管制度。根据州域的大小和重要程度，“州，置总管者，列为上中下三等。总管刺史加使持节”③，且明确由皇帝任命的“加使持节”的州总管，统一负责该州所属地区的军事和戍守事宜。根据《隋书》记载统计，杨坚在位期间，前后设置总管的州累计60个④。由于地方行政区划时有变化，所设总管也随之有所变化，但始终设有总管的州共有30个⑤，其分布情况如下：

从西北到东北计有16州，即：凉州（治姑藏，今甘肃武威）、

---

①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④ 隋文帝统治时期所设总管数，系依据《隋书》之《高祖纪》、人物《列传》和《地理志》记载统计。

⑤ 据《隋书》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一《地理志》统计。

兰州（治金城，今甘肃兰州）、会州（治会宁，今甘肃靖远）、叠州（治合川，今甘肃迭部）、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原州（治平高，今宁夏固原）、夏州（治岩绿，今陕西横山西北）、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州）、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隰州（治隰川，今山西隰县）、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玄州（治无终，今天津蓟县）、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

从西南到东南计有 14 州，即：益州（治成都，今属四川）、利州（治绵谷，今四川广元）、信州（治人复，今四川奉节东）、潭州（治长沙，今属湖南）、荆州（治江陵，今属湖北）、襄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桂州（治始安，今广西桂林）、广州（治南海，今广东广州）、循州（治归善，今广东惠州东）、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扬州（治江阳，今江苏扬州）、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吴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

综观开皇年间常设不废的 30 州总管府的分布情况，可以明显看出，杨坚承袭周制而实行总管制度，重点在于强化从西北到东北、从西南到东南的南、北两线边远地区的军事控制，这既是对内维护统治的需要，又是对外巩固边防的措施。除了州置总管统制一方军事外，军事要地和重要关隘，杨坚还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设立镇、戍、关，镇置镇将和副将，戍置戍主和戍副，关置令、丞，统管所辖地的戍守事宜。

杨广即帝位之后，于大业三年（607 年）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两级制，与此同时，下令“罢诸总管”①，郡置都尉、副都尉，负责统御一郡军事事务；诸军事重镇，“又置诸防主、副官，掌同诸镇”②。

---

①②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

四、作战指挥及军队编组

隋朝军队的指挥大权，虽为皇帝所独揽，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情况下，却有不同的体现方式。开皇时期，文帝杨坚对战时军队指挥权的运用，是通过委派将帅率兵征战而实施的，杨坚本人并不亲临战场直接指挥。例如，开皇三年（583 年）的北攻突厥之战，杨坚任命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督率诸多行军总管分兵八道出塞反击突厥。开皇八年（588 年）冬开始的南下灭陈战争，杨坚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①，调集 90 行军总管、51.8 万人的兵力，在淮南道行台尚书令、行军元帅杨广的统一指挥下，兵分八路南进，一举而灭陈。由此可见，开皇时期的隋军作战指挥体制是，在隋文帝杨坚的统御和部署之下，委派行军元帅直接指挥，由行军总管各自率兵按照统一作战部署，遂行作战任务的。

但到炀帝杨广统治时期，出于对外战争的需要，他一改开皇时期由皇帝委派将帅指挥军队作战的作法，而亲自率领大军出战。例如，大业八年（612 年）进攻高丽的战争，杨广亲自率领左、右各 12 军，凡 113.38 万人，号称 200 万众，亲临战场，直接指挥隋军作战。其作战部队的编组情况是：每军置大将、亚将各 1 人。每军编配骑兵 40 队，分为 4 团，每团 10 队，队为 100 人；步兵 80 队，分为 4 团，每团 20 队；团由各置偏将 1 人统领；每团都以不同颜色的铠甲、缨拂、旗幡相区别。每军还各配属辎重、戎车、后勤兵等 4 团，与步卒团队相挟而行；军还配备受降使者 1 人，其职责是"承诏慰抚，不受大将制；战阵则为监军"②。出征之时，每日遣发 1 军，两军相距 40 里，"连营渐进"③，凡 24 日续发完毕，

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③ 《隋书》卷八《礼仪志三》。

作战部队“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①；加之次发而进的“天子六军”，隋军的行军队形前后长达1040里之遥。杨广此次亲临前线、直接指挥的进攻高丽之战，是有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由此可以略见隋军后期作战编组的一般情况。

第二节　主要国防建设

杨坚取代北周以后，为了巩固隋王朝的封建统治，在积极做好北击突厥和南下灭陈的战争准备的同时，也着力抓了隋朝的国防建设。灭陈战争胜利后，鉴于南北复归统一，杨坚在完成府兵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着重抓了和平时期以“禁卫九重”和“镇守四方”为中心内容的国防建设。杨广即帝位后，在继续加强国防建设的同时，也在加紧进行对外战争准备，从而把国力空前强大的隋王朝由相对和平时期推向战争和危亡的状态。

综观文献记载，可以看出，隋朝的国防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掘堑设防，拱卫两京

隋代注意营建都城并掘堑设防以卫之。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杨坚鉴于京师旧“长安城制度狭小”②，根据纳言苏威的建议，决定在“川原秀丽，卉物滋阜”③的龙首山（位于长安北10里）建造新都，遂诏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总监、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为副监，负责组织施工。同年十二月，新都建成，命名为大兴城；次年三月，文帝杨坚迁入新都。新都大兴城的兴建，不仅

① 《隋书》卷八《礼仪志三》。

② 《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宣帝太建十四年六月。

③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扩大了隋都的规模，而且为以后唐朝都城长安奠定了基础。仁寿四年（604 年）七月，杨广即帝位后，又下令扩建东京洛阳，命以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负责营建工作，施工役丁每月达 200 万人之多，经过一年始告建成。因隋炀帝扩建洛阳为东京，而始称首都长安为西京。自此，东、西两京便成为隋朝对全国实施统治的两大政治中心。隋代东、西两京的兴建，虽然是以供封建统治阶级享受为基本目的，但却充分显示了当时劳动人民在筑城方面的伟大创造力。

为了拱卫东、西京两大政治中心的安全，隋炀帝杨广在扩建洛阳的同时，又下令调发数十万民工，自龙门（今山西河津）东抵长平（今山西晋城东北）、汲郡（今河南滑县西北），直至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北），再渡过黄河到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河南临汝），尔后西向直达上洛（今陕西商县），掘堑设置关防，拱卫东西两京。隋炀帝的这一措施，不仅有利于巩固隋朝两大政治中心的安全，而且在军事上大大加强了内卫力量。

二、修筑长城，巩固边防

为了对付来自漠北突厥的南下袭扰和掠夺，隋文帝杨坚自建国伊始，就把修筑长城、巩固边防，作为重要国防建设来抓。开皇元年（581 年）四月，杨坚下令“发稽胡修筑长城”①；十二月，再次下令沿北部边境“修保障，峻长城”②。开皇三年（583 年），隋军取得北上反击突厥作战胜利以后，突厥虽然归顺称臣，但杨坚鉴于突厥统治者“易为反复”③，故始终没有放松北境的边防建设。开皇五年（585 年）十月，杨坚派遣上开府、司农少卿崔仲方督率 3 万丁壮，于朔方（治岩绿，今陕西横山西北）、灵武（治回

---

①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又见《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

② 《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③ 《隋书》卷四十七《韦世康传附韦冲传》。

乐，今宁夏灵武西南）两郡间修筑长城，“东至黄河，西拒绥州，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① 开皇六年（586 年）二月，杨坚又令崔仲方调发丁壮 15 万人，“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②。开皇七年（587 年）二月，杨坚再次诏“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③。

炀帝杨广即位以后，除了继续防御北方突厥的袭扰之外，还要着力对付来自西北方面吐谷浑的侵袭。为此，杨广曾先后两次修筑长城，动用劳力之多是隋代前所未有的。大业三年（607 年）七月，为加强对北方突厥的防御能力，杨广下令调发丁壮百余万人筑长城，西迄榆林（治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东至紫河（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东西“绵亘千余里”④。大业四年（608 年）七月，又调发二十余万丁壮北筑长城，自榆谷（位于今青海西宁西）而东，“以御吐谷浑”⑤。

总之，自开皇元年至大业四年的 28 年中，隋朝两代统治者先后 7 次调发近 200 万劳力，于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修筑长城、增建城垒，在前代北魏和周、齐修筑长城的基础上，使东迄紫河，中经朔方、灵武之境，西至榆谷以东的长城、筑垒，基本连成一线。这对巩固隋朝北部及西北边防，抵御突厥和吐谷浑的袭扰，无疑是有一定作用的。

三、大兴屯田，积谷备边

在北部和西北边境地区，大力推行屯田制度，也是隋朝加强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从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隋代的屯田大体上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

---

①② 《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

③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④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四《陕西十三·榆谷》。

开皇三年（583年）初，文帝杨坚为了解决北部与西北守边隋军因突厥、吐谷浑不断犯塞扰边所造成的“军旅数起，转输劳敝”① 的实际困难，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守边军资。这就是隋代“军屯”之始。时兖州刺史赵仲卿受命为朔州总管全权负责塞北屯田事宜，由于他认真督责，积极组织实施，使屯田收到明显效益，“由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②。从而稳定了部队，巩固了国防，为其后隋军北击突厥之战，奠定了胜利基础。

开皇四年（584年）四月，杨坚以陇西地区屡为吐谷浑袭掠，而甚为忧患。他鉴于该地有“不设村坞”③ 之俗，乃令上大将军贺娄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④这就是隋代“民屯”之始。但在实行过程中，贺娄子干却根据陇西地区土旷民稀，“不可广为田种”⑤的实际情况，建议采取设置镇戍、加强防守的办法，对付吐谷浑的犯边袭扰，而为杨坚所采纳。至于其它边境地区，是否实行过“民屯”制度，因文献无明确记载，目前不得其详。

开皇五年（585年），文帝杨坚任命瀛州刺史郭衍为朔州总管，率兵镇守北边。郭衍赴任后，鉴于其所辖恒安镇（今山西大同东北）“北接蕃境，常劳转运”⑥，乃按照朝廷旨意，选择沃土，大开屯田，收到很好效益，不仅“岁剩粟万余石，民免转输之劳”⑦，而且又增筑桑干镇（今山西朔县东南），充实和加强了边防。

杨广即位以后，为了防御吐谷浑东进袭扰，着力扩大西北边境地区的屯田以加强防务。大业五年（609年）五月，卫尉卿刘权率兵随从杨广西征吐谷浑，在击败当面吐军乘胜进至伏俟城（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后，杨广复令刘权率众南下过曼头城（今青海共和西南）进至赤水（今青海兴海东南），置河源郡（治赤水）、

---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隋书》卷七十四《赵仲卿传》。

③④⑤ 《隋书》卷五十三《贺娄子干传》。

⑥⑦ 《隋书》卷六十一《郭衍传》。

积石镇（位于赤水南），“大开屯田，留镇西境”①。刘权戍边5载，由于贯彻屯田制度和执行民族政策卓有成效，致使“诸羌怀附，贡赋岁入，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②，巩固了边防，加强了隋朝中央与西域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刘权也因功晋升为司农卿、加位金紫光禄大夫。同年六月，杨广西巡至张掖（今属甘肃），受到高昌、伊吾等西域27国的隆重欢迎，并“献西域数千里之地”③。杨广则在西域设置西海（治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河源、鄯善（治今新疆若羌）、且末（治今新疆且末）等4郡，然后，“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④，以解决西域隋军戍边部队的物资供应。

四、开河筑路，沟通运输

开凿运河，修筑道路，也是隋朝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据文献记载，隋代开凿（或疏通）运河规模较大者有6次，其中：文帝杨坚在位时2次，炀帝杨广即位后4次（其中1次是疏通山阳渎）；修筑道路规模较大者两次，均在杨广统治初期。

开皇四年（584年）六月，文帝杨坚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开漕渠大监郭衍等人督总水工开凿广通渠，又称富民渠⑤，引渭水自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东向经潼关（今陕西潼关北）入黄河，运河全长三百余里⑥。该运河的开凿，不仅在经济上便利了漕运和农田灌溉，“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⑦，而且在军事上成为关中与中原联系的战略纽带。开皇七年（587年）四月，出于

---

①② 《隋书》卷六十三《刘权传》。

③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④⑦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 《隋书》卷六十一《郭衍传》。

⑥ 《隋书·郭衍传》作“四百余里”。本书这里取《隋书·食货志》和《资治通鉴》说。

南下灭陈战争的需要，杨坚调发大批民工“开山阳渎，以通运漕”①，该运河全长三百余里②，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流经射阳湖（今江苏淮安东南70里），南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入长江。山阳渎运河的开通，不仅便利了江、淮地区的运输，而且成为隋朝实施灭陈战争的战略运输线。③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炀帝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议调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工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该运河全长千余里④，自西苑（今河南洛阳城西）引谷、洛二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向东南，流经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浚仪（今河南开封）、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夏丘（今安徽泗县）、洪泽湖（今属江苏），入淮河。这条运河凿通以后，便将中原与淮河流域广大地区联系起来。同年，杨广又调发淮南民工十余万人拓宽邗沟（即山阳渎），使“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⑤。大业四年（608年）正月，杨广诏发河北诸郡百余万民工开凿永济渠，引沁水（今沁河，发源于山西太岳山）南入黄河，向北流经汲郡（治卫县，今河南滑县西北）、长河（今山东德州东）、长芦（今河北沧州西），至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永济渠全长二千余里，该运河的开凿，不仅有利于河南、河北两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且便利了南北军事运输，其后杨广对高丽的用兵，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输送兵力和作战物资的。大业六年（610年），杨广将要东巡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又发民工开凿江南河，北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向南流经毗陵（治晋陵，今江苏常州）、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至余杭（治钱

---

①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②④ （隋）杜宝：《大业杂记》（见于《说郛》卷五十七）。

③ 山阳渎，又称“邗沟”，始建于春秋吴国，“沟通江、淮。山阳渎通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尚矣，隋特开而深广之，将以伐陈也。”（引文见《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元年四月，胡三省注）。

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元年三月。

唐，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该运河总长八百余里，河宽十余丈，可通龙舟等大型船只。

综观隋代所开运河情况，工程浩大，影响深远。从京师长安（大兴）东向经广通渠入黄河，至板渚后分为二道：一道向东北入永济渠而北达涿郡；一道向东南入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而南抵余杭，从而以运河网络将隋朝政治中心关中地区与黄河南北、江淮南北广大地区联系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高度智慧。隋朝统治者特别是隋炀帝开凿运河，虽然带有巡游享乐的动机和性质，但也有为了解决当时实际需要的一面。这些运河的开凿，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而且在政治上有利于国家统一，在军事上沟通了南北战略交通。

隋朝在广开运河，搞好水路运输建设的同时，也注意开辟陆路交通。大业三年（607 年）五月，杨广为便利乘车北巡，乃调发河北十余郡丁壮开凿太行山，筑路达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以通驰道”①。不久，杨广的车驾进至榆林郡（治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打算“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②，遂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奉旨北入东突厥，令启民可汗调动其所属各部，“举国就役，开为御道”③，自榆林向北至东突厥牙庭所在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北），尔后东向抵达涿郡郡治蓟县。这条塞外“御道”长 3000 里、宽 100 步，是当时最长的公路。它的筑成，虽然基于杨广“出塞耀兵”的目的，但对加强北部边境防务，确保戍边部队军需供应的输送，是起一定作用的。

五、建置仓储，备战备荒

建置仓储，“为水旱之备”④，这是隋朝自建国以来，加强国防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五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六月。

④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隋代所建的仓储，分为官仓和义仓两种。

官仓的设置，是直接为了解决国家的粮食储备和便利转运。开皇三年（583年），文帝杨坚"以京师仓廪尚虚"①，乃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于是决定沿黄河流域的卫州（治汲县，今属河南）建黎阳仓、洛州（治洛阳，今属河南）建河阳仓、陕州（治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建常平仓、华州（治郑县，今陕西华县）建广通仓。与此同时，又下令于蒲、陕、虢、熊、伊、洛、郑、邵、卫、汴、许、汝等沿黄河流域13州"置募运米丁"②，负责向上述四大官置粮仓运储粮食和"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③。杨广即帝位之后，于大业二年（606年）十月，在巩县（今河南巩义东北）东南的洛水入黄河处建洛口仓（又称兴洛仓），该仓城周围20余里，内凿3000窖，每窖可装8000石粮食，共装粮食2400万石。为确保仓城的安全，特置监官领兵1000人守卫。同年十二月，杨广又下令于洛阳城北7里处建回洛仓④，仓城周围10里，内凿300窖，可存粮食240万石。大业初年隋炀帝所建的两大粮仓，共可存储粮食2640万石，其规模之大是空前无比的，由此可以窥知隋代农业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

义仓，又称社仓，始建于开皇五年（585年）五月⑤。是时，杨坚为解决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⑥的问题，采纳民部尚书长孙平的建议，下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⑦。即在收获季节，各家依其贫富不等和谷物收获情况，自愿缴纳一定数量（即一石以下不等）的粮谷，"于当社造仓窖贮之"⑧，

---

①②③⑦⑧《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 回洛仓的地址，《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载称："《隋纪》云，回洛仓置于洛阳北七里，似误。"该书作者认为，仓址当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本书取《资治通鉴》说。

⑤ 隋朝设置义仓的时间，《隋书》卷四十六《长孙平传》作"开皇三年"；本书这里取《隋书·食货志》、《通典·食货十二》和《资治通鉴·陈纪十》说。

⑥《隋书》卷四十六《长孙平传》。

而由本地所委社司负责管理，一旦发生灾情，便可开仓赈给灾民。自此以后，各州普建义仓。开皇十五年（595年）二月，杨坚下令将义仓收归州县地方政府管理；次年二月，又规定凡置义仓地区的农民，须按户等分别向封建政府纳税，即：上户纳税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这样，本为农民抗灾自救的义仓，又成为增加封建剥削、加重农民负担的一种手段。

然而，从总体上看，隋朝官仓和义仓的建置，有利于备战备荒和发展生产。例如，开皇四年（584年），对于发生水旱灾荒的州县，杨坚下令官仓“开仓赈给”① 灾民。开皇五年各地普建义仓以后，恰逢关中诸州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频频大水，严重的饥馑和病疫威胁着各地百姓。对此，杨坚一方面命司农丞王亶调发广通仓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②，命苏威等人赴关东“分道开仓赈给”③饥民；另一方面，则下令凡“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④。从而使上述灾区百姓获得及时救济。可见，隋代官仓和义仓的建置，不仅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而且，有利于稳定民心，加强国防建设。

第三节　兵器与装备

隋代设有专司兵器与装备的管理机构。从隋朝的出土实物和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其兵器虽以仿制前代为多，但以战争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舰船和御用军帐等装备的制造，却是空前而别具特点的。

---

①②③④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一、兵器与装备的监造、管理机构

隋代的军事后勤制度，是封建中央集权统一下的后勤管理体制。尚书省既是隋朝中央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也是隋朝后勤体制的最高管理机构。根据文献记载，隋朝兵器与装备的生产和管理，统归尚书省内六部的兵部和卫尉寺、太府寺（炀帝时为少府监）、都水台（炀帝时改为都水监）等中央直属机构署理。具体说来，隋文帝时袭北齐制，由太府寺所辖之尚方署（即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负责兵器制造①；隋炀帝时改太府寺为少府监，始由该监所辖之铠甲、弓弩二署执掌兵器制造，后废二署，兵器制造之权归尚方署。兵部的库部和卫尉寺的武库署，负责武器装备的收藏、管理和供应；都水台隶掌船局则负责造船和航运。

隋代兵器的制造和管理之权，虽然集中于封建中央，但在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战争之前，朝廷对兵器的生产和管理，并非十分严格，民间私造兵器的现象较为普遍。灭陈战争胜利结束后，杨坚为了把兵器生产和管理之权完全收归于中央，遂下令禁止私造兵器，且规定："人间甲仗，悉皆除毁"②。但此规定收效甚微。因而，杨坚又于开皇十五年（595年）二月，再次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③开皇十八年（598年）正月，杨坚下令不仅把制造战船之权完全控制于中央，而且还将"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④。杨广即帝位后，为了对内巩固政权和对外进行战争的需要，一方面，下令"民间铁叉、搭钩、穳刃之类，皆禁绝之"⑤；一方面，根据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的推荐，选任云定兴为将督总少府工匠"大造兵

① 见《通典》卷二十七《职官八·太府卿》。

②③④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器”①。大业五年（609年），杨广“大阅军实”②，对于由云定兴负责组织制造的兵器甲仗倍加赞赏，并因此擢升云定兴为少府丞，不久又转任卫尉少卿、左御卫将军等职，“仍知少府事”③，继续负责兵器的监造工作。

隋代兵器的种类、形制及其性能，因缺乏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目前尚不清楚，有待今后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不过，隋朝之前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铜、铁质兵器并用的冷兵器时代。从目前出土实物和历史文献记载情况来看，这时期的兵器，就其性能来看，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远射兵器、长杆兵器、短柄兵器和防护装具等四类：远射兵器有弓弩等，长杆兵器有枪、戟、矛等，短柄兵器有刀、剑等，防护装具有铠甲、盾牌等。隋继南北朝之后仅存在三十余年，因之在兵器制造上不会有多大发展变化，从总体上看，仿制前代者多，而创制新兵器者少。④

二、战船工业发展情况

隋代舰船工业是在隋初进行统一战争的物质准备的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其规模之大，是前所罕见的。这正是隋朝军事装备发展的突出特点。

隋文帝杨坚建国以后，为了实现其灭陈以统一南北的战略目标，从开皇元年开始，即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准备。杨坚鉴于南方水多利于水战的地理特点，把大力发展舰船和训练水军作为灭陈战争准备的重点工作。为此，他采纳了柱国王长述等人关于修造战舰、训练水军的建议，先后派遣仪同三司元寿、柱国李衍、上柱国杨素等人，分别于长江上、下游和淮水流域，监造战船、训练水军。

---

①②③《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传附云定兴传》。

④ 参见周纬《中国兵器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7月版。

杨素奉命于永安（今四川奉节东）“造大舰”①，是在开皇七年（587年）。当时，他组织众多工匠制造了大批战船，其中一种名为“五牙”的最大型号舰船，可以装载800士卒，舰体上起楼5层，高达100余尺；前后左右设置了高50尺的6根“拍竿”，用于“发之以拍敌船”②。另一种名为“黄龙”的大舰，可以置兵100人。此外，还制造了“平乘”、“舴艋”等大批不同型号的舰船。杨素等人奉命于各地监造的大批舰船，为其后的灭陈战争提供了雄厚的装备保障。

在隋灭陈战争发动之前，隋朝究竟制造了多少用于作战和运输的舰船，历史文献虽无明确记载，但从杨素所率水军的宏大场面可以窥见一斑。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攻陈战役首先从长江上游发起后，“素率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其中“亲率黄龙数千艘”③。可见隋军水师之盛、舰船之多。次年正月，当杨素所率水师顺流东下进至巫峡时，他以习水性、善驾舟的巴中士卒1000人，分乘4艘“五牙”舰船，向拒守于巫峡的陈军猛冲，“以拍竿碎其十余舰，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余人”④，陈军守将吕仲肃仓皇东逃，“仅以身免”⑤。由此可见，隋军的舰船性能良好，具有较强的攻击力。

杨广即位后，为适应其出巡和作战的需要，从其上台伊始，即于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派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於士澄等人前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⑥，为杨广巡游江南作准备。据文献记载，同年八月，杨广巡游江都（今江苏扬州）时所乘之“龙舟”，舟长200丈，其上起楼4层，高45尺（一说5丈）；最上层内设正殿、内殿及东、西朝堂；中间两

---

①③⑤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元年十二月，胡三省注。

④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⑥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层有房120间，皆以金玉装饰；下层为内侍处室。皇后所乘之船名为“翔螭舟”，其船体虽比龙舟为小，“而装饰无异”①。别有“浮景”9艘，上起3层，皆为水殿。有王公贵戚、百官僧道乘坐和装载供奉之物的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艙、黄篾等数千艘。以上共用挽船夫役八万余人，其中挽“漾彩”以上大船者计有九千余人。还有供十二卫府兵士乘坐和装载兵器甲仗的平乘、青龙、艨艟、艚艓、八棹、艇舸等战船数千艘，由士兵自挽。杨广的巡游船队自洛口（即洛水入黄河之口）入黄河，再取道通济渠入淮河，经山阳渎而抵江都，其“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②。此等规模庞大空前的巡游船队，一方面真实地说明了以炀帝杨广为首的隋朝统治集团的极度奢华，一方面也充分地显示了隋代后期造船工业的无比发达。而如此发达的造船工业，则必然为部队作战和军事运输，提供更多高质量的舰船。其后，杨广对高丽用兵，从江、淮地区调遣的大批兵员和物资，就是靠庞大舰船运载而通过永济渠集结于涿郡的。大业八年（612年）正月，杨广发动的第一次进攻高丽之战，隋军海上进攻，“舟舻千里”③，而其中仅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所率的江、淮水军，即“舳舻数百里”④。隋朝水军舰队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三、御用军帐装备的制造

隋炀帝杨广统治时期，为了出巡和作战的需要，在御用军帐装备的制造方面，日趋大型化和野战化。这是隋代后期军事装备发展的另一突出特点。

大业三年（607年）七月，杨广亲率大队兵马北巡进至榆林郡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元年八月。

③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五月。

(治今内蒙古托克托）时，为了向突厥统治者夸示隋朝的军威和富有，乃命工部尚书宇文恺督总大批工匠制作大型御用军帐；帐成，杨广命将大帐置于郡城之东，“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①。突厥启民可汗及其部落首领见之惊悦不已，“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②。同年八月，当杨广车驾发榆林北进到金河（位于榆林北）时，又令宇文恺等人制造一种适用于野外条件的大型御用“观风行殿”，其上可容卫士数百人；又作“行城”于外，“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③。该“观风行殿”的构造特点及其性能是：“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④。这种组合结构、移动灵活的御用“观风行殿”，实际是一种适于野战条件下的御用活动观察指挥所。因此，它在野外一建起来，突厥人见之，莫不“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⑤。可见，“观风行殿”在军事上确实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隋代另一独具特点的军用装备设施，则是著名的威震域外的“六合板城”。大业四年（608年）三月，杨广因出塞北巡长城，乃令太府卿兼领少府监何稠建造野外行宫置设“六合板城”以护卫之。据《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记载，“六合板城”的构造形制是：“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为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离合为之，涂以青色。垒六板为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墙板，高六尺。开南北门。又于城四角起楼敌二，门观、门楼槛皆丹青绮画。”

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载称：“六合板城，载以枪车。每顿舍，则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菱；次施弩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

①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七月。

③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八月。

④ 《隋书》卷六十八《宇文恺传》。

向所触而发。其外又以矰（一种绳系而便于弋射的短箭）周围，施铃柱、槌磬以知所警。”由此可见“六合板城”是装载于枪车之上，设有自动报警、触机发弩装置，适用于野战条件下的一种性能良好的防御性的装备设施，它对护卫出巡塞北的杨广及其指挥所的安全，无疑是起一定作用的。

大业八年（612年），杨广曾将“六合板城”这种大型装备设施，应用于对高丽的作战实践中。当时，杨广亲率大军进至辽东郡（治今辽宁沈阳西北）城西，与高丽守军相对而驻，乃命何稠督率工匠“夜中设六合（板）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又四隅有阙，面别一观，观下开三门。其中施行殿，殿上容侍臣及三卫仗，合六百人。”① 该“六合板城”一夜而就，可见，架设是何等迅速和娴熟；而“高丽旦忽见，谓之为神焉”②。显而易见，“六合板城”的架设，对高丽守军起了一定震慑作用。

---

①②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又见《隋书》卷六十八《何稠传》。

第四章　隋朝开拓边疆与进伐高丽的战争

隋朝灭陈战争结束后，文帝杨坚鉴于统一大业已经完成，遂实行战略性转变，着力于国家的和平建设，并把隋朝建成为国力强大的封建帝国。但炀帝杨广即位以后，一反文帝时期的和平战略，凭借强大的隋朝国力，推行战争政策。综观杨广执政后的全部军事与战争活动，可以看出，在其统治前期对周边民族与部落政权的用兵，取得了拓边和固防的明显胜利；但在其统治后期对高丽接连三次的大规模征伐，不但没有取得预期胜利，相反却因极度劳民伤财而把隋王朝推上了危亡的边缘。

第一节　隋朝国内形势及其对外政策

灭陈战争结束不久，文帝杨坚发布诏令，宣告国家由以往战争状态转入现今和平时期。在其此后统治的十数年中，杨坚为实践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对内发展建设、对外发展睦邻关系的政策。

一、统一战争后的隋朝政治、经济

灭陈战争后，杨坚为了贯彻和平建国的方针，在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参见本书第三章）的同时，着重加强国内政治、经济建设。

（一）政治建设

杨坚称帝后，在其诫勉太子杨勇时，曾这样说过：“我闻天道

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①杨坚这些诫子从政勿奢的话，虽然是以维护和巩固隋王朝封建统治为根本目的，但也较为真实地反映其在位 24 年，基本上是以推行廉洁政治作为治国的重要目标。平陈战后，杨坚在政治建设上，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崇尚俭约，关心民苦。推行廉洁政治，杨坚首先是从自身作起的。《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称：“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行俭约，以事府帑。”这大体上概括了杨坚从政尚廉的基本特点。在杨坚带头倡导之下，崇尚俭约之举已成为全国的良好风尚。当时“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②关心民间疾苦，这是杨坚推行廉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他常常暗中派员深入各地“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③。开皇十四年（594 年），关中地区由于特大旱灾而发生严重饥荒，杨坚立即派遣贴身官员前往灾区视察百姓所食情况。当得报民众用以充饥的食物是“豆屑杂糠”时，杨坚“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④，并且为此而戒食酒肉将近 1 年时间。为了解决关中灾民的生活问题，杨坚亲率饥民东迁而就食于洛阳地区。在东进途中，杨坚命令警卫部队要保护饥民，不得随意驱逼。每逢扶老携幼者，杨坚“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⑤；凡至艰险难行之处，见到背负肩挑者，杨坚“遽令左右扶助之”⑥。杨坚崇尚俭约、关心民苦的作法，深得百姓拥护。这也正是开皇年间，隋朝国内政局稳定、民众乐业的重要原因。

2、考察政绩，褒奖良吏。杨坚为了便于对文武百官的了解和使用，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考绩制度。凡是经过实践考察而政绩卓著者，都能及时予以褒奖和提拔。例如，平原（今属山东）令刘

---

① 《隋书》卷四十五《杨勇传》。

②③④⑤⑥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旷在任7年，由于他对民众能够“晓以义理”和“赈施穷乏”①，不仅使当地“风教大洽”②，社会安定，而且深受广大群众拥戴。开皇十一年（591年）二月，刘旷在被调任临颍（今属河南）令不久，杨坚根据尚书左仆射高颎的推荐，以旷“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③，而亲自召见，予以殊奖，并下优诏擢升其为莒州（治今山东临沂）刺史。又如，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刺史令狐熙在任内，因整顿社会治安卓有成效，为时人“称为良政”④，杨坚获悉后，不但对他大加褒扬，而且还令相州（治所邺城，今河南安阳）刺史豆卢通“习熙之法”⑤，借以整顿治理“天下难理处”⑥的邺城社会秩序。开皇十五年（595年），令狐熙奉命进京述职，杨坚以其“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⑦，大力宣扬和推广令狐熙从政的先进事迹和经验。

3、秉公断案，严惩不法。隋朝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承袭北周旧制，京内外官府皆置公廨钱，且允许放债收息。这样做的结果，既“烦扰百姓”又“败损风俗”⑧。有鉴于此，杨坚采纳工部尚书苏孝慈的建议，于开皇十四年（594年）六月，下令取消公廨钱，而“给地以营农”⑨，并且明确规定，今后各级官府“毋得治生（即不得放债生息），与民争利”⑩。是年闰十月，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地区发生粮荒，米价暴涨，该州刺史卢贲下令禁止他人卖米，而自己却高价出售谷米，乘机牟取暴利。案发后，杨坚秉公严惩，将卢贲“除名为民”⑪。秦王杨俊是杨坚的三子，在灭陈战争中，曾担任山南道行军元帅，负责指挥长江上游的隋军。因作战有功，受到杨坚的“下书奖励”⑫。但自开皇十年（590年）杨

---

①②③《隋书》卷七十三《刘旷传》。

④⑤⑥⑦《隋书》卷五十六《令狐熙传》。

⑧⑨⑩《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四年六月。

⑪《隋书》卷三十八《卢贲传》。

⑫《隋书》卷四十五《杨俊传》。

俊出任并州总管统御“二十四州诸军事”① 以后，逐渐腐化奢侈起来，且公然“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②。杨坚发现后，十分恼火，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处理，查办了与此案相牵连的不法分子达百余人。杨俊本该从此接受教训，改过向善，但他不仅不思悔过，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盛治宫室，穷极侈丽”③。开皇十七年（597 年）七月，杨坚以俊奢纵不改，给予他免官就第（即禁闭于王府）的处罚。左武卫将军刘升、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皆认为对杨俊的处罚过重，为此，他们先后为杨俊说情，企图“劝谏”杨坚收回成命。但杨坚却正颜厉色地对他们说：“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④终不为说情者的“劝谏”所动摇。杨坚作为封建帝王，却以“法不可违”⑤为信条，对于至亲违法者，能够做到以法惩治，不徇私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健全法制，纠乖正谬。开皇十二年（592 年）八月，杨坚鉴于各地官府在执法过程中，普遍存在“用律者多致踳驳（乖谬），罪同论异”⑥ 的问题，下诏规定：今后诸州判处死罪者，不得随便处决，必须“悉移大理案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⑦。开皇十六年（596 年）八月，又下令进一步规定：“决死罪者，三奏而后行刑”⑧。这些规定，无疑是对《开皇律》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杨坚企图以此规定来消除各地在执法断案中存在的“罪同论异”问题，这虽在封建制度下难以完全做到，但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杨坚，能够正视问题的存在，并且适时作出明确规定，这对进一步健全法制，减少执法过程中量刑不当和由此而产生的冤案，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二）经济建设

---

①②③④⑤ 《隋书》卷四十五《杨俊传》。

⑥⑦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⑧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此条规定作出的时间，《隋书·刑法志》为开皇十五年（595 年）。

发展社会经济，这既是隋朝在灭陈战争之后，实施战略转变的重点工作，又是政治、国防建设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发展经济方面，杨坚着重抓了以下几项措施：

1、轻徭薄赋，实行富民政策。平陈战争结束后，杨坚为了稳定江南和进一步发展全国农业生产，于开皇九年（589年）四月，下令宣布南陈旧境免除赋役10年，全国其它诸州“并免当年租赋”①，“军人毕世免徭役”②。开皇十年（590年）五月，杨坚“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③，特规定全国百姓年满50岁以上者，一律“免役收庸”④。开皇十二年（592年）十二月，杨坚根据主管物资储备工作的太府寺的报告，鉴于京师“库藏皆满”⑤，遂下诏提出了“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⑥的富民政策，并且决定将河北、河东诸州的“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⑦。开皇十七年（597年），杨坚根据“中外仓库，无不盈积”⑧的实际情况，再一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⑨。在实现南北统一之后，杨坚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多次下令减免赋役，特别是基于“薄赋于民”⑩的考虑而提出的“宁积于人，无藏府库”的富民政策，对于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较大作用的。

2、遣使四出，继续推行均田制。隋朝建立以后沿袭北齐旧制，仍然实行均田制的土地制度。灭陈之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封建地主对土地的掠夺，一些地区特别是关中及三河（即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出现“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⑪的问题。妥善解决农民缺地的问题，无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当时，朝臣多数主张采取迁徙户口以“就宽乡”⑫的办法解决。开皇十二年（592年）冬，杨坚为了解决“地少而人众”地区的耕地问题，虽

---

①③⑤⑥⑦⑧⑨⑪⑫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

④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⑩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二年十二月。

命诸州考使进行研究，又责成尚书省“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①，然而，竟提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在此情况下，杨坚“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②。杨坚的这一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狭乡农民缺少耕地的问题，但由于派员深入各地（当然也应包括江南陈朝故境）推行均田制度，是对肆意占地的封建地主的一种限制，因而或多或少能使无地农民得到获取土地的机会。这一措施的贯彻执行，终于可使狭乡的农民分到20亩的土地。这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缓解“衣食不给”的社会问题，无疑是有一定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3、治水防涝，发展农业生产。开皇时期，杨坚前后两次动用大批民工开凿的广通渠和山阳渎两条大型运河，不仅具有较高的军事战略价值，而且对于促进农业生产、便利水上运输有重要作用。平陈战争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杨坚一直比较重视兴修水利的工作。开皇十八年（598年），杨坚鉴于杞、宋、陈、亳、曹、戴、谯、颍等诸州连年降雨，致河水泛滥成灾，遂派遣官员率领水工，分赴各地“巡行川源，相视高下，发随近丁以疏导之”③。而对涝灾地区，实行“租调皆免”④的政策。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涝灾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4、开仓赈给，救济灾区民众。自开皇三年（583年）始，隋朝在各地普建的积谷粮仓（包括官仓和义仓），不仅有利于搞好战略物资的储备，而且有利于灾年民众生产生活的自救。平陈战后，杨坚为了落实轻徭薄赋的政策，他依据历年的灾情实际，着重加强全国的救灾济民的工作。例如，开皇十四年（594年）八月，关中地区大旱，为解决“民饥”的问题，杨坚亲率饥民东进而“就食于洛阳”⑤。开皇十八年（598年），中原诸州普遭水灾，为解决

---

①②③④《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灾民的生活困难，杨坚下令“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万余石”①。仁寿二至三年（602～603年），河南诸州连续两年水灾，杨坚都适时派遣工部尚书杨达前往“赈恤之”②。杨坚针对灾情实际，采取及时救济的作法，对解决部分地区灾民生活的困难，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是有积极作用的。

隋朝在结束统一战争以后，文帝杨坚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适时实施战略转变，把工作重点转到国内建设上来。为此，他采取一系列加强国内建设的重大措施，从而把隋朝建设成为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比较繁荣、国防上比较巩固的封建王朝。开皇之初，全国有户不满四百万、人口有九百余万。平陈之后，由于杨坚大力推行“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③的政策，使社会呈现“衣食滋殖，仓库盈溢”④的繁荣兴盛景象。随着国内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人口有较大增长，到大业初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余万、人口四千六百余万，人口较开皇之初增长了四倍多。人口的迅猛增长，充分反映了开皇时期隋朝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唐代史学家魏徵等人在评价隋文帝杨坚时，曾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踪盛烈”⑤。如此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之辞，但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开皇时期隋朝政治、经济发展的盛况和由此所奠定的雄厚国力。其后，隋炀帝杨广进行的开拓边疆和对外战争，恰是在此基础上发动的。

---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前后用谷五百万余石”句，原文无“万”字，清乾隆进士陆锡熊《炳烛偶钞》考证指出：“案文当作‘五百万余石’，疑脱‘万’字。”今据此增补。

②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③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文帝仁寿四年七月。

⑤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史臣评语。

二、隋朝对周边民族和邻国的政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汉族占绝大多数的立于世界之林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多种原因，在中华民族内部曾出现过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和地区政权。历代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扩大对外影响，在对待和处理民族间、国家间、地区间的关系问题上，有过和睦友好的交往，也有过兵刃相见的战争。隋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一个短暂王朝，同样也不例外。隋朝时期，居于隋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主要邻国是：在东北方向，有同属东胡族的奚、契丹、室韦和靺鞨，有居于今朝鲜半岛北部、并跨占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及其以北部分地区的高丽以及居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在北部与西北方向，有东、西突厥，吐谷浑以及高昌、伊吾、焉耆等西域诸部族；在南部与东南方向，有林邑、流求等。隋朝对上述周边民族和邻国所采取的政策，从总体上说，是经历了开皇时期和大业时期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帝杨坚在其执政的 24 年中，除在开皇三年（583 年）北攻突厥和开皇十八年（598 年）东征高丽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外，其余大多数时间，对周边民族和邻国，都是实施睦邻友好政策的。而周边的民族和邻国多数也都承袭历史上旧有关系，或接受隋朝的封号称臣，或岁岁遣使朝贡，与隋朝保持着和睦相安和友好往来的新关系，“诸国朝正奉贡，无阙于岁时”①。但是，到了炀帝杨广执政以后，他一改文帝杨坚时期所奉行的睦邻友好政策，而代之以兵刃相见的武力政策。仁寿四年（604 年）七月，杨广即帝位后，在其执政近 14 年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炫耀武力、大张挞伐的军事活动中度过的。杨广所进行的战争和军事活动，在不同的时期，其性质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在其统治前期对契丹、突厥、吐

①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史臣评语。

谷浑、流求等的战争和军事活动，是属于对国内周边民族用兵以开拓边疆和巩固边防的军事行动；但在其统治后期对高丽的3次大规模军事进攻，虽然不无其拓边固防的一面，但其不顾国情民意的好战政策，恰是导致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节　开拓边疆的战争与军事活动

隋朝开拓边疆的战争与军事活动，主要是在隋炀帝杨广统治前期，即从大业元年至六年（605～610年），他先后对林邑、契丹、吐谷浑、流求等地用兵。在此期间，他还亲率大军北巡突厥和开展经略西域的活动。

一、进攻林邑和反击契丹

（一）进攻林邑之战

林邑，原本西汉武帝元鼎年间（前116～前111年）所置日南郡（郡治西卷，位于今越南广治西北）之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将军马援奉命率军再开南境，而置此地为象林县。自汉武帝以来，至南朝宋、齐、梁等，林邑不仅遣使朝贡，而且接受王位封号。① 可见，林邑当时是“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② 的南地之一。隋朝灭亡南陈以后，林邑“乃遣使献方物”③。仁寿二年（602年），因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土著头目李佛子作乱，阻断林邑与隋朝中央的往来，“其后朝贡遂绝”④。

仁寿四年（604年）初，时天下无战事已久，群臣以“林邑多奇宝”⑤为辞，极力怂恿杨坚进军林邑。于是，杨坚遂以参加平叛

---

① 《南史》卷七十八《海南诸国·林邑》。

② 《隋书》卷八十二《南蛮传》。

③④⑤ 《隋书》卷八十二《林邑传》。

（平定李佛子作乱）的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为驩州（治今越南荣市）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率兵“经略林邑”①。刘方一面派遣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率步骑兵出越裳（今越南河静西北），一面亲率大将军张愻、司马李纲舟师越海直趋比景（今越南洞海西北）。同年七月，太子杨广谋杀杨坚而立，但隋军南进林邑的军事行动并未因为朝廷易主而中止。大业元年（605 年）正月，刘方挥军进抵林邑的出海之口，林邑王梵志遣兵据险抗击，为隋军所击溃。隋军乘胜进抵阇黎江（今名不详）北岸，林邑军又据南岸立栅抵抗，刘方采取“盛陈旗帜，击金鼓”②的虚张声势之战法，吓退了林邑军。隋军乘胜渡江后，南进至 30 里处，又遇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③，隋军与战不利，刘方遂即改变战术，采用“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④ 的诱敌入陷战法。梵志悉众而阵，刘方挥军与战佯败；梵志以为得计，驱众追击，至坑所，“其众多陷，转相惊骇，军遂乱”⑤。刘方乘其象阵混乱之机，纵兵回击，大败林邑军，俘斩万余人。之后，刘方以破竹之势，挥军南进，过区粟，度六里，“前后逢贼，每战必擒”⑥。当隋军进抵大缘江时，梵志“据险为栅”⑦，企图顽抗，刘方挥军又击破之。隋军迅速南下，过了铜柱山后，仅以 8 天时间，即迫近林邑都城。林邑王梵志见隋军来势迅猛，“遂弃城而走”⑧，逃往海上，隋军不战而入城，缴获其庙主 18 尊铸金人像，始知林邑“有国十八叶矣”⑨。进攻林邑之战，以隋军胜利而告结束。战后，隋炀帝杨广于林邑境内置冲州，不久复改为林邑郡。同年四月，隋军“刻石纪功而还”⑩，主将刘方因身染疾病而亡于归途中。隋军撤离林邑之后，梵志复其故地，仍为林邑郡主，为了表达他对隋朝中央的归顺，乃遣使入朝谢罪，自此“朝贡不绝”⑪，始终与隋朝中央保持和睦相处的臣属关系。

（二）反击契丹之战

---

①②③⑥⑦⑩ 《隋书》卷五十三《刘方传》。

④⑤⑧⑨⑪ 《隋书》卷八十二《林邑传》。

契丹，其族源于鲜卑，属鲜卑宇文别部的一支。① 最初分布于今东北辽河以北地区。东晋时期，为鲜卑慕容部所破，逃散于松、漠之间。后逐渐发展，移至黄龙以北地区。北魏时，契丹为避高丽侵扰而内附，并逐渐移居辽河流域地区。杨坚取代北周而建立隋朝后，契丹主莫贺弗于开皇四年（584年）遣使归降，文帝杨坚拜其为大将军。从此，契丹对隋朝保持着称臣朝贡的关系。开皇末，契丹内分十部，各部都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遇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②。此时的契丹尚处于“逐寒暑，随水草畜牧”③的落后状态。

隋朝建立之初，杨坚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控制，在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设立总管府，委将镇守。开皇十五年（595年）四月，杨坚派遣开府仪同三司韦冲为营州总管。韦冲到任后，由于能够正确执行民族政策，深获当地民众的拥护，契丹、靺鞨等族“皆能致其死力”④。但自杨广即帝以后，隋与契丹关系发生磨擦。大业元年（605年）八月，契丹出兵西向，扰掠营州。隋炀帝杨广出于自卫和开拓的双重需要，立即命令通事谒者⑤ 韦云起率领突厥所派2万骑兵，“往讨契丹部落”⑥。韦云起受命后，将所率兵力分为20营，四路并进，直趋契丹境界。为了达成出奇制胜的作战效果，云起一面严令部队“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⑦，凡有违约者，一律处斩不赦；一面利用契丹“本事突厥，情无猜忌”⑧之点，派遣突厥人诈称赴柳城与高丽进行贸易，遂使契丹信之不疑而放松戒备。云起率军乘夜南进，抵达距契丹军营50里处“结阵而宿”⑨，契丹军竟毫无察觉。比及

---

① 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②③ 《隋书》卷八十四《契丹传》。

④ 《隋书》卷四十七《韦世康传附韦冲传》。

⑤ 通事谒者，隋代官职名。炀帝即位后，增置谒者台，改内史省通事舍人为谒者台职，通事谒者员额为20人，从六品。

⑥⑦⑧⑨ 《旧唐书》卷七十五《韦云起传》。

拂晓时分，云起挥军突袭，大败契丹军，尽俘获其男女4万，并缴获大批畜产。韦云起除将所获男子杀掉，女子及畜产的一半赐给突厥外，余皆携带还朝。战后，隋炀帝杨广以韦云起“行师奇谲，才兼文武”①，而亲自举荐并提升其为治书御史。

大业初年，隋朝对林邑和契丹的两次用兵，其直接起因虽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隋朝封建统治者开拓边疆、巩固国防的性质。战争的进行，虽在一定时间给各自的人民带来动荡不安和流血牺牲，但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它对开发边疆，加强边远地区民族与中原人民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联系和交流，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隋军两次作战，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军事上的胜利，却是十分迅速的。这除了因为隋军有强大的国力、军力作为战争的坚实后盾外，担任统军作战的隋军主将，能够严令约束部队，从敌情实际出发，实施正确的主观指导，乃是隋军迅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二、北巡突厥与经略西域

（一）北巡突厥

开皇三年（583年），隋朝取得北击突厥的军事胜利后，以摄图为首的东突厥和以大逻便为首的西突厥，相继遣使请降，愿意“永为藩附”②。在此后十余年间，隋与突厥虽然也曾发生过军事磨擦，但从总体上看，彼此和睦相处，则是双方关系的主流。此种相对和平局面的形成，是与隋文帝杨坚对突厥实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政策分不开的。此种和平友好的民族关系，不仅有利于隋朝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突厥的社会进步。隋炀帝杨广即帝位后，正是在文帝杨坚开创的和平友好局面的基础上，发展与突

① 《旧唐书》卷七十五《韦云起传》。

② 《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厥的关系的。

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即帝执政之时，恰值启民可汗染干（处罗侯之子）统治东突厥。杨广为“欲出塞耀兵”①，进而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强对突厥的控制，乃于大业三年（607年）四月，率领文武百官和大批军队，自京师长安东进，在巡省了河北的赵、魏两郡之后，决定北上巡视突厥。为确保北巡的顺利进行，杨广下令调发河北十余郡民工开凿太行山达于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以沟通北巡突厥的驰道。

六月初四，杨广亲率大队人马经新凿驰道穿越太行山向西北抵达连谷（今陕西神木西北），然后北上，于十一日进至榆林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杨广打算在此休整数日后，径趋突厥牙庭（庭址在今蒙古哈尔和林西北），尔后东向直抵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此行为防止惊扰启民可汗，杨广先派武卫将军长孙晟持诏前往突厥晓谕，启民可汗奉诏后，一面召集突厥所部及奚、霫、室韦等部族酋长齐集突厥牙庭；一面组织突厥民众，自榆林北抵突厥牙庭，再从牙庭直达涿郡，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里、宽100步的“御道”，以奉迎杨广北巡人马的到来。

六月二十七日，杨广登上榆林郡城之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②。时有太府卿元寿，为了充分显示北巡“出师之盛”③，建议杨广仿效汉武帝当年出塞巡边故事④，于御营之外，将所率隋军分为二十四军，每日遣发一军，相距各30里，从而造成“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连注，千里不绝”⑤的军事盛况。但前来朝拜炀帝的定襄郡（治大利，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太守周法尚却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六月。

②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⑤ 《隋书》卷六十五《周法尚传》。

④ 汉武帝出塞巡边事，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十月。据《汉书·武帝纪》载称：汉武帝“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

认为元寿的这一建议，“乃取败之道”①。法尚指出：“兵亘千里，动间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长，难以相救”②。为此，他建议“结为方阵，四面外距，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若有变起，当头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阵”③，从而形成一个如同固守坚城的方阵壁垒布势。这样，一旦交战得手，即可遣骑追歼；倘或交战不利，也可屯营自守。杨广对上述两种建议权衡利弊后，欣然采纳了周法尚的建议，并因此而授任他为左武卫将军。

七月初四，突厥启民可汗为表达其对隋朝的臣附，乃上表请求说：“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④ 杨广览表后交臣下讨论，公卿大臣皆请依其所奏，但杨广却以为不可准请，遂以玺书答启民，谕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⑤。这不仅说明杨广深知尊重民族习俗的重要性，而且懂得突厥的“服饰法用”与战争、军事的关系。七月初七，杨广于榆林城东设千人大帐，隆重宴请前来迎驾的启民可汗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余人，并下诏赐“志怀沉毅，世修藩职”⑥的启民可汗以路车乘马、鼓吹幡旗，明令其“位在诸侯王上”⑦，以资褒奖和笼络。

八月初六，杨广车驾自榆林出发，溯金河（今内蒙古大里河）而上，径往漠北。隋军“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⑧。进入突厥境内以后，杨广又令工部尚书宇文恺等人建造“观风行殿”于野外，“戎狄见之，莫不惊骇”⑨。启民可汗于突厥牙庭亲奉庐帐以恭候杨广车驾。初九，杨广亲幸启民住所，受到突厥君臣的热烈欢迎，启民可汗亲自“奉觞上寿，宴赐

---

①②③ 《隋书》卷六十五《周法尚传》。

④⑤⑥⑦ 《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⑧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八月。

⑨ 《隋书》卷六十八《宇文恺传》。

极厚”①。杨广对此十分高兴，当即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韝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② 以此抒发其北巡突厥的得志之意。

八月十三日，杨广率众南返，启民可汗亲自护送至定襄后归藩。杨广大队人马途经楼烦关（今山西神池东）、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济源（今属河南）等地，于九月二十三日回到东京洛阳。杨广北巡突厥之举，是一次空前的具有拓边、固防性质的军事活动，出动军队五十余万，历时五个月，行程数千里，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史所罕见。此次军事活动虽以“出塞耀兵”为直接目的，因而不能不造成极大的铺张浪费和消耗，但在客观上，对进一步沟通中原人民与突厥民族的联系和交往，对增强隋朝北部边防，均有重要意义。

（二）经略西域

杨广在结束北巡突厥之后，积极开展经略西域的活动。

西域，是汉以后对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以西地区的总称，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有狭、广二义：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主要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帕米尔以东的我国新疆广大地区；广义则指通过葱岭向西所能达到的地区，包括中亚细亚，直至地中海东岸古罗马等地。

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西汉于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设西域都护府，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等地区。东汉时期，继置都护或校尉，对西域实施管理。东汉以后至南北朝，虽因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而影响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联系从未间断过。隋朝建立之初，由于北方突厥的强盛和西境吐谷浑的崛起，使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受到阻碍。隋炀帝杨广即位执政以后，出于开拓边疆、巩固

---

①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② 《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

国防的需要，便把经略西域的问题，提到了隋朝的重要议事日程。

大业三年（607年）十月，杨广任命吏部侍郎裴矩赴张掖（今属甘肃）主管隋朝与西域诸蕃商业贸易事宜。裴矩根据炀帝“方勤远略”① 的实际需要，千方百计地从前来贸易的西域诸“商胡”了解“其国俗山川险易”②情况，撰成记载西域44国的《西域图记》3卷，并“别造地图，穷其要害”③，尔后入朝上报隋炀帝。裴矩在《西域图记》序言中，载明敦煌（今甘肃敦煌西）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④，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鄯善西）、鄯善（今新疆若羌）并为“西域之门户”⑤，从此三地出发向西而达于西海⑥，有3条可为通行的大道：

北道为天山北麓，由伊吾向西，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位今新疆乌鲁木齐西）、西突厥可汗庭（位今新疆新源南），渡过北流河（今名不详），至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及其所属西亚地中海沿岸一带），而达于西海（这里具体似当指今地中海）。

中道为天山南麓之北道，由高昌向西南，经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越过葱岭（今帕米尔），又经钹汗（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附近）、苏对沙纳（今塔吉克斯坦乌拉提尤别）、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伊什特汗）、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伊什特汗西）、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穆国（今土库曼斯坦查尔朱），至波斯（今伊朗），而达于西海（这里具体似当指今波斯湾）。

南道为天山南麓之南道，由鄯善向西南，经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喝槃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越过

---

①②③④⑤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⑥ 西海，我国古籍对位于西方远处之海域的泛称，具体所指则因时因书而异。《隋书·裴矩传》三处提到的“达于西海”句中的“西海”，根据前后文义，似当依次指今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

葱岭南麓，又经护密（今属巴基斯坦境内）、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挹怛（今阿富汗北境）、帆延（今阿富汗巴米安）、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至北婆罗门（今北印度），而达于西海（这里具体似当指今印度洋）。

裴矩还提出：以国家之威德，将士之骁雄，控制西域，易如反掌。“但突厥、吐（谷）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①

裴矩上报的《西域图记》之作，不仅为隋朝经略西域提供了进军路线等详尽的兵要地志资料，而且提出了怀服西域诸蕃、孤立打击浑、厥的军政并举的实施方略。十分明显，裴矩在《西域图记》序言中所提出的“混一戎夏”的计划，既富有积极开拓精神，又颇为切实可行。因此，杨广读后“大悦”，“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②，裴矩不仅一一详细作答，而且再次指明“吐谷浑易可并吞”③。杨广终于定下经略西域的决心，并且把“将通西域，四夷经略”④的重任完全委诸裴矩。杨广遂以裴矩为黄门侍郎，复令其前往张掖实施经略西域的计划。裴矩到达张掖后，按照既定方略，采取“啖以厚利，导使入朝”⑤的策略，先后争取了高昌、伊吾、铁勒、西突厥等西藩数十国。“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⑥，朝贡不绝。杨广以裴矩“有绥怀之略”⑦，而进其位为银青光禄大夫。

隋朝经略西域的成功，不仅密切了隋与西域的关系，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有利于边疆的开拓与发展，而且提高了隋朝在西域的声望和影响，使吐谷浑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从而为其后在军事上战胜吐谷浑，消除西北边患，创造了有利条件。

---

①②③④⑤⑦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三年十月。

三、进击吐谷浑和开拓流求

（一）进击吐谷浑之战（参见附图 3）

吐谷浑，本是辽西鲜卑族徒河涉归的后代。涉归生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嫡少曰若洛廆。西晋太康四年（283 年），涉归死后，嫡子若洛廆代统鲜卑部众，是为慕容氏；吐谷浑虽为长子，但因其庶出，仅分有 1700 家①。吐谷浑因与若洛廆发生矛盾和斗争，而逐渐西迁至陇，止于甘松（今甘肃腊子口附近）之南、洮水（今甘肃洮河）之西一带。东晋咸和四年（329 年），吐谷浑之孙叶延继立首领，开始建立国家政权，并以吐谷浑为其族氏和国号。其后，吐谷浑不断向南、向西扩展，征服当地的氐、羌等族，逐渐强大起来。到北魏太和十四年（490 年），伏连筹继立首领之后，吐谷浑已成为据有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青海和新疆南部广大疆域的强国。当北朝魏、周之际，其首领吕夸始称可汗，并定都于伏俟城（位于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为完善其国家政权机构，吕夸仿效汉制，设置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等军政职官，“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②。此时的吐谷浑与中原汉族政权不仅保持通商往来，而且建立了岁修职贡的朝贡关系。但到北朝末期，由于周、齐交争，吐谷浑遂乘隙袭扰，常与北周发生战争。

隋朝建立初期，鉴于吐谷浑东进袭扰，文帝杨坚先后两次派兵击败之；特别是在隋灭陈战争之后，吕夸慑于隋朝势盛，遂“遁逃保险，不敢为寇”③。开皇十一年（591 年），吕夸死，其子世伏立为可汗，他遣使“奉表称藩，并献方物”④；杨坚派遣刑部尚书宇文㢸前往进行抚慰，其后又以光化公主嫁给世伏为妻，双方保持着和睦友好关系。开皇十七年（597 年），世伏为部下所杀，

---

① 参见周伟洲《吐谷浑史》第一节，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5 月版。

②③《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

④《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浑传》。

其弟伏允乘乱继立可汗之位。开始数年，伏允尚与隋朝保持“朝贡岁至”① 的友好关系。但到大业元年（605 年）杨广继立帝位以后，吐谷浑与隋朝的关系发生变化，由和平交往变为兵刃相见。吐谷浑挟持羌胡诸部族“屡为侵掠”②，袭扰张掖。这不仅直接威胁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而且严重妨碍炀帝经略西域战略的实施。所以，出兵给吐谷浑以打击，乃是杨广拓边、固防战略的重要军事步骤。

隋朝进击吐谷浑之战，前后经历了两个作战阶段：

第一阶段，联合西突厥、铁勒进击吐谷浑。大业元年，活动于乌孙故地（今巴尔喀什湖东南）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的西突厥处罗可汗，因统治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攻，大为铁勒所败。”③ 此时，正在敦煌“引致西域”④的裴矩，得此消息后，建议朝廷乘机说降处罗可汗，共击吐谷浑。炀帝杨广采纳裴矩的建议，于大业四年（608 年）二月，派遣司朝谒者崔君肃为使，携带诏书前往慰谕、游说，以便联合西突厥，采取“汉击其内，可汗攻其外”⑤的内外夹击之策，一举打败吐谷浑。处罗可汗听后十分高兴，遂即降隋并遣使朝贡。其后，处罗可汗虽因内乱而无力对吐谷浑采取进攻行动，但其归降，确使吐谷浑陷入更加孤立状态，这为隋军尔后顺利出击，创造了条件。同年七月，杨广派遣黄门侍郎裴矩前往贪汗山（今新疆乌鲁木齐东之博格达山）一带，劝诱已经归降的铁勒部莫何可汗，使其“击吐谷浑以自效”⑥，莫何许诺，遂即出兵袭击，大破吐谷浑。伏允可汗兵败东走，遁入西平（治所湟水，今青海乐都），并遣使向隋请降求救。杨广乘机派遣安德王杨雄率兵出浇河（治河津，今青海贵德）、许国公宇文述率兵出西平，对吐谷浑实施东西夹击，大破其军，收降其部众

---

① 《北史》卷九十六《吐谷浑传》。

② 《隋书》卷三十九《阴寿传附阴世师传》。

③④⑤ 《隋书》卷八十四《西突厥传》。

⑥ 《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

十万余人，缴获其牲畜三十余万头。伏允因畏隋军势盛，既不敢战，又不能降，遂率余众西逃。宇文述等挥军追击，连克曼头（今青海共和西南）、赤水（今青海兴海东南）两城，又歼灭其军三千余人，俘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①；伏允仓皇南逃雪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至此，隋军出击吐谷浑作战之第一阶段已告结束。

第二阶段，杨广西巡再败吐谷浑。在隋军胜利班师以后，伏允重新回到故地，并派兵“复寇张掖”②。为此，杨广决心乘战胜之威，再次调集大军，亲自组织反击。

大业五年（609年）三月初二，杨广以“西巡河右”③为名，亲率大军自京师长安西进，经扶风（治今陕西凤翔），于四月二十七日，出临津关（今青海循化东之黄河南岸），渡过黄河后向西北，进至西平。为了取得此次战役的胜利，杨广命令隋军驻地休整，“陈兵讲武”④，进一步做好反击吐谷浑作战的各项准备。五月初九，杨广于西平西南的拔延山（今青海化隆北之马场山），举行大规模围猎活动，这实际上是一次进击吐谷浑的战前军事演习。十四日，杨广率军北上，经长宁谷（今青海西宁北），越星岭（位于长宁谷北），于二十日进至浩亹川（今青海大通川）。杨广急令都水使者黄亘督役架桥以通过隋军，以其架桥缓慢贻误军行而处斩。继而又组织人员架桥，数日桥成，隋军大队人马顺利过河，继续北进。

是时，吐谷浑伏允可汗正率众据保覆袁川（今甘肃张掖西之黑河）上游地区。根据当面敌情实际，杨广作了如下进攻部署：

以太仆卿杨义臣所部东屯于琵琶峡（今甘肃天祝南），连营80里；

以内史令元寿所部南屯于金山（今青海西宁西70里），东西连营300余里；

---

①② 《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传》。

③④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以将军张寿所部西屯于泥岭（今青海祁连西南）；

以兵部尚书段文振所部北屯于雪山（今甘肃武威西南之冷龙岭），连营300余里，东接杨义臣，西连张寿，南与元寿相对。

显而易见，隋军的上述部署，乃是一个对吐谷浑军呈“四面围之”① 的战役进攻布势。在隋军四面包围攻势的威慑下，伏允畏怕，不敢出战，派遣名王诈称其据保车我真山（在覆袁川上游之西），以吸引隋军注意力，然后自率少部兵力逃出重围。五月二十六日，杨广命令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率军往击之，因其轻敌贸进，为吐谷浑伏兵所射杀，其副将柳武建继后挥兵奋战，击破吐谷浑军，歼灭数百人。二十八日，被隋军围困中的吐谷浑仙头王见势不妙，遂率十余万人来降。

六月初二，杨广遣左光禄大夫梁默、左翊卫将军李琼等率兵追击伏允，与吐谷浑军遭遇，皆兵败被杀。卫尉卿刘权奉命率兵出伊吾道东进，击败吐谷浑军，乘胜追奔，进至吐谷浑都邑伏俟城。穷蹙无计中的伏允可汗，深感“无以自资”②，被迫率领数千骑南逃，而寄居于地处积石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附近的党项。杨广复令刘权率兵南下，再克曼头、赤水两城。至此，隋军反击吐谷浑之战，胜利结束。

六月初八，杨广率领隋军经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南）向张掖进发，因谷路险狭难行，又遇连绵大雨，“士卒死者十二三焉”③。十一日，进至张掖。十七日，杨广登燕支山（今甘肃民乐东），受到高昌、伊吾等西域27国君臣的隆重欢迎。十八日，杨广下令于吐谷浑故地置西海（郡治设于伏俟城）、河源（郡治设于赤水）、鄯

---

①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② 《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

③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隋书·炀帝纪上》和《北史·隋本纪下》均作“士卒冻死者太半”，似有夸大；《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载称，炀帝过大斗拔谷遇“风雪晦冥”句，当为七月“车驾东还”之时，而非六月之事。本书这里从《隋书·食货志》说。

善（治今新疆若羌）、且末（治今新疆且末南）四郡。从此，“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东南）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今祁连山）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① 二十一日，杨广于张掖所置观风行殿上，设盛宴款待高昌、伊吾等西域来朝的诸国王及使者。接着，杨广颁令“大赦天下”②，鉴于对吐谷浑用兵给各地带来的负担，下令陇右诸郡免除一年徭役，而作战“行经之所”③，免除两年徭役。至九月十九日，杨广车驾返回长安。

隋军进击吐谷浑的作战，既是隋王朝拓边、固防战略的具体实施步骤，又是加强中原与边疆经济、文化联系的实际需要。隋对吐谷浑的用兵，虽然暴露了隋炀帝扩张势力范围和掠夺的一面，但客观上不仅有利于隋朝西北边防的进一步巩固，而且有利于国内各民族的联系与交往，这对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隋军的胜利，除了决定于较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诸客观条件外，主观指导的正确，乃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原因。隋军战争指导的可取之处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成功地运用孤立对方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指导方针。这是隋军进攻吐谷浑第一作战阶段的基本特点。战前，杨广采纳裴矩的建议，派遣使者先后争取西突厥和铁勒部站到隋朝一边，使吐谷浑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尔后又在铁勒挫败吐谷浑的基础上，适时出动隋军，一战而败吐谷浑，取得了首战告捷的初步胜利。

二是从敌情实际出发，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和采取符合实战需要的战略战术。这是隋军进攻吐谷浑第二作战阶段的突出特点。隋军首攻吐谷浑到杨广亲率大军西征，经历了 7 个多月的战争准备；隋军进抵西平以后，杨广又令隋军“陈兵讲武”和举行以围猎活动为形式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可见，隋军再次出击吐谷浑，是在

---

① 《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传》。

②③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经过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作战进程中，杨广根据当面敌情实际和隋军的兵力情况，采取四面包围的战役进攻布势，迫使伏允惧战而逃；尔后，又及时挥军追击，接连击败吐谷浑军，终于取得了整个战役作战的胜利。

（二）开拓流求之战

隋朝在取得对吐谷浑作战的胜利之后，又向东南沿海方向发展，开始了进军流求岛屿的军事活动。

流求，即我国今之台湾。据历史文献记载，自东汉始，以至三国、南朝时期，称之为夷洲；隋代改称流求，一直沿用至宋、元，亦作“琉求”、“留求”、“瑠求”、“琉球”。明朝末年始称台湾至今。该岛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根据地下考古发掘证实，远在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它与我国福建乃至广西、山东等地，共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该岛与大陆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和联系。① 三国时期，东吴皇帝孙权为了扩大其经济、军事势力，在联蜀抗魏的同时，积极向东南沿海及海岛扩展。东吴黄龙二年（230年）正月，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兵万人，渡海开拓夷洲，往返“军行经岁”②。孙权派兵“远规夷洲”③ 的举动，是实现其谋取天下，“以定大事”④战略目标的重要军事步骤。自此以后，夷洲便成为我国历代政治势力所及的范围。

杨广即帝执政以后，在集中力量实施北巡突厥、经略西域的军政战略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向东南沿海方向开拓、发展。大业三年（607年）三月，杨广根据海师何蛮等人观察海面所提供的情况，派遣羽骑尉朱宽偕何蛮等人渡海而至流求。此行虽名曰“求访异俗”⑤，但实际是先行探察情况，为尔后出兵开拓流求作准

---

① 参见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载于1979年《考古》第3期。

②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全琮传》。

③④ 《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

⑤ 《隋书》卷八十一《流求传》。

备。

在隋军击败吐谷浑，使西北边防得到进一步巩固之后，杨广于大业六年（610 年）正月，再次派遣朱宽渡海“招抚流求”①，流求不从，朱宽仅“取其布甲而还”②。有鉴于此，杨广复命虎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率兵万余人，自义安（今广东潮州）乘船入海东渡，进击流求。隋军舰船泛海东进，途经高华屿、鼊鼊屿（今澎湖列岛），历时月余乃抵流求西岸。流求人初见舰船，以为是商旅船队，“往往诣军中贸易”③。为了顺利降服流求，陈稜首先选派懂流求语的人，前往“慰谕之”④，以期不战而使其归附，但是，“流求不从，拒逆官军”⑤。在此情况下，陈稜始以镇周为先锋，率军登陆进攻之。流求主欢斯渴剌兜派兵抵抗，屡为镇周所部击败。陈稜率军继后，当进至低没檀洞时，流求小王欢斯老模率兵拒战，陈稜挥军奋杀，击败之，并斩欢斯老模。其后，陈稜兵分五路，直趋流求都邑。欢斯渴剌兜亲自率兵数千迎战，为隋军前锋部队所击溃。陈稜乘势挥军追击，进抵流求营栅。欢斯渴剌兜率兵出营“背栅而阵”⑥，陈稜乘其立阵未稳，尽锐击之，迫使欢斯渴剌兜败入营栅。隋军乘胜填堑为路，“攻破其栅”⑦，斩欢斯渴剌兜，俘获其子岛槌及其部众万余人⑧。至此，隋军进击流求之战始告结束。战后，杨广以陈稜作战有功，将其进位为右光禄大夫，张镇周进位金紫光禄大夫。

隋朝出兵流求，是继三国东吴“远规夷洲”之后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其性质属于拓边固防的国内战事。此战规模虽然不大，但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隋朝进击流求之战，不仅有利于隋朝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拓发展，进一步沟通流求与大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而且为该岛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

---

①⑧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六年正月。

②④⑤ 《隋书》卷八十一《流求传》。

③⑥⑦ 《隋书》卷六十四《陈稜传》。

第三节　炀帝三次进伐高丽的战争

杨广统治后期，凭借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从大业八年至十年，接连三次以重兵进伐高丽，其结果非但未能取得预期胜利，相反，却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成为隋朝由兴盛到衰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高丽的兴起及其与隋朝的关系

高丽，原谓“高句丽”，始见于北齐史学家魏收（505～572年）所撰《魏书》中，隋代改称高丽，此后我国史书多用之。高丽当时位于今朝鲜半岛北部并跨占中国东北辽东半岛及其以北部分地区，南与新罗、百济接壤，北与西分别同靺鞨、契丹、隋朝为邻，都于平壤城，亦称长安城。该国传为朱蒙所建，“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①，后为卫氏朝鲜所并。西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汉灭朝鲜，置玄菟郡，“以高句丽为县以属之”②，并接受汉朝封赏。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高句丽遣使朝贡。自此以后，高句丽一直同中原封建政权保持着臣属朝贡关系，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其国中所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中国古代典籍，其“兵器与中国略同”③。南北朝末期，高汤为高丽国王。北齐乾明元年（560年），北齐废帝高殷以汤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高汤遣使至周，周武帝宇文邕以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辽东郡公、辽东王。

①③《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②《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

隋朝建立以后，高汤[1] 于开皇元年（581年）十二月，派遣使者朝贡，文帝杨坚授高汤以大将军，改封其为高丽王。自此，高丽对隋朝“岁遣使朝贡不绝”[2]，双方保持着密切友好往来的关系。但自开皇九年（589年）隋朝灭陈统一南北以后，高汤因怕高丽步陈朝灭亡的后尘，于是，以隋朝为假设敌，在国内大搞“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3]。消息传到隋朝，文帝杨坚对高丽的作法深感不安和不满，致使双方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开皇十七年（597年）十二月，杨坚致书高汤王，指责其“虽称藩附，诚节未尽”[4]，高汤“得书惶恐”[5]，一病而卒，其子元嗣立。杨坚为了改善双方关系，乘高元新立为主之机，先是主动派遣使臣前往其国，授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公，继则准其所请，册封高元为高丽王。高元对隋朝的“安抚”之策，虽曾“奉表谢恩”[6]，但并没有为增进和改善双方关系，作出实际步骤，相反，却于次年二月，驱使靺鞨之众万余骑扰掠隋朝之辽西郡（治柳城，今辽宁朝阳），遭到隋军守将、营州总管韦冲所部的有力还击而溃逃。杨坚获此消息后怒不可遏，一面“下诏黜其爵位”[7]，一面以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率“水陆三十万伐高丽”[8]。开皇十八年（598年）六月，杨谅率步骑兵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向辽东进发，水军总管周罗睺率水师自东莱（今山东掖县）入海直趋平壤，企图水陆并进，一举征服高丽。但因陆师“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9]，水师海上“遭风，船多飘没”[10]，致使隋军未战而损失颇重。尽管如此，但当陆路隋军进抵辽水（今辽河）时，高元十分恐惧，因慑于隋军势盛，被迫遣使奉表自称“辽东粪土

---

① 高汤，《隋书·高祖纪上》和《北史·隋本纪上》皆作“高阳”，疑误。本书从《隋书·高丽传》和《北史·高丽传》说。

②③④⑤⑥⑦ 《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⑧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⑨ 《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八年六月。

⑩ 《隋书》卷六十五《周罗睺传》。

臣元"①，以示谢罪，请求罢兵。杨坚于是下令班师，对高丽仍"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②。

杨坚决定出兵高丽，带有反击和惩罚性质。此次军事行动，虽因文帝尚能较好地把握兵威相加、适可而止的尺度，并从隋军出师不利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罢兵言和而避免了一场战火。但是，来自高丽方面的障碍双方关系正常发展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所以，自炀帝杨广即位以后，为谋求国防安全与自身发展，在其统治前期取得北巡突厥、西击吐谷浑等重大军事胜利后，便于统治后期移兵东北，向高丽连续进行三次大规模征伐，从而把双方关系由矛盾隐伏状态推上战争状态。

二、炀帝第一次进伐高丽

（参见附图 4）

（一）"征辽之策"与战前准备

隋朝对高丽战争的动议，由来已久。据《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记载："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这说明隋对高丽的战争，早在文帝杨坚统治后期，即已成为隋朝统治阶级的基本意向，而到了炀帝杨广执政以后，则终于把对高丽的大规模战争付诸行动了。大业三年（607 年）八月，杨广率领隋军大队人马北巡突厥行至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时，恰值高丽使者先期到达突厥，启民可汗不敢隐匿，遂引见于杨广。高丽暗遣使者"先通于突厥"③ 的这一举动，显然对隋朝的安全不利，因而引起隋朝君臣的极大不安。当时黄门侍郎裴矩就此事向杨广启奏说：

---

①② 《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③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高丽之地，本孤竹国[①]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②]，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地，仍为蛮貊之乡乎?"[③] 杨广听后反问其怎么办？裴矩建议说："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④]杨广听后不但完全予以采纳，而且还当面警告高丽使者说："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土矣"[⑤]。于是，一个进伐高丽的"征辽之策"[⑥]，终因高丽王不听命而最后形成了。

为了进伐高丽，杨广倾注国力，抓紧进行各项战争准备：

1、开凿永济渠，沟通战略运输。大业四年（608年）正月，杨广调发河北百余万民工凿通永济渠，引沁水南入黄河，北抵涿郡（治今北京城西南），运河全长二千余里，成为南物北运、支援征辽作战的重要水上战略运输线。与此同时，杨广还下令于涿郡修筑临朔宫，作为其出兵高丽的前进基地。

2、大造兵器，大造战船。大业三年（607年）三月，杨广命以云定兴督总少府工匠大造兵器，为进伐高丽储备大批精良兵器。大业五年（609年），杨广亲自"大阅军实"[⑦]，验收所造兵器，称赞云定兴监造的"甲仗为佳"[⑧]。大业六年（610年），杨广"复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⑨]，倘若所造兵器粗制滥造，则对制造者处以斩首。

---

① 孤竹国，商代墨胎氏之封地，汉属辽西郡，当今河北卢龙至辽宁朝阳一带。

② 箕子，商纣王之诸父，本名胥馀，因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而得名。曾因规劝纣王收敛暴政而被囚。周武王灭商后，将其释放，并封之于朝鲜。

③④⑥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

⑤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⑦⑧ 《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传附云定兴传》。

⑨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杨广即帝以后，前后委官组织工匠制造大批船只，除供其巡游之用外，还用为作战舰船。大业七年（611 年）二月，为了适应进伐高丽的海上作战需要，杨广派遣木工监元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①，又造战船 300 艘。

3、制造戎车，运储饷械。大业七年（611 年）五月，杨广下令河南、淮南、江南制造戎车 5 万辆送往高阳（今河北高阳东），以“供载衣甲幔幕”② 之用；又发河南、河北民夫运储军需物资。七月，调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舶，运送黎阳仓、洛口仓所储之大批粮食，并“载兵甲及攻取之具”③ 至涿郡，以备进伐高丽的作战需要。运送军需物资的“舳舻相次千余里”④，昼夜不停，每日“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⑤。隋军后勤保障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4、扩充兵员，广征军马。为了扩充进伐高丽的兵力，自大业之初，杨广即在全国范围内“增置军府，扫地为兵”⑥；其后，又下令“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⑦。仅从江淮、岭南等地调集至涿的特种部队达 7 万人，其中：水手 3 万、弩手 1 万、排镩手 3 万。

杨广在大力扩充和征调兵力同时，还下令于“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⑧；又根据原有军马“已多损耗”⑨的情况，下令“课天下富人，量其赀产，出钱市武马”⑩，限期补足所需军马数量。

经过上述的战争准备之后，杨广遂率文武百官和王公后妃，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进至涿郡临朔宫，并“下诏讨高丽”⑪。于是，一场进伐高丽的大规模战争如箭在弦上，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

① 《隋书》卷七十四《元弘嗣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五月。

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七月。

⑥⑨⑩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四月。

⑧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⑪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二月。

（二）隋军的进攻部署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朝"四方兵皆集涿郡"①，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而担负后勤保障的"馈运者倍之"②。是时，虽因炀帝穷兵黩武和横征暴敛，已激起农民起义的强烈反抗，但杨广并未因此而打消进兵高丽的企图。正月初二，杨广将隋军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并下诏部署进攻事宜。

左十二军的进攻部署是：

第一军出镂方道（今辽宁沈阳西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二军出长岑道（今辽宁沈阳东），本由武卫将军樊子盖统率之，后因担任"宿卫不行"③，改为别将，失考；

第三军出海冥道④（今朝鲜海州），此路为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之；

第四军出盖马道（今朝鲜北部狼林山一带），由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统率之；

第五军出建安道（似在朝鲜境内），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六军出南苏道（今辽宁新宾境），由兵部尚书、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统率之；

第七军出辽东道（今辽宁辽阳），由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统率之；

第八军出玄菟道（今辽宁新宾西），由左屯卫将军辛世雄统率之；

第九军出扶馀道（今吉林四平），由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统率之；

第十军出朝鲜道（今朝鲜平壤南），此路为水军，由左武卫将军周法尚统率之；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正月。

③ 《隋书》卷六十三《樊子盖传》。

④ 海冥道，《隋书·来护儿传》作"沧海道"。从来护儿所率水军的作战经过地区来看，"沧海"亦即"海冥"，故从《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第十一军出沃沮道（约今吉林临江至长白一带），由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统率之；

第十二军出乐浪道（今朝鲜平壤），由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统率之。

右十二军的进攻部署是：

第一军出黏蝉道（今朝鲜平壤西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二军出含资道（今朝鲜平壤东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三军出浑弥道（今朝鲜平壤北），由右武卫大将军李景统率之；

第四军出临屯道（今朝鲜汉城东），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五军出侯城道（今辽宁沈阳东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六军出提奚道（今朝鲜瑞兴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七军出蹋顿道（今辽宁朝阳县境），由右骁卫大将军史祥①统率之；

第八军出肃慎道（今辽宁北部），由太仆卿杨义臣统率之；

第九军出碣石道（今河北昌黎南），由右候卫将军赵才统率之；

第十军出东暆道（今朝鲜江陵），由何人统率不详，但史载治书侍御史陆知命为该路隋军的“受降使者”②；

第十一军出带方道（今朝鲜平壤南），由何人统率不详；

第十二军出襄平道（今辽宁辽阳北），由右御卫将军张瑾统率之。

从上述二十四军的进攻部署来看，担任陆路进攻作战任务共有二十二军（其中左军十、右军十二）担任海上进攻作战任务共两军（即左三、十军）。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集中优势兵力于陆路进攻，而以部分水军于海上进攻相配合的声势浩大的进攻作战部署，其战略企图是：陆路进攻部队在集中兵力攻克辽东诸城后，分

---

① 史祥，《隋书》卷六十三《史祥传》称其为“左骁卫将军”；本书从《北史》卷六十一《史宁传附史祥传》说。

② 《隋书》卷六十六《陆知命传》。

路南进，渡过鸭绿水（今鸭绿江），继续南下，进逼高丽都城平壤；海上作战部队，则分别自东莱、江淮东渡渤海、东海（今黄海），从今朝鲜半岛西岸登陆后，溯浿水而上向北挺进，与南下的诸路隋军“总集平壤”①，以南北夹击之势，而收一举击败高丽之效。但是，其后隋军作战经过表明，战争实践的结果，并没有完全按照杨广进攻部署的初衷进行。

（三）辽东之战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初三，百余万隋朝大军，在炀帝杨广的“亲授节度”②之下，陆路进攻部队自涿郡向辽东进发，日遣一军，相去40里，连营渐进，历时40天，诸军始发完毕。加上御营内的十二卫和三台、五省、九寺等隋军官员所隶之内、外、前、后、左、右六军，隋军首尾相继，旌旗绵亘千里之遥。与此同时，海上进攻部队也分别自东莱、江淮入海东渡，“舟舻千里”，“迳造平壤”③。隋军出师之盛，近古“未之有也”④。

三月十四日，杨广率军进至辽水。面对隋朝“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⑤的严重形势，高丽兵阻水拒守，毫不示弱，致使隋军无法渡河。有鉴于此，杨广遂命工部尚书宇文恺督造3道浮桥于辽水西岸，既成，隋军登桥直趋东岸，却因桥身太短不及东岸，致使隋军大队人马仍不得过河。就在这时，高丽众兵突然来攻，隋兵争先“赴水接战”⑥，高丽兵居高临下而击之，隋兵不得登岸，伤亡甚众。隋军前锋、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人，虽率先登上东岸，但因寡不敌众，皆在混战中被杀。见此情形，杨广无奈，只好下令收兵“引桥复就西岸”⑦。接着，杨广又命少府监何稠率人继续造桥，二日而就，隋军相次过河，大战于辽水东岸，高丽军大败，死者以万计。隋军乘胜东进，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

---

①③④《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正月。

⑤⑥⑦《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二月。

杨广车驾过辽水之后，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围辽之战。为了显示隋朝军威，杨广一面引随军东征的西突厥曷萨那可汗（即处罗可汗）和高昌王伯雅等人登“观战处以慑惮之”①；一面命以卫玄为刑部尚书偕尚书右丞刘士龙前往安抚辽民，企图以许诺“给复十年”②为手段，来配合隋军攻城作战。此时，辽东城内的高丽守军，鉴于隋军重围，数次出战不利，遂改取“婴城固守”③之策。对此，杨广一面催促诸路隋军加紧围攻，一面又严令诸将不得擅自行动，“高丽若降者，即宜抚纳，不得纵兵”④。高丽守军见此有隙可乘，故每当城围吃紧将陷之时，即声言请降；隋军诸将奉旨不敢机断行事，只好驰奏杨广待命，比及命令到来之时，高丽守军业已做好了守御之备，并且“随出拒战”⑤，给攻城之隋军以打击。高丽守军再三使用诈降手段欺骗隋军，而杨广竟然始终不悟，致使隋军“食尽师老”⑥，顿兵城下。六月十一日，杨广来到辽东城南，“观其城池形势”⑦，怒责诸将攻城不肯尽力，遂亲自指挥部队攻城，但由于高丽守军凭据坚城顽强抵抗，辽东及附近诸城，仍然“攻之不下”⑧。杨广无奈，只好退到城西数里，缩居于“六合城”内，再无良策可施了。

围攻辽东，是杨广对高丽战争的首攻目标。隋军从三月下旬攻城，至七月下旬撤军，历时 4 个月之久，竟未攻占一城。此种战局的出现，虽与高丽守军的顽强抵抗不无关系，但主要是由于杨广统军太死、指挥不力所致。其结果不仅使攻辽隋军“食尽师老”，战斗力锐减，而且严重地影响了隋军及时南下，破坏了隋军“总集平壤”、一举击败高丽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平壤之战

在陆路诸军向辽东进兵的同时，水路诸军在右翊卫大将军来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三月。

③④⑤⑥ 《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六月。

⑧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护儿、左武卫将军周法尚等将领的统率下，自东莱、江淮等处入海东进，直趋平壤。六月中旬，隋军水师自浿水（今朝鲜大同江）逆流而上，进抵距平壤60里处，与高丽军遭遇，隋军奋勇进击，大破高丽军。此时，来护儿欲乘胜直迫平壤，但周法尚认为不可孤军深入，建议“俟诸军至俱进”①。可是，来护儿根本不予采纳，执意率领精兵4万，直抵平壤城下。高丽王高元之弟建成见来护儿孤军深入，遂设伏兵于城内空寺之中，出动少数兵力与隋军交战而佯败，诱使隋军入伏。来护儿不知是计，遂挥军入城，高丽伏兵乘隋军入城后队形混乱之际出击，大败隋军，来护儿仅以身免，4万隋军伤亡惨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②。高丽军乘胜追到隋军泊船之所，幸有周法尚事先“整陈待之”③，才没有为高丽追兵所乘。高丽追兵不战而退之后，来护儿与周法尚不敢复留，遂率余众沿浿水而下，还屯海滨，“以待期会”④，再攻平壤。但其后在得知宇文述等南下的九路隋军已经失败的消息后，来护儿等只好班师回国。

来护儿不听周法尚的正确建议，执意孤军深入，已犯冒进之忌；进抵平壤郛郭（外城）之后，又不严控部队，这就给高丽设伏邀击以可乘之隙。从而铸成了来护儿的平壤之战的败局。倘若来护儿虚心采纳周法尚的建议，即便实现不了待诸军至而会攻平壤的计划，也可以伺机而进退，取得一定战果，或者全军而还。

（五）萨水之战

在隋军主力围攻辽东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军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率军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率军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军出沃沮道，左屯卫将军辛世雄率军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率军出襄平道，右候卫将军赵才率军出碣石道，检校左武卫大将军崔弘升率军出遂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六月。

④《隋书》卷六十四《来护儿传》。

城道①，检校右御卫大将军卫玄率军出增地道②。以上九路隋军于六月中旬“皆会于鸭绿水西”③，并且准备继续南进，企图配合水军，对平壤实施南北夹击。

此时，面对即将展开的隋军攻势，高丽王高元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北赴隋营以请降为名，“实欲观虚实”④。宇文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⑤，把乙支文德抓起来，但由于随军慰抚使、尚书右丞刘士龙的极力阻挠，只好将其放还。就在宇文述等人因放还文德而“内不自安”⑥之时，又遇军粮已尽，士气不稳。有鉴于此，宇文述“议欲班师”⑦北返，但却遭到于仲文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派遣精兵追捕乙支文德，以立军功。宇文述迫于众议压力，不得已而从之，遂与诸将率军渡水南下追击之。乙支文德自隋营脱身返回后，根据隋军粮尽士饥的实际情况，采取“每斗便北”⑧的佯败疲敌之战术，故意麻痹和骄纵隋军。宇文述等九军不知是计，遂挥军奋追，一日之中竟七战皆捷。隋军恃胜而骄，于是，南渡萨水（今朝鲜清川江），进到距平壤 30 里处“因山为营”⑨。对此，乙支文德故伎重施，又遣使者前来隋营诈降，诡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⑩。宇文述等见隋军已经疲惫，不堪再战，又鉴于平壤险固，难以力攻，“遂因其诈而还”⑪。宇文述等九路隋军以方阵队形而浩浩荡荡北撤，乙支文德见有机可乘，于是挥军“四面抄击”⑫，隋军被迫且战且行，慌忙北撤。七月二十四日，当隋军退到萨水，士卒刚渡过一半时，高丽追兵突然而至，袭击隋军之后，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隋诸军“大溃不可禁止”⑬，昼夜奔逃，而溃至鸭绿水。将军王仁恭殿后挥军奋战，击

---

① 遂城道，位于平壤之西。《隋书·崔弘升传》作“平壤”；本书这里取《资治通鉴》说。

② 增地道，隋左、右二十四军的进攻部署中并无“增地道”一路，可能是根据作战实际需要，临时增加的。

③④⑫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六月。

⑤⑥⑦⑧⑨⑩⑪⑬ 《隋书》卷六十一《宇文述传》。

退高丽追兵，使隋军余众得以北归。

宇文述等九军渡辽水之初，共有兵30.5万人，及溃还至辽东之时，仅剩2700人了，九军中唯卫玄一军独全；而“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①。杨广对此十分恼怒，遂将宇文述、于仲文等人收监属吏治罪，并于七月二十五日，下令班师，至九月初三，始回到东京洛阳。

隋军萨水之战，除粮尽师老、军心不振是致败的根本原因外，宇文述与于仲文等人主观指导上的一再失误，也是致败的重要原因。放走前来刺探军情的乙支文德，暴露了隋军粮尽师老的弱点；追击中不察敌情实际，贸然轻进，中了高丽佯败诱歼之计；当乙支文德诈降故伎重施之时，又不辨真伪，轻信不疑，竟因麻痹大意而作出退军不战的错误决定。隋军客观条件存在的明显弱点和主观指导上的一误再误，成为高丽最后反击隋军得手的有利条件。

三、杨帝第二次进伐高丽

（一）隋廷再征高丽之议

隋军一攻高丽败归以后，国内农民起义蜂起，但隋炀帝杨广并未从战败和动荡中汲取教训，改弦易辙，收敛进伐高丽的企图，相反，战争刚刚结束，又积极策划再次进伐高丽。于是，杨广召集朝臣“复议伐高丽”②之事，当即遭到左光禄大夫郭荣、太史令庾质等人坚决反对，他们各以“中国疲敝”③、“糜费实多”④为由，规劝杨广不要再次冒险。然而，杨广却一意孤行，置此正确意见于不顾，决定向高丽进行第二次攻伐。

大业九年（613年）正月初二，杨广下诏征天下兵集于涿郡。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七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二月。

③ 《隋书》卷五十《郭荣传》。

④ 《隋书》卷七十八《庾质传》。

为了扩充进伐高丽的兵员，杨广开始“募民为骁果”[1]，并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2]。二十四日，命刑部尚书卫玄等辅佐代王杨侑（杨广之长孙）留守西京长安；不久，又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佐越王杨侗（杨广之孙）留守东京洛阳。二月，下令恢复宇文述等人官爵，令其统兵从征。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又动用大批民工整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3]。经过以上的匆忙准备之后，杨广终于又把进伐高丽的战争，再一次推上了日程。

（二）围攻辽东之战

大业九年（613年）三月初四，杨广自东京洛阳起驾，再次统率大军亲征高丽。杨广行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命礼部尚书杨玄感留在该地负责督运作战物资。四月二十七日，杨广率军渡过辽水后，一面派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率兵南下直趋平壤，一面命令诸将率军围攻辽东城。杨广改变以往统军过死的作法，“乃敕诸军以便宜从事”[4]。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率劲骑担任前锋，师出扶馀道南下进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附近，遭到数万高丽兵的抵抗，仁恭率劲骑1000猛烈冲击，一举而破之。高丽军被迫退入新城而“婴城拒守”[5]，仁恭则挥军“四面攻围”[6]，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进攻辽东城的诸路隋军，使用飞楼、橦车、云梯等攻城器械和采用地道战法，“四面俱进，昼夜不息”[7]。面对强攻硬取的诸路隋军，辽东城内的高丽守军则“应变拒之”[8]；他们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战术，抵御攻城之隋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各自伤亡甚众。隋军虽然付出很大代价，而城终未能拔。

（三）杨玄感起兵反隋与杨广罢攻班师

正当隋军攻辽激战之际，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的阴谋正

---

①②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正月。

④ 《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⑤⑥ 《隋书》卷六十五《王仁恭传》。

⑦⑧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四月。

在加紧酝酿之中。杨玄感，是尚书令、楚国公杨素之子。大业四年（608年）正月，受任为礼部尚书，袭父爵楚国公。杨玄感担任朝廷重臣之后，“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①，又见杨广猜忌日甚，朝政日紊，早有“潜谋废帝”②的野心。杨广二次进伐高丽，杨玄感认为这是起兵反隋、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此时，杨玄感正受命于黎阳督运军需物资。为给隋军攻辽作战制造困难，他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人密谋，以“水路多盗贼”③为借口，故意拖延漕运时间，“欲令渡辽诸军乏食”④。同时，他又暗中将其弟玄纵、鹰杨郎将万硕等亲信，从辽东战场秘密召回；又派家奴至长安，密召其弟玄挺等人潜赴黎阳，共同策划起兵反隋。是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隋军舟师自东莱即将入海东趋平壤，杨玄感暗遣家奴伪为从东方归来的使者，“谬称护儿失军期而反”⑤，为其起兵反隋制造借口。六月初三，杨玄感入黎阳“闭城大索男夫”⑥为兵，依照开皇旧制置署设官，并移书附近各郡，“以讨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⑦，揭起了反隋的旗帜。其后，杨玄感率众万人西进，企图袭取东京洛阳。杨玄感的起兵作乱，不仅加剧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而且打乱了杨广进伐高丽的作战部署。

隋军攻辽作战进入六月以后，杨广鉴于辽东城久攻不克，一方面派遣大批人员制造百余万个布囊，皆装满沙土，并用此沙囊堆积宽30步的高与城齐的“鱼梁大道”（即筑道如鱼梁状），“使战士登而攻之”⑧；一方面又令工匠制作八轮楼车（即安有8个轮的楼车），高出于城墙，夹鱼梁道而立，以作“俯射城内”⑨之用。在此攻城准备已经就绪，且“指期将攻，城内危蹙”⑩之际，恰值杨玄感反书至，杨广十分惊惧；又听说隋朝“达官子弟皆在玄感所”⑪，则越发忧虑不安。在此情况下，杨广不得不中止围辽之战，

---

①②③⑤⑥⑦《隋书》卷七十《杨玄感传》。

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四月。

⑧⑨⑩⑪《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六月。

并于六月二十八日深夜，“密召诸将”①，令其引军还京。隋军“众心汹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②，仓皇回撤。其大批军资、器械、攻具，堆积如山；营垒、帐幕，按堵无损，皆弃之而去。隋军回撤的狼狈相，由此可见一斑。对于隋军的秘密撤退，高丽虽然即时察觉，但因“犹疑隋军诈之”③，而未敢及时出兵追击。待隋军后撤已过两日，高丽虽然出兵数千尾追于后，又因“畏隋兵之众，不敢逼”④，总与隋军尾队保持八九十里之距。高丽追兵将到辽水之时，在得知杨广的“御营毕渡，乃敢逼后军”⑤。是时，隋军的后军有数万人，虽为高丽追兵所抄击，但仅损失老弱残兵数千人。隋军大部队则安全返回内地。至此，杨广第二次进伐高丽之战，以耗资巨大、损失颇重而暂告一段。此后，杨广调兵遣将，大肆围攻杨玄感，终于在八月初将其消灭在阌乡（今河南灵宝西北）一带。

杨广二次亲征高丽之战，虽终因杨玄感称兵作乱而师出无功，但此次军事行动，杨广在作战指导上，确有改进和可取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吸取了一攻高丽作战的教训，比较注意发挥诸将指挥作战的积极性。为此，二攻高丽伊始，杨广便一改首攻高丽时统军过死的作法，明令给诸将“以便宜从事”的机断指挥之权。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统军将领的主观能动性，去夺取更多的战果。二是从敌情实际出发，注意运用多种攻城的技术战术。围攻辽东之初，杨广命令诸将采用多种攻城器械和地道战术，昼夜不停地四面攻城，虽未立即破城，但却给高丽守军以较大消耗和杀伤。其后，杨广又根据攻城作战的特点，堆筑鱼梁大道和制作八轮楼车，作为攻城的辅助技术条件，致使高丽守军即刻陷入危蹙不利的态势。倘若不是杨玄感起兵作乱于内，那么，攻克辽东城将是指日可待之事。

---

①②③④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六月。

四、炀帝第三次进伐高丽

（一）炀帝下诏三征高丽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初三，杨广诏命文武“百僚议伐高丽”①。然而，诏下数日，竟“无敢言者”②。这说明，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大多数人，对杨广三攻高丽的动议，是持反对的态度。此种情况的出现，恰是其统治阶级内外危机不断加深的集中反映。此时，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几乎燃遍全国各地，严重地动摇着隋朝统治的基础，以杨广为首的统治集团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可是，穷兵黩武的杨广竟置隋朝内外危机于不顾，于二月二十日，下诏“复征天下兵”③；二十三日，再次下诏亲征，“分命六师，百道俱进”④，揭开了第三次进伐高丽的战争帷幕。

（二）卑奢城之战与高丽请降

大业十年三月十四日，杨广自博陵（治今河北定县）北赴至涿郡。各地隋军在向涿郡集结的途中不断逃亡，杨广虽以执杀相威胁，可士卒逃亡“而莫能止”⑤。四月二十七日，杨广进抵北平（治今河北卢龙）。时因天下大乱，朝廷所征之兵多失期不至，加之“在路逃者相继”⑥，故杨广在北平停留数月，才督军东进，于七月十七日抵达辽水西畔的怀远镇（今辽宁沈阳西南）。与此同时，隋军水师在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下，自东莱入海东渡至卑奢城（又称毕奢城，今辽宁旅大东北），高丽举兵迎战，隋军奋击破之，斩首千余。正当来护儿即将乘胜直趋平壤之时，高丽王高元因其内部困敝而惧，于是，遣使执送叛臣斛斯政⑦至辽东城下，

---

①②④《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年二月。

⑤⑥《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⑦ 斛斯政，本隋兵部侍郎，与杨玄感兄弟关系密切。大业九年随军东征高丽期间，因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阴谋活动，事发而畏罪潜逃至高丽。

"上表请降"①。杨广欣然准请，并立即遣使持节诏来护儿还军。八月初四，杨广自怀远班师，于十月初三至东京洛阳，二十五日，回到西京长安。杨广班师还朝后，仍徵高丽王入朝，但高元竟然不予理睬。杨广大怒，又令诸军整装以待，拟再讨高丽，但终因"天下大乱，遂不克复行"②。

从军事角度探讨，杨广三征高丽之战，虽因国内民众广泛起义和士卒反战逃亡的严重冲击，而使隋军呈现强弩之末势，但在高丽更加困敝不堪的情况下，来护儿卑奢城一战，竟迫使高丽王"上表请降"。然而，高丽的请降，并非真心归附，只不过是诈退隋军的一种缓兵之计。而"自负才学"③天下无比的杨广，对此却未能识破，竟下令班师还朝。当杨广派遣使者持诏命令来护儿旋师之时，来护儿始则"不肯奉诏"④，恳请乘"高丽困敝，野无青草"⑤之窘境，挥军东进，"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⑥。长史崔君肃对此竟以违诏治罪相威胁，迫使来护儿不得不奉诏还军，从而使隋军失去了进击高丽并取得更大军事胜利的良机。

五、进伐高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杨广即帝执政以后，"负其富强之资"⑦，从大业八年至十年，接连向高丽进行三次大规模征伐，企图使高丽完全俯首听命，岁岁朝贡不绝。然而，战争实践的结果则与杨广的主观意愿相反，隋朝不但损兵耗资，"三征不克"⑧，而且导致国内严重政治危机，使隋王朝步入衰亡之途。此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刻原因和教训的。

---

①④⑤⑥《隋书》卷六十四《来护儿传》。

②《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

③《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

⑦《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评语。

⑧《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首先，政治上的不得人心，是造成隋军进伐高丽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隋朝进伐高丽的战争企图，始于文帝开皇之末，带有对高丽邀靺鞨之众袭掠隋辽西郡进行反击和惩罚的性质。当时，“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①；而炀帝杨广鉴于高丽曾邀靺鞨袭隋辽西郡，认为高丽对隋怀有二心，他即位伊始，不但“潜有取辽东之意”②，而且凭借隋朝强大的国力，终于把进伐高丽的战争推上了历史的日程。杨广进伐高丽之战，虽然具有封建王朝上升时期拓边固防的性质，但置国情民意于不顾，倾注全力地接连发动大规模战争，势必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危害。事实上，由于统治阶级在战争准备与实施的过程中，“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③，所以，这场战争一开始，就遭到隋朝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遭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而这恰是导致杨广“三驾辽左”④无功而还的基本因素。三伐高丽的战争，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不仅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激起民众普遍起义，而且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造成隋朝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此种内外交困的动荡局面，便把隋王朝推向了覆灭的边缘。诚如唐代史学家魏徵所深刻指出的，杨广“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⑤。

其次，战争指导上的重大失误，是导致隋军进伐高丽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进伐高丽的战争，虽是在经过长期较为充分筹划和准备的基础上发动的，但由于杨广战争指导的不力，而造成隋军实战的失利。综观三次进攻作战的全过程，可以明显看出，杨广在战争指导上的重大失误，主要有以下四点：

---

① 《隋书》卷七十五《刘炫传》。

② 《隋书》卷七十四《元弘嗣传》。

③④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评语。

⑤ 《隋书》卷八十一《高丽传》史臣评语。

第一，庞大的水陆兵力与后勤供应难以确保之间的矛盾，乃是导致隋军失败的首要因素。

第一次进伐高丽之战，杨广调集水陆大军113万余人，号称200万；而动用担负军需运输的民工，则是兵力总数的两倍，即226万余人。第二、三两次进伐高丽之战，出动的兵力和民工数，均大体与首攻高丽时相当。《通典》卷七《食货志七》明确载称：杨广"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运者倍之。"据此可知，隋朝三次进伐高丽的战争，累计使用兵力约为340万，民工约680万，两项累计约1020万人。在战线过长、交通不便、连年用兵的情况下作战，怎样确保如此众多作战部队的军需供应，乃是保证作战胜利的重大问题。为此，杨广除下令士卒每人自带一定数量的米粟外，主要采取征调倍于作战部队人数的"馈运者"，征用大批船只和车辆运送资粮。其中，仅征调的鹿车（小车）夫多达60余万人，每2人推挽1辆鹿车，载米3石。由于道途险狭遥远，车夫自身食用消耗过大，待运到前线时，已经"不足充糇粮"①，军粮物资难以保障，军心士气势必动摇。首攻高丽作战的失败，特别是宇文述等九军的惨败，"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② 是很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见，尽管杨广为了解决庞大作战部队的军需物资问题，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隋军的后勤供应始终未有可靠的保障。而要使资粮匮乏的隋军作战部队保持高昂的军心士气，去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战略打击方向选择得不正确，战役战斗上缺乏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这是导致隋军失败的重要因素。

在战略上能否正确地选择既是敌人的要害、又是敌人的薄弱部位（或环节，或地段），作为隋军的基本打击方向，并且根据敌情实际，采取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战术，这是关系到进伐高丽之战能否取胜的关键。恰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暴露了杨广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六月。

主观指导上的低能。早在首攻高丽的进军途中，兵部尚书兼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在其病笃弥留之际，曾上表杨广建议说："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① 段文振的上述建议有两个值得肯定的基本指导思想：其一是以高丽的首都平壤为隋军的根本进攻目标，只要集中兵力攻陷平壤，那么，其余诸城便不攻自破；其二是为了达成"倾其本根"的战略企图，必须采取"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的以奇取胜的速战速决战术。这样，既可避免秋雨的艰阻，又可缓解粮竭的困扰。显而易见，此一建议乃是从敌我双方和天候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提出的较为符合实战需要的制胜之策。然而，"自负才学"天下无比的杨广竟不采纳，却督令隋军主力按部就班地围攻辽东城。高丽守军凭据坚城，采取诈降误敌之战术，迫使隋军久攻不克，顿兵坚城之下而无所施策。其后，虽有宇文述等九军南下之举，却因自身师老兵疲、军粮竭尽，以及来护儿水师孤军进攻平壤之败，而使隋军终于丧失了水陆会攻平壤的有利时机。倘若杨广最初以部分兵力进攻和箝制辽东高丽守军，以主力疾速南下，以水师密切配合，采取速决制胜之策，那么，攻取平壤、战胜高丽，不是没有可能的。

第三，隋军行军缓慢和消耗过重，水陆两军缺乏密切协同，这是导致隋军失败的又一因素。

杨广将百余万隋军编为三十军，其中，遂行作战任务的为左、右二十四军，担负御营守卫任务的为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从涿郡出发，每日发一军，每军相距四十里，历时月余，三十军始发完毕。行进中的隋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②，旌旗飘荡，绵亘千里。由于千里行军，长途跋涉所带来的疲惫和消耗，及

① 《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正月。

至前线之时，部队战斗力已经锐减。十分明显，此种徒有“近古出师之盛”[1]虚名的作战编成和行军序列，根本不适合野战条件下的作战需要。杨广策划进伐高丽的战争，虽然采取的是水陆并进的进攻战略，但由于战线过长，通讯不灵，指挥失当，致使陆师长期顿兵于辽东而不能南进，水军不待诸军俱至而贸然轻进，水陆两军互不协同，孤自为战，对高丽始终没有形成合力而强大的总体进攻之势。因此，尽管杨广最初设想以“总集平壤”[2]为其进伐高丽的总战略目标，然而，最终却以其错误的主观指导，而化为泡影。

第四，杨广统军御将过死，严重压抑诸将组织指挥才能的充分发挥，也是导致隋军失败的一个因素。

隋军三次进伐高丽之战，杨广是以最高军事统帅率兵亲征的。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的皇权之威，他在进伐高丽之前，就明令告诫诸将说：“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3]杨广的这一命令，表面看似乎是在强调统一指挥和战场纪律，而实际上则是违背战争的客观实际的一种主观主义规定。实践的结果表明，杨广的这个规定，就像一条绳索捆住了诸将的手脚，严重地妨碍他们作战指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致使多次陷城歼敌的有利时机，失之于“奏闻待报”的往返过程之中，而这恰恰给高丽守军采取诈降手段重整守备，“随出拒战”，提供了时间和条件。首战高丽，隋军之所以久攻辽东而不克，直接原因即在于此。二攻高丽，杨广虽能汲取教训，改变统军御将过死的作法，给诸将“以便宜从事”的指挥之权，但却因为杨玄感起兵作乱，而终致围辽之战未果。

---

①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五月。

第五章 隋末农民大起义与隋王朝的灭亡

隋文帝杨坚建国以后，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劳动，在二十几年间，便把隋朝建设成为当时世界上比较繁荣富强的封建国家。然而，到了隋炀帝杨广执政时期，特别在其统治后期，由于内施横征暴敛、外行穷兵黩武，致使隋朝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急剧激化，而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参见附图 5），摧毁了以炀帝为首的隋朝腐朽政权。

第一节 隋末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

隋朝自建立至灭亡，仅历 38 年，可谓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短命王朝。其得失存亡之情，"大较与秦相类"①。唐太宗李世民在与臣下讨论治国之道时，曾经指出："隋炀帝岂为甲仗不足，以至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② 可以认为，这大体上揭示了隋亡于炀帝的基本缘由。因此，从史载杨广执政以来违背国情民意的种种暴行，便可清楚了解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社会背景及其不可避免性。

隋炀帝杨广是文帝杨坚的次子，他是靠搞阴谋而当上皇帝的。他 13 岁时被封为晋王，先后担任并州总管、河北道和淮南道行台

---

① 《隋书》卷七十《列传第三十五》传末史臣评语。

② 《贞观政要》卷五《仁义第十三》。

尚书令等要职。灭陈战争中，他担任隋军行军元帅，战绩颇著。杨广随着自身职权的不断扩大，他一心想当皇帝的欲望也在日益膨胀。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广串通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采用“内外喧谤”① 的阴谋手段，促使杨坚废掉太子杨勇，首先夺得太子之位。仁寿四年（604年），又与杨素、右庶子张衡等人合谋杀害了卧病中的隋文帝②，而终于夺到了帝位。杨广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改变了文帝时期所行的各种富国利民之政策，推行了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暴政，把一个比较安定、繁荣的隋朝社会，搞得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杨广所行暴政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恶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徭役频兴，民不堪命

隋炀帝杨广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封建暴君之一。对内横征暴敛，连年大兴徭役，置劳动人民疾苦于不顾，乃是杨广内施暴政的突出方面。在其残酷统治之下，广大劳动人民除要完成隋朝政府法定的成丁岁役20日之外，还要承担炀帝恣意兴起的各种徭役和兵役。从仁寿四年（604年）杨广即帝时起，至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进攻高丽止，在8年时间里，杨广所兴的大规模徭役和兵役，史有明确记载的达22次之多③。尽管所兴之役，如开运

---

① 《隋书》卷四十五《房陵王杨勇传》。

② 据《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注引马总《通历》载称：“上（文帝）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是时，唯太子（杨广）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杨广与杨素等人谋杀杨坚之事，又见于《隋书》卷三十六《宣华夫人陈氏传》。

③ 参见胡如雷：《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载于中华书局《文史》第十一辑，1981年3月版。

河、修道路、筑长城等类工程，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开发边疆有积极作用，但综观杨广统治时期的各种徭役，确有不少是为了满足其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需要而兴。连年不断的徭役，不仅浪费了大批劳动力，而且给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例如，大业元年（605 年）三月，杨广即帝不满 1 年，就下令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负责营建洛阳新都。此项工程包括修建显仁宫和西苑等附属配套工程项目，历时 10 个月竣工①，以“每月役丁二百万人”②计算，前后累计役丁不下 2000 万人次。由于工程规模大、工期紧、劳役重，致使服役民工“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今河南巩义东北），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车相望于道。”③可见，死于营建洛阳之役的民工，至少数百万之多。如此惨状，史所罕见。又如，大业三年（607 年）七月，杨广征调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死者十五六。”④ 次年正月，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⑤。由于连年征役，劳动力死亡过巨，“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⑥。

杨广统治时期，大兴土木，“劳役不息”⑦，造成“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⑧的凄惨社会局面，这无疑是导发农民起义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

① 据《隋书·炀帝纪上》、《北史·隋本纪下》和《资治通鉴》卷一八〇载称：大业元年三月始“营建东京”，次年正月“东京成”。可见，营建东京洛阳及其附属配套工程，历时 10 个月竣工。今人研究者有的根据《隋书·裴矩传》所载：“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误以为营建东都整个工程的工期为“九旬”即三个月。实际上，所谓“九旬而就”，本指裴矩“职修府省”这一专项工程的工期，并非指整个工程包括附属配套工程的完成时间。

②③⑥⑧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 《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

⑤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⑦ 《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

二、穷奢极侈，挥霍无度

隋炀帝杨广不惜民力，大兴土木，其主要目的无非是为了满足以他为首的隋朝封建统治集团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在杨广执政的13年中，“无日不治宫室”①，先后动用大批民力，修造了显仁宫、天经宫、汾阳宫、晋阳宫、临朔宫等大型豪华的宫殿；从长安至江都，沿途所建离宫多达四十余所。而所有这些建筑，都极尽奢华铺张之能事。在营建东京洛阳之初，杨广虽在诏令中提出“今所营构，务从节俭”②，但实际建筑却是不计工本，“穷诸巨丽”③的。杨广为满足自己“雅爱宏玩，肆情方骋”④的奢侈需要，他下令“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⑤。修建西苑，这是营建东京总工程中的重要附属配套工程之一，是专供杨广及其统治集团寻欢作乐的场所。该苑位于新都洛阳之西，“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雕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竞以肴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⑥建筑如此规模巨大而又穷极华丽的皇家园苑，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和物力！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四年三月。

②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④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元年三月。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元年五月。

“每岁巡幸”①。这是隋炀帝杨广穷奢极侈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杨广自称帝以来，即以“观风问俗”、“忧勤兆庶”② 为名，几乎每年都要外出巡游。他这样做，虽然也为了安辑地方、巩固统治，但也确实存有显威夸富、游山玩水之目的。这一点，在其三幸江都的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自大业元年（605 年）八月十五日开始的一幸江都之游，往返历时 8 个月。为了这次巡游能够成行，杨广先于三月遣人赴江南采木，制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种型号的舰船数万艘。据估算，此次所造船只“至少也不会少于二、三万艘”，所用资费“当合庸绢六千七百余万匹”，所用人力“当共役丁匠九百五十七万余人”。③ 可见，仅此一次造船之役而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何等巨大！至于巡游过程中的奢华之盛、靡费之大，更是十分惊人。据《大业杂记》记载，随同巡游江都的有“骑兵翊两岸二十余万……别有步骑十余万，夹两岸翊舟而行”，再加上“挽船士八万余人”④，那么，巡游中所动用的兵力和役丁，“合计当在五十万人左右”⑤。杨广一幸江都之游，其“舳舻相接，二百余里”⑥，如此庞大的船队，沿途“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⑦。大业六年（610 年）三月，杨广再游江都，下令营建江都宫，命以王世充领江都宫监。大业十二年（616 年）七月，杨广为躲避农民起义的打击而三幸江都时，因先前所用龙舟水殿皆焚于杨玄感兵变，故又“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度仍大于旧者”⑧。总之，杨广三幸江都之游，因追求享受、讲究排场所造成的巨大耗资和浪费，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

① 《隋书》卷二十三《五行志下》。

②⑥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③⑤ 见胡如雷：《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

④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元年八月。

⑧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一年十月。

盛治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这是杨广穷奢极侈生活的又一表现。大业二年（606年）二月，杨广诏命由尚书令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大将军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等人负责制造车舆仪服。为此，下令“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毦者，皆责焉”①。由于官府搜刮急迫，朝命夕办，平民百姓不得不网罟遍野，四处捕求，以至“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②，被迫出高价“买于豪富蓄积之家”③而上交官府。致使羽毛之价暴涨，“是岁，翟雉尾一，值十缣（一种双丝的细绢），白鹭鲜半之”④。可见，杨广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仪和排场，而强行盛治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的作法，给民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经济负担。隋朝政府从百姓那里搜刮了大量骨角齿牙、皮革羽毛之后，杨广责令由太府少卿何稠督役工匠制成“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⑤，送往江都供其寻欢作乐。仅制造车舆仪服一项，即动用“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⑥，其耗资浪费之大，可见一斑。

夸富于外，大肆铺张。杨广即帝之后，经常在东京洛阳举办演奏散乐百戏和盛大饮宴活动，向来朝的外国使者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夸示隋朝的富有和强盛。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来朝，杨广“欲以富乐夸之”⑦，于是，“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⑧，于西苑积翠池畔大演百戏。史载开场之后，“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腾过，左右易处。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⑨。其场面之盛，热闹之烈，“旷古莫俦”⑩。自此以后，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都要“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

①②③④《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⑥《隋书》卷六十八《何稠传》。

⑦⑨《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炀帝大业二年十二月。

⑧⑩《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①；歌伎舞女多达3万人，皆身着锦绣缯彩，致使“两京缯锦，为之中虚”②。大业六年（610年）正月，为款待来朝“大献方物”③的诸蕃酋长，杨广乃于洛阳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④可见，挥霍浪费之大，“振古无比”⑤。

以上所述，仅是炀帝杨广及隋朝统治集团穷奢极侈生活的几个侧面。为了确保其挥霍浪费的财源不竭，隋朝政府对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压榨政策，“租赋之外，一切征敛”⑥。即使如此横征暴敛，也满足不了他们挥霍无度之需要，因而“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采取各种手段，大肆搜刮，中饱私囊。诚如史载所揭露的：“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⑧在隋朝封建统治集团苛暴的赋役和残酷的榨取之下，广大人民已处于“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⑨的悲惨境地。这是导致隋末农民起义爆发的又一重要原因，“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⑩。

三、恃强好战，穷兵黩武

隋炀帝杨广在其执政的十余年间，为了巩固和扩大隋朝的封建统治，几乎连年发动战争，特别是在其统治后期，接连三次对高丽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所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与破坏，是有隋以来最为严重的。大业七年（611年）二月，杨广为了准备进

---

①②③④⑤ 《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

⑥⑧⑩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⑦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旧唐书·李密传》则载称：“逆折十年之租”。

⑨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攻高丽这场战争，他派遣木工监元弘嗣前往东莱监造战船。由于官吏督役严酷，动辄捶楚，造船工匠、役丁被迫昼夜立于水中赶造战船，而不敢略作休息，致使他们“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①。接着，杨广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征兵，并强行征调大批民工担负作战物资的运输任务。到大业八年（612年）正月，杨广首攻高丽之前夕，调集总兵力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强征民工二百二十六万余人。隋军一攻高丽遭到惨败之后，杨广非但没有接受教训，息兵止攻，反而变本加厉，接着又于大业九年、十年，连续两次进攻高丽。杨广先后三次进攻高丽之战，累计动用兵力达三百四十余万，民工六百八十余万，两项累计千余万人。沉重的兵役和徭役，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困苦和灾难。以一攻高丽为例，仅江、淮以南地区被征发运送军粮兵械的民船，就相次连绵千余里，每天往返运输在路的民工达数十万人之多。他们“填咽（拥挤）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②。从陆路向泸河、怀远二镇运米的六十余万鹿车夫，由于路途遥远险狭，自身消耗过大，到镇已无粮可交，因之“皆惧罪亡命”③。而前线作战部队，因严重缺粮，加之战斗减员，“士卒死亡过半”④。可见，进攻高丽的战争所直接带给兵士、征夫的灾难，是何等惨重！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无休止的战争给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三次进攻高丽之战，累计千余万壮年劳力被征投入残酷的战争，导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⑤，社会生产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人民群众过着“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⑥的悲惨生活。加之水旱灾情不断，官府横征暴敛，地主巧取豪夺，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

---

① 《隋书》卷七十四《元弘嗣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七月。

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⑥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离失所，“转死沟壑，十八九焉”①；“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②。一个在文帝末期呈现“国家殷富”③的隋王朝，到了炀帝统治后期，竟变成田园荒芜、“死人如积”④的悲惨社会。隋末农民大起义正是在此种形势下爆发起来的。

四、内讧迭起，统治不稳

杨广是靠搞阴谋而被立为太子和登上皇帝宝座的。因此，从其上台伊始，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就蕴藏着分裂的危险因素。早在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随着太子杨勇的被废和杨广被立为太子，而日趋尖锐。蜀王杨秀（杨坚之四子），对于杨广阴谋夺得太子之位“意甚不平”⑤；而杨广为防“秀终为后变，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⑥。怂使文帝杨坚将蜀王杨秀废为庶人并软禁于内侍省不得外出，“与相连坐者百余人”⑦。汉王杨谅（杨坚之五子）见蜀王秀被废，“尤不自安，阴蓄异图”⑧，且以并州为基地（时谅任并州总管），“大发工役，缮治器械，招集亡命”⑨，伺机而动。仁寿四年（604年），杨谅乘文帝故去、杨广初即帝位之际，“遂发兵反”⑩，而“从谅反者凡十九州”⑪。杨广急忙派遣杨素率领大军围攻，杨谅几经作战，最后穷蹙不支而降，被“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⑫；而其所属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余万家”⑬。这场围绕皇权继承人问题的皇室内讧，突出地反映了隋王朝统治集团高层矛盾斗争的白热化。这场斗争虽以杨谅及其支持者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深深埋下了杨广政权严重不

---

①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评语。

② 《隋书》卷七十《杨玄感传》。

③④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⑥⑦ 《隋书》卷四十五《杨秀传》。

⑧⑨⑪⑬ 《资治通鉴》卷一八〇《隋纪四》，文帝仁寿四年八月。

⑩⑫ 《隋书》卷四十五《杨谅传》。

稳的种子。

杨广是中国古代肆虐成性的封建暴君，这不但表现在他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也表现在他对臣属的骄横暴虐。杨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的十余年统治中，他一贯“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①。因此，在其治下为官而“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②。其中，号称“先皇心膂，参谋帷幄”③的高颎、贺若弼，“藩邸惟旧，绩著经纶”④的张衡、李金才等人，就是在杨广“或恶其直道，或忿其正议，求其无形之罪，加以刎颈之诛”⑤而先后丧生的。杨广对朝臣的骄横猜忌和恣意虐杀，这无疑是导致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业九年（613 年），礼部尚书杨玄感的起兵反隋，便是隋王朝统治集团进一步分裂的集中体现。杨广虽然调兵遣将把杨玄感镇压下去，但却永远无法弥合隋朝政权因内部激烈斗争所造成的裂痕深沟。隋末农民大起义又是在以炀帝为首的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　农民起义的爆发及其发展壮大

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隋朝封建统治阶级层层的压迫和剥削，终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早在大业六年（610 年），东京洛阳即爆发了一次民众徒手起义事件。是年正月初一，有几十个“素冠练衣，焚香持华”的民众，“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⑥，夺取了守门卫士手中的兵仗，准备攻打皇宫，不幸被杨广之子齐王杨暕率兵赶到所镇压。同年六月初二，有雁门（治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尉文通“聚众三千”⑦据莫壁谷而起义；十二月初五，又有朱崖（治舍城，今海南琼山东南）人王万昌举兵起义。这一北

①②③④⑤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⑥⑦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一南两次起义，虽然都遭到隋军镇压而先后失败，但在同一年里，继洛阳数十壮士徒手夺械反隋之后而举行武装起义，这本身就预示着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有如箭在弦上，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一、山东、河北农民起义的爆发

大业七年（611 年），正当隋炀帝杨广加紧实施进攻高丽的战争准备之时，邹平（今山东博兴西南）人王薄聚众于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而起义，揭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王薄率众举义后，“自称知世郎”①，并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曰：“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② 公开反对杨广进攻高丽的战争，号召被强征入伍的民众勇于参加起义队伍。于是，“避征役者多往归之”③，使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在这支起义军的影响下，又有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窦建德和孙安祖入据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鄃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聚众于河曲（在今山东夏津至河北清河间）、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北）相继起义。在此前后，有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翟让与徐世勣等人于瓦岗寨聚众起义。此外，还有平原郡（治安德，在今山东陵县）富豪刘霸道起兵于豆子䴚（在今山东惠民县境），远近民众多来投依，有众十余万，号称“阿舅军”。义军攻城陷邑，处决贪官污吏，给隋朝地方封建势力以严重打击。杨广虽令隋军与地方官府联合追捕，“然莫能禁止”④；以农民为主要参加者的武装起义斗争，在山东、河北（当时指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山东、河北及河南的一部）各地风起云涌，蓬勃发展起来。

---

①③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② 杨慎：《古今风谣》。

隋末农民大起义之所以首先在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自北魏以来，山东、河北始终是士族豪门剥削压榨最重，因而导致阶级矛盾尖锐激烈的地区。北齐时期，由于士族豪门势力的残酷剥削和肆意掠夺，山东、河北地区出现了“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① 的严重局面。有隋以来，士族豪门势力虽已趋于衰落，但他们仍然官居地方，拥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因而，这里长期所形成的强弱相凌、贫富悬殊的严重对立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就是隋末农民大起义首先在山东、河北地区爆发的重要历史根源。隋炀帝杨广推行暴政，这里又是受其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大业七年，山东、河南发生特大水灾，“漂没四十余郡”②。在如此严重灾荒之下，杨广竟置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死于不顾，强行将这里作为进攻高丽的人力、物力供应基地，这就进一步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渊。人民群众在“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③ 的情况下，为了争得起码的生存条件，只有奋起反抗，而别无其它出路。可见，杨广的残暴统治及其发动对高丽的战争，乃是造成隋末农民大起义首先在山东、河北爆发的直接现实原因。

大业八年（612 年）七月，杨广首次进攻高丽的战争遭到失败以后，他不但没有接受教训，收敛好战之心，相反，却变本加厉地进行二攻高丽的战争准备，于大业九年（613 年）正月，下令“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④；三月，他亲率大军东征，再次进攻高丽。杨广这一不得人心的战争行动，激起广大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从是年正月至六月，山东、河北的农民起义斗争，已由局部地区迅速扩展到全境。除王薄、高士达、张金称等起义

---

① 《通典》卷二《食货志二·田制下》。

②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④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军继续开展斗争外，陆续起义的还有平原的杜彦冰、王润、李德逸、郝孝德，济北（治卢县，今山东长清西南）的韩进洛、甄宝车，济阴（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南）的孟海公，北海（治益都，今属山东）的郭方预，齐郡（治历城，今山东济南）的孟让，河间（治河间，今属河北）的格谦，渤海（治阳信，今山东阳信西南）的孙宣雅，等等。上述诸路起义军，“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①。他们攻城拔邑，所向披靡。腐败不堪的隋朝地方官兵，每与义军接战，便“望风沮败”②。在此期间，其它地区起义的还有灵武（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的白榆妄（一作“白榆娑”）率领牧奴举义，号称“奴军”。他们活动于陇右地区，“劫掠牧马”③，攻杀隋官；杨广虽遣将军范贵率兵进讨，但却“连年不能克”④。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大业七年王薄领导的长白山农民起义的爆发，到大业九年六月农民起义斗争扩展到山东、河北全境，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农民起义斗争不仅由局部地区迅速扩展到山东、河北全境，而且呈现逐步向全国发展的趋势。起义队伍比较分散，尚未联合形成较强的力量，其斗争所向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他们虽然也攻打郡城县邑，但多为“大掠而去”⑤。义军的斗争虽给地方官吏、地主以很大打击，但对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还未形成严重威胁。因此，在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形势下，杨广除“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⑥外，并没有引起严重注意，仍把主要精力和力量用在进攻高丽的战争上。这一点恰为农民起义的进一步发展壮大，造成了有利时机和条件。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三月。

③④⑤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⑥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二、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与三大起义力量的形成

大业九年六月，正当杨广督军围攻辽东作战紧张之际，礼部尚书杨玄感等人于黎阳起兵反隋，围攻东京洛阳。七月，余杭（治钱唐，今浙江杭州）地主刘元进见天下已乱，遂举兵响应杨玄感；接着，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西南）人朱燮、晋陵（今江苏苏州）人管崇亦举兵响应，“共迎元进，奉以为主”①，成为一支“众至十万”②而活动于江浙地区的地主武装③。杨玄感及其响应者刘元进等武装力量，虽然先后被隋军镇压而归于消灭，但其起兵反隋乃是继隋朝宗室汉王杨谅起兵之后又一重大事件，它标志着隋朝统治集团的进一步分裂，这不仅严重动摇了杨广封建集权统治的政治基础，迫使其二攻高丽无功而还，而且也为全国范围内农民起义的蓬勃发展，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时机，从而使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农民起义已从山东、河北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大起义，黄河南北、淮南江表、河东关陇、闽浙岭南，全国到处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经过斗争的实践锻炼，农民起义军已开始由分散作战逐步走向联合行动；他们进攻的矛头所向，不仅由乡村逐渐转向城邑，而且相继称王称帝建立政权，充分表明了这场起义斗争是以推翻隋朝黑暗统治为基本目标的。

大业九年八月以后，各地农民起义斗争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蓬蓬勃勃。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信安（治高要，今广东肇庆）陈瑱等人率众3万“攻陷信安郡”④；济阳吴海流、东海（治朐山，今江苏连云港东南）彭孝才同时举兵起义，有“众数万”⑤；

---

①② 《隋书》卷七十《刘元进传》。

③ 参见胡如雷：《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

④⑤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苍梧郡（治封川，今广东封开东南）梁慧尚“率众四万，陷苍梧郡”①；东阳（治金华，今属浙江）李三儿、向但子举兵起义，“众至万余”②；东郡（治白马，今河南浚县南）吕明星率兵数千攻打该郡城；扶风（治雍县，今陕西凤翔）向海明自称弥勒佛转世，受到当地民众信奉，因之举兵反隋，“众至数万”③，并自称皇帝，建元白乌；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杜伏威和临济（位于章丘西北）辅公祏聚众起义，伏威自称将军，后率军南下转战于淮南地区。随着全国农民起义形势的蓬勃发展，最早于山东、河北起义的几支农民军，也有很大发展。其中，王薄、孟让等义军已发展到十余万人，他们“据长白山，攻剽诸郡”④；清河张金称也有众数万；渤海孙宣雅自称齐王，河间格谦自称燕王，两支义军队伍有“众各十万”⑤。

大业十年（614 年）二月，杨广下令“复征天下兵”⑥，发动了第三次进攻高丽的战争，激起更多民众和兵士的强烈反抗，从而把隋末农民起义斗争推向更加广阔的范围。是年二月，扶风唐弼聚众 10 万人起义，拥立李弘芝⑦ 为天子，自称唐王。四月，彭城（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张大彪率众数万据悬薄山起义。五月，宋世谟⑧ 率众起义，攻陷琅邪郡（治临沂，今属山东）；延安（治肤施，今陕西延安东北）刘迦论据郡起义，“有众十万”⑨，自称皇王，建元大世。六月，郑文雅、林宝护等率众 3 万起义，攻陷建安郡（治闽县，今福建福州），击斩太守杨景祥。自十一月以后至年底，又有司马长安率众破长平郡（治丹川，今山西晋城东北）；离石（治离石，今属山西）胡人刘苗王率众数万起义，自称天子，

---

①②④⑤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九年十二月。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年二月。

⑦ 李弘芝，《隋书·炀帝纪下》作“李弘”，今从《资治通鉴》说。

⑧ 宋世谟，《隋书·董纯传》作“宗世谟”，今从《隋书·炀帝纪下》说。

⑨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年五月。

以其弟六儿为永安王，隋朝将军潘长文率兵进讨而“不能克”①；汲郡（治卫县，今河南浚县西南）王德仁拥众数万据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县境）起义；齐郡左孝友率众10万起义；孟让则率义军10万自长白山南下，转战至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占领都梁宫（位于今江苏盱眙西南），“阻淮为固”②。

在日益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以炀帝为首的隋朝统治集团始感形势不妙。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挽救隋朝封建统治，杨广一面继续敕令各地隋军加紧围攻起义军，一面“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③，企图以此切断民众与义军的联系，实现其困毙和消灭起义军的目的。然而，杨广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农民起义继续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推向全国。

大业十一年（615年）二月，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杨仲绪率众万余攻打北平郡（治卢龙，今属河北），但为隋军所败而牺牲。接着，上谷（治易县，今属河北）王须拔举兵起义，自称漫天王，国号曰燕；魏刀儿自称历山飞，拥“众各十余万”④，于河北燕、赵地区开展斗争。五月，司马长安率众自长平北进，攻破西河郡（治隰城，今山西汾阳）。七月，淮南（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张起绪举兵起义，“众至三万”⑤。十月，彭城魏骐驎率众万余，攻打鲁郡（治瑕丘，今山东兖州）；卢明月“聚众十余万”⑥，转战于河南陈（即淮阳郡，治宛丘，今河南淮阳）、汝（即襄城郡，治承休，今河南临汝）之间；东海李子通率领义军南下渡过淮河，进攻江都（治江阳，今江苏扬州），自称楚王，建元明政。十一月，上谷王须拔率领义军南下攻克高阳郡（旧称郡，治高阳，今河北高阳东）。十二月，绛郡（治正平，今山西新绛）敬盘陀、柴保昌等聚众数万起义，杨广虽命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前往镇压，但

---

①④⑤⑥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② 《隋书》卷六十四《陈稜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帝大业十一年二月。

却“经年不能破”①。

大业十二年(616年)正月，杨广举行一年一度的元旦大朝会，此时由于农民起义已经席卷全国，致使“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②。为此，杨广决定分遣使者到各地调兵进剿起义军。当杨广向侍臣询问农民起义情况时，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骗他说起义大大减少，不抵过去的十分之一；纳言苏威却认为起义大有日趋逼近之势，并据实报告杨广说：“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今河南荥阳西北）。且往日租赋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不时翦除。又昔在雁门（今山西代县)，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③而宁信谎言、不听实话的隋炀帝，在听了苏威一席如针刺背的实话之后，十分不高兴，不久竟找借口将苏威“除名为民”④。然而，谎言毕竟掩盖不住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是年正月，雁门翟松柏于灵丘（今属山西）起义，聚“众至数万”⑤，转战于周围各县。二月，东海卢公暹率众万余据苍山（今山东临沂东）而起义。三月，张金称率兵攻克平恩（今河北曲周东南），继陷武安（今属河北）、钜鹿（今河北巨鹿北）、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诸县。四月，魏刀儿部将甄翟儿率众10万进攻太原（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打败前来进剿的隋军，击斩隋将潘长文。七月，李子通进据海陵（今江苏泰州)，左才相转攻淮北，杜伏威进屯六合（今属江苏），皆有“众各数万”⑥。八月，赵万海率“众数十万”⑦自恒山（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南）北上，进攻高阳（今河北高阳东）。九月，东海杜扬州、沈觅敌等人举兵起义，“众至数万”⑧；安定（治安定，

① 《隋书》卷六十三《樊子盖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正月。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五月。

④ 《隋书》卷四十一《苏威传》。

⑤⑦⑧ 《隋书》卷四《炀帝纪下》。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

今甘肃泾川西北）荔非世雄杀死临泾县令起义，自号将军。十月，翟让领导的瓦岗农民军已发展到万余人。十二月，鄱阳（治鄱阳，今江西波阳）操师乞① 自称元兴王，建元始兴，率领义军攻陷豫章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以其同乡林士弘为大将军；后操师乞在与隋将刘子翊的作战中不幸中矢阵亡，林士弘代统其众，于彭蠡湖（今鄱阳湖）击斩刘子翊，义军队伍迅速扩展"至十余万"②。不久，林士弘自称皇帝，国号为楚，建元太平，并率兵先后攻取了九江（治湓城，今江西九江）、临川（治临川，今属江西）、南康（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宜春（治宜春，今江西宜春东）等郡，各地豪杰争杀隋朝守令以郡县应之，自此，"北至九江，南洎番禺（即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悉有其地"③。

全国性农民起义的蓬勃发展，给隋王朝统治以沉重打击，使以隋炀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惊恐万状。大业十二年四月间，东京洛阳之大业殿失火，杨广以为是农民军打进皇宫，吓得慌忙逃入西苑，藏匿于野草丛中，待火扑灭后才敢还宫。自此以后，杨广"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④。七月，面对燃遍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烈火，杨广虽然如坐针毡，日夜不安，但他却不听臣下"还京师，安兆庶"⑤ 之谏，而决定以越王杨侗（杨广之孙）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洛阳，自携后妃及文武随员至江都，企图寻求安全之所。杨广弃离东京洛阳这一事件，既充分反映出日趋发展的隋末农民起义斗争的强大威势，又集中说明了隋朝统治实际已经开始走向崩溃。到大业十三年初，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经过长期艰苦奋战和在斗争中逐步组合，形成了以翟让、李密为领导的瓦岗农民军、以窦建德为领导的河北农民军和以杜伏威、辅公祏为领导的江淮农民军等三支强大的农

---

① 操师乞，《隋书·炀帝纪下》作"操天成"。这里从《资治通鉴》说。

②③ 《旧唐书》卷五十六《林士弘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四月。

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

民武装。它们都建立了政权机构，各自为战，成为最后摧毁隋朝黑暗统治的中坚力量，从而标志着隋末农民大起义进入了一个以推翻隋朝封建政权为主要战略目标的新的斗争阶段。

第三节　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农民军的斗争

瓦岗农民军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三大主力之一。这支农民军起义时间最早，发展规模最大。由于它明确地把推翻隋朝黑暗统治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因而在斗争中逐渐发展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

一、翟让瓦岗起义与李密参加瓦岗军

瓦岗农民军是由翟让首先创建的。翟让，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自称“起陇亩之间”①。曾作过东郡法曹②，因犯法被捕入狱，后为狱吏黄君汉救出；约于大业六年至七年（610～611 年）间③，逃往韦城西南的瓦岗寨聚众起义。同郡单雄信、徐世勣（降唐后改名为李勣）等人各聚众前来归附。由于瓦岗起义的参加者多为“齐、济间渔猎之手，善用长枪”④，故这支义军骁勇能战，较周围其它义军更有战斗力。其后，翟让采纳徐世勣向“宋、郑两郡”⑤ 发展的建议，率众西出，进入荥阳（治管城，今

---

①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 法曹，隋制郡置执法之吏。

③ 翟让瓦岗起义的时间问题，历来其说不一。本书从漆侠《隋末农民起义》（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7 月第 1 版）说。

④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⑤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河南郑州）至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之间，于汴水之上截获往来官私商船物资，从而使义军得以“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①。正当义军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李密的前来投军，乃是促使瓦岗农民军的斗争走向新阶段的重大事件。

李密，本是隋朝贵族蒲山郡公李宽之子，多筹善算，抱负雄远。大业九年（613年），因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而被捕。不久，李密在被隋军押送途中施计逃脱，辗转而隐匿于淮阳郡（治宛丘，今河南淮阳）乡下，以教书为生。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李密在全国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的推动下，毅然决定北上投奔中原农民起义军。是时，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队伍，除了由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外，还有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王当仁、济阳（今山东曹县西北）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今河南杞县）李公逸等人领导的起义军。李密到达河南后，往来于上述诸路义军之间，“说以取天下之策”②，始则不为人们所信，交往既久之后，渐为义军所敬信。李密通过频繁的交往和认真观察，逐步认识到义军“诸帅唯翟让最强”③，于是，经王伯当引荐而参加了瓦岗军。

二、瓦岗军战略决策的制定

李密参加瓦岗军之初，义军中有的将领因李密是杨玄感的亡将，曾暗劝翟让杀害他，翟让便将其闲置于营外而不任用。但是，李密并没有因自己被冷遇而弃离瓦岗军，相反，他却通过王伯当积极“为让画策”④。鉴于瓦岗军声势日益壮大，李密及时建议翟让要积极发展义军力量，乘机推翻隋朝封建统治政权。李密认为，当今炀帝昏庸腐败，民众怨声载道，隋朝精兵尽在辽东，杨广委弃京都逃往南方，这正是义军奋起夺取隋朝政权的最好时机。为

---

①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

此，他激励翟让说："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① 翟让听了李密的建议之后，不仅对他疑忌骤逝，而且欣然予以采纳，从而为瓦岗军制定了以"诛灭暴虐"为政治目的，以"席卷二京"为进攻目标的战略决策。为了扩大瓦岗军的队伍，翟让在听了李密的建议之后，立即派遣李密为使相继说服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诸路小股义军，都联合到瓦岗军的旗帜之下。

三、进军荥阳地区的作战

（参见附图 6）

在制定了以推翻隋朝政权为政治目的的战略决策之后，应采取何种切实可行的战略步骤，来实现这一战略决策，这是摆在瓦岗军首领面前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为此，李密从义军兵多粮少、难以持久临敌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翟让作出了"直趣荥阳，休兵馆谷"② 的首战决策。荥阳既是隋朝的富粮地区，又是洛阳东出的屏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瓦岗军如能控制该地区，不仅可以解决义军的长期粮秣供应，进一步发展壮大义军力量，而且还可以此地区作为西取东京洛阳的前进基地。所以，由李密首议、翟让作出的"直取荥阳，休兵馆谷"的决策，便成为瓦岗军实现推翻隋朝政权斗争任务的一个首要战略步骤。

（一）大海寺诱歼张须陁军

大业十二年（616 年）十月，翟让、李密按照既定的作战计划，率领义军自瓦岗寨西出，向荥阳地区挺进。瓦岗军以迅猛攻势，首破金隄关（今河南荥阳东北），继陷荥阳周围诸县，直逼荥阳郡城。时荥阳太守、郇王杨庆（杨坚从祖弟杨弘之子）面对来势迅猛的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义军竟束手无策。有鉴于此，杨广只好另委齐郡（治历城，今山东济南）通守张须陁为荥阳通守率兵对抗瓦岗军。十月二十七日，张须陁率兵出城迎战瓦岗军。翟让因以往数为须陁所败，闻其来攻，有些畏惧，打算避而不战，但为李密所劝阻。李密对翟让说："须陁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① 按照李密的作战部署，翟让率部正面列阵待敌，密率千余人埋伏于大海寺（今河南荥阳东北）以北的树林中，企图采取诱敌入伏的战法，一举歼灭来犯之隋军。张须陁素轻翟让，交战时，勒兵"方陈而前"②，直扑义军正面；瓦岗军利用须陁骄狂轻进之心理，刚一接战，翟让即行后退。须陁误认义军畏战败退，遂挥军乘势向北追击十余里，恰好进入义军伏击圈内；李密乘其骄狂不备，立即"发伏自后掩之"③，隋军顿时败溃。李密乘胜挥军追杀，配合翟让及徐世勣、王伯当等部，将隋军四面包围，歼其大部，击斩隋将张须陁，其副将贾务本身受重伤，率残部五千余人逃往梁郡（治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不久死去。瓦岗军乘势进占荥阳城。

大海寺之捷，是瓦岗军自创建以来一次战果辉煌的军事胜利。此战不仅击斩了"勇决善战"、"号为名将"④ 的张须陁，沉重地打击了隋军的嚣张气焰，致"河南郡县为之丧气"⑤，而且极大地振奋了义军的军心士气，为瓦岗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基础。此战之胜利，既是在全国农民大起义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取得的，又是与李密根据双方实际情况，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分不开的。面对强敌来犯，李密不但毫无惧色，敢于斗争，且以非凡的胆识说服翟让利用隋军骄狂心理，采取佯败诱敌入伏的巧妙战法，一举创造了伏歼强敌大部的成功战例。

（二）袭取洛口仓之战

---

①③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

④ 《隋书》卷七十 ·《张须陁传》。

瓦岗军取得进攻荥阳作战的胜利之后，翟让见李密军事才能出众，“于是令密建牙，别统所部”①，号称“蒲山公营”。但在义军初战获胜的情况下，翟让却滋长了志满意足的思想情绪，他对李密说：“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唯公所适，让从此别矣。”②遂率辎重别密东行；李密无奈，只得与翟让作别，率部西行，尔后南下进至康城（今河南禹县西北），“说下数城，大获资储”③。不久，东行的翟让已经悔悟，遂引兵西行复与李密合军。

在瓦岗军重归统一以后，如何进一步实施灭隋战略计划，这是瓦岗军面临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时，炀帝杨广已离东京洛阳，居江都，洛阳由其孙越王杨侗留守。由于杨侗年轻不孚众望，“留守诸官政令不一，士民离心”④，致使东京洛阳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而这恰为瓦岗军西向进攻发展，提供了极好时机。有鉴于此，李密及时向翟让建议说：“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预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⑤李密的一席谋深虑远的分析，为翟让谋求新的发展，打开了思路。对于李密这一新的战略构想，翟让不但完全赞同，而且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请君先发，仆为后殿。”⑥于是，一个夺占洛口粮仓，开仓济民，壮大队伍，然后攻打洛阳，实现灭隋总战略目标的新的作战计划，就这样制定出来了。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初九，翟让与李密率领精兵7000

---

①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

④⑤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人出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向北，穿越方山（位于今河南登封北）后，自罗口（今河南巩义南）向东北方向进发，乘敌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袭占洛口仓。洛口仓，亦称兴洛仓，坐落于今河南巩义东北，建于大业二年（606 年），是隋朝最大的官方储粮仓城。该仓城周围 20 余里，内筑 3000 窖，每窖可储粮 8000 石，共计储粮 2400 万石；以每石 120 斤计算，共合 28.8 亿斤粮食。显而易见，洛口仓是隋朝政权赖以维持在中原地区统治的最大粮秣供应基地。瓦岗军袭占该仓城，不仅从经济上给隋王朝以致命性打击，而且为义军此后的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瓦岗军占领洛口仓之后，立即“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①。得到救济的民众，纷纷参加起义军，使义军一下子就发展到数十万人。因此，袭占洛口仓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战略一着，它既解决了瓦岗军的资粮供应来源，迅速扩大了义军队伍，又切断了洛阳隋军的重要粮源，陷敌于更加孤立的困境之中，从而为瓦岗军进一步夺取更大的军事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石子河聚歼刘长恭军

瓦岗军夺取了洛口仓之后，在义军强大攻势的威慑下，先后有朝散大夫时德睿以尉氏（今属河南）反隋响应瓦岗军，前宿城（今山东汶上北）令祖君彦自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归附瓦岗军。义军声威的不断壮大，给洛阳的隋朝统治者以极大震动和打击。越王杨侗急忙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率领步骑兵 2.5 万人，自洛阳东出，对瓦岗军行正面进攻；又派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率所部，自汜水（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西北）西进，对瓦岗军行侧后掩袭，并约期于二月十一日会师于洛口仓城南，妄图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消灭瓦岗军，夺回洛口仓。但隋军的作战企图，却事先为瓦岗军所侦知。据此，李密与翟让便将精锐部队编为 10 队，以 6 个队于洛水下游之支流石子河（位于今河南巩义

---

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东南）东岸列阵以待刘长恭军，以4个队埋伏于横岭（今河南巩义东）以待裴仁基部。刘长恭自洛阳率军先到，不等其士卒就食早餐，即驱赶他们渡过洛水，进到石子河西岸，并在南北十余里的宽大正面上列阵。刘长恭见对岸义军兵少，十分骄傲，不待裴仁基所部到达，即挥军渡河向义军发动进攻。瓦岗军翟让所部先与之交战，不利稍退，隋军尾追于后。这时，李密看准时机，乘敌骄狂不备，遂令单雄信、徐世勣等将率领骑兵"为左右翼"①，自引主力正面迎敌，采取正面迎击与翼侧包抄相结合的战术，给隋军以猛烈痛击。隋兵本已饥疲不堪，在遭到义军猛烈打击之后，一败涂地，十分之五六被击杀，余者四处溃散，隋将刘长恭"仅以身免"②，狼狈逃回洛阳。裴仁基在得悉刘长恭惨败的消息之后，畏战不前，屯于百花谷（在洛口仓东南），固垒自守，不敢出战。自此以后，瓦岗军"威声大振"③。

石子河之战，是瓦岗军继袭占洛口仓之后的又一次意义重大的作战行动。此役，义军在作战指导上，有以下主要成功之处：第一，充分的战前准备。这是义军获胜的主要原因。李密与翟让特别重视敌情侦察工作，在隋军预谋进剿瓦岗军之初，他们即通过侦察而"具知其计"④，从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敌情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选骁雄，分为十队"⑤，较为充分地做好了实战需要的组织准备和应战部署。第二，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是义军获得作战胜利的又一重要原因。作为瓦岗军的实际指挥者的李密，在指挥义军作战中，能够从敌情实际出发，利用隋将刘长恭骄狂不备的弱点，采取正面迎击与翼侧包抄相结合的巧妙战术，予敌以猛烈打击，一举而获歼敌大部、"尽收其辎重器甲"⑥的重大胜利。

---

① 《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②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③④⑤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四、争夺洛阳地区的作战

争夺洛阳地区的作战，是瓦岗军“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灭隋战略的必然发展。从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义军首袭洛阳，到次年正月义军再败王世充，在长达近10个月的洛阳地区争夺战中，瓦岗军既取得了辉煌战绩，又存在着重大战略决策的某些失误；既表现出团结对敌的雄劲力量，又隐伏着内部不和的不利因素。瓦岗军正是在此种错综复杂的斗争历程中曲折前进，并一步步走向自身发展壮大的顶点的。

（一）瓦岗军建立政权与全国起义形势

在对隋军作战的斗争实践中，李密以其超群的军事指挥才能，而赢得了瓦岗军的创始人翟让及其他将领的崇敬和信任，于是，众将共推李密为领袖，号称魏公。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十九日，瓦岗军于巩县城南设坛，拥戴李密即位，建元永平，正式建立政权称魏公府，府置三司、六卫等机构；军事上称行军元帅府，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李密被拥立为魏公后，乃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其府亦置长史以下官属，编制员额为元帅府之半。李密又拜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各领所部官兵；以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诸将皆有封拜不等。①

李密就任魏公之位后，拜官设将，建立军政制度这一事件，标志着瓦岗农民军的革命斗争已经走上新的阶段，即由一般地反对封建压迫而进一步走向以夺取封建统治政权为根本政治目标的发展阶段。瓦岗军所建立的政权，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无法摆脱封建政权的基本模式，但由于这一政权的机体多系农民起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义领导者所组成，因此，它一出现便以有别于隋朝腐朽政权的崭新姿态，而吸引着更多的农民起义军。于是，自赵、魏以南，至江、淮以北地区的起义军“莫不响应”①，诸如齐郡的孟让，平原的郝孝德，邺县（今河北磁县东南）的王德仁，济阴的房献伯，上谷的王君廓，长平的李士才，淮阳的魏六儿、李德谦，谯郡（治今安徽亳县）的张迁，魏郡（治安阳，今属河南）的李文相，谯郡的“黑社”、“白社”（似皆为义军组织名号），济北的张青特，上洛（今陕西商县）的周比洮、胡驴（似为少数民族起义者的绰号）等起义军，都纷纷归于瓦岗军的旗帜之下。对于所有归附的其他义军首领，李密“悉拜官爵，使各领其众，置百营簿以领之。”②各地归附的起义军不绝如流，多达数十万人。鉴于义军队伍日益壮大，李密一方面命由护军将军田茂广负责构建洛口城，建成一座方圆 40 里的城邑，作为瓦岗军的兵营驻地；一方面派遣元帅长史房彦藻率军东进攻城略地，先后攻取了安陆（治安陆，今属湖北）、汝南（治汝南，今属河南）、淮安（治比阳，今河南泌阳）、济阳（今山东东明西南）等地，“河南郡县多陷于密”③。自此，瓦岗军在以魏公李密为领袖的组织指挥之下，已经发展成为威震中原的反隋主力大军。

在瓦岗军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军，也在斗争中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十余万人的起义军，并在乐寿称王建立政权。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在屡败隋军进攻的艰苦奋战中，也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威震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这样，到大业十三年（617 年）三月间，在全国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河南瓦岗军为中坚，以河北义军和江淮义军为左右翼的三大农民武装力量。就在农民军反隋战争节节胜利，隋朝统治行将崩溃的时候，各地官僚地主也乘机起兵反隋，割据一方。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便形成了各个割据势力与各地农民军既同时反隋、又互相对立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一点不

①②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仅是隋末农民大起义进入高潮阶段以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又是导致农民起义由顺利发展走向曲折斗争乃至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洛阳外围的争夺战

瓦岗军在进占荥阳地区和建立政权以后，随着全国农民起义斗争的不断高涨和瓦岗军队伍的迅速壮大，李密逐渐把进攻的矛头指向隋王朝的陪都洛阳。为了夺取东京洛阳，李密命由护军将军田茂广负责督造“云旝三百具，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① 为进攻洛阳做好物质准备。

大业十三年（617 年）四月初九，李密命以孟让为总管，率领步骑兵 2000 人，夜入洛阳东郭，火烧丰都市②，比及拂晓而去。瓦岗军的这一军事行动，虽是进攻洛阳前的一种试探性袭扰活动，却给洛阳内外的封建统治者以极大震恐。惊乱中，越王杨侗急令“东京居民悉迁入宫城，台省府寺皆满”③。巩县令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献城请降，李密遂委柴孝和为护军将军，郑颋为右长史；坐守百花谷的隋将裴仁基偕秦叔宝、罗士信等人率领部众献虎牢归降，李密任命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郡公；继有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程咬金以及赵仁基等人也率众归附。李密以秦叔宝、程咬金等四将为骠骑，挑选军中骁勇士卒 8000 人作卫队，分隶四骠骑统领，号称“内军”；以罗士信、赵仁基为总管，使其各统所部。经过上述组织准备之后，李密终于把进军洛阳地区的作战，提到了灭隋战争的重要日程。

---

① 《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旝，本谓古代旗的一种。这里指发射石块的器械，《说文·㫃部》释“旝”为：“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追敌也。”

② 丰都市，洛阳的集贸市场之一。隋炀帝时，洛阳建有三大集贸市场，即：东市丰都，南市大同，北市通远。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四月十三日，李密派遣裴仁基、孟让率兵3万余人[①]，自洛口西进，一举袭破回洛仓。该仓城是隋朝第二大官储粮仓，位于洛阳城北7里，仓城周围10里，内凿300窖，共储粮240万石。义军袭破回洛仓，将进一步陷东京洛阳于困境之中。裴、孟率兵袭破回洛仓之后，直趋洛阳城，火烧天津桥[②]。时东京洛阳尚有隋军20余万人。为防义军攻城，越王杨侗命令隋军“乘城击柝，昼夜不解甲”[③]。在其获悉义军入城烧了天津桥的消息后，杨侗急令隋军迎击，裴、孟因寡不敌众，败还巩县。此时，率众进至回洛仓的李密，也因指挥义军进攻偃师（今属河南）、金墉（今河南洛阳城东北）等洛阳外围城邑不克，只得退兵返回洛口城，回洛仓得而复失。

此时，因东京洛阳“城内乏粮”[④]，城外防卫薄弱，杨侗一面派人自回洛仓运入大批粮食；一面调兵遣将加强洛阳东之外围的防卫力量，遂派兵5000守丰都市、5000守上春门、5000守北邙山，“为九营，首尾相应，以备密”[⑤]。

四月十九日，李密亲率3万瓦岗军自洛口西进，再次攻占了回洛仓，然后据此“大修营堑，以逼东都”[⑥]。杨侗急忙派遣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恭等率兵7万拒之。二十一日，义军与隋军战于回洛仓城北，隋兵败走。二十七日，李密命记室祖君彦作讨隋檄文而“移檄州县”[⑦]，数列炀帝十大罪状，痛斥杨广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⑧]的独夫民贼，

---

① 见《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新唐书·李密传》和《资治通鉴》均作“二万余人”。

② 天津桥，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令宇文恺营造东都，以洛水贯都有天汉之象，故建桥取名为“天津桥”。

③④⑤《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⑥《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⑦《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⑧（唐）韩昱（号“太行山人”）《壶关录》（载于《说郛》卷三十五）；又见《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公开号召各地吏民共同起来推翻杨广的黑暗暴政。这篇措词尖锐的讨隋檄文，无疑对唤起民众觉醒，推动起义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瓦岗军的战略分歧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正当李密积极准备再次进攻洛阳地区的时候，护军将军柴孝和向李密提出了西进长安、乘虚夺取关中的战略设想。孝和分析指出：关中地区“阻山带河”①，形势险要，秦、汉两朝都是以此处作为立国之基地，而今又是隋朝都城之所在，夺取该地，则便于“传檄指扮，天下可定”②。他还指出，目前各地反隋武装竞起，如不及早决策，必为他人所先据，一旦失机，则后悔莫及。为此，柴孝和主张由翟让据洛口、裴仁基据回洛，继续牵制洛阳地区的隋军；由李密亲率精锐，西袭长安。这样，“即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③，一举而定天下。柴孝和的建议，是一个颇具远见卓识的战略设想。关中地区不仅形势险要，而且又是隋朝政治中心的所在地，先克长安、夺取关中，既可使义军立稳根基，避免处在洛阳与江都隋军的战略夹击之中，又能使隋王朝因丧失立国之根基和全国的第一政治中心，而加速其灭亡的进程。柴孝和的建议，又是一个较为切实可行的重要谋策。洛阳是隋王朝对全国实施统治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杨广即帝位后，虽仍以长安为首都，但其战略重心逐渐东移，在其统治期间的多数时间，是以东京洛阳为基地，开展政治、军事活动的。杨广到江都以后，洛阳尚有隋军二十余万。由于隋军主力被蓬勃发展的义军斗争吸引在中原地区，致使关中地区隋军兵力薄弱，长安防卫尤为空虚。因此，倘若瓦岗军采纳柴孝和的战略主张，先舍洛阳，转攻关中，那么，攻占隋都长安，进而夺取天下，是有较大可能性的。然而，李密对此富有进取意义的战略建议，竟未予完全采纳。他虽然也认为柴孝和的主张是上策，但却顾虑到义军皆系山东（这里指崤山、函谷关以东）之人，

---

①②③《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今见洛阳屡攻不下，怎肯随军西去；如留翟让等人在河南，又怕他们“各竞雄雌”①，不听指挥，等等。据此，李密仍然坚持其先取洛阳、后攻长安的既定方针。在柴孝和一再请求之下，李密始同意由孝和率领少数兵力西上，仅以“间行观衅”②、探察虚实为目的。

是先攻洛阳，还是先攻长安，实质上是个如何正确选择战略首攻方向的问题。战争的胜利或决定性胜利，往往取决于正确地选择战略首攻方向；换言之，正确地规定战略首要基本打击方向，乃是一个“预先决定整个战争时期各次战役的性质，因而也就是预先决定整个战争十分之九的命运”③的关键问题。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恰恰在此重大问题上，由于李密的固执己见所造成的决策失误，而使瓦岗军最终失去了夺取天下的机会。

（四）回洛仓的争夺战

瓦岗军自进军荥阳地区以来，由于接连取得胜利，李密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在其拒绝柴孝和的先弃洛阳、转攻长安的建议之后，他自“恃兵锋甚锐，每入苑与隋军连战”④。面对瓦岗军的不断进攻，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慌忙派人急赴江都，请求杨广速返东京，以解洛阳之危。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杨广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领关中兵东援洛阳。杨侗在得到隋军增援之后，遂乘瓦岗军连续作战未得休整和李密“为流矢所中，卧于营内”⑤之机，于五月二十八日派遣段达与庞玉等将率军夜出，在回洛仓西北列阵挑战。李密与裴仁基急忙率兵出战，结果为隋军所败，死伤大半，左司马杨德方、右司马郑德韬等将皆战死，李密被迫放弃回洛仓而奔回洛口城。此时，率领少数兵力西上而进到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柴孝和，虽曾一度发展到万余人，但在获悉李密败归洛口的消息后，其部众纷纷离散，孝

---

①④⑤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五月。

③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135 页（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11 月第 1 版）。

和无奈，只得“轻骑归密”①。这是瓦岗军自进军荥阳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惨重的挫折。

瓦岗军余众自回洛退归洛口，经过休整和补充之后，李密又率军向洛阳方向进发。六月十七日，瓦岗军与隋军大战于平乐园（在洛阳城东）。李密采用“左骑、右步，中列强弩”②的进攻布势，鸣击千鼓以令部队猛烈冲击，一举大败隋军，再次夺占回洛仓。

七月，杨广鉴于东京洛阳的形势又趋危迫，乃遣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精锐部队5万人③，又派将军王隆、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将，各率所部同赴洛阳，企图会剿瓦岗军。这样，义军与隋军之间，一场围绕东京洛阳的激烈争夺战，又在积极酝酿之中。

（五）黑石首败王世充军（参见附图7）

大业十三年（617年）九月，河南、山东地区发生特大水灾，灾民每天饿死者多达数万人。严重灾荒固然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大困苦，但也正是义军进一步发动民众，掀起反隋抗暴斗争高潮的大好时机。为了谋求瓦岗军新的发展，右武候大将军徐世勣向李密建议说：“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④李密对此建议完全赞同，并立即派遣徐世勣率兵5000自原武（今河南原武西）北渡黄河，尔后东进，在河北郝孝德、李文相、张升、赵君德等义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占黎阳仓（位于今河南浚县南）。义军开仓救济灾民，深得百姓拥护，世勣所部迅速壮大，仅10天时间，就扩大了“胜兵二十万余”⑤。自此，瓦岗军在黄河以北也拥有一支规模较大的兵力，与黄河以南由李密亲率的义军主力形成犄角之势。接着，又有武安（治永年，今河北邯郸东北）、永安（治黄冈，今湖北新州）、义阳（治今河南信阳）、弋阳（治

①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

③ 见《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④⑤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光山，今属河南)、齐郡等地相继归降瓦岗军；河北农民军领袖窦建德、长江中游的地主武装头目朱粲，“亦遣使附密”①，李密委朱粲为扬州总管，封爵邓公。随着瓦岗军声势的进一步扩大，李密又把进攻洛阳的作战推上了活动日程。

在瓦岗军抓紧准备进攻洛阳的同时，隋朝统治阶级也在积极调兵遣将入保东京洛阳。截至是年九月初，杨广所调增援洛阳的诸路隋军除王隆误期未到和薛世雄所部被河北义军窦建德截击消灭外，其余所调各路皆会于东京洛阳。九月十一日，越王杨侗命虎贲郎将刘长恭等率留守兵、庞玉等率偃师兵，与王世充所部共计十万余人，在王世充的统一指挥下，向洛口瓦岗军发起反扑。隋军东进至洛口西，与瓦岗军相隔洛水而成对峙局面。

十月二十五日，王世充率领隋军夜渡洛水，至黑石（今河南巩义东南）扎营。次日，王世充分兵一部守营，自率精兵进至洛北列阵待攻；李密闻之，亲率义军渡过洛水迎战，被隋军所败，护军将军柴孝和落水而亡。有鉴于此，李密及时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东走洛口仓之月城（即临洛水所筑之屏蔽仓城的半圆形小城），诱使隋军主力来追；而李密则亲率精骑退往洛水之南，“策马直趣黑石”②，突袭隋军营寨。黑石留守之隋军见形势危迫，连举六次烽火告急。此时，正率主力包围洛口月城的王世充，见状不得不“释月城之围，狼狈自救”③。李密乘隋军主力仓皇回救黑石之机，挥军还战，迎头痛击，大败王世充军，歼敌三千余人。王世充败后龟缩于黑石营内，凭据壁垒而不敢出战，直至十一月初九，迫于越王杨侗的压力，才不得不越壁出战。是日，王世充率部与瓦岗军夹石子河（今河南巩义东南）对阵，李密沿河南北布阵十余里。交战中，翟让率部先战，不利而退；王世充自以为得手，遂率兵跟踪追击，瓦岗军乘其不备，王伯当、裴仁基各率所部从两翼出击，横断隋军后路，李密则率主力正面迎战，大败隋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②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十月。

军，杀伤甚众，王世充率残部仓皇向西逃窜。

（六）洛水再败王世充军（参见附图 8）

瓦岗军黑石连败王世充军后，“河南诸郡尽附李密”①。正当义军顺利发展，李密的领袖地位不断提高的时候，瓦岗军领导集团内部却不幸地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翟让的部将司马王儒信因“惮密威望”② 的迅速提高，极力“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之权”③；而翟让之兄荥阳公翟宽④ 则大肆煽动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⑤ 对于这些严重妨害义军领导之间团结的言论，翟让先是“不从”，后“但大笑，不以为意”⑥。这一方面说明翟让本无削夺密权的意向，另一方面也说明翟让对上述之挑唆性言论，并没有采取有力的制止措施。而李密对此破坏团结的言论，先是“闻而恶之”⑦，后在部下左长史房彦藻、左司马郑颋等人的怂恿之下，始“有图让之计”⑧。大业十三年（617 年）十一月十一日，李密在其部下的支持下，利用宴会之机，将翟让与其兄宽及王儒信、摩侯等少数翟之亲信杀害。李密此举虽然所诛范围不大，但采取谋杀手段毕竟是公开分裂义军的严重政治事件，所以，自此以后，“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⑨，使瓦岗军的内部团结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也给隋军再次反扑提供了可乘之机。

屡为李密所败的隋将王世充，早就察觉翟让与李密之间的关系“必不久睦”⑩，并且寄希望于翟让在内讧中取代李密，但在得知翟让被杀的消息后，王世充虽有大失所望之感，却仍然认为这是进攻瓦岗军的大好时机。因此，他积极“募兵飨士”⑪，妄图利用瓦岗

---

①⑥⑦⑨⑩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十一月。

② 《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③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④ 翟宽，《资治通鉴》作“翟弘”。本书这里从《隋书·李密传》、新旧《唐书·李密传》说。

⑤⑧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⑪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十二月。

军内讧不和之机，采取偷袭手段，夺占洛口仓城。然而，王世充的险恶企图，却被义军所侦知。李密于是乃命瓦岗军积极进行应战准备，并令郝孝德、王伯当、孟让诸将"勒兵分屯仓城之侧以待之"①。十二月二十四日，入夜三更时分，王世充果然率兵而至，瓦岗军奋力迎击，大败王世充，击斩其骁将费青奴，隋军被歼和跌入洛水而亡者千余人。王世充因屡与义军交战不胜，无奈，只好"诉以兵少"②而再次向洛阳求救。于是，杨侗又派兵7万补充王世充军。

大业十四年（618年）正月，王世充在得到洛阳的大批援兵之后，再一次向瓦岗军发动进攻，于洛水北岸击退李密军千余骑，遂进屯至巩县北，与瓦岗军主力在洛口仓附近，相隔洛水而对阵。是月十五日，王世充命诸军各造浮桥，准备过洛水大举进攻瓦岗军。但因桥成有先后，先成者先过，致使隋军过洛水行动不一，秩序异常混乱。虎贲郎将王辩桥成先过洛水，孤军突进，虽破瓦岗军之外栅，致"密营中惊扰，将溃"③，但不明此战况的王世充，却急忙"鸣角收众"④，李密乘机亲率敢死之士奋力反击，再次大败王世充，隋军仅因争桥而落水淹死者万余人，洛水北岸的诸路隋军亦纷纷败溃，瓦岗军乘胜追杀，击斩王辩、杨威、霍世举、刘长恭、梁德、董智等隋军"大将六人"⑤，王世充仅以身免。是日入夜，适逢天寒大雪，溃逃中的隋军士卒因涉水沾湿而"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⑥。王世充因屡战屡败，不敢逃回洛阳，只得向北逃窜，比至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隋军仅剩几千人。王世充因败而"自系狱请罪"⑦，杨侗遣使赴河阳予以赦免，并将其召回洛阳，赐以金帛、美女，"以安其意"⑧。其后，王世充收拾散众，复得万余人，进屯至洛阳城北之含嘉城，自此，"畏缩不敢出"⑨战了。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十二月。

③④⑧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

⑤ 《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⑥⑦ 《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⑨ 《新唐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瓦岗军洛北大败王世充军后，李密乘胜扩张战果，挥军西进，一举攻占了金墉城（位于洛阳新城东北），并据此“修其门堞、庐舍而居之，钲鼓之声，闻于东都”①。接着，李密将义军30万兵力自北邙（位于金墉城北）布阵，向南直逼洛阳上春门（洛阳城之东北门）。正月十九日，隋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奉杨侗之命率兵出战，段达望见义军兵盛生畏，竟“不阵而走”②；李密乘机纵兵追杀，大败隋军，击斩韦津，直抵洛阳城下。瓦岗军再次进逼洛阳的作战行动，不仅极大地震撼了隋朝统治阶级，而且进一步壮大了义军声威。于是，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以及隋游骑尉宇文儒童③等隋朝地方军政官吏，各率所部归降瓦岗军。至此，“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④。其他义军领袖，诸如窦建德、杨士林、孟海公、徐圆郎等人，也都先后遣使奉表劝李密早就尊号，但李密却表示：“东都未平，不可议此”⑤。其后，李密一方面派遣左长史房彦藻、右长史郑颋等人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⑥，以扩大瓦岗军地盘；一方面继续以主力进攻洛阳，以期实现其先取洛阳的战略计划。但终因洛阳城坚，且有重兵防守，以致瓦岗军久攻不下而顿兵于洛阳城外。

争夺洛阳地区的作战，是瓦岗军胜利进军荥阳地区和建立政权以后的又一重要战役；也是实施李密“席卷二京”战略计划的首攻目标。由于义军此时正处于顺利发展的阶段，加之李密作战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

② 《隋书》卷八十五《段达传》。

③ 宇文儒童，隋将作大匠宇文恺之长子。《旧唐书·李密传》载称：“将作大匠宇文恺叛东都，降于密”。显然，这一记载有悖史实，因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所载，宇文恺已死于大业八年（612年）十月初八；而大业十四年（618年）正月，“叛东都，降于密”的不可能是宇文恺，而只能是其子宇文儒童。本书这里从《新唐书·李密传》说。

④⑤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二月。

指挥比较灵活有力，故使瓦岗军在洛阳外围地区的一系列对隋军的作战中，取得了显著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在与王世充军的“前后百余战”[①]中，歼灭大批隋军，迫使王世充退入含嘉城而再也不敢出战。从而使隋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东京洛阳，已完全陷于义军进攻的威胁之下。

瓦岗军虽在争夺洛阳地区的作战中，取得了战绩颇著的胜利，但在义军的胜利中确实隐伏着某些重大战略弱点。首先，李密舍柴孝和颇为可行的先攻长安、再取洛阳的战略建议而不用，长期顿兵于洛阳城下，这不仅使瓦岗军失去了有可能夺取天下的战略主动权，而且是导致义军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李密杀害瓦岗军的创始人翟让，是其不善于处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所酿成的重大政治失误。这一错误行动的严重后果，不仅为隋将王世充妄图消灭瓦岗军，提供了“得从而乘之”[②]的机会，而且更破坏了义军的内部团结，埋下了分裂乃至最终失败的因素。只是由于隋军的极端腐败无能和义军尚处于上升发展时期，才未使王世充的险恶用心得逞和引起瓦岗军的更大动乱。

第四节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军的斗争

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亦是隋末农民革命队伍中起义最早、活动时间最长的一支武装力量，它是推翻隋朝黑暗统治的北方起义队伍中的一支劲旅。

一、窦建德参加起义军

窦建德，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世代为农，他

---

① 《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十一月。

"材力绝人，少重然许，喜侠节"①；以其具有仗义济贫的思想品格，而"大为乡党所称"②。建德曾作过里长，因犯法逃亡，后遇赦得归。其父卒时，乡里前来送葬者多达千余人，但对他们所赠的财物，建德一律"让而不受"③。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大肆征兵，准备进攻高丽，窦建德被征入伍，以其"勇敢尤异者"④而被选任为二百人长。时有同县孙安祖"亦以骁勇选为征士"⑤，安祖以其"家为水所漂，妻子馁死"⑥为由，向官府求情免征，非但不准，反遭县令痛打。安祖受辱，怒杀县令，逃到窦建德处，官府追捕，建德将其藏匿保护起来。是年，山东因大水而发生严重饥荒，邹平王薄为反对炀帝征辽战争而聚众于长白山首举义旗。在此形势下，窦建德对孙安祖说："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今水潦为灾，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亲驾临辽，加以往岁西征，疮痍未复，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归，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⑦安祖听后十分赞同。于是，一个以反对参加征辽战争为直接目的、以高鸡泊为活动基地的反隋抗暴起义计划，就这样形成了。建德暗中招纳逃兵和穷苦百姓，得数百人，令安祖统领入据高鸡泊起义，安祖自称将军。时有鄃人张金称聚众100人于河曲、蓨人高士达聚众千余人于清河，先后起义反隋。官府怀疑窦建德私通起义军，悉收其家属，"无少长皆杀之"⑧。建德闻知家属惨遭屠杀，遂率征辽部众200人，投往清河高士达起义军。士达自称东海公，而以建德为司兵，后孙安祖被张金称所杀，其部众尽归于窦建德。自此，窦建德在高士达的领导下，率所部转战于清河至高鸡泊之间。由于建德

---

① 《新唐书》卷八十五《窦建德传》。

②③④⑥⑦⑧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七年十二月。

“每倾身接物，与士卒均执勤苦”①，所以百姓争相投附，其部队很快便发展到万余人。后经多年艰苦奋战，这支活动于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足以动摇隋朝统治基础的隋末三大农民武装力量之一。

二、长河诱歼郭绚军

长河诱歼郭绚军，是窦建德自创建义军以来反击隋军进攻的一次重要作战。

大业十二年（616年）十二月，隋涿郡（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南下进攻活动于清河至高鸡泊之间的高士达起义军。士达自以军事才能不及窦建德，乃进建德为军司马，“咸以兵授焉”②，即由建德全权负责部队作战指挥。建德既得统军御众之权，“欲立奇功”③以威服众人，遂请士达负责看守辎重，自率精兵7000迎击来犯之隋军。为了达成出奇制胜之效，建德“诈为与士达有隙而叛之”④；士达则声言“建德背亡”⑤，并取一虏获妇人伪为建德之妻，而杀于军中，以此来欺骗和麻痹隋军。尔后，建德又以“请降”为名，一面派人给隋将郭绚送“降书”，诈称“愿为前驱，破士达以自效”⑥，一面将义军埋伏于长河（今山东德州东），准备诱使隋军入伏，一举而歼灭之。郭绚得诈降书之后，不辨真伪，信以为真，迅即率兵跟随送书人南下进至长河地界，妄想同建德“期与为盟，共图士达”⑦。待隋军一到，建德遂乘郭绚“益懈而不备”⑧之隙，立即挥军突然袭击，大败隋军，歼敌数千人，缴获战马千余匹。隋将郭绚仅率少数骑兵逃走。建德率军乘势追击，进至平原（治安德，今山东陵县）斩郭绚首而献于高士达。自此，窦建德“威振山东”⑨，义军获得迅速发展。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⑨《新唐书》卷八十五《窦建德传》。

三、窦建德力挽危局

起义军长河作战胜利之后，高士达滋长了骄傲情绪。是时，隋太仆卿杨义臣奉杨广之命，率兵万余人于清河地区镇压了张金称起义军后，乘胜东向进至平原地界，妄图深入高鸡泊消灭高士达、窦建德农民军。隋军的这一险恶用心，完全为窦建德所识破。面对隋军的攻势，建德及时提醒士达说："历观隋将，善用兵者唯义臣耳。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与争锋，恐公不能敌也。"① 建德这一根据敌情实际而提出的避锐就疲、伺机出击的建议，无疑是个切实可行的作战方略，但是，为长河胜利而冲昏头脑的高士达，竟不以为然，执意立即出兵正面迎敌。于是，士达决定留建德守营，自率精兵前往平原迎战隋军。士达初战小胜，便"纵酒高宴，有轻义臣之心"②。建德闻之而预感祸将不远，为阻击隋军长驱直入，遂决定留人守营，自率精骑百余据险"以防士达之败"③将给义军造成的更大损失。不久，士达果因轻敌不备，而在隋军进攻之下兵败被杀。隋将杨义臣乘胜挥军西进，企图围歼窦建德。在此紧急关头，建德鉴于兵少难以固守，遂断然决定避开隋军锋锐，率众自高鸡泊北上，向隋军薄弱地区发展。当义军进到饶阳（今属河北）时，建德乘该城空虚无备，挥军一举攻陷。义军入城之后，建德采取"抚循士众"④的正确政策，深得当地军民拥护，故"又得三千余兵"⑤。在大敌压境的危急情况下，窦建德能够临危不惧，采取"避实击虚"的灵活战术，与强敌周旋，这不仅使义军避免了被消灭的厄运，而且扩大了活动地盘，壮大了义军队伍。隋将杨义臣既杀高士达，"以为建德不足忧"⑥，遂志满意骄地引军而去。其后，窦建德率众复返平原，一

---

①②③④⑤⑥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面隆重为士达发丧，安葬阵亡士卒；一面招集士达旧部，重整旗鼓，又得数千之众。义军士气复振，建德“始自称将军”①。在此后与隋军作战中，由于建德始终贯彻“每获士人，必加恩遇”②的政策，致“隋郡县吏多以地归之”③，这不但有力地分化了隋朝地方统治势力，而且使义军地盘不断扩大，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胜兵十余万人”④的起义军。

四、七里井大败薛世雄军

（参见附图 9）

大业十三年（617 年）正月初五，窦建德于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年号丁丑，置署设官。这标志着窦建德所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的斗争，已发展到建立政权的新阶段，并且以一支活跃于河北的强大义军力量，而与河南瓦岗军的斗争遥相呼应。是年二月，瓦岗军建立政权后，李密亲率义军屡逼东京洛阳，致使“中原骚动”⑤，东京内外不安。七月，杨广为了解救洛阳之危，诏遣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领幽、燕精兵 3 万人南下，企图与洛阳的王世充等诸将合军，一举消灭瓦岗军于洛阳外围地区，并令其南下沿途所遇义军“随便诛翦”⑥。薛世雄率军南下进至河间（今属河北）城南之七里井而驻军扎营。窦建德在获悉隋军南下将至之时，即选精兵数千预先埋伏于河间南界的沼泽地中；比及隋军已至，建德为了欺骗和麻痹隋军，采取了“悉拔诸城伪遁”⑦、佯言南逃豆子䴚的隐真示假的战术。对此，隋将薛世雄不仅信以为真，而且竟误断“建德畏己，乃不设备”⑧。建德通过侦

①②④⑦⑧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③ 《新唐书》卷八十五《窦建德传》。

⑤ 《隋书》卷六十五《薛世雄传》。

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七月。

察得悉隋军麻痹不备的情报后，立即亲率敢死之士 1000 人①，自乐寿北上，直趋七里井夜袭隋军营寨。天将明，“会云雾昼晦，两军不辨”②，建德挥军突袭敌营，在义军的突然打击之下，隋军顿时溃败，大部被歼，其中因混乱自踏而亡者万余人，余众皆为义军所俘。隋将薛世雄于慌乱之中，仅“与左右数十骑遁入河间城”③，因兵败“惭恚发病”④，逃回涿郡后不久而亡。义军击败隋军之后，建德挥军乘胜进围河间城，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七里井大败薛世雄军，是河北农民军反击隋军进攻的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作战。杨广调遣薛世雄率军南下，其战略企图不仅在于进攻窦建德的河北农民军，而且更是为了打击李密的瓦岗军，以解除东京洛阳的困境，挽救摇摇欲坠的隋朝政权。所以，窦建德于七里井反击作战的胜利，不仅消灭了河北地区的一支隋军主力，为义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在客观上有力地配合了于洛阳城下浴血奋战的瓦岗军，为加速隋朝政权的土崩瓦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河北农民军迅速发展的原因

以窦建德为领袖的河北农民军，从大业七年至大业十三年(611～617 年)七月，经过 7 年的艰苦奋战，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威振山东”的起义武装力量。河北农民军的成长壮大，这既是隋末农民大起义蓬勃发展形势下的必然产物，又是与义军领袖窦建德善于从军事上、政治上实施正确的主观指导分不开。长河与七里井两次重要作战，建德均能从敌强己弱的实际情况出发，巧妙地采取诈降误敌的手段和诱敌入伏的战法，乘敌不备，奇袭获

---

① 七里井之战窦建德所率敢死队的人数，据《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记载为“二百八十人”；本书这里取新、旧《唐书·窦建德传》说。

②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③④ 《隋书》卷六十五《薛世雄传》。

胜。当士达兵败被杀，义军处于危困之际，建德又能临危不惧，沉着应敌，采用避实击虚的战法，迅速甩开当面强敌的围攻，而向敌人空虚之处发展，从而不仅使困境中的义军转危为安，而且获得了重新发展壮大的条件。可见，窦建德在作战指导上的正确，乃是义军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原因。

窦建德出身于劳动农民，参加起义后，特别是在士达不幸牺牲，他成为河北农民军领袖之后，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史载“建德性约素，不喜食肉”①；“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所使婢妾才十数人”②。这些记载说明，窦建德虽已称王于乐寿，但与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那些封建帝王，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每次平城破阵，建德都能身先士卒，甘苦共众；对于作战中缴获的资财或其它战利品，建德自己“一无所取”③，全部分赏有功将士。身居王位而葆有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特色，这正是窦建德深受广大将士拥护，“能致人之死力”④，进而促使义军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对待降将政策上，建德从“欲安百姓以定天下”⑤的政治战略出发，一改其他义军每“得隋官及士人必杀之”⑥的作法，实行宽待降将、择贤而用的开明政策。这也是河北农民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攻陷饶阳时，建德得该县长宋正本，以其有贤才，遂“引为上客，与参谋议”⑦；建德乐寿称王后，授任宋正本为纳言。总之，对于每战所得之才堪任用的隋官及士人，建德都能“随才拜授，委以政事”⑧。建德实行广泛的“招集贤良”⑨的正确政策，这对瓦解敌人，壮大自己，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

①⑥ 《新唐书》卷八十五《窦建德传》。

②③④⑤⑦⑧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⑨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史臣评语。

第五节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的斗争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是隋末三大农民军中起义稍晚，但却长期活跃在江淮广大地区的一支重要农民武装力量。这支义军以自己的存在、发展和斗争，而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瓦岗农民军的重要战略一翼。

一、杜伏威、辅公祏起义

江淮农民军是以杜伏威、辅公祏为领袖的一支反隋抗暴的农民武装力量。杜伏威，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西北）人；辅公祏，临济（位于章丘西北）人。两人均出身于贫苦家庭，并且从小一起在艰苦生活中长大。共同苦难的身世经历，使他们自幼就结成了“刎颈之交”①。辅公祏的姑家是以牧羊为业，公祏曾多次以其姑家所牧之羊，馈赠予“家贫无以自给”②的杜伏威，其姑家以其偷盗罪名告之官府。两人为躲避官府追捕之急，“遂俱亡命，聚众为群盗”③，从此，便投身于反隋抗暴的起义斗争行列。当时，伏威虽年仅16，但其胆略非凡。在对官军作战中，他英勇善战，常以护卫义军弟兄为己任，每战都能“出则居前，入则殿后”④。由于他足智多谋，故每战“众用其策皆效”⑤。因之，伏威深受义军拥护和爱戴，被众人“共推为主”⑥。

大业九年（613年），正当全国农民大起义蓬勃发展之际，杜伏威与辅公祏率众进入长白山，投奔义军左君行所部，因不被礼遇而离去，遂率军南下，转战于江淮地区。自此以后，伏威与公

①②③④⑥《旧唐书》卷五十六《杜伏威传》。

⑤《新唐书》卷九十二《杜伏威传》。

祏所领导的起义军，经过艰苦奋战，便逐渐发展成为活跃于江淮广大地区的一支重要农民起义队伍。

二、淮南诱歼宋颢军

杜伏威、辅公祏率领义军南下之时，有下邳（治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人苗海潮聚众起义。伏威从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取得反隋抗暴斗争的胜利，诸路义军必须实行联合。为此，他派遣辅公祏前往下邳苗海潮处，晓以联合之大义，指出："今同苦隋政，各兴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见擒，何不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若公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可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雄雌。"①海潮听后，为伏威力主联合的大义所威服，遂"即以其众归于伏威"②。不久，伏威率军转战至淮南（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并自称将军。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的不断发展壮大，直接威胁和动摇着隋王朝在江淮地区的统治。大业九年（613年）十二月，隋朝江都留守派遣校尉宋颢率领步骑兵西进淮南，企图消灭起义军，以挽救隋朝在江淮地区的统治。面对来犯的隋军，伏威毫无惧色，亲率义军迎战。为了聚歼敌人，伏威采取"阳为奔北"③的佯败惑敌之战法，诱使隋军进入芦苇荡中，然后令士卒在上风头纵火。火势顺风倏忽烧入芦苇荡，将龟缩在那里的隋军全部烧死。伏威以其卓越的军事智慧和指挥才能，充分利用天时地利条件，采取佯败惑敌、火攻聚歼的巧妙战术，成功地打了一个全胜性的歼灭战。其后，伏威乘胜率军东进海陵（今江苏泰州），合并了赵破阵所领导的起义军。接着，又挥军北上，攻陷了安宜（今江苏宝应西南）。至此，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农民军已发展到数万人。

①②③ 《旧唐书》卷五十六《杜伏威传》。

三、盐城全歼公孙上哲军

大业十一年（615年）十月，东海人李子通率领义军万人，南渡淮河进至安宜，“与杜伏威合”① 兵一处。不久，因李子通“恶伏威雄武，使骑袭之”②，而致联合后的两支义军又分道扬镳。隋朝乘义军分裂之隙，派遣虎牙郎将来整率军围攻义军，先后击败杜、李二部。义军受挫后，李子通率其余众南奔海陵，得众2万，自称将军。杜伏威与辅公祏则率领余众数百人，向东转移发展，沿途“收卒得八千”③，迅速进抵盐城（今属江苏）。此时，隋虎牙郎将公孙上哲率军驻守盐城，伏威乘其不备，挥军突然袭击，一举全歼该城隋军。从而使受挫后的伏威农民军，转危为安，士气复振。

四、六合大破陈稜军

（参见附图10）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杜伏威所部义军已从盐城地区南下，进屯至六合（今属江苏）；李子通则率众进占海陵。杜、李两支义军，皆各拥有数万兵力。海陵与六合，位于江都（治今江苏扬州）之东、西两侧，该两地在义军的控制之下，对隋朝在江淮地区的政治中心江都，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此时，已在江都的隋炀帝杨广，为求自身安全之计，屡派隋军攻打义军。

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杨广派遣光禄大夫、右御卫将军陈稜率领宿卫精兵8000人西向六合，进攻杜伏威农民军，但在义

---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六《李子通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六《王雄诞传》。

③ 《新唐书》卷九十二《杜伏威传》。

军英勇顽强的抗击之下，陈稜竟畏惧而“闭垒不战”①。为了调动隋军脱离壁垒而于运动中将其歼灭之，杜伏威采取“激将”之法，派人给陈稜送去“妇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书号为‘陈姥’”②。陈稜见书大怒，果然“悉兵而至”③。伏威立即率军迎击，并亲临阵前指挥作战，但不幸为陈稜部将暗箭射中面额；伏威大怒，指着陈稜骂道：“不杀汝，我终不拔箭！”④愤然率军直突其阵，杀声动地，所向披靡，终于活捉射箭者，伏威令其拔出面额所中之箭后而杀之，然后枪挑其首复入陈稜营阵奋杀，立斩数十人。在义军的猛烈打击之下，隋军乱了阵脚，士卒大溃，伤亡惨重，隋将陈稜仓皇奔逃，仅以身免。伏威挥军追杀，全歼隋军 8000 宿卫精兵。六合作战获胜之后，伏威率军北上，袭破高邮（今江苏高邮北），然后又引兵南下，占领历阳（治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而以辅公祏为长史。其后，伏威分遣诸将率兵经略历阳郡地所属各县，“所至辄下”⑤。至此，江淮地区的诸路小股义军也都“争来附之”⑥。

五、江淮农民军成长壮大的原因

杜伏威与辅公祏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自大业九年南渡淮河之后，经过数年艰苦奋战，终于成长壮大为江淮地区一支重要农民武装力量。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严重地威胁着隋朝在江淮地区的统治和杨广在江都的自身安全，而且在客观上有力地策应了瓦岗军在中原地区的斗争。江淮义军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农民武装力量，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它之所以能够胜而不骄、败而不馁，是与义军领袖杜伏威治军有方分不开的。综观杜伏威的作战与军事活动，可以看出他在治军方面，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正月。

②③④⑤⑥ 《旧唐书》卷五十六《杜伏威传》。

其一，注重训练，从严要求。为了培养部队英勇顽强的杀敌献身精神，杜伏威选拔和训练了5000名敢死之士，号称“上募”，作为义军对敌作战的骨干力量。伏威每次指挥义军攻城陷邑，“辄令上募击之”① 在前，充分发挥其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精神，以带动整个部队顽强战斗，克服困难，去夺取胜利。

其二，身先士卒，赏罚分明。自创建义军以来，每逢对敌作战，伏威都能以身作则，甘苦共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成为深得广大将士衷心拥戴的光辉表率。伏威严格贯彻赏功罚罪的治军制度。对作战中所缴获的财物，伏威自己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奖赏杀敌有功的将士；但对于那些畏敌后退的人，一旦发现便给以严厉惩处。由于伏威治军严格，信赏明罚，充分调动广大将士的积极性和顽强战斗精神，因此，这支农民军每与隋军对阵，都能“人自为战，所向无敌”②，成为一支威震江淮的农民武装力量。

第六节　隋官起兵割据与炀帝统治的覆灭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行将推翻隋朝暴政的重要关头，各地的官僚地主也乘机纷纷起兵割据。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隋朝封建统治政权，正是在农民革命斗争的沉重打击和隋官起兵割据的分化瓦解下，走向灭亡的。

一、隋官的起兵割据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朝统治政权，在全国农民起义接连数年的沉重打击下，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此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中许多握有实权的地方官僚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乘机纷纷起兵，打出反隋的旗号。是年十二月，隋虎贲郎将罗艺

---

①② 《旧唐书》卷五十六《杜伏威传》。

"将图为乱"①，首先于涿郡发动兵变，杀死渤海郡（治今山东阳信西南）太守唐祎等数人，据有涿郡而自称幽州总管，柳城（治今辽宁朝阳）、怀远（今辽宁沈阳西南）等地"并归附之"②，成为一支"威振边朔"③的割据势力。

大业十三年（617年），随着农民起义斗争的深入发展，各地官僚地主的起兵反隋，也趋向不断高涨之势。这一年，先后爆发的隋官起兵割据，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起：

朔方（治岩绿，今陕西白城子）鹰扬郎将梁师都，"阴结徒党数十人"④，杀死郡丞唐宗而据郡起兵，北连突厥反隋。梁师都始自称大丞相，夺取雕阴（治上县，今陕西绥德）、弘化（治合水，今甘肃庆阳）、延安（治肤施，今陕西延安东北）等郡后，改称皇帝，国号梁，建元永隆；并接受突厥封号，称大度毗伽可汗。

马邑（治善阳，今山西朔州）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联合当地豪强，杀死该郡太守王仁恭，据郡自称太守，并"遣使附于突厥"⑤，在突厥出兵支援下，打败了来攻的隋军。接着，刘武周率兵袭破楼烦郡（治静乐，今属山西），夺取汾阳宫（位于今山西静乐东北），攻陷定襄郡（治大利，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不久，刘武周称帝，建元天兴；并接受突厥封号，称定杨可汗。

因罪被流放到榆林（治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的左翊卫郭子和，乘郡中发生灾荒之机，"潜结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门"⑥，执杀郡丞王才，开仓赈济饥民，自称永乐王，建元丑平。为了巩固其地盘，郭子和"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各遣子为质以自固"⑦，并接受突厥官号称屋利设。

金城（治兰州，今属甘肃）府校尉薛举，乘陇西"群盗蜂起，

①②③ 《旧唐书》卷五十六《罗艺传》。

④ 《旧唐书》卷五十六《梁师都传》。

⑤ 《旧唐书》卷五十五《刘武周传》。

⑥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三月。

百姓饥馁"① 之机，与其子薛仁杲（一作"薛仁果"）阴聚豪强劫持金城令郝瑗，囚禁郡县官，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封其长子仁杲为齐公、少子仁越为晋公。薛举父子起兵后，"掠官收马，招集群盗，兵锋甚锐，所至皆下"②，不久则称帝于兰州（金城郡治），成为一支"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③的封建割据势力。

武威（治姑臧，今甘肃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在其得悉薛举父子起兵的消息后，为"保据河右"④ 不被薛举侵扰，遂与同郡豪强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人"谋共举兵"⑤，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等人，始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并以开皇旧制，置署设官，后又改称皇帝。李轨聚党起兵之后，相继攻陷张掖（治张掖，今属甘肃）、敦煌（治敦煌，今甘肃敦煌西）、西平（治湟水，今青海乐都）、枹罕（治枹罕，今甘肃和政西北）等地，成为"尽有河西五郡之地"⑥的封建割据势力。

巴陵（治巴陵，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瓒、徐德基、郭华等人"同谋叛隋"⑦，共推罗川（即罗县，今湖南汨罗）令萧铣为主。萧铣本南朝梁宗室后裔，因以自称梁王，建元凤鸣。后又称皇帝，依照南梁旧制，置署设官。萧铣派兵相继攻陷南郡（治江陵，今属湖北）、略定岭表（即岭南地区），成为一支拥有"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⑧ 广大地区和拥有"胜兵四十余万"⑨的割据势力。

在隋末起兵割据的诸多官僚地主当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太原留守李渊、李世民父子。当全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李渊父子看到隋朝统治即将崩溃，也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大业十三年（617 年）五月，李渊父子杀死太原副留守王威及高君雅等人，揭起反隋大旗。同年七月，李渊率兵 3 万进军关中，沿途击败对

---

①②③ 《旧唐书》卷五十五《薛举传》。

④⑤⑥ 《旧唐书》卷五十五《李轨传》。

⑦⑨ 《旧唐书》卷五十六《萧铣传》。

⑧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四月。

义军进行堵截的隋军，于十一月进占隋都长安，暂立代王杨侑为恭帝，改元义宁。至此，在全国范围内，隋朝统治势力所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就只有江都和洛阳两个孤立的据点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统治阶级内部分离出来的这部分握有实权的官僚地主及其武装力量，无疑是加速隋朝灭亡的不可小视的力量。他们与农民军既同时反隋，又相互对立。这两种力量的错综交织，既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显著特点，又是造成农民军后期斗争趋于曲折复杂的重要因素。

二、隋炀帝统治的覆灭

以炀帝杨广为首的隋王朝黑暗暴政，正是在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和官僚地主的起兵反叛的双重夹击之下，而走向最后覆灭的。

（一）杨广在江都继续作恶

大业十二年（616 年）七月，隋炀帝杨广自东京洛阳到江都以后，这个本欲躲避农民革命风暴而寻求安乐之所的封建暴君，对自己以往腐化作恶的行径，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荒淫益甚”①。杨广所居之宫，内置百余房间，各以美女居住，每日一房轮流做主人，供杨广及其萧后等众姬千余人就房中饮酒作乐。杨广见天下已乱，常常惶恐不安，他对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侬不失为长城公（指陈叔宝降隋后被封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指叔宝妻沈氏），且共乐饮耳！”②因此，他每日杯不离口，完全沉湎于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之中。有一次，杨广取镜自照，情不自禁地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萧后惊问其故，他强颜作笑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斩头）亦复何伤！”③

然而，杨广如同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一样，他虽然已经预感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三月。

到穷途末路，自身难保，但也并不甘心束手待毙，退出历史舞台。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杨广“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①，打算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企图“保据江东”②，以维持苟延残喘的隋王朝。可是，就在杨广下令修建丹阳宫，准备迁都的时候，一场密谋推翻炀帝统治的宫廷政变，正在江都酝酿之中。

（二）江都政变与杨广被杀

是时，“江都粮尽，将士离心”③。杨广到江都时所带的护驾部队“骁果”多系关中人氏，他们久客思故乡，因见杨广并无西归之意，由是“谋欲叛归”④。先是郎将窦贤率所部叛离江都西走，虽为杨广派兵所追杀，“而亡者犹不止”⑤。在此形势下，总领骁果的虎贲郎将司马德戡，暗中联络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内史舍人元敏、鹰扬郎将孟秉（一作“孟景”）、虎牙郎将赵行枢、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等人，“因谋构逆”⑥，并共推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主，准备推翻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初十，司马德戡召集骁果全部军吏，“谕以所为。众皆伏曰：‘唯将军命’”⑦；同时，他又派人“盗御厩马，潜厉兵刃”⑧，为发动政变做好了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是日入夜，元礼、裴虔通当值，专管皇宫内殿；唐奉义负责禁闭城门，为使政变部队顺利打进皇宫，他故意“诸门皆不下钥”⑨。夜至三更时分，司马德戡于东城内集兵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⑩，尔后率兵自玄武门攻入皇宫。杨广闻变，慌忙“易服逃于西阁”⑪，为变兵所捕获。次日天明，司马德戡迎接宇文化及入宫，当天将杨广缢杀于宫中，隋氏宗室、外戚也多被捕杀。隋炀帝这个“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⑫的封建暴君，终于在农民革命斗争与统治阶

---

①②⑤⑧⑪《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三月。

③《隋书》卷六十五《赵才传》。

④⑥⑦⑨⑩《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

⑫《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评语。

级内部斗争的双重打击下，结束了他的腐朽统治。

江都政变、杨广被杀之后，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总揽全权；立秦王杨俊之子杨浩为帝，又以己弟宇文智及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对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司马德戡，仅赐爵温国公、加光禄大夫，虽仍以其专统骁果，但却心忌之。不久，便以司马德戡为礼部尚书，“外示美迁，实夺其兵也”①。从此埋下两人火并和司马德戡最终被杀的种子。

是年五月，杨广被杀的消息传到东京洛阳以后，越王杨侗被留守诸官拥立为帝，改元皇泰；同月，李渊于长安废恭帝杨侑，自立为帝，建国号曰唐，改元为武德。至此，统治仅历38年的隋王朝归于灭亡；唐王朝的建立则揭开了中国封建社会新的一页。

第七节　隋亡后农民军的曲折斗争

杨广的被杀和李渊的称帝，标志着旧王朝的结束和新王朝的开始。在此新旧朝代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从战略全局来看，以瓦岗、河北、江淮三大义军为主力的农民军，虽在摧毁隋朝暴政的斗争中，各自作出了不可泯没的巨大贡献，但并没有最终完成自己的斗争使命。在新的形势下，他们不仅仍然肩负着同盘踞于洛阳的王世充和自江都北进的宇文化及这两个隋朝残余势力的斗争，而且还面临与李唐王朝以及其它割据势力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由于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义军主观指导上的失误，致使后期的农民革命斗争呈现艰难曲折乃至最后失败的结局。

一、瓦岗军的曲折斗争与最后失败

（一）宇文化及北上与杨侗对义军诱降

---

① 《隋书》卷八十五《司马德戡传》。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与司马德戡等人于江都发动政变杀死杨广以后，利用官兵久盼西归的恋乡心理，以“欲还长安”① 为名，率领禁军“骁果”及在江淮地区招募的士卒共约十余万人，自江都沿水路北上，企图逐鹿中原，夺取统治权。当其率军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时，因水路不通，遂弃舟登陆。宇文化及在途中消灭图谋反叛的司马德戡及其党羽之后，“拥兵北上，直指东郡”②。宇文化及所率之“骁果”，是杨帝统治后期隋军的主力部队，宇文化及率军北上的这一行动，不仅直接危害激战于洛阳地区的瓦岗军的安全，而且对盘踞于洛阳的杨侗势力，也是个严重威胁。因此，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应付北上的宇文化及军，便成为杨侗和义军都在谋求解决的问题。

是年五月，已于洛阳称帝的越王杨侗，对于杀死其祖父杨广的宇文化及，既仇恨又畏惧。当宇文化及率军自东郡西进的消息传来后，洛阳顿时陷于“上下震惧”③ 的严重混乱局面。在此危急情况之下，杨侗采纳盖琮等人“请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④的建议，并以盖琮为通直散骑常侍往说瓦岗军，企图以高官厚禄诱降李密，借瓦岗军的力量阻击宇文化及西进，并让双方在互斗中两败俱伤，然后“徐承其弊”⑤，坐收渔人之利。杨侗对李密诱降的阴谋活动，给瓦岗军后期的斗争带来了极大危害性，使义军步入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历程。

(二) 黎阳之战与李密接受诱降

六月末，宇文化及留刑部尚书王轨(王轨原为东郡通守，降宇文氏后被任为刑部尚书)在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看守辎重，自率大军北趋黎阳。是时，驻守黎阳的瓦岗军将领徐世勣，为避敌之军锋，主动撤兵西保黎阳仓城。宇文化及率军渡过黄河进占黎阳后，遂分兵西出进围徐世勣。有鉴于此，李密亲率步骑兵2万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三月。

②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六月。

人前来救援，屯军于清淇（今河南滑县西南），采取深沟高垒、待机破敌的战术，与黎阳仓的徐世勣“以烽火相应”①，互成犄角之势。宇文化及每攻仓城，李密即挥军袭击其后，使其进攻不能得逞。宇文化及又大造攻城器械“四面攻仓”②，对此，徐世勣一面于城外掘深堑以阻断敌军近城，一面于仓城壁垒中挖地道通往城外，暗出奇兵袭击攻城之敌，尽焚其攻城器械，致使宇文化及军“大败而去”③。

尽管瓦岗军采取深沟高垒、待机破敌的战术，守住了黎阳仓城，但并没有完全消除被围攻的不利态势。就在这时，洛阳杨侗所派之通直散骑常侍盖琮来到清淇诱降李密。为了摆脱瓦岗军西“与东都相持日久，又东拒化及”④的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李密采取妥协之策，欣然接受杨侗诱降，遂派记室李俭、上开府徐师誉等人，随盖琮赴洛阳入见杨侗。于是，杨侗册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⑤；又任命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李密对于杨侗的册封，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还“因卑辞以报谢焉”⑥。不久，杨侗又遣大理卿张权、鸿胪卿崔善福赐书李密，许以“七政之重，伫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挥”⑦。从此，李密便“悉以精兵东击化及”⑧了。

（三）童山之战与宇文化及败走魏县

宇文化及在进占黎阳以后，由于久攻仓城而未下，至七月，其所属部队粮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李密在获悉这一情报后，采取假意议和与伪供军粮为手段“以弊其众”⑨。宇文化及求粮心切，不审虚实，竟让部队随意食用军中仅存的余粮，而寄希望于李密提供军粮，及至余粮用尽，才发觉中计上当。宇文化及在盛怒之下，便率军渡过永济渠，向瓦岗军发起猛烈进攻，双方终日激战于童

①④《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六月。

②③《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⑤⑥⑨《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⑦⑧《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山（位于今河南浚县西南）之下，李密为流矢所中，堕马昏迷不醒，义军受挫奔散，幸得秦叔宝全力护卫营救，才从乱军中将李密救出。之后，秦叔宝复收兵继续奋战，终于打退宇文化及军的进攻。宇文化及无奈，只好率军西入汲郡（治卫县，今河南滑县西）抢粮；同时，“又遣使拷掠东郡吏民以责米粟”①。由于宇文化及采取此种不得人心的劫掠抢夺政策，不仅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也加剧其内部的分化瓦解。先是留守滑台而“不堪其弊”②的刑部尚书王轨“以城归于李密”③；继有其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率江淮排穳兵、张童儿率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密”④。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宇文化及被迫率余部2万人，向北逃往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李密认为来自东面宇文化及军的威胁已经解除，遂留徐世勣率部仍驻守黎阳，自率瓦岗军主力西向还屯巩洛（洛水至巩县入河，故有巩洛之称）。

童山之战，瓦岗军虽然最后击败了宇文化及军的进攻，保住了黎阳仓，但自身的消耗、损失颇大，“其劲兵良马多战死，士卒皆倦”⑤，瓦岗军的实力受到较大削弱，给义军此后对敌作战，带来很大不利。

（四）王世充乘隙反扑与瓦岗军北邙之败

在瓦岗军与宇文化及激战期间，东京洛阳一场将由王世充发动的兵变正在加紧酝酿之中。杨侗称帝后，王世充虽官拜纳言，但实权却为内史令元文都、卢楚等人所控制。元、卢二人力主招降李密的建议被杨侗采纳以后，王世充生怕李密降后自己位居其下，因此，十分忌恨元、卢二人。于是，暗中积极策划，准备除掉元、卢。七月十五日夜，王世充发动兵变，先后杀死元、卢二人及其诸子，迫使杨侗以其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此时，率领义军西返进到温县（今河南温县东）的李密，得悉元文都等人

---

①③ 《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

②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⑤ 《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皆死于兵变的消息后，便打消了“入朝辅政”的念头，遂进驻金墉城。

王世充控制了洛阳的军政大权以后，为了消灭瓦岗军，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他一方面针对“东都绝粮”①、军心不稳的情况，利用瓦岗军缺少衣服的困难，采取以衣易粮的手段，稳定了军心士气；一方面采取“厚赐将士，缮治器械”②等备战措施。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王世充决心乘瓦岗军童山战后尚未完全恢复之隙，简选精兵二万余人、战马二千余匹，于九月初十自洛阳东出进攻瓦岗军。次日，王世充率军进至偃师（今河南偃师东南）境内，于通济渠南安营扎寨，并立即于渠上架起3座桥梁，以沟通前进道路。

是时，瓦岗军的兵力部署是：王伯当率部守金墉城，邴元真率部守兴洛仓，郑颋率部守偃师，李密亲率主力屯于北邙山。在王世充即将展开进攻的前夕，李密召集军事会议，与诸将共同商讨战守之策。上柱国裴仁基认为，王世充率精兵而来，洛阳必然空虚，据此，可分兵扼守要道，以阻其长驱东进；再选精兵3万，沿河（这里指洛水）西出，“以逼东都”③。这样，王世充必然弃攻回救，对此我可按兵不动；待其再来进攻，我又出兵逼之，如此反复多次，“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④。李密听了裴仁基的发言后，十分赞赏地说：“公言大善”⑤。接着，李密又进一步分析指出：王世充凭恃兵甲器械精良和士卒食尽求战心切，决计深入来犯，对此不可立即与之决战，而应凭城固守以避其锋锐，

---

①②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③ 《隋书》卷七十《裴仁基传》。

④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而《隋书》和《北史》的《裴仁基传》则载称：李密在听了裴仁基的发言后，斥之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但从裴、李的主张来看，内容虽略有不同，但其要旨是一致的，即二人均主张不马上与敌决战。故《资治通鉴》说为是。

“按兵蓄力以观其弊”①；待其“求斗不得，欲走无路”②的时候，再出兵进击即可破之。裴仁基的主张意在扼守要道阻敌长驱直入的前提下，采取佯动误敌之法，调动敌人就范；李密的意见旨在坚守不战、待机破敌。如把裴、李二人的主张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么，便是一个依据敌情实际而确定的以攻为守、攻守结合的积极防御之策。但是，裴、李这一要旨一致的正确战略主张，却遭到了单雄信、陈智略、樊文超等将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王世充兵少，且屡被击败，已完全丧胆；义军兵力不仅多于王世充，而且江、淮新附之将士皆欲求战立功，正可“及其锋而用之”③。因此，他们坚决主张立即与敌进行决战。单雄信等人对敌我双方兵力状况的看法，虽然不无一定道理，但从总体上看，是带有较大片面性的意见。对王世充军，他们只看到其兵力人数少于义军和以往屡战皆败的一面，而不见其军经过备战以后“人心渐锐”④和“器械精”⑤ 的一面；对瓦岗军，他们只强调义军数量多于敌方的一面，却忽略了童山一战损失颇重且未完全恢复的一面。由于过低地估计敌方和过高地估计己方，他们便提出了立即与敌决战的主张。然而，正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冒险主张，竟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将领的赞同。这就严重干扰和动摇了李密正确决心的定下。裴仁基会上苦争不从，无奈而发出了“公后必悔之”⑥的长叹。会后，书记魏徵想通过右长史郑颋来劝说李密能够排除干扰而定下正确决心，他深刻指出：瓦岗军虽胜宇文化及军，但“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而“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⑦。据此，魏徵建议李

---

①② 《北史》卷三十八《裴仁基传》。又见《隋书》卷七十《裴仁基传》。

③⑥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④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⑤ 《隋书》卷七十《裴仁基传》。

⑦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

密要“慎无与战”①，主张采取“深沟高垒，旷日持久”②的坚守固垒、持久疲敌的作战方针。然而，这一符合实战需要的取胜之策，却被郑颋讥笑为“老生之常谈”③，而拒绝向李密转达意见。李密身为义军最高统帅，会议之初虽对敌情作过正确判断和提出了正确战略方针，却因“惑于众议”④，而终于改变了自己初始的正确决心，作出了立即出兵与敌决战的错误决定。

九月十一日，王世充遣数百骑兵渡过通济渠，向屯兵于偃师城北的单雄信营地发起攻击，李密急派裴行俨、程知节两将率兵自北邙山前往救援。行俨先驰赴敌，不幸中矢堕地，知节救之而还；敌骑追击，知节返身奋杀，敌骑受挫败退。时至入暮，双方各自收兵还营。初次交锋，瓦岗军竟有骁将孙长乐等十余将领身受重伤。尽管义军初战失利，但李密仍因新败宇文化及而轻敌之心颇重，故依然“不设壁垒”⑤。这就为王世充军暗袭义军提供了可乘之隙。当夜，王世充派遣二百余骑兵潜入北邙山谷设伏。次日天刚亮，王世充即对其所属部队进行战斗动员，说：“今日之战，非直争胜负；死生之分，在此一举。若其捷也，富贵固所不论；若其不捷，必无一人获免。所争者死，非独为国，各宜勉之！”⑥随后，即率军向北邙山瓦岗军主力逼近。李密因“有轻世充之心”⑦，预先备战不足，临敌只得仓卒出兵应战，未及列好阵势，王世充即挥军冲杀过来。王世充所部“皆江、淮剽勇”⑧，骁健能战；他又事先找一貌似李密的人“缚而匿之”⑨，待其士卒交战方酣之时，突然将此缚匿之人拉过阵前，大叫：“已获李密矣！”⑩其士卒信以为真，斗志倍增。就在这时，其伏兵骤然而起，乘高驰下，直迫李密军营，“又纵火焚其庐舍”⑪；瓦岗军“大惊而溃”⑫，其将张童儿、陈智略等人不战而降，李密无奈，遂率领余众万人退往洛口

---

①②③《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

④⑥⑧⑨⑩《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⑤⑫《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⑦⑪《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

方向。

王世充乘胜挥军夜围偃师，义军守将郑颋为部下劫持后“以城降世充”①；裴仁基、祖君彦等数十名将领被俘。接着，王世充率军自偃师东向进攻洛口仓。该地义军守将邴元真，原本隋朝县吏，投瓦岗军后任元帅府右长史，因其“性贪鄙”②，有人曾建议李密及早将其除掉，李密虽未准许，但事泄后，邴元真便忌恨于心，伺机“阴谋叛密”③；及至义军北邙战败，李密被迫东走将入洛口之时，邴元真已暗中派人迎引王世充军。李密对邴元真的背叛行径，表面上采取“知而不发”④的态度，暗地里却与众将谋议，拟“待世充之兵半济洛水，然后击之”⑤。可是，当王世充率军东进抵达洛水之时，义军担任侦察任务的候骑并未发觉，及至发现而将要出击的时候，王世充军已全部顺利渡过洛水，直趋洛口仓。此时，单雄信等义军将领“又勒兵自据”⑥而不出援，在此情况下，李密自度不支，遂率所部轻骑东奔虎牢。邴元真“竟以城降于世充”⑦；接着，单雄信也以所部叛降王世充。

瓦岗军北邙对王世充军的作战，由于李密急于决战的错误指导和将领内部的叛降，使义军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前后被俘降的将士及后勤人员达“十余万人”⑧。从此，瓦岗军的斗争由低潮而走向失败。

（五）李密归唐与瓦岗军解体

李密率领轻骑向东退往虎牢以后，本打算北赴黎阳与徐世勣合兵一处，但有人劝密说：“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⑨李密听后，遂打消北赴黎阳的念头。此时，据守金墉的王伯当已弃城退保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李密自虎牢北渡黄河而归之。到达河阳以后，李密召集诸将会议，共商今后打算的问题。当他首先把自己“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

---

①③⑤⑦《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④⑥⑨《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⑧《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月。

以图进取”[①]的行动设想讲出以后，诸将都对他继续停留河南地区的想法表示不赞成，并且指出说：“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②]李密听了诸将的发言后，失去主张地说：“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③]遂拔剑欲自刎以谢大家，幸被王伯当及时抱住救下。李密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便提出了一个西去关中降唐的想法。他说：“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④]此议一出，立即得到诸将赞同。于是，李密率领诸将及所属部众2万人，西入关中归附了李唐；瓦岗军原所占有的河南诸郡县，大多沦于王世充的控制之下。对于李密归唐举动，唐高祖李渊深表欢迎，“遣使迎劳，相望于道”[⑤]。李密抵达长安后，李渊拜其为光禄卿，爵封邢国公；其他诸将，也都得到不同封赏。其后，李渊派遣秘书丞魏徵（归唐后任职）前往黎阳说降了徐世勣，李渊授任其为黎州总管，封莱国公，并赐李姓，史称李勣。从此以后，瓦岗军作为反封建的农民武装力量，已经完全解体，结束了自创建以来多年艰苦奋战的光荣历史。

李密归唐以后，因“自负归国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⑥]，常常郁郁不乐，尤对受任光禄卿（专掌皇室酒醴、膳羞之事的职官）“深以为耻”[⑦]。为此，他在得到旧将王伯当的支持下，表奏李渊，以前往山东收抚旧部为名而另谋发展。李渊遂派李密与王伯当率本部兵马前往黎阳，当行至桃林（今河南灵宝东北）时，渊又令其疾速返回，李密因之“大惧，谋将叛”[⑧]；伯当虽劝阻，但密不从。于是，李密亲率骁勇之士数十人攻入桃林县府，“因据县城”[⑨]而起兵反唐。接着，李密率众东向，派人驰告襄城（治承休，今河南临汝）的故将张善相，“令以兵应接”[⑩]。但当李密率部进至

---

①②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④⑧⑨⑩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⑤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月。

⑥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

陆浑县（今河南嵩县东北）南70里处，突遭唐军伏兵袭击，李密与王伯当等战败被杀，密年仅37岁。①

二、河北农民军的曲折斗争

（一）河间收降隋官王琮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窦建德指挥河北农民军于七里井大败隋将薛世雄军后，乘胜移兵北向，进围河间郡（治河间，今属河北），由于郡丞王琮凭城固守顽抗，义军围攻岁余不下。次年七月，当隋炀帝杨广于江都被杀的消息传到河间以后，给正在围攻该郡城的义军领袖窦建德以前所未有的影响，自此，河北农民军的斗争进入了复杂曲折的发展阶段。是时，河间郡丞王琮获悉炀帝被杀如丧考妣，亲率士吏为之发丧；受封建忠君思想毒害的窦建德则派员入城进行祭悼。王琮因感建德"遣使吊之"②的态度至诚，遂率官属"素服面缚诣军门"③请降；建德则亲释其缚，设宴款待。酒宴之间，当说到隋亡之事时，王琮痛哭流涕，"建德亦为之泣"④。有的义军将领因王琮负隅顽抗，杀伤义军甚众，建议将王琮杀掉以平民愤时，窦建德非但不准，而且还严令军中：谁敢轻举妄动，则将"罪三族"⑤。并授王琮为瀛州（即河间郡，唐时改瀛州）刺史。不久窦建德正式定都乐寿，将其居所命名为金城宫，并依隋开皇之制⑥，"备置百官"⑦。其后，改国号曰夏，改元五凤。

（二）深泽兼并魏刀儿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据有深泽（今属河北）而活动于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县）之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③④⑤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⑥ 见《新唐书》卷八十五《窦建德传》。

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七月。

间的另一支农民军魏刀儿，有众10万，自称魏帝。窦建德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联合为名，乘魏刀儿守备松弛之隙，出兵袭击之，攻占深泽，击斩魏刀儿，“尽并其众”①。接着，易（治易县，今属河北）、定等州不战而降；唯有已附李唐的冀州刺史麹稜未降，建德率兵急攻，城陷稜降，建德待之以厚礼，任其为内史令。为了进一步向北扩大势力范围，建德复于十二月率兵10万，进攻据守幽州已附李唐的罗艺，但“相拒百余日”②而终未能克，只好退兵南返乐寿。

（三）聊城擒斩宇文化及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宇文化及于童山战败率余众北走至魏县以后，鸩杀其所立之杨浩，自称皇帝，国号曰许，建元天寿，并“署置百官”③。不久，他引军东北进至聊城（博州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企图“以珍货诱”④使附近的农民军归降；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义军王薄乘机率众“诈来投附”⑤，宇文化及信以为真，“与共居守”⑥。当宇文化及魏县称帝与东进至聊城的消息传到乐寿以后，窦建德十分震怒，他对隋之降官、现为义军纳言的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绍说：“吾为隋之百姓数十年矣，隋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杀之，大逆不道，此吾雠矣，请与诸公讨之，何如？”⑦此议一出，立即得到宋、孔二人的积极支持。接着，窦建德亲自率兵进讨宇文化及，于聊城外围“连战大破之”⑧；宇文化及退保聊城，建德挥军进抵城下，并“纵撞车抛石，机巧绝妙，四面攻城”⑨。就在建德加紧攻城之际，诈降宇文化及且佯“与共守聊城”⑩的王薄，率众作内应，打开城门“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虏其众”⑪。窦建德率军入城之后，首“先谒隋萧皇后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

③⑤⑥⑪ 《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

④⑩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闰二月。

⑦⑧⑨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炀帝妻），语皆称臣，素服哭炀帝尽哀；收传国玺及卤簿仪仗，抚存隋之百官”①；继而将参与谋杀杨广的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秉等人处死，“枭首辕门之外”②；然后，以槛车载宇文化及并其二子承基、承趾北返至大陆③（今河北隆尧东）时，在历数其“杀君之罪”④以后，连同其二子皆斩之，并传首以献嫁给突厥可汗为妻的隋义成公主。

宇文化及作为隋王朝的封建贵族和炀帝政权的重要成员之一，无疑应是农民起义的打击对象，杀了他乃是其罪有应得。但是，身为农民起义领袖的窦建德，对杨广之被杀先是“遣使吊之”，继则公开提出为其报仇，此种作法不能不同农民起义反抗炀帝暴政的初衷相背离，因而也是导致河北农民军后期斗争走向艰难曲折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接受杨侗封号称夏王

窦建德在率军消灭宇文化及以后，北返回到乐寿，进一步建立健全其政权机构。对于所收降的隋朝文武官吏，凡愿留任的，他都“随才拜授，委以政事”⑤。因之，先后拜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内史侍郎虞世南为黄门侍郎、太常博士欧阳询为太常卿，等等。而对不愿留任的隋官吏，无论是欲投关中还是东京洛阳的，皆听其便，并发给资粮，以兵护送出境。对于俘获的隋骁果近万人，“亦各纵遣，任其所之”⑥。接着，窦建德“又与王世充结好”⑦，派遣使者奉表赴东京洛阳朝拜隋皇泰主杨侗，并接受杨侗的封号，称夏王。

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于长安称帝建唐以后，在巩

---

①⑥《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闰二月。

②⑤⑦《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③ 大陆，《隋书·宇文化及传》作“河间”，《资治通鉴》作“襄国”。本书这里从《北史·宇文化及传》与新、旧《唐书·窦建德传》说。

④《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

固了关中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自是年十一月始，李渊先后出兵平定据有陇右、河西、河东等几支敌对割据势力以后，便把战略进攻的矛头转向盘踞洛阳的隋朝残余腐朽势力王世充。而此时“以布衣而起”①的农民军领袖窦建德，由于受封建忠君思想的毒害，竟接受隋朝皇室杨侗的封号，与腐朽的封建割据势力王世充携手联合。此种有悖于农民起义斗争方向的作法，恰是导致河北农民军此后在与唐军争夺中原作战失败乃至最后解体的重要政治原因。

三、江淮农民军的曲折斗争

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如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军一样，也经过了由发展壮大到衰落失败的曲折斗争历程。

（一）上表杨侗称臣接受封号

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杜伏威率军击败隋军陈稜部的进攻，继而乘胜占领历阳以后，由于采取了“进用士人，缮利兵械，薄赋敛，除殉葬法”② 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加强战备的措施，使这支起义队伍逐渐发展成为江淮地区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农民武装。次年三月，宇文化及等人杀死杨广而控制了江都政局以后，为了寻求对其政变的支持者，曾以授任历阳太守一职来诱引杜伏威就范，但为伏威所断然拒绝。可是，就在其拒绝宇文化及的政治利诱之后不久，这位出身于贫苦家庭的农民军领袖，竟为封建忠君思想所使，主动向洛阳的杨侗上表称臣，并受任为隋东南道大总管，爵封楚王。杜伏威主动向隋朝皇室称臣受封一事，这不能不给江淮农民军的斗争带来不利影响，也是导致义军后期

①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② 《新唐书》卷九十二《杜伏威传》。

斗争走向曲折复杂的重要因素。

（二）应援隋将进攻义军李子通

在杜伏威上表称臣于杨侗之时，江淮地区除了他和辅公祏领导的农民军外，还有据毗陵（治晋陵，今江苏常州）称梁王的隋官沈法兴、拥兵江都（治江阳，今江苏扬州）的隋将陈稜、据海陵（今江苏泰州）称将军的农民军李子通等几支规模较大的武装力量。由于他们“并握强兵，俱有窥觎江表之志”①，因而也给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农民军的斗争带来了复杂性。唐武德二年（619年）九月，李子通率领义军进攻江都，陈稜见势危急立即南求救于沈法兴，而西乞师于杜伏威。沈法兴应援派子沈纶率兵数万进至扬子（今江苏扬州西南），杜伏威则应援率兵进屯清流（今安徽滁县）。李子通为破坏沈、杜两路援军协力来攻，采纳部下计策，“募江南人诈为纶兵，夜袭伏威营”②。伏威不明真相，因恨沈纶侵己而出兵袭击之，由是沈、杜“二人相疑，莫敢先动”③。在此情况下，李子通得以尽锐攻陷江都，继而大破沈纶军，伏威见状亦自清流引兵退归历阳。陈稜于江都城破后逃往伏威处，不久为伏威所杀。李子通入据江都，自立为帝，国号为吴，建元明政，成为与杜伏威相并立的又一政权。

（三）杜伏威归唐受新职

在李子通攻占江都称帝后不久，杜伏威与辅公祏向唐请降，李渊授伏威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安抚大使、上柱国，封吴王，并赐姓李氏，“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④；授任辅公祏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至此，杜伏威与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已经结束了反抗隋王朝压迫的斗争使命，转而变成唐军攻取河南、消灭王世充割据势力的重要助攻力量。但是，其后随着杜

---

① 《旧唐书》卷五十六《沈法兴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纪三》，高祖武德二年九月。

③ 《旧唐书》卷五十六《李子通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高祖武德三年六月。

伏威入朝任职和辅公祏起兵反唐，这支久战江淮地区的农民军，又经历了被镇压乃至完全解体的痛苦历程。

第八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及其主要经验教训

隋末农民大起义，自大业七年（611 年）王薄于长白山起兵，到大业十四年（618 年）三月杨广在江都被杀，诸路义军经过七年多的艰苦奋战，终于摧毁了隋王朝的残暴统治。这充分地显示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强大威力，对推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进，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其所经历的胜利、曲折乃至失败，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农民革命斗争的成败，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经验教训。

一、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隋末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隋王朝黑暗、腐败的封建统治，为开辟中国封建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其重要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朝封建地主阶级，使广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隋炀帝实行暴政，是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而其暴政在全国的推行，又是通过各地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来贯彻实施的。因此，起义的农民在奋起反抗炀帝暴政的斗争中，必然要把斗争矛头集中而直接地指向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指向贵族、官僚、门阀士族等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的旧势力，和其他新崛起的豪门贵族，因为他们正处在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带，所以受到的打击也就更加沉重。农民起义军攻城拔邑中，“得隋官及

士族子弟……杀之"①；对于隋之"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②，确实镇压了一批直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和士族豪强。史载继隋亡而兴的唐朝初年出现的关东魏齐旧姓望门"皆沦替"③、燕赵右姓大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④ 的进一步衰败局面，恰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奋起扫荡的结果。随着地主官僚、门阀士族势力的急剧衰败，农民乘机夺回部分土地自己去耕种，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而且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起义风暴给奴隶制残余以极大荡涤，从而使广大奴婢获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解放。魏晋南北朝至隋代，中国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中期发展阶段，但是，贵族、官僚占有大量奴婢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奴婢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他们被看成牛马田宅一样，可以随意买卖或赏赐。据《隋书》和《册府元龟》等史书记载，自杨坚执掌北周朝政开始，到隋朝灭亡的 38 年中，经杨坚、杨广父子赏赐官吏、将领的奴婢共有 35 次、5222 人，平均每年赏赐奴婢 137 人之多。北周末年，杨坚执政之初，以行军元帅梁睿统兵平定益州总管王谦叛乱作战有功，杨坚一次即赏赐其"奴婢一千口"⑤；隋朝建立后，总管周法尚因屡战功著，先后六次受赏奴婢累计 800 人。⑥ 由此可见，隋朝贵族、官僚占有大量奴婢的现象，特别是"以战俘为奴婢的事，在隋代还是相当严重的"⑦。但是，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唐朝，到"安史之乱"前的 130 余年间，史载由皇帝赏赐奴婢的事，仅有 17 次、约 1870 余人，平均每年赏赐奴婢约 14 人，与隋代相比，唐代每年平均赏赐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五十六《杜伏威传》。
③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④ 《唐会要》卷八十三《嫁娶》。
⑤ 《隋书》卷三十七《梁睿传》。
⑥ 《隋书》卷六十五《周法尚传》。
⑦ 参见《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

奴婢次数约相当于隋代的14%，所赐奴婢人数约相当于隋代的10%。而且，从总体上看，唐朝赏赐奴婢的次数和人数，是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到了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年）以后，每次所赐奴婢数就微不足道了。[①] 上述隋唐两代赏赐和占有奴婢情况的重大变化，正是经过隋末农民起义斗争的结果。在隋末农民战争中，不少摆脱了隋官束缚的奴婢和部曲，都投身于农民起义队伍，或是参加到反隋的地主武装组织，成为反抗隋朝暴政的重要斗争力量。例如，李渊所领导的反隋武装，就是由许多"部曲及徒隶"组成的。大业十三年（617年）八月，李渊为奖赏霍邑作战的有功将士，针对"军吏疑奴应募者不得与良人同"[②] 的错误作法，尖锐指出："义兵取人，山藏海纳，逮乎徒隶，亦无弃者。及著勋绩，所司致疑，览其所请，可为太息。岂有矢石之间，不辨贵贱，庸勋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论功，将何以劝？黥而为王，亦何妨也？赏宜从重，吾其与之。"为此，他明确下令："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③] 接着，李渊于西河（治隰城，今山西汾阳）召开庆功大会，对作战有功的"部曲及徒隶"，给予了与"良人"同等待遇的奖赏；对于那些关中从军且欲归乡的军士，"并授五品散官"[④]后予以遣归。李渊在奖励军功问题上，不分贵贱、同等对待的开明作法，为其后唐朝实行"奴婢纵为良人"[⑤] 的进步政策，树立了良好开端。李渊之所以能够一反封建的某些传统观念，采取有利于"部曲及徒隶"人身解放的措施，是由于他真切地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推翻隋朝暴政斗争中的伟大力量，诚如其在指斥某些人"谏以官太滥"[⑥]而反对给徒隶出身的军士授官时所言："隋氏吝惜勋赏，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用兵乎！"[⑦]由此可见，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确是起到了

---

① 参见《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

②④⑥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

③ 《全唐文》卷一《唐高祖·徒隶等准从本色授官教》。

⑤ 《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

部分解放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历史作用。

再其次，起义深刻地教训了唐朝新的封建统治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唐朝是在隋朝已被农民大起义摧毁之后建立起来的。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亲眼看到了经济上富庶、军事上强大的隋王朝，是怎样由于隋炀帝杨广推行暴政而灭亡于农民大起义的严酷事实，这个因亲身所见而得到的教训，对于他们来说是最直接、最深刻的。因此，当他们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李世民登上帝位以后，始终不忘以“亡隋之辙”① 为戒鉴。仅据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直接论及以亡隋为戒者多达45处，而其中谈到以炀帝暴政引起农民大起义为戒者有21处。②震撼中国大地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充分显示了封建时代人民群众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对于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不但有认识，而且“常怀畏惧”③，正如其所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④ 又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⑤ 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从亡隋的戒鉴中，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所以，他自即帝伊始，便从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举贤任能、实行廉政、减轻剥削、发展生产等一系列进步的政策措施。实行这些政策措施，其目的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以确保唐王朝“宗社永固”⑥，使整个地主阶级“长守富贵”⑦，但在客观上确实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安定与统一。正是在唐初国家比较安定统一、所行政策比较切合实际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才使遭到严

---

①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第三十》。

②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论唐太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0月版。

③⑥ 《贞观政要》卷六《谦让第十九》。

④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一》。

⑤ 《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⑦ 《贞观政要》卷六《贪鄙第二十六》。

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据历史文献记载，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①这些对唐初社会景象的描述，虽然其中不无封建史家的溢美之处，但也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期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历史情况。此种兴旺、发展局面的形成，无疑是亲身经历过隋亡于隋末农民大起义深刻教训的唐太宗李世民，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采取一系列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的结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它以轰轰烈烈的革命变革力量，摧毁了旧的隋王朝黑暗统治的基础，而且还在于它以蓬蓬勃勃的社会前进动力，创造了新的唐王朝兴盛繁荣的条件。隋末农民大起义以自己空前壮观的斗争实践，进一步证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②。

二、隋末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

综观隋末农民起义战争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此次农民起义战争以其鲜明的特点和宝贵的经验教训，而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

首先，起义时间之长，义军队伍之多，波及范围之广，抗暴斗争之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显著特点。从大业七年（611年）王薄于长白山揭开大起义的序幕，到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杀而致隋朝灭亡，反抗隋朝暴政的农民起义战争历时长达7年之久，前后起义者达126起之

---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多①，义军队伍达数百万人，其斗争范围几乎波及了隋朝统治版图的各个地方，呈现出“星离棋布，以千百数”② 之势。此种空前壮观局面的出现，恰恰是以隋炀帝为首的隋朝黑暗暴政的残酷性造成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反抗就最烈。这在隋末农民起义斗争中是有明显体现的。如在126起的农民起义中，今山东、河北、河南以及江苏、安徽等五省共有89起（其中：山东31起，河北21起，河南15起，江苏、安徽22起），占全国起义总数的70.6%强。因为这些地方，正是隋炀帝实行横征暴敛而受害最重的地区。如此众多的起义队伍，在轰轰烈烈的反隋抗暴斗争中，经过分化组合，终于形成了足以摧毁隋朝暴政基础的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农民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军和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等三大农民武装力量。

其次，起义具有以推翻隋朝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明确政治目标。这是隋末农民起义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隋末农民起义三大主力军形成以后，特别是在瓦岗农民军的斗争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当时，义军领袖翟让采纳了李密的建议，为瓦岗军制定了“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战略决策；不久，李密又在夺取洛口仓、壮大义军队伍的建议中，提出了“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的口号，又为翟让所欣然采纳。十分明显，这一口号是对“席卷二京，诛灭暴虐”总战略决策的具体化，它既表达了瓦岗军推翻隋朝统治的决心（“除亡隋之社稷”），又体现了瓦岗军夺取全国政权而实现自身统治的思想（“布将军之政令”）。此一最终奋斗目标的提出和战略决策的制定，不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而且把隋末农民起义由开始那种单纯以“聚众剽掠”为目的的低级斗争阶段，升华到以推翻隋朝统治、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高级斗争阶段。这正是瓦岗军得以迅速壮大，并推动其他义军斗争不断向前发展的重

① 参见胡如雷：《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

② 《隋书》卷七十《裴仁基传》末史臣评语。

要原因之一。在隋末农民起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以后，仅在河南地区开展斗争的义军就有十五支之多，小者数千人，大者数万人，由于力量分散和缺乏统一领导，多为隋军镇压而失败。而瓦岗军却能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适时提出以亡隋夺权为根本目标的斗争纲领，从而把活动于河南地区的诸路义军都联合到瓦岗军的旗帜之下，使瓦岗军得以集中精兵猛将，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军的中坚力量，为其后主动积极地向隋王朝发动进攻并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奠定了雄厚基础。

再其次，义军在作战指导上，比较善于运用谋略计策和巧妙战法。这既是隋末农民起义战争的突出特点，又是其军事上多打胜仗的重要原因。当瓦岗军制定了"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总战略决策以后，面对义军兵多粮少、难以持久临敌的实际情况，义军实施了首先夺取隋朝粮仓的军事谋略。夺占了隋朝两大粮仓，这不但解决了义军的粮秣供应，壮大了义军队伍，而且切断了洛阳隋军主力的粮源，使瓦岗军取得了战略主动地位。农民军在与隋军作战中，都能比较注意根据敌情实际，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法制敌。例如，河北农民军采用诱敌入伏、出奇制胜的战法；江淮农民军采用诱敌出垒、速战全歼的战法；瓦岗农民军采用诱敌轻进、迂回包抄，以逸待劳、侧袭伏击等战法，都体现了农民起义军卓越的作战指挥艺术，因而往往能够连战皆捷，给隋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摧毁了隋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从而在客观上为后来李渊、李世民父子顺利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唐朝新的统治秩序，铺平了道路。

以瓦岗、河北、江淮三大农民武装力量为主体的隋末农民起义军，在轰轰烈烈的反隋起义的军事斗争中，虽然都各自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因而为推翻隋朝封建统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隋朝灭亡前夕和灭亡以后，他们在与起兵反隋的地主武装或是隋朝残余势力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中，都先后遭到了失败。此种结局的出现，是有深刻原因和严重教训的：

第一，在政治上，义军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与灭隋目标的动

摇，是导致隋末农民起义最后失败的基本原因。瓦岗军是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它的发展变化，无疑将直接影响着整个农民起义斗争的发展变化。大业十三年（617 年）十月，瓦岗军于黑石大破王世充军，正以威震中原之势顺利发展的时候，其领导集团内部却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握有义军指挥全权的李密，以翟让等人欲“夺密之权”①为由，将这位瓦岗军的创始人杀害了。不管李密出于何种理由，但采取此种自相残杀的行动，却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严重地破坏了义军内部团结，埋下了瓦岗军最终失败的种子。

隋炀帝杨广被杀以后，隋朝统治集团完全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这正是农民军进一步发展胜利的大好时机。但不幸的是，恰在这时，义军领袖们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封建忠君思想及正统观念的毒害，普遍发生政治动摇的严重倾向，把农民起义斗争逐渐引向歧途。江淮农民军领袖杜伏威，在杨广被杀之后，他虽然果断地拒绝了政变者宇文化及以其“署为历阳太守”②的高官厚禄相引诱，但却主动上表洛阳，接受隋朝皇室杨侗的封号称“楚王”，出任隋东南道大总管。河北农民军领袖窦建德，当他获悉杨广被杀的消息后，先是遣使祭悼，发誓要为被杀的杨广报仇；后“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朝隋越王侗于洛阳”③，并欣然接受杨侗的封号称“夏王”。瓦岗农民军领袖李密，在杨侗高官厚禄的政治诱降下，欣然接受封号称“魏国公”，并受任太尉、尚书令等军政要职。上述农民军主要领导者先后向隋朝皇室残余势力俯首称臣的作法，显然是与农民起义反隋斗争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的，它模糊了农民斗争的政治方向，涣散了义军将士的斗志。其后，瓦岗军之所以北邙战败后迅速解体，窦建德及其河北农民军之所以在唐军的进攻下落得兵败被执杀的结局，与义军领袖们政治上的逆转不无一

---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二《李密传》。

② 《旧唐书》卷五十六《杜伏威传》。

③ 《旧唐书》卷五十四《窦建德传》。

定关系。

第二，在军事上，义军战略指导的某些重大失误，是导致隋末农民起义战争最后失败的直接原因。义军战略指导上的重大失误，主要有以下三点：

1、战略进攻方向选择不当，且囿于已得的军事胜利而不求更大发展，这是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军战略指导上普遍存在的弱点。

当瓦岗军已经夺取了隋朝的洛口、回洛、黎阳等三大粮仓，义军队伍获得迅速发展壮大以后，能否根据敌情实际和战场态势的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军事部署，正确选择战略进攻方向，这是关系到义军成败的大问题。护军将军柴孝和依据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而提出的以部分兵力牵制洛阳隋军、以主力乘虚夺取关中的战略主张是积极可取的。当时，关中是隋都长安的所在地区，又是地势险要、便于攻守的"四塞"之地；生产破坏的程度较轻，物质条件优于中原地区；隋军兵力薄弱，防卫极度空虚。可见，关中既是隋朝的要害地区，又是隋军力量的薄弱环节。选择关中作为战略首要打击方向，无疑是壮大后的瓦岗军的最佳发展方向。河南处于四战之地，周围有不少敌对割据势力，选择此地作为战略首攻方向，很难摆脱数面受敌的不利地位；且洛阳城坚垒固，又有隋军精锐坚守，一时难以攻破。瓦岗军不能迅速破城，势必削弱自己力量而失去发展的机会；纵然攻占了洛阳，也因困于四战之地，难以建立巩固的基地，以对付其他武装割据势力的进攻。这是摆在义军面前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瓦岗军主要领导者李密在义军夺取了隋朝几大粮仓以后，满足于就食者"道路不绝"①的现状，而缺乏"一旦米尽民散"②的思想准备，遂置柴孝和的可行战略建议于不用，一味固执地强攻洛阳，致几十万大军长期顿兵于洛阳坚城之下，最终使瓦岗军失去了巩固和发展胜利的大好时机。这不能不是李密战略指导上的重大失策。李世民曾尖锐指出：

---

①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①,这可以说是切中瓦岗军战略失策要害的一种批评意见。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军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农民军，几经艰苦奋战，虽都发展成为威震一方的重要农民武装力量，但在战略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满足于既得胜利而不求更大发展的弱点，因而这两支农民军也都始终未能冲出河北或江淮的活动地区，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2、不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在不该决战的时机进行决战,此种主观指导上的失误,乃是造成农民军最后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杨广以后,以拥立杨浩为名,率军北上,企图逐鹿中原，夺取政权；而洛阳的杨侗也在杨广死后称帝，并在王世充等人扶持下，企图挽回已丧失的隋朝天下，因而他同宇文化及的矛盾十分尖锐。此时，正是农民军特别是瓦岗军，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发展胜利的极好机会。可是，李密非但没有利用这个矛盾，促使宇文化及同洛阳的王世充军互相攻杀，反而被杨侗所利用,作了隋朝皇室残余势力对抗宇文化及进攻的挡箭牌,结果使瓦岗军虽大败宇文化及军，却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实力。

在瓦岗军打败宇文化及军尚未来得及休整恢复之时，又逢洛阳王世充军乘机来攻。李密在召集众将研究对策时，依据来攻之敌极度缺粮而急于决战的企图和"东都兵马有三不可当"②的实际情况，本来是赞同裴仁基意见，主张采取坚壁不战、待机破敌的正确方针的，但在单雄信等多数将领的坚决反对下，竟"惑于众议而从之"③，定下了立即与敌决战的错误决心。加之李密因"新破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④，故在遭到王世充军的袭击

---

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② 《隋书》卷七十《裴仁基传》。为对付王世充军的进攻，李密在召集诸将会议研究对策时,曾正确地指出:"东都兵马有三不可当:器械精,一也;决计而来，二也；食尽求斗，三也。"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纪二》，高祖武德元年九月。

④ 《旧唐书》卷五十四《王世充传》。

后，瓦岗军竟一败不可收拾，以至最后彻底解体。

3、三大农民军之间在战略上缺乏积极配合和协同动作，也是导致义军失败的一个原因。

瓦岗农民军、河北农民军和江淮农民军，是最终摧毁隋王朝统治的三大农民革命武装力量，他们要维持自己的存在与发展，除须正确地发挥各自的主观指导之外，还须相互之间能够密切配合和协同动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各自为战的三大农民军，形成互相支援、积极配合、密切协同的战略整体力量，予敌以致命性打击，使自己获得生存和更大发展的条件。综观隋末农民起义战争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起义全面爆发的时期，诸路义军基本上是处于分散作战、互不配合，甚至相互火并的状态；当瓦岗、河北、江淮三支义军发展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三大主力之后，虽曾出现过河北农民军七里井大败隋将薛世雄军，粉碎了杨广企图调遣此军南下围攻瓦岗军的阴谋，因而在客观上起到了策应瓦岗农民军进攻洛阳作战的作用，但从隋末农民起义战争的全过程来看，三大起义军仍然处于独立作战、自我发展的状态。大业十三年（617 年）九月，正当三大农民军顺利发展之时，河北农民军领袖窦建德曾以“遣使附密”①的实际行动，主动向瓦岗军伸出联合之手，但史载此时志满意骄的李密，对此竟未作出积极的反应，相反，对于同样“遣使附密”而活动于汉水下游的地主武装首领朱粲，李密却委以扬州总管，封为邓公。李密对同一问题所持的两种不同的对待态度，是其贵族出身的阶级局限性之所使，此种政治立场的明显逆转，最终使瓦岗军失去了与河北农民军携手联合、共同发展的机会。其后，诸路农民军在各自为战的斗争中而先后遭到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无疑与他们相互之间在战略上缺乏主动积极配合有很大关系。

---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九月。

第六章　隋代军事思想与名将事略

隋朝在其存在的38年中，前后经历了隋初统一南北和隋末农民起义两次规模颇大、影响深远的战争。战争与军事的实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隋朝军事思想与军事学术的发展，而且造就了一代著名军事将领。

第一节　军事思想

隋朝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但随着战争与军事实践的深入发展，总结战争与军事实践经验并给战争与军事活动以理论指导的军事思想，却较动荡、分裂的南北朝诸国有所前进和发展。据唐代史学家魏徵主编的《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载录，隋代流行① 的各种兵学著作有"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之多。这说明隋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学术是比较活跃的。在隋代流行的诸多兵学著作中，既有许多隋以前历代著名兵书，也有不少隋朝军事将领撰写的军事著作。现据文献记载，可以确认为隋人撰写的军事论著，有隋文帝时大将军赵煚的《战略》二十六卷②；大都督

---

① 根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版）考证，中国雕板印刷术始于唐朝贞观十年（636年），隋代尚无印刷术，当时是以钞本书籍而流行于世。

② 见《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又见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子类·兵家》。

刘祐所著兵书有《金韬》十卷、《阴策》二十卷①，其中《金韬》一书是"奉诏"撰写，书成后受到隋文帝杨坚的赞赏②；还有上仪同萧吉所撰兵书《金海》三十卷③、《孙子注》一卷④，等等。以上所述隋人所撰兵书虽因年久失传，具体内容不得其详，但这并不妨碍有隋一代军事学术活动的客观存在。综观隋代军事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能够比较集中反映隋代军事思想发展水平的代表人物，一是封建帝王杨坚，一是农民起义领袖李密。

一、杨坚军事思想

杨坚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世家，生于西魏大统七年（541 年），卒于隋仁寿四年（604 年），终年 64 岁。从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担任宰相执掌北周朝政，到次年称帝建立隋朝以后，在其连续执政的 25 年中，杨坚先后组织指挥平定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人相继发动的"三方之乱"⑤，组织指挥并取得了北击突厥、南灭陈朝等重大战争的胜利。从其全部军事与战争实践活动中，可以明显看到，作为隋朝开国皇帝的杨坚，他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颇有建树的政治家，而且也是隋唐时期富有谋略、战绩卓著的军事家。据《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载录，杨坚曾有《新撰兵书》三十卷⑥，但可惜的是，该书早已散佚失传。今天，

---

① 见《隋书》卷七十八《刘祐传》。但《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载录："《阴策》二十二卷"。

② 《隋书》卷七十八《刘祐传》载称：刘祐"奉诏撰写兵书十卷，名曰《金韬》，上善之"。

③ 见《隋书》卷七十八《萧吉传》、《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

④ 见宋郑樵《通志》卷六十八《艺文略第六》。

⑤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⑥ 《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称为"《新授兵书》三十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兵家》称为"《隋高祖兵法》三十卷"。

我们虽然无法从杨坚自撰兵书中研究其军事思想，但从其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仍可窥见其军事思想的某些精华。兹将其主要军事思想观点分述如下：

（一）“以伐罪吊人”为目的的战争观

隋军平陈战争胜利后，一次，杨坚在“大宴百僚”① 的庆功会上，当其讲到平陈战争目的时说：“朕平陈国，以伐罪吊人，非欲夸诞取威天下。”②通观杨坚执政后的长期军事与战争实践，可以说，“以伐罪吊人”为目的的思想，乃是集中体现杨坚战争观的一个基本思想观点。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杨坚主张要行仁义之师，以伐罪抚民为目的，反对肆杀无辜的残暴行为。开皇元年（581 年）八月，居于今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出兵扰掠隋地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为了迅速制止吐谷浑的袭扰，巩固西北边防安全，杨坚命以乐安公元谐为行军元帅，率领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数万步骑兵前往河西反击之。行前，杨坚诏命元谐，强调指出：“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③杨坚的这一诏命，不仅阐明了对吐作战乃是为了“自宁疆境，保全黎庶”的政治目的，而且指明了抚绥敌众所应采取的“晓示以德，临之以教”的策略方法，从而为隋军确立了以军事进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正确作战方针。此后，元谐等将遵循杨坚的命令，在以武力击退吐谷浑数万劲骑进攻之后，又“移书谕以祸福”④，致使吐谷浑“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⑤，从而取得了反击作战的完全胜利。战后，杨坚以元谐作战有功，特下诏予以褒奖，盛赞元谐是“识用明达，神情警悟，文规武略，誉流朝野”⑥的一代名将。开皇九年（589 年）二月，在隋军攻占陈都建康、灭亡陈朝以后，杨坚为了迅速控制岭南地区，命以江州总管韦洸率军南进。杨坚在给韦洸的命令书中，再次强调指出：此次军事行动“若使

---

①②③④⑤⑥ 《隋书》卷四十《元谐传》。

干戈不用，兆庶获安，方副朕怀，是公之力”①。韦洸则严格遵循杨坚的旨意，率军进至广州（今属广东）后，采取政治争取的策略，说降了原陈朝镇南大将军王猛，兵不血刃地取得了收复岭南二十四州的重大胜利。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在战争问题上不以大张杀伐为乐事，主张“以伐罪吊人”为目的，这是贯穿杨坚全部战争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从此点出发，他所提出的“自宁疆境，保全黎庶”和“干戈不用，兆庶获安”的主张，对瓦解敌军、争取民心有积极作用，也是隋军攻取战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以练兵、选将为内容的治军思想

杨坚出生于军事贵族世家，祖祯，北魏宁远将军；父忠，从宇文泰开创关中政权有功，而官至柱国大将军，爵封隋国公。杨坚在将门家风的薰陶下，自幼习兵善武，15岁即任西魏车骑大将军，16岁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领府兵。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72～577年)，杨坚曾多次率军从平北齐，以战功卓著而进位上柱国、大司马。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担任大丞相，从此“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②。从杨坚在隋朝建立前的主要经历来看，他已是一位长期从军并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将领了。恰是这种长期的军旅生活和战争实践，使他懂得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于赢得战争胜利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特殊意义。因此，杨坚自担任北周重要军职以后，一向比较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并以治军亲身实践经验而形成他那颇具特色的治军思想。

杨坚治军思想的特点之一，是他不但重视军事训练，强调从严治军，而且亲自对部队将领“口授兵书，手画行阵，量敌制胜，指日克期”③。杨坚治军的这一特点，在其组织指挥平定尉迟迥等“三方之乱”的作战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在杨坚言传身教的推动下，极大地激发了部队训练的积极性。通过训练，“诸将遵其成旨，

---

① 《隋书》卷四十七《韦世康传附韦洸传》。

②③ 《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壮士感其大义，轻死忘生，转斗千里，旗鼓奋发，如火燎毛”①，迅速取得了平叛作战的彻底胜利。隋朝建立以后，杨坚为了巩固既得政权，实现统一南北的宏伟战略目标，从开皇伊始，就把军事训练作为治军的一项根本制度来抓，明确规定：“军人每年孟秋阅戎具，仲冬教战法”②。经过长期训练，终于把隋军建设成为一支颇有战斗力的，由步、骑、水师组成的武装力量。开皇九年（589年）初，杨坚一次即出动五十余万水、陆军，仅用个把月时间就一举灭亡陈朝。这一事实本身便足以说明杨坚重视部队训练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杨坚治军思想的特点之二，是他一贯重视军事人才队伍的建设，坚持文武兼备的选将任将标准。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杨坚下诏全国，指出：“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③。杨坚明令各地推举军政人才，这不仅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也是加强军队建设的需要。在铨擢军事人才方面，杨坚始终把选拔文武兼备的人才担任军队要职，作为其治军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这一点在杨坚给尚书左仆射杨素的诏书中有明显体现。仁寿二年（602年），杨坚下诏褒奖杨素时，说他是“志度恢弘，机鉴明远，怀佐时之略，包经国之才。……论文则词藻纵横，语武则权奇间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处，夙夜无怠”④。显而易见，杨坚这里所提出的“既文且武”的思想，实际是其选拔军事人才所一贯坚持的标准，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杨坚在进行平陈战争准备过程中，才把诸如高颎、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一大批文武兼备的人才，选拔担任重要将帅之职，并在对陈战争实践中，充分发挥了他们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为统一南北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三）“先北后南”的战争指导

---

①③《隋书》卷一《高祖纪上》。

②《隋书》卷八《礼仪志三》。

④《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之后，即立下了统一全国的宏图大志。但是，统一战争先自何处发起，杨坚在战略指导上，却经历了一个“先南后北”到“先北后南”的发展变化过程。杨坚称帝之初，便“潜有吞陈之志”①，并于开皇元年（581年）九月，派遣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总指挥，以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率军“大举伐陈”②。次年正月，当隋军“水陆俱进”③，即将渡江南下之际，恰遇陈宣帝（陈顼）病亡。行军元帅长孙览“欲乘衅遂灭之”④，但隋军总指挥高颎却“以礼不伐丧”⑤为由，奏请文帝批准而班师北归。杨坚中止隋军南下灭陈的作战行动，表面上虽是“礼不伐丧”的观念所使，但内里真实的原因，确是此时漠北的突厥南下袭扰的加剧，严重威胁隋朝新政权的安全，迫使杨坚不得不对既定的先南下灭陈的战略决策作重新考虑。隋建之前，居于漠北的突厥，常乘北周与北齐争战不休之隙，不断南下袭扰和掠夺；迫于突厥的军事威胁，周、齐争相采取送美女、输财帛的作法，企图结好突厥。可是，杨坚称帝建隋以后，一反周、齐软弱屈从的作法，而对突厥实行停送美女、财帛的强硬对抗政策。于是，为隋朝强硬对抗政策所激怒的突厥统治者，便乘隋朝政权初建尚待巩固之际，接连不断地派兵南下，对隋朝北部边境实施大规模军事袭扰。这不但严重威胁杨坚统治的安全，也给隋朝统一事业带来极大不利。因此，首先解决来自漠北突厥的袭扰威胁，巩固隋朝北部边防安全，便是摆在杨坚面前的当务之急和实现统一大业的首要战略步骤。有鉴于此，杨坚一改初衷，依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果断而适时地制定了先北击突厥、后南下灭陈的“先北后南”的总战略决策。从客观实际出发，对既定之策作出及时修正，以确保统一事业顺利实现的思想，这不仅是杨坚军事思想

---

① 《隋书》卷六十五《吐万绪传》。

② 《隋书》卷三十九《元景山传》。

③④ 《隋书》卷五十一《长孙览传》。

⑤ 《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的重要精华，而且是其较同时代诸多名将谋胜一筹的根本之点。其后，通过隋朝对突厥和陈朝前后两次用兵皆胜的战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杨坚所制定的"先北后南"的总战略决策，是完全符合客观情况和实践需要的正确战争指导。

（四）顺应形势发展需要的战略转变

在灭陈战争取得胜利，南北统一完全实现的新形势下，能不能顺应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在指导思想上实施战略转变，即把封建国家的工作重点由战争轨道转向和平建设，这是直接关系到隋朝政权能否巩固、经济能否发展、国力能否强大的根本性问题。对此，杨坚不但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上及时作了战略性转变。可以说，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指导思想上实施重大战略转变，这不仅反映了杨坚在治国方略上的明智，也反映了他军事思想精华的重要方面。

开皇九年（589年）四月，杨坚向全国发出诏书，明确指出："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① 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太平之法，方可流行"，是指在灭陈战争胜利结束后，南北统一已经实现的新形势下，隋朝应由以往"干戈方用"的战争状态，转向当今"率土大同"的和平时期。开皇十四年（594年）四月，杨坚再次颁诏全国，强调了"天下大同，归于治理"②的重要性。可以明显看出，两次诏书的内容集中体现了杨坚顺应新形势发展需要而实施战略转变的重要思想。隋朝由战争转入和平以后，摆在封建王朝面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这在上述杨坚所颁诏书全文中是有明确规定的，概言之，就是要求全国上下集中精力开展以"文治"为中心内容的和平建设事业。根据文献所载隋朝的实际作法，可以看出，杨坚在实施战略转变以后，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方面，开展建设事业的。在政治建设上，杨坚主要采取"制礼作乐"③和加强吏治、法制等措施，建立以维护隋氏王

①②③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朝统治为根本目的的封建政治秩序。在经济建设上，杨坚通过继续推行均田制，采取减免赋役、兴修水利、救灾济民等措施，着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文化建设上，杨坚采取搜求“遗文旧物”①和普建庠序等措施，弘扬传统文化和发展学校教育。

加强军队与国防建设，这是隋朝实行战略转变以后的重点工作之一。在由战争转入和平以后，军队的职能是什么，还要不要加强建设，杨坚对此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在开皇九年四月颁布的诏书中，杨坚认为在平陈战争胜利，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虽然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活动应当停止，即所谓“戎旅军器，皆宜停罢”②，但军队“禁卫九重”和“镇守四方”③的职能仍然不变。在国家实施战略转变以后，依然不放松军队与国防建设，这是杨坚军事思想的最为可贵之处。根据史载可以看出，杨坚在实行战略转变以后，为加强军队与国防建设，主要采取以下重大措施：1、完善府兵制度。在继承西魏创建的府兵制的基础上，经过多年改革与建设，杨坚于开皇十年（590年）十月，颁诏明确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④这样，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实行“兵民合治”、“寓兵于农”的新型府兵兵役制度，则完全确立起来。2、实行兵符制度。隋朝实行战略转变以后，杨坚先是于开皇九年闰四月，“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⑤；后于开皇十七年（597年）十月，再次“颁铜兽符于骠骑、车骑府”⑥。实行兵符制度，有利于隋朝封建中央对军队的统一管理与指挥。3、收缴兵器，禁止私造。开皇九年四月，杨坚下诏实行战略转变以后，曾规定：“人间甲仗，悉皆除毁”⑦；其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收缴兵器，并规定除“关中缘边”地区外，一律禁止私人制造兵器。⑧杨坚这样做，其主要目的，显然在于加强封建国家对武器装备的控制，以维护隋王朝的封建统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能够私造兵器的是那些

---

①②③④⑤⑦⑧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⑥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铜兽符，当为“铜虎符”，唐人讳改。

拥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官僚地主，而一般贫苦百姓是没有条件这样做的。因此，杨坚禁止私人制造兵器的措施，主要还是针对那些不法官僚地主而发。开皇十八年（598年），杨坚在其所颁收缴江南私造大船的诏书中，指出："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① 从上述诏书的全文看，杨坚此项收缴私船的措施，显然是针对开皇十年江南地主武装叛乱而发。因此，这一措施的实行，除有防范群众反抗之企图，还有反对不法地主反叛、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一面。

从上述四个方面不难看出，杨坚作为隋代著名军事家，不仅对战争和治军问题有其定见，而且尤在战略指导上有其独到之处，此点正是杨坚军事思想的基本特色。综观杨坚一生军事与战争实践活动，可以看出其军事思想发展脉络是，当南北分裂局面出现统一趋势之际，他不但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勇担统一全国的大任，而且善于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和具体实施计划，指导战争到胜利；而在取得北击突厥、南灭陈朝的胜利，完成南北统一大业之后，杨坚又能够顺应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适时将国内工作重点由以往从事战争，转变为当今的和平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就。杨坚此种"自强不息，朝夕孜孜"②的进取精神，既是构成其军事思想精华的基础，也是促使隋朝得以迅速发展，国家呈现"人庶殷繁，帑藏充实"③的兴盛局面的原因之一。

二、李密军事思想

李密是隋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之一。他出身于将门之家，曾祖李弼，北周开国功臣、八柱国之一；祖父耀，北周开府，邢国

---

①②③《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公；父宽，隋柱国、蒲山郡公，累世“皆知名当代”①。李密在前辈的教育和影响下，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隋大业初，以父荫任左亲卫侍等职，后遭炀帝疑忌而辞官归家专心读书，从师于国子助教包恺，学习《史记》、《汉书》，“尤好兵书，诵皆在口”②；以其“才兼文武，志气雄远”③，而深受当朝宰相杨素赏识，并因此而与素子杨玄感结“为刎颈之交”④。大业九年（613年）六月，杨玄感乘隋炀帝率军远征高丽之机，于黎阳起兵反隋，并推李密为“谋主”（军师）；八月，玄感兵败被杀，李密则辗转逃往淮阳（治宛丘，今河南淮阳）农村，隐姓埋名，“聚徒教授，经数月”⑤。后在全国农民大起义风暴的推动下，李密毅然弃教北上，投奔了瓦岗农民军。

李密参加农民革命斗争以后，以自己丰富的军事才学，积极出谋划策，为瓦岗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不断取得军事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而赢得瓦岗军创始人翟让的充分信任，在广大将士的拥戴下，一跃而为瓦岗军后期的领袖。李密虽然并没能把瓦岗军的反隋斗争引向最后胜利，但综观其参加农民革命后的全部军事实践活动，可以看出，李密不愧是杰出的隋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他在领导义军开展反隋斗争中，无论是制定战略策略，还是指导作战、治军，都有可供后人总结和继承的成功思想和经验。其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推翻隋王朝统治为根本目标的战略思想

这是李密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李密参加瓦岗农民军之初，该义军在翟让领导下，仅是一支“聚党万余人”⑥的小股农民军，它同当时许多义军队伍一样，既无明确的斗争纲领，又无巧妙的战略战术，主要活动在流经宋、郑二郡的汴水水域，以“劫公私船取物”⑦为目的。因此，瓦岗军在当时全国兴起的诸路农民起义队

---

①⑤⑥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②③④ 《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⑦ 《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

伍中并无多大影响。李密参加瓦岗军后，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义军队伍，他以积极的态度向翟让建议，制定一个明确的反隋斗争纲领，以引导瓦岗军夺取更大胜利。李密在通观隋朝政局形势后，向翟让指出："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刘、项奋起之会。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① 李密一席精辟分析和积极建议，翟让听后茅塞顿开，不禁"深加敬慕"②，完全予以采纳。不久，李密在建议袭取洛口仓以壮大义军队伍时，再次提出"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③的口号，又为翟让所采纳。这样，瓦岗军一个以推翻炀帝暴政、夺取隋朝政权为根本目标的战略计划，在李密的积极倡导下制定出来了。从此，瓦岗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很快便由"旦夕偷生草间"④的小股义军，发展成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三大主力军之一。

李密以推翻炀帝暴政、夺取隋朝政权为根本目标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始于大业九年他参加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后，逃匿于淮阳农村教书的数月中。李密在此期间，由于目睹了广大农村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更加激起他对隋朝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他在自撰的五言诗中这样写道："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涂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⑤ 读此诗文，不难看出，这岂但是一首抒发个人"郁郁不得志"⑥的伤感诗，简直是

①②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

⑤⑥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又见《隋书》卷七十《李密传》，但诗文略异。

一篇观点鲜明的讨隋檄文！诗中不仅饱含着李密对隋末黑暗社会的揭露（“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还蕴藏了他要奋起推翻隋朝统治的决心（“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李密把炀帝统治比作秦始皇暴政的继续（“秦俗犹未平”），而寄希望于继秦而兴的汉朝刘邦式的统治的到来（“汉道将何冀”），并决心作一个以推翻隋朝统治为己任的“世上雄”。这说明，李密后来决意投身于农民革命斗争洪流，绝非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大业十三年(617 年)九月，李密在写给泰山道士徐鸿客的招聘书中，明确地表白了自己参加反隋农民起义斗争的动机和目的。他说：“孤门承世胄，地藉余绪，平生大志，岂图富贵？只为时逢板荡，代属艰虞，厌海水之群飞，悯苍生之涂炭，便与二三人杰，百万武旅，欲受降于轵道，将问罪于商郊”；“除暴静乱，方称君子，赞我兴运，今也其时”。① 可见，李密参加农民起义军的目的，不是为了贪图富贵，而是为了“除暴静乱”，推翻炀帝的反动统治，以拯救深遭涂炭的“苍生”。这标志着李密虽系“门承世胄”的贵族知识分子，但其阶级立场却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点恰是李密投身于农民革命斗争后，所以能够积极为瓦岗军出谋划策的原因所在。

（二）以夺取隋朝粮仓、壮大义军队伍为首要任务的扩军、建军思想

这是构成李密军事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李密在为瓦岗军制定了以灭隋夺权为宗旨的斗争纲领以后，始终把扩大义军队伍作为主要任务。为此，他受翟让派遣，往来于诸路义军之间，积极做义军的联合工作，终于把附近诸小股义军都团结在瓦岗军的旗帜之下。随着义军队伍的扩大，李密意识到，瓦岗军要想求得更大发展，进而实现“席卷二京，诛灭暴虐”的总战略目标，关键在于建立一支兵强马壮的农民起义队伍，而要建立一支兵员雄厚的武装力量，必须首先解决义军赖以生存、发展的粮物供应等后

① 《全唐文》卷一三一《李密·招道士徐鸿客书》。

勤保障。为此，李密及时向翟让建议说："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弊，大敌一临，死亡无日矣！未若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① 翟让听后欣然采纳。这样，李密所提出的"直取荥阳，休兵馆谷"的作战方略，便成为瓦岗军获取生存与发展条件的首要战略步骤。其后，瓦岗军在此作战方略的指导下，攻陷了隋朝富粮地区的荥阳郡所属大多数县城，歼灭了隋军中原主力之一的张须陁部，从而为瓦岗军的生存与发展，获取了有利条件。

在瓦岗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李密不但没有满足于既得的军事胜利，相反，他依据对整个斗争形势的分析，又在酝酿一个义军更大的发展计划，即夺取隋朝两大粮仓以壮大义军队伍的作战计划。他向翟让建议说："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②李密此一建议的战略意图是，夺取隋朝粮仓以进一步扩大义军队伍，为进攻东都洛阳创造条件。不管选择洛阳作为实现"席卷二京，诛灭暴虐"这一总目标的首攻战略突破口是否得当(其后作战实践证明，选择洛阳作为瓦岗军的战略突破口，是李密战略决策的一大失误)，而李密那种胜利面前不停步，敢于斗争、积极进取的思想，确是为起于"陇亩之间"③的翟让所不及的可贵之处。因此，李密这个夺取隋朝粮仓以扩大义军队伍的战略构想一提出，便再次为翟让所采纳。其后，李密与翟让率领瓦岗军先后攻占了隋朝兴洛仓（亦称洛口仓）和回洛仓两大粮储基地，并开仓救济饥民，深受广大群众拥护，远近民众纷纷参加起义军。从而使瓦岗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拥有数十万"威声大振"④的农民武

---

①②③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二月。

装力量。

李密建军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不仅仅注重从数量上扩大瓦岗军，更重要的是注重从质量上建设瓦岗军。史载李密非常重视军事训练，经他统御训练的义军，其“军阵整肃，凡号令兵士，虽盛夏皆若背负霜雪”①，这充分说明了李密从严治军的思想特点。正是在李密严格要求、严格训练的治军思想指导下，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起义队伍中最能战斗的三大主力之一。

（三）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配合的策略思想

这是李密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业十三年（617 年）二月，瓦岗军在李密的运筹之下攻占兴洛仓以后，又一举歼灭隋军主力刘长恭所部 2.5 万人。李密以其足智多谋和卓著战绩，而赢得了瓦岗军广大将士的信赖和拥护，翟让“于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②。从此，李密便成为瓦岗军的最高领袖。统军作战的实践经验，使李密认识到，要实现灭隋夺权这一根本战略目标，不仅要从军事上给隋军以强大打击，而且还要从政治上给隋王朝以有效瓦解；只有把开展政治攻势与实施军事打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灭隋夺权这一根本目标。因此，李密在同年四月指挥义军袭占洛阳北之回洛仓以后，一面令部队据此仓城“大修营堑”③，从军事上做好进攻东京洛阳的准备，一面令记室祖君彦“作书以移郡县”④，以笔代剑，向隋王朝展开政治攻势。这篇长达近 3000 字的讨隋檄文，既表白了李密灭隋的坚强决心，又体现了李密斗争的策略思想。该文一方面以大量事实历数了隋炀帝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恃众怙力、穷兵黩武，妒贤嫉能、滥施淫威等十大罪状，揭露了在以炀帝为首的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下，“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⑤的悲惨社会情景，号召广大人民奋起推翻隋朝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它以犀利的笔触讴歌了“四方起义，足食足兵，无前无敌”⑥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指明了隋朝已完

---

①②③④⑤⑥《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全处于人所“共识殷亡”① 的穷途末路，敦促广大“隋代官人”②要认清形势，“识机知变，迁殷事夏”③；规劝他们要反戈一击，投身革命，“共建功名”④；警告他们不要“守迷不反”⑤，否则将后悔莫及。

李密在指挥瓦岗军对隋军作战中，由于正确运用以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配合的斗争策略，首先给隋朝最高统治者以极大心理震慑，迫使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派人赴江都奏报，请求炀帝速返洛阳应付危局，并发出了“不然者，东都决没”⑥ 的哀鸣；而炀帝听后则“为之改容”⑦，一筹莫展。其次，大大加剧了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加速了以炀帝为首的隋王朝统治垮台的进程。李密发出讨隋檄文是在大业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而隋太原留守李渊及其子李世民于晋阳起兵反隋是在同年五月十五日，这两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之如此紧密，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联系的。这从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起兵战略的一段对话可以得到印证。刘文静本晋阳令，“有器干，倜傥多权略”⑧。李渊奉命出任太原留守之初，文静察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⑨；其后，文静因与李密有连姻关系，而被炀帝下令拘捕入狱。在李密发出讨隋檄文后不久，李世民以探监为名，入狱与刘文静谋议起兵之事。文静指出：“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⑩李世民听后欣然采纳。于是，一个于晋阳起兵，尔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的战略计划制定出来了。从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起兵时谈及“李密长围洛邑”一事来看，说

---

①②③④⑤ 《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⑥⑦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⑧⑨⑩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

明李渊父子其后不久于晋阳起兵反隋，恰是在李密对隋朝统治者采取重大军政攻势的影响下发生的。李渊父子是隋朝统治支柱关陇贵族军事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的起兵反隋，标志着隋朝统治集团的进一步分裂和崩溃。可见，李密军政结合的策略思想的正确运用，起到了加速隋王朝灭亡的重要作用。

李密参加农民起义斗争以后，在其领导瓦岗军同隋朝反动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尽管犯有不可原谅的杀害翟让的严重政治错误和战略首攻方向选择不当的重大失误，然而，综观其参加和领导农民起义后的全部实践，可以看出，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瓦岗军的发展壮大所做出的业绩，却是光辉而不容抹杀的。特别是制定灭隋夺权的总战略决策、建设义军队伍、运用军政策略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李密军事思想，均是高出于同时期的其他农民义军领袖思想水平的。李密不愧是知识分子型的隋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

第二节　名将事略

隋朝建立以后，在实施统一战争和巩固国防的斗争实践中，涌现出一批著名军事将领，诸如“有文武大略”的高颎，“驭戎严整”的杨素，“倜傥英略”的贺若弼，“武毅威雄”的韩擒虎，等等。他们各以自己不同特色的军事才华，为隋王朝统一事业的开创，做出了名标青史的贡献。

一、“有文武大略”的高颎

高颎，又名敏，字昭玄，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生年不详，卒于隋大业三年（607 年）。他出身于世宦之家，曾祖皓为北魏卫尉卿，祖父孝安官至兖州刺史。父宾先仕东魏，任谏议大夫，后避谗弃官奔归西魏，为杨坚之岳父、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

佐，并赐姓独孤氏；北周时，官至骠骑大将军，以其“敏于从政，果敢断决”① 而著称于世。高颎在先世良好教育和影响下，自幼器度不凡，聪敏好学，“略涉书史，尤善词令”②。17 岁时，为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周武帝时，任内史上士，寻迁下大夫。后因参加灭齐战争有功，拜官开府。

自请监军，初显才华 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五月，杨坚总摄朝政以后，以高颎精明强干、知兵多谋，而招之为相府司录，“委以心膂”③。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发动武装叛乱，遣其子惇率步骑兵 8 万进屯武陟（今河南武陟西南），杨坚派遣总管韦孝宽为帅统领关中诸军东讨，由于“诸将不一”④，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而滞留不进。为加强东征诸军的统一指挥，杨坚打算派遣相府司马刘昉或长史郑译一人前往监军，但他们或借口“未尝为将”，或“以母老为请”⑤，而拒绝出任监军。此时，身居相府司录之职的高颎，因见刘、郑二人“并无去意”⑥，遂主动请行前往监军，杨坚欣然准请。高颎奉命进抵河阳后，协助孝宽督总诸军筑桥过沁水，大破武陟的叛军，并乘胜挥军追击北上，以迅猛之势进至邺城（魏郡郡治，今河南安阳）之下，尔后又以计设阵，大败叛军于西门豹祠南，叛首尉迟迥“穷迫自杀”⑦。平叛作战结束后，杨坚以高颎监军作战有功，将他进位柱国，并升任其为相府司马。

灭陈献策，谋深虑远 北周大定元年（581 年）二月，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建隋后，即任命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又拜左卫大将军、左领军大将军等职，并进封渤海郡公。自此，杨坚每呼其为独孤而不名，其隆遇之盛，“朝臣莫与为比”⑧。高颎的这种特殊政治地位，为他尔后施展军事才华提供了便利条件。

---

① 《北史》卷七十二《高颎传》。

②③④⑥⑧ 《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⑤ 《隋书》卷三十八《刘昉传》。

⑦ 《北史》卷六十四《韦孝宽传》。

隋朝建立以后，杨坚为了实现南下灭陈、统一南北的战略目标，在加紧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物质准备的同时，广泛征求臣下意见以制定灭陈战略实施计划。在此期间，高颎以其聪明才智，积极向文帝杨坚进献“取陈之策”①。综观高颎所献之谋策，其要点有二：一是采用佯动误敌之法，麻痹陈军，以削弱和瓦解陈朝江防能力。具体作法是，利用江南收获季节，调集一部兵马，采取虚张声势之法，摆出攻陈架式，使陈朝匆忙屯兵防守，以此延误其农时；待其大军齐集后，隋军便解甲收兵。如此反复多次，陈军便习以为常，麻痹不备，从而为隋军其后渡江灭陈减少障碍。二是采用遣谍入境之法，破坏陈朝后方物资储备。具体作法是，密遣间谍潜入陈境，采用“因风纵火”②之法，焚毁陈朝的物资储备，破坏其物力财力。高颎认为，如上述之策得以实施，那么，不出数年，陈朝“自可财力俱尽”③。十分明显，高颎的上述建议，是从敌情实际出发，首先破坏陈朝的军力和国力，然后乘其势衰不备之隙予以突袭的战略构想。杨坚听后完全采纳实行，并且收到致“陈人益敝”④的实际效果，为此后隋军南下灭陈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皇八年（588 年）底，长江上游的隋军在秦王杨俊指挥下，首先向陈发动进攻。接着，长江下游的隋军也在晋王杨广统率下“大举伐陈”⑤。当时，高颎担任杨广元帅府长史，“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⑥，从而为协助杨广大举伐陈，做出了卓越贡献。平陈战争胜利结束后，杨坚以颎功高而加授其为上柱国，进爵齐国公，并下诏褒奖他是“识鉴通远，器略优深”⑦的天辅良将。

不恋权位，功高益谦　这是身居宰相兼将帅的高颎思想政治品质的突出特点。开皇初年，隋文帝授任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之职后，颎为避权势，立即“上表逊位，让于苏威”⑧。杨坚本欲成其让贤之美，听解仆射一职，但经数日考虑，认为：“苏威高蹈（谓隐遁不仕）前朝，颎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去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官！"① 于是，不仅仍命高颎担任相位，而且还先后任命他担任左卫大将军、左领军大将军等职。平陈战后，一次杨坚命高颎与贺若弼各言平陈战事，颎非常谦逊地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军论功！"②杨坚听后大笑，褒美高谦让可敬。

竭诚尽节，举贤荐能 这是身居宰相兼将帅的高颎思想政治品质的又一突出特点。高颎自开皇元年（581年）受任尚书左仆射一职，到开皇十九年（599年）被谗免官，在连续担任宰相长达19年的时间里，不仅竭尽全力地为治理朝政、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充分发扬"伯乐精神"，举荐大批贤臣良将担任王朝军政要职。诸如尚书右仆射苏威，上柱国杨素，大将贺若弼、韩擒虎等人，都是由高颎举荐而"各尽其用"③的一代名臣良将。至于为高颎所荐而能"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④。

史称高颎是一位"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的"真宰相"⑤。在其执掌朝政19年的政治生涯中，隋朝呈现"治致升平"⑥的繁荣昌盛局面，是与高颎的政绩分不开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兼备的奇才、竭诚尽节的贤相，其后竟因反对隋炀帝杨广的"侈靡"行为，而被扣以"谤讪朝政"⑦的罪名给杀害了，成为"天下莫不伤惜"⑧的一位含冤饮恨的历史人物。

二、"驭戎严整"的杨素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生年不详，卒于隋大业二年（606年）。祖暄，北魏辅国将军、谏议大夫；父敷，北周汾州刺史。出身于将宦之家的杨素，自幼胸怀大志，深为其叔祖北魏尚书仆射杨宽所看重，夸他将来当是"逸群绝伦，非常之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隋书》卷四十一《高颎传》。

器”① 的人物。素少时曾与牛弘（隋文帝时吏部尚书）同窗共读，由于他勤奋好学，对古代典籍“研精不倦，多所通涉”②。及长，以其学优，乃为北周宰相宇文护引为中外记室，后转礼曹，加大都督。周武帝时，官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率兵参加灭齐战争，以其“每战有功”③，加位上开府，爵封成安县公。

攻陈任帅，战功卓著 杨坚担任北周宰相后，以杨素为汴州刺史。以素参加平定相州总管尉迟迥叛乱有功，进其位为柱国，封清河郡公。杨坚取代北周称帝以后，为了实现统一南北的战略任务，在大力改革内政、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抓紧进行南下灭陈的战争准备。此时，已居上柱国之位的杨素，以积极的态度“数进取陈之计”④，受到隋文帝杨坚的极大重视。不久，杨素奉命出任信州总管，坐镇永安（即巴东，位于今四川巴东西北），监造战船，训练水军，为攻陈作战作准备。开皇八年（588 年）末，灭陈战役发起时，杨素受任为长江上游隋军行军元帅之一，他亲率大批舟师自永安乘流东进，直趋长江三峡。当水师进至流头滩（今湖北宜昌西北）时，杨素鉴于拒守狼尾滩（位于流头滩东）的陈军兵力较强，昼间进击易被发现的实情，乃改为夜间实施水陆齐击，一举而歼灭该地守敌。尔后，杨素挥军乘胜东进，先后击溃或歼灭岐亭、安蜀、公安等地大量陈朝守军，致使陈自“巴陵以东，无敢守者”⑤。接着，杨素在收降陈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后，率军迅速东下，进至汉口（今湖北武汉），与先期抵达的行军元帅、秦王杨俊所部会师，从而切断了长江上游陈军东撤“入援建康”⑥之路，确保了长江下游隋军渡江灭陈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战后，杨素以指挥作战有功，升任门下省纳言，爵封越国公。

江南平叛，再建新功 开皇十年（590 年）十一月，长江以南地区，原陈朝一些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士族豪门势力，发动武装叛乱，“大者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杀害长吏”⑦。面对江

---

①②③④⑤⑦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⑥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一月。

南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杨坚采取果断措施，命以杨素为行军总管，率领大军渡江进讨。杨素率军自杨子津（今江苏扬州东南之长江渡口）渡过长江，以迅猛之势先后击败京口（今江苏镇江）的朱莫问、晋陵（毗陵郡郡治，今江苏常州）的顾世兴、无锡（今属江苏）的叶略、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西南）的沈玄恰、婺州（治金华，今属浙江）的汪文进、越州（治今会稽，浙江绍兴）的高智慧、永嘉（治括苍，今浙江丽水东南）的沈孝澈、乐安（今浙江仙居）的蔡道人、南安（今福建泉州西北）的王国庆等大股叛乱势力，“自余支党，悉来降附，江南大定”①。平叛作战胜利后，杨素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自此出将入相，“与高颎专掌朝政”②。

北击突厥，灵活用兵 史称“素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③。这的确是杨素用兵作战的重要特点。开皇十九年④（599年），突厥达头可汗率领10余万骑兵南下侵扰，杨坚命以杨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北上迎击之。交战前，诸将为防突厥骑兵的强大冲击，皆主张采取“以戎车步骑相参，设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⑤的作战布势。杨素在听取了诸将众口一致的主张后，指出此种“方阵”战术，仅是防御自固之方，而非进攻取胜之道。“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⑥，乘突厥军初至立阵未稳之隙，挥军奋击，大破之，致“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⑦。仁寿元年（601年），突厥再次南犯，杨素受任为行军元帅，亲率骑兵北出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⑧。自此，突厥远遁，“碛南无复虏庭”⑨。杨素从敌情实际出发，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充分发挥骑兵的强大冲击力，多次打败南犯的突厥军，为巩固隋朝北部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 《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④ 突厥达头可汗率军南犯时间，《隋书·杨素传》作“开皇十八年”；本书这里从《隋书·高祖纪下》、《隋书·突厥传》和《资治通鉴》说。

驭戎严整，赏罚分明　杨素一生主要是在为实现隋朝统一大业和巩固封建中央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度过的。从其全部军事与战争实践活动中，可以明显看出，杨素所属部队是颇有战斗力的。而其部队之所以往往打胜仗，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杨素“驭戎严整”①，治军得力，严格贯彻赏罚制度。在作战中，对于违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②；但对奋勇杀敌者，则“微功必录”③，及时奖赏。因此，尽管杨素对下十分“严忍，士亦以此愿从焉”④。可见，从严治军，赏罚分明，这既是杨素身为将帅的突出特点，也是其“战无不胜，称为名将”⑤的重要原因。

三、“倜傥英略”的贺若弼

贺若弼（544～607年），字辅伯，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祖父若统，西魏时任右卫将军、刺史等职，以勇健著称。其父若敦，官至西魏骠骑大将军；北周时先后受任总管、刺史等职，“以武烈知名”⑥，后为宰相宇文护所忌杀，刑前呼若弼而嘱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⑦少年若弼牢记在心，含泪与父诀别。为了实现父愿而报效国家，若弼一面苦练骑射本领，一面博涉典籍学问，终以精武善文而“有重名于当世”⑧，并为北周齐王宇文宪所赏识，引为王府记室。不久，受封当亭县公，升任小内史。大象元年（579年），若弼在从行军元帅韦孝宽对陈作战中，积极出谋划策，为周军取得“攻拔数十城”⑨的作战胜利，作出了贡献。周宣帝以其作战有功，升任其为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刺史，改封襄邑县公。

出镇广陵，积极备战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以后，矢志于南北统一大业。为此，他积极选拔得力

①②③④⑤《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⑥⑦⑧⑨《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

将领戍镇江淮，预作灭陈的战争准备。根据尚书左仆射高颎的推荐，杨坚任命“有文武材略”① 的贺若弼为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事”②。若弼欣然领命出镇广陵（吴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以后，抓紧整军备战，并“献取陈十策”③，受到杨坚赞赏，赐其宝刀，以资褒奖。

在戍镇吴州的过程中，若弼积极运用谋略于备战工作，充分展现了他那“倜傥英略”④ 的军事才华。他一方面暗中“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⑤，又购一批不堪使用的破船放在江边明处，令陈人看见后以为隋军并无渡江战船，以此种隐真示假之法欺骗和麻痹对方，为渡江作战做好物质准备。另一方面，若弼采取佯动惑敌之法，利用部队每次换防机会，集兵于江边，“大列旗帜，营幕被野”⑥，佯作渡江之势，制造紧张空气。但当陈军匆忙调兵遣将进行防守时，即令隋军撤散。如法泡制，多次反复之后，陈军便习以为常，“不复设备”⑦了。从而为隋军尔后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乘隙渡江，所向披靡 开皇九年（589年）春，继长江上游隋军对陈发动进攻后，长江下游的各路隋军在晋王杨广的指挥下，也发起了渡江战役。当时，贺若弼担任行军总管，他所率领的部队是长江下游隋军进攻陈都建康的三大主力之一。是年正月初一这一天，建康的陈朝统治者完全沉醉于元会（春节）的欢庆之中。若弼利用江雾弥漫的有利天候，乘陈军江防极度松弛之隙，亲率部队自广陵偷偷渡江，出敌不意地一举袭占京口（陈南徐州州治，今

---

① 《周书》卷二十八《贺若敦传》。

②⑥⑦ 《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

③ 《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另据《北史》载称：“平陈后六年，弼撰其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这里所称之《御授平陈七策》，实乃《隋书》载称若弼所“献取陈十策”的主要内容。“七策”的原文详见《北史》卷六十八《贺若敦传附贺若弼传》。

④ 《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史臣评语。

⑤ 《北史》卷六十八《贺若敦传附贺若弼传》。

江苏镇江），生擒了陈朝南徐州刺史黄恪，俘获陈军六千余人。尔后，率军逆江而上，直趋陈都建康。若弼军令森严，纪律严明。凡发现有违纪从民间买酒的军士，立斩不赦。对待战俘，不但不准随意虐杀，且经抚慰而全部释放，并“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①。因此，隋军所到之处，民众热烈欢迎，陈军“望风尽走”②。正月初七，若弼率军进至建康城东之钟山（又名蒋山，今南京之紫金山），屯兵于白土冈（位于钟山南麓）之东。于此前后，隋军之韩擒虎部进至建康西南约20里处的新林浦，宇文述部抵达建康城北14里处的白下城。至此，隋军已对陈都建康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苦战钟山，钳制陈军 面对隋军即将攻城的危迫局势，昏庸腐败的陈后主先是一筹莫展，只知日夜啼哭；继而竟在毫无计划准备的情况下，强令陈军自白土冈向北20里的宽大正面上布成一字长蛇阵，企图阻击来自东面贺若弼军的进攻。正月二十日，若弼亲率8000甲士自钟山疾驰而下，冲向陈军一字长蛇阵的南端，但在陈军鲁广达部顽强抵抗下，攻势受挫，损兵二百余人。有鉴于此，若弼立即采取燃物“纵烟以自隐”③之法，掩护部队后撤，从而使受挫之隋军得以“窘而复振”④。其后，若弼根据陈军初战得手必生骄惰的实情，及时调整进攻部署，集中兵力，向陈军薄弱环节的北端阵地，发动猛烈进攻，迅速打败陈军孔范、萧摩诃两部，歼敌五千余人。就在贺若弼率军苦战钟山之际，西南方向的韩擒虎挥军自新林浦乘虚疾进，在陈军降将任忠的引导下，兵不血刃地进入建康城。接着，贺若弼挥军在彻底摧毁陈军一字长蛇阵之后，也进入了建康城。至此，陈朝宣告灭亡。

战绩卓著，功高当奖 在灭陈战争中，贺若弼以其勇敢善战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为隋朝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功高受奖，理所当然。然而，攻陈作战结束后，作为隋军总指挥的晋王杨广，

①②③④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对若弼非但不论功行赏，相反，竟“以弼先期决战，违军令”① 为由，将贺若弼“收以属吏”②，欲以军法处置。其实，杨广这种看法和处置是不公道的。因为，攻陈作战虽然预先有命韩擒虎与贺若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③ 的明令在前，然而，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一个好指挥员必须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才能指导战争走向胜利。当陈都建康已经处于三面被围的态势下，陈后主将陈军主力完全集中在建康城东，企图阻遏贺若弼军的进攻。面对此种形势，恰是贺若弼首先向陈军阵地发起攻击，以英勇奋战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把陈军主力钳制和歼灭在钟山之北，才使韩擒虎部得以自西南方向乘虚疾进，直趋建康。显而易见，韩擒虎部之所以能够兵不血刃地顺利进入建康城，是与贺若弼率部“在蒋山（即钟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④的实战结果分不开的。贺若弼作为隋军攻城主力的一员将帅，能够根据当面敌情实际，采取相应可行的战术，机动行事，以引导作战到胜利，这非但不是什么违犯军令的行为，相反，倒是其能因变制敌、灵活用兵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他那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明于此理的文帝杨坚，则采取了与晋王杨广完全相反的态度和作法，他不但不加罪于贺若弼，反而及时下诏给杨广，明确指出：“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⑤。随后，又亲自召见贺若弼，“命登御坐”⑥，以示殊荣，除给予其优厚物质赏赐外，还加其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拜官右领军大将军，寻转右武候大将军。从此，贺若弼进入“位望隆重”⑦的贵盛时期。

平陈之后，贺若弼随着自身名望的不断提高，逐渐滋生了居功自傲的情绪，“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⑧。开皇十二年（592 年），若弼因对杨坚任命杨素为尚书右仆射不满而“形于言色”⑨，遭到杨坚的疏远，先是免其官爵，继则下狱问罪。但

---

①⑥⑦⑧⑨ 《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

②⑤ 《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文帝开皇九年正月。

③④ 《隋书》卷五十二《韩擒虎传》。

杨坚因念其平陈功高，最后仅给以除名为民的处罚。一年以后，虽复其爵位，但不再任用。杨广即帝以后，对其更加疏忌。大业三年（607年），若弼以光禄大夫荣衔随杨广北巡突厥至榆林郡（治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因反对杨广侈靡之风，与高颎、宇文弢等人“私议得失”①，为人告发而被杀，时年64岁。

四、“武毅威雄”的韩擒虎

韩擒虎（538～592年），字子通，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人。父雄，以武烈知名，北周时官至大将军，洛、虞等八州刺史。擒虎在父辈影响下，少年即慷慨刚毅，“以胆略见称”②。他尚武好学，博览群书，经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尤爱研读孙、吴兵法③。因而为周太祖宇文泰所赏识，并令擒虎与其诸子交游为友。后擒虎以军功，拜官都督、新安太守，寻迁仪同三司，袭爵新义郡公。

东征南战，屡建军功 北周建德五年（576年），武帝宇文邕率军东征北齐，时韩擒虎领兵进攻金墉城（北齐洛州州治，今河南洛阳）。擒虎以其超人的胆略，说降了该城守将独孤永业，不战而克金墉。接着，擒虎挥兵北上，进平范阳（治今河北涿县）。灭齐战争结束后，周武帝以擒虎战功卓著，加其位上仪同，拜官永州（治今河南信阳北）刺史。后陈朝派兵进攻光州（治今河南光山），擒虎奉命以行军总管率兵击败之；继而又从大将军宇文忻进平合州（治今安徽合肥）。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杨坚担任宰相执掌北周朝政以后，为了加强江淮地区防务，乃任命韩擒虎为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刺史。时江南陈朝为宣帝陈顼执政，派遣甄庆、任忠、萧摩诃等将“共为声援，频寇江北，前后入界”④，严

---

①《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

②④《隋书》卷五十二《韩擒虎传》。

③ 据新、旧《唐书·李靖传》载称：隋初，韩擒虎常与其外甥李靖讨论孙、吴兵法。由此推知，韩擒虎少时喜读兵书。

重威胁北周江淮地区的安全。韩擒虎率兵奋起反击，“屡挫其锋，陈人夺气”①。自此，韩擒虎之名威震江淮。

夜袭采石，直趋建康　开皇元年（581 年），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后，即“潜有吞并江南之志”②。为实现灭陈统一南北之大业，杨坚“以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声名”③，拜其为庐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任”④。擒虎赴任至庐江（庐州治所，今安徽合肥）后，至攻陈作战前，在长达 8 年时间里，他以卓有成效的战备工作和“夙著声名”，而“甚为敌人所惮”⑤。开皇九年（589 年）初，长江下游隋军发起渡江战役，韩擒虎担任行军总管，其所部为隋军合围陈都建康的三大主力之一。是年正月初一，擒虎亲率 500 人为前锋，自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长江，乘敌醉饮不备，一举袭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全歼该地陈军。初七，攻克姑孰（今安徽当涂），俘获陈将樊巡，尔后转兵北上。由于江南素闻擒虎之威名，因而其兵锋所到之处，皆不战而克，先后收降陈将鲁世真、田瑞等。擒虎挥军乘胜继续北进，迅速抵达新林浦；接着，晋王杨广所遣行军总管杜彦率部与擒虎会师于新林浦，共有步骑兵 2 万人。这样，韩擒虎从西南方向与来自东、北两路隋军，对陈都建康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正月二十日，就在贺若弼率部苦战于钟山之时，韩擒虎乘建康城内空虚之隙，在降将任忠的引导下，亲率精骑 500 自朱雀门直入建康城，俘获了陈后主，陈朝宣告灭亡。战后，杨坚以其平陈作战有功，下诏予以褒奖，进其位为上柱国。

灭陈战争胜利后，韩擒虎一度调任凉州总管，率部屯驻于金城（今甘肃兰州），“御备胡寇”⑥。后调还京师长安。开皇十二年（592 年）十一月，因病逝世，终年 55 岁。

韩贺齐名，各放异彩　韩擒虎是与贺若弼齐名的隋代名将，他们在灭陈战争中，各以不同特点的指挥艺术和军事实践，为隋朝统一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诚如唐代史学家魏徵所评价指出的：

---

①②③④⑤⑥《隋书》卷五十二《韩擒虎传》。

“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擒（虎）奋发，贾余勇以争先，势甚疾雷，锋逾骇电。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废兴，考之人谋，实二臣之力。其倜傥英略，贺若居多，武毅威雄，韩擒称重。”① 这一评价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

①《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末史臣评语。

后　记

《隋代军事史》是《中国军事通史》的一个分卷，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笔者受命之后，自知功底浅薄，难当重任，因而非敢怠惰，用力颇勤。大凡学术观点、史实考辨、战略运筹、军制得失、国防设施、军事思想、人物评论，无不力求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历经三个春秋，两易其稿，于1992年12月终告完成。

完稿之后，送请北京大学吴宗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卢兆荫研究员评审；付梓之前，又蒙军事科学出版社的同志悉心阅改，他们既对拙稿多所奖挹，又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值此书稿出版面世之际，谨向诸位先生致以衷心的谢忱。书中疏漏不当之处，敬祈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作　者